目录

一　撤离延安　1

二　来到毛泽东身边　21

三　粉碎“重点进攻”　41

四　时刻不忘为民兴利除弊　52

五　在杨家沟的日子　65

六　惜别陕北　90

七　在西柏坡的日子（一）　110

八　在西柏坡的日子（二）　133

九　毛主席当红娘　147

十　他像父亲一样　162

十一　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173

十二　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182

十三　从双清别墅到菊香书屋　198

目录

十四　开国大典　222

十五　毛泽东和他的儿女们　230

十六　俭朴的一生　252

十七　毛泽东劝和　264

十八　建国后第一次出行　272

十九　爱心　280

二十　大风大浪不可怕　302

二十一　举起“三面红旗”　321

二十二　回韶山　338

二十三　毛泽东的一九五九　349

二十四　挥泪惜别　359

二十五　后来的故事　377

一　撤离延安

李银桥：我给周恩来当卫士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蒋介石在他的美国主子援助下，不顾全国人民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强烈要求，撕毁《双十协定》，从1946年夏天起，悍然大举进攻解放区，挑起了全面内战。中共中央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所在地陕甘宁边区，自然是他们进攻的重点。蒋介石指挥他的嫡系、国民党西北绥靖公署司令长官胡宗南，投入了34个旅，约25万兵力，分5路进攻陕甘宁边区。同时在西安集中了一支伞兵部队，企图突袭延安。

1946年10月，我所在部队358旅由内蒙古经山西调到

1946年6月，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毛泽东指挥解放区军民坚决进行自卫反击。图为毛泽东在陕北审阅有关文件

延安，准备迎击胡宗南的进攻。部队驻在延安东边的雀儿沟一带，旅部设在柳树店。当时，我在旅长黄新庭身边当特务员。358 旅政治委员是余秋里。他们俩工作配合默契，仗打得很好。

从 11 月开始，敌机不断进入延安上空骚扰。周恩来副主席、董必武同志和叶剑英参谋长从重庆先后回到了延安。延安的后方机关开始有计划地疏散。

1947 年 2 月，我奉命调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社会部警卫科长刘坚夫同志和我谈了一次话。

“李银桥同志，你在前方给首长当过特务员吧？”刘坚夫的神情表明他了解我的历史。

“我从 11 岁参军后，一直在首长身边当通信员、特务员。”我这样回答。其实，特务员就是勤务员，负责照顾首长的生活。

“参加过战斗吗？”

“参加过。在 358 旅青年连，参加了陕西爷台山和山西离石的战斗。调晋绥后，打凉城，打卓资山，又打包头，打进去又被打出来。”

“很好。组织上决定调你去周副主席身边当卫士，既要保护好首长安全，又要照顾好首长生活，你看怎么样？”

“我怕干不好呢。”

“你当过特务员，又打过仗，相信你一定能干好。好了，就这么定了。”

于是，我便来到周恩来身边。

那一天见面，周恩来握住我的手说：“你来我这里工作，愿意吗？”

我低着头说：“干太长了……我想到部队去。”

周恩来注视我片刻，温和地一笑，说：“想去部队也是好事么。

不过，你来我这里工作，我还是欢迎的。你工作两三年，我送你到学校学习去。”

当时，邓颖超同志也在场。邓大姐说：“我们是欢迎你来的。”

我说：“我怕干不好。”

周恩来说：“我的事情很简单，很有规律，就是生活上的事情，打饭，洗洗涮涮，你帮我料理料理就行。”

就这样，我给周恩来当了卫士。

元宵节到了，延安城内人流滚滚。从北关到新市场，从东关到大会场，一通通锣鼓，一队队秧歌。高跷、花灯、武术、杂耍，引来观者如潮，喝彩声如雷。入夜，街道两旁挂彩灯，放花炮，火球映红夜空。

可是，我们这些当卫士的却明白眼前的歌舞决不意味着升平，大战已经迫在眉睫。我们几乎天天跟随周恩来去参加重要会议，在会议室外，可以看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彭德怀等中央领导同志。他们的脸上带着平常的微笑，但他们的眼里，却漾出了战士冲锋陷阵时所特有的锐气。

开会回来，周恩来用他那柔和悦耳的声音问道：“小李，你说胡宗南这一次会不会来延安？”

“他过去已经叫喊过两次，这一次也许又是诈唬人。”我说。

“你要是这样想就危险了。这一次他是决定要来的。”周恩来两道浓眉毛扬了扬，望着我，“为什么说决定要来呢？因为国民党在全国打了许多败仗，被我们消灭了65个旅，活捉一百多个将军，损兵折将哟，所以他们决定要向我们边区出气。”周恩来轻轻点点头，露出自信的微笑，“他是决定要来出气，出了出不了气，可就由不得他

喽！”

3 月 5 日，国民党 29 军 48 旅佯攻陇东，企图牵动我军主力西向，以便乘虚突袭延安。可是，敌人弄巧成拙，佯攻不曾展开，西线我军根据毛泽东的命令，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夜便歼灭了敌 48 旅，击毙旅长何奇，并连夜赶往南线，准备迎击敌人主力进攻。

3 月 8 日，延安一万多军民在宝塔山下的商会大会场举行保卫边区的动员大会。毛泽东没有参加这次会议。朱德总司令和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到会讲了话。接着，周恩来走到主席台前。他从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分析了蒋介石独裁政府的处境，说明蒋介石已到了穷途末路，妄图拿进攻延安来挽救其垂死命运。党中央考虑到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悬殊，决定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主动放弃延安，在运动中寻机歼敌，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暂时放弃延安，是为了将来解放延安、南京、北平、上海，进而解放全中国。最后，他提高声音，充满激情地号召：“我们有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一定能够打胜仗。大家一条心，黄土变成金。大家动员起来，保卫我们的土地，保卫延安，保卫毛主席！我们一定能够胜利！”

会场上，红旗翻卷，步枪、红缨枪挺立如林，口号声惊天动地：“团结起来打胜仗！”“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

3 月 11 日，根据《双十协定》而派驻在延安的美军观察组，匆匆撤往国民党统治区。

3 月 12 日，延安上空出现美制蒋记轰炸机。当第一颗重磅炸弹落在人民解放军总部附近时，毛泽东、周恩来与彭德怀正在军用地图前研究迎敌方案。

这一天，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叶剑英等领导带领一部分机

关人员迁到瓦窑堡办公。毛泽东、周恩来留在延安，由枣园后沟搬到王家坪人民解放军总部办公。

3 月 13 日拂晓，胡宗南的 15 个旅分兵两路——右集团董钊，左集团刘戡，同时由宜川、洛川一线分路向延安发动猛攻。我们的部队利用梢林隘路和纵深工事展开英勇抗击。延安城内从早到晚都能听到前线隆隆震响的大炮声。

同时间，45 架敌机对延安实行狂轰滥炸，一整天没有停歇。

彭德怀紧急调来新四旅一个团守卫延安机场，准备歼灭敌空降兵，并亲自劝说毛泽东尽早撤离延安。

毛泽东对周恩来、彭德怀及身边工作人员讲了两句话，那平静而坚定的声音至今想来仍清晰在耳畔：

“我是要最后撤离延安的。”

“我还要看看胡宗南的兵是个什么样子呢！”

当时，守在窑洞内外的卫士和警卫人员都以为毛泽东只是笼统讲战略上藐视敌人的精神，并未当真。彭老总却立刻认真了，在院子里召集警卫人员严厉下令：“主席一向说到做到，一向不顾个人安危。我们党要顾，你们要顾！不许由着他的性子来，必要时，抬也要把他抬走！”

撤离延安前，毛泽东在批阅文件

下午，敌机轰炸王家坪，一颗重磅炸弹就落在毛泽东的窑洞前，

遍地是散落的弹片和烧黑的石头，窑洞前的大槐树被弹片削去一大块皮。空气里弥漫着硝烟和火药燃烧的辛辣气味。烟雾散去，毛泽东左手端着的茶杯竟动也没动，杯里的水不曾洒出一星半滴！而他右手的那支笔仍在地图上移动，那条调兵路线没打一点折扣！站在一旁的周恩来、彭总对那山摇地动的一声炸响毫无所动，目光追逐着毛泽东的笔尖……

爆炸声着实把我们吓了一跳，但眼前的情景却使我们镇定自若。

门忽然被推开了，警卫参谋贺清华冲进来，刚要叫喊什么，一见窑里的人们从容自若的情景，立刻闭了嘴巴。

“客人走了吗？”毛泽东看着地图问。

“谁，谁来了？”贺清华纳闷。

“飞机呀，”毛泽东用笔朝上指指，“喧宾夺主，讨嫌！”

于是，大家都笑了。

有人拿了一块落在门前的弹片给毛泽东看。毛泽东接过来掂量掂量，一本正经地说：“嗯，发财发财，能打两把菜刀呢。”然后对警卫排长阎长林说：“去，你们赶紧去查查群众受到什么损失没有？”

晚上，阎长林调查回来报告：“南门外炸死一头毛驴。”

“人呢？”毛泽东着急地问。

“赶毛驴的老汉被土埋住了，被人扒出后一个劲骂蒋介石。”

“损失一头驴，这笔账我们迟早要跟蒋介石讨。”毛泽东说罢，继续同周恩来、彭德怀讨论军事行动计划。

3月16日中午，毛泽东正同周恩来、彭德怀谈话，说：“群众发动起来了，其势如暴风骤雨……”

话音未落，轰隆隆两声巨响，天昏地暗。两颗重磅炸弹在门前

不远处同时爆炸。门窗玻璃全部震碎，气浪像强台风一样冲进来，窑洞受到震荡和冲击，嗡嗡作响。片刻，烟雾散去，窑内恢复光明。只见毛泽东用手在身上轻轻一掸，拂去烟尘，笑道："他们的风不行，连我一个人也吹不动。我们的风起来就不得了，要将他们连根拔哩！"

周恩来和彭德怀都放声大笑起来。

傍晚，新四旅的干部来了，汇报西华池阻击战的详情。汇报结束后，旅领导纷纷劝说毛泽东："主席，形势已经很紧迫，您应当马上撤离延安。"

毛泽东将手一拂，接着又在桌上轻轻一击："不要说了。我有言在先，我是要最后撤离延安的。"

李银桥：毛主席说"我们还会回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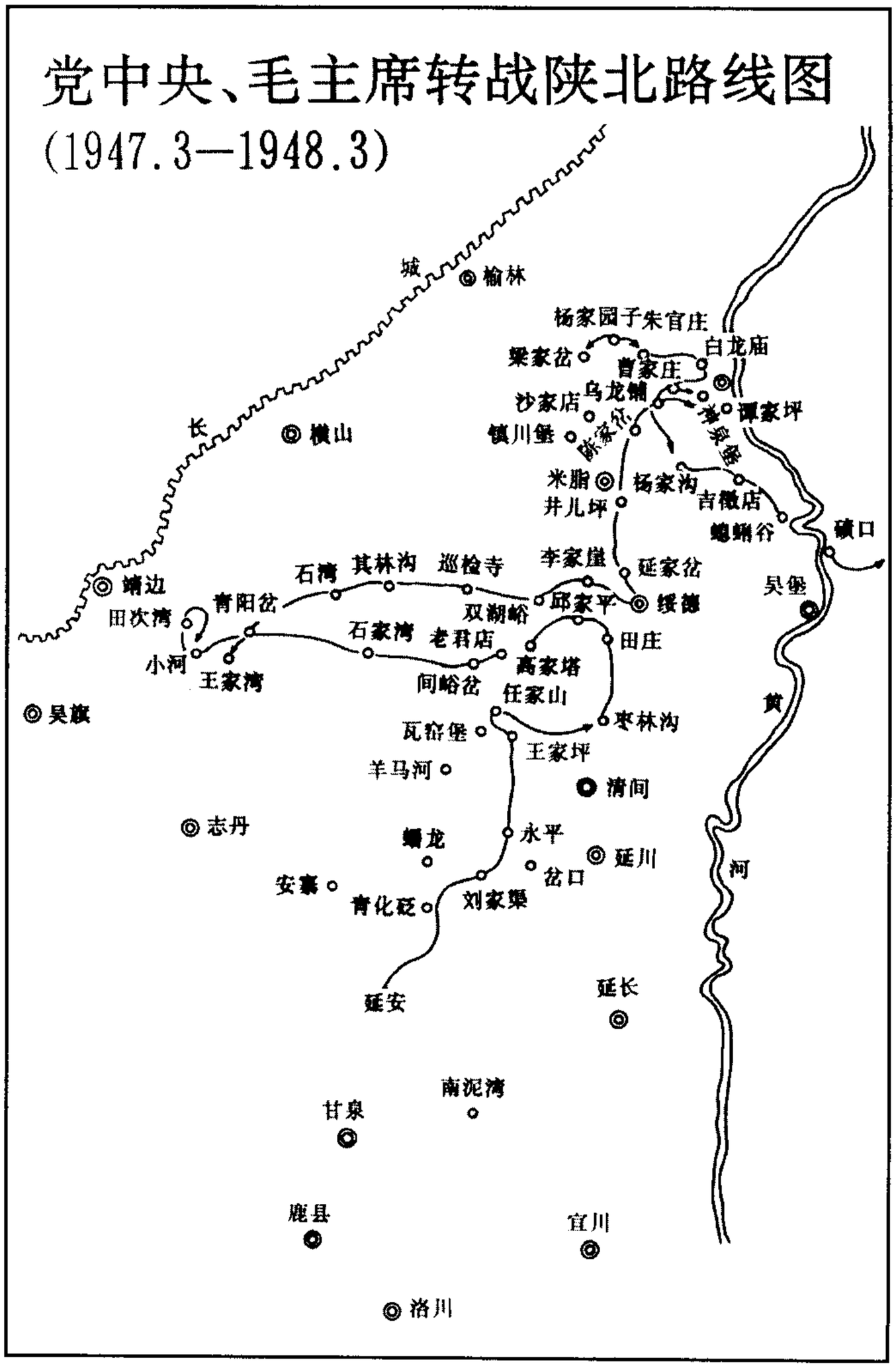
几天来，敌机一批一批闯入延安上空，狂轰滥炸。每次防空警报一响，周恩来都要跑到毛泽东住处，看毛泽东进了防空洞没有。毛泽东对他的卫士下令："敌机来时，不许打搅我的工作。它扔它的炸弹，我办我的公。"周恩来查看了毛泽东居住的土窑，认为土层薄，很不安全，便亲自选了一个石洞，再三劝说毛泽东搬进石洞里办公。

新四旅程悦长副旅长和 16 团团长袁学凯来见毛泽东，说："部队兵强马壮，给养充足，士气很高。指战员纷纷请战，坚决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只是大家都担心主席的安全。我们全旅指战员都请求主席早些转移到黄河以东去。"

毛泽东微笑着说："你们代我谢谢同志们的关心。好多地方来电报，催我过黄河，中央有个安全的环境，对指挥全国作战的确有好

处。不过，我有点想法。”毛泽东扳下一根指头，说：“其一，我们在延安住了十来年，一直处在和平环境中。现在一有战争就走，我无颜面对陕北乡亲，日后也不好再见面。我决定和陕北老百姓一起，不打败胡宗南决不过黄河！”

毛泽东停了停，又扳下一根指头，说：“其二，我不离开陕北还有一个理由。胡宗南有20多万人马，我们只有2万，陕北的比例是十比一。这样我们其他战场就要好得多，敌我力量对比不这么悬殊。党内分工我负责军事，我不在陕北谁在陕北？现在几个解放区刚刚夺得主动，我留在陕北，蒋介石就不敢把胡宗南投入别的战场。我拖住他的‘西北王’，其他战场就可以减轻不少压力。”



程副旅长和袁团长面面相觑，既受感动，又有些不安，实在是无可奈

何，他们再也没说什么就走了。

1947 年 3 月 18 日黄昏，毛泽东和周恩来正同第二纵队王震司令员谈话。东南方向忽然枪声大作，敌人先头部队已经进犯到延安附近的吴家枣园。

一阵沉重急促的脚步声传来，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员彭德怀跑步赶到，喘着粗气吼道："怎么主席还不走？快走快走，一分钟也不要呆了！"

同志们都感到形势严峻。中央警卫科参谋龙飞虎来不及报告就破门而入："主席，彭总发脾气了，请你立刻出发。"

王震忙说："主席，今天就谈到这里吧。你必须尽快撤离。"

周恩来也劝道："主席，时候到了，该走了。"

毛泽东倾听门外，外面没了彭德怀的声音，显然是去前线了。毛泽东稳坐椅子上问："机关都撤完了吗？"

"早撤光了。"好几个喉咙抢着回答。

"群众呢？"

"全撤离了。"

"嗯，"毛泽东满意地哼了一声，"好吧，吃饭！"

枪声已是近在耳畔，一阵紧似一阵，中间还夹杂了喊杀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同志们火烧屁股一般急，饭菜早已装在饭盒里准备带到路上吃，这时不得不拿出来，又摆放在毛泽东面前。毛泽东吃饭历来是狼吞虎咽，可今天却细嚼慢咽，"蘑菇"起来。原来，毛泽东有言在先，他要"最后一个撤离延安，要看看胡宗南的兵是个什么样子"。

这时，周恩来请回了彭德怀。彭老总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就吼起

来："主席怎么还不走！龟儿子的兵有什么好看的？走走走，部队代你看了。你一分钟也不要呆了，马上给我走，快给我走！"

毛泽东望望心急如焚的彭德怀，又往嘴里拨饭。彭德怀朝工作人员瞪起眼："还愣什么？快把东西都搬出去！"

秘书急忙清理办公室，而窑洞外那辆深蓝色的美式重吉普车已经轰隆隆地发动起马达。

毛泽东皱了皱眉，用他那浓重的湖南口音幽默地说："把房子打扫一下，文件不要丢失，带不了的书籍可以留下来摆整齐，让胡宗南的兵读一点马列主义也有好处嘛！"

司机周西林踩动油门，汽车马达一阵隆隆急响。

"你们愿意走吗？"毛泽东走出窑洞，仰望矗立在延河边土山上的宝塔，喃喃着。良久，他把嘴角一沉，对站立身边的周恩来及所有工作人员说："我本来还想看看胡宗南的兵是个什么样子，可是彭老总不答应。他让部队代看。我惹不起他，那就这样办吧。"

毛泽东登车之际，蓦然又回首，发表宣言一般大声说道："同志们，走吧。我们还会回来的！"

韩桂馨：在洛杉矶托儿所

撤离延安

蒋介石、胡宗南开始大举进攻延安，党中央指示非战斗人员提前转移，撤离延安。此时，我在延安洛杉矶托儿所当保育员，我们20多个工作人员带着60多个孩子第一批撤离。临行前，我们为孩子们赶制了棉衣、棉被、干粮，把孩子们睡觉的木床改为驮床，就是两个小床用一个架子连起来，以便放在牲口背上驮着，一边一个。你

们看电影《啊，摇篮》了吗？就是那个样子。

一路上，虽然没有正面和敌人遭遇，但也多次遇到过危险。在战争环境中孩子们也很懂事，他们在紧急情况下也学会了卧倒、隐蔽等动作。我们最感头疼的是疾病的侵袭。刚开始转移时，天气就冷了。大冷天行军，体质弱的孩子就容易感冒发烧，气管炎、肺炎总在纠缠着孩子们。由于我们精心照料，加上到了驻地，乡亲们的大力支持，孩子们一次次战胜了病魔。

我们撤离延安后，首先转移到瓦窑堡，在那里居住了几个月。1947 年 3 月又奉命继续东进转移，15 日清晨到了黄河边的吴堡县，当晚在艄公的配合下，抢渡了黄河，到达山西林家坪。出陕北，到山西，一路上高高低低的尽是山路。尽管有牲口驮着孩子们，省了我们的力，但有时也会遇到麻烦。有一次走到一条窄窄的山路上，一头驴子一脚踏空，驮着的小木床一下子歪下去了，把我们惊出了一身冷汗，要翻下山去可不得了哇！所幸的是孩子没摔下山去，但一看那孩子头上碰破了一个大口子，鲜血直流。幸亏沈元辉所长是学医的，她做了消毒清创处理，及时把孩子的伤口包扎好，队伍又前进了。

中排左一为李讷，后排左一为韩桂馨，后排右一为穆文卿

为了躲避敌机轰炸，我们从林家坪转移到张家沟，后来又转移到三交的爪洼沟，在山里

转来转去。

在行军路上，我于 1947 年 3 月加入了党组织，经过半年预备期的考验，9 月份转为正式党员。我的入党介绍人就是穆文卿和丑子冈。

1945 年春，我来到延安参加革命后，就被组织上安排到洛杉矶托儿所当保育员，我记得有江燕、边庆国、李文芳、阎明、梁国馨等（这些同志都还健在）。我们都是从河北省到延安来的新同志，另外还有抗大七分校毕业的穆文卿和顾明等人。开始我们想不通：为什么不让我们上学，而让我们去抱孩子？我们跑几千里地就是为了这个吗？我们向领导提意见，要求去上学或干别的工作。领导没答应，要求我们服从分配，做好工作，并说以后有机会学习。

到了洛杉矶托儿所后，我才知道这儿原叫中央托儿所，1940 年成立，是直属中央军委卫生部领导的。1942 年由宋庆龄主持的美国援华委员会中国保卫大同盟在洛杉矶募捐了一大笔钱款及生活用品、医疗器械，通过层层封锁送到了抗日根据地，其中一部分就给了托儿所的孩子。为了纪念和感谢美国和平进步友好人士及爱国华侨，中央托儿所就改名叫洛杉矶托儿所了。当时许多中央领导同志的孩子就放在这个托儿所，托儿所里还有一些抗日阵亡将士的子女。我报到时所长是沈元辉，书记兼副所长是老红军丑子冈同志。

我们到了托儿所以后，老同志们给我们上课，给我们讲白求恩、张思德的故事，教育我们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托儿所里有个姓赵的男同志，负责保育工作，他对孩子们非常关心，工作很出色，他的事迹还登在了延安的《解放日报》上。沈元辉同志是在北平协和医学院上过学的大学生，医疗技术和外语水平都很高，她从中央医院调到托儿所工作毫无怨言，工作中兢兢业业，这些身边的同志为

我树立了好榜样。我渐渐安下心来。沈元辉教我们学外语，学卫生保健知识和护理知识，比如用镊子夹棉球为孩子做口腔清洁啦，为孩子体检啦，什么都有学问，什么都要学习。因为我在家里是老小，什么家务事都用不着我做，所以干起活来笨手笨脚，一切都要从头学。在沈元辉、丑子冈这些老同志的帮助下，我们进步也很快。江燕后来调到卫生部当了护士，穆文卿护理技术好，后来常到中央首长身边担任医务保健工作。李伯钊大姐生孩子就是她护理的。李大姐生小孩还没有过满月，就下乡去搞调查，写剧本。穆文卿帮李大姐抄稿子，自己很受教育。我们听了大姐们的事迹，也就更加爱护这些孩子了。

我到托儿所后发生的另一件事，使我受到很大震动。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天早上，托儿所接班的同志招呼孩子们起床，孩子们纷纷起来穿衣服。但小女孩华北那里却一点动静也没有。阿姨叫她、喊她都不应。走过去一看，华北死了。阿姨马上报告到所里，很快领导同志都知道了。华北是刘伯承的女儿，这事非同小可啊！调查时，据班里一个小朋友说："夜里进来个叔叔，他在屋里走，嘴里小声叫着'华北，华北'，就到华北的小床那儿去了"。原来那个人是伙房的炊事员，他被特务收买，夜里趁孩子们入睡时害死了小华北。敌人的用心是很险恶的。那时解放战争已经开始，敌人为了阻止刘邓大军南下，竟派特务来干这卑鄙的勾当。虽然敌人的阴谋手段并未阻止人民解放军的铁流，但这事从反面教育了我们，大家都感到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为了让孩子们健康成长，我们不仅对孩子们进行良好的喂养，而且还对孩子们进行智力开发。大家动手制作玩教具、编教材，教孩

子们画画、写字，并开辟了小动物园、小菜园，丰富孩子们的自然知识，培养他们热爱劳动的优良品质。

由于全所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托儿所的工作取得了成绩，并受到中央领导同志和中央妇委的重视。妇委书记蔡畅大姐曾指示我们总结工作，提高效率，使洛杉矶托儿所成为解放区保育事业的表率。

延安时期的韩桂馨（左一）

尤其使我激动的是毛泽东主席亲自来视察托儿所，并看望了全体保教人员。那是1946年6月的一天，天气格外晴朗。我领着孩子们在户外活动，孩子们拍着小手，高高兴兴地唱着：

“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

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忽然从远处来了几位同志，都穿着一样的军服。其中一位高个子的首长，迈着稳健的步伐，在那群人中比较突出。我想肯定是有领导同志来了，以前还有外宾来参观过呢。那些人越来越近，“啊，是毛主席！”同志们分外惊喜。我们热烈地鼓起掌来。

毛主席在沈元辉等同志的陪同下，仔仔细细地看了孩子们的伙房，看了孩子们住的窑洞，用手摸一摸孩子们的被褥，不时地点点头，看起来主席对托儿所的工作还比较满意。我是第一次见到毛主席，因为工作在身，人也多，我不敢近前。毛主席、朱总司令，这两个名字我是多么熟悉啊，我就是为了跟毛主席干革命，才千里迢迢来到延安；我就是听了毛主席为人民服务的教导，才安心在托儿所搞保育工作。没想到，今天我亲眼见到了毛主席，见到毛主席向大家招手，对我们微笑。我是多么幸福啊！

毛主席参观完孩子们吃饭、睡觉、游戏、洗澡的地方后，竟转身去看了孩子们的厕所。当时延安的卫生条件还很差，那时根本不可能有抽水马桶，但托儿所为了孩子们的卫生及使用方便，想办法在厕坑上面搭起了一大块木板，整个盖上厕坑，在木板上面挖出一个一个的小洞，很适合孩子们使用，既卫生又安全。毛主席看了后，连连夸奖说："你们为娃娃们着想，做得好！"毛主席多细心哪。

临别时，毛主席应大家的要求，挥笔为托儿所题了词："已有进步，更求进步。"

李银桥：他胸有成竹，三战三捷

汽车驶上延（安）榆（林）公路，速度加快。延安渐渐远了。

毛泽东与周恩来在车上谈笑风生，话题上到天文，下至地理，无所不有。远处的枪炮声对这两位叱咤风云的历史巨人不过像一阵蚊虫叫。

车过拐峁，王震司令员要回部队。毛泽东和周恩来下车相送。

握手告别时，王震司令员问："主席还有什么指示没有？"

毛泽东笑笑说："没有什么了，就按我们研究的去做吧！"

"请主席放心，我们一定按照您的指示，打好撤出延安后的第一仗！"王震说罢，翻身上马，顺公路向东飞驰而去。

拐峁以北，出现了由延安转移出来的群众。人们背着行李，担着锅碗瓢勺，赶着猪羊，牵着毛驴，有的妇女还背着纺车，老大娘们一手抱着老母鸡，一手拄个拐棍慢慢走。山梁上，大路旁，民兵持枪警戒，队伍漫长而井然有序。毛泽东沉默了，不时向外观望，紧锁眉头，凝望着撤退的群众队伍。

汽车驶过青化砭三十里长川，毛泽东望着大川，冲周恩来点点头："嗯？"

1947年3月18日，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机关主动撤离延安，转战陕北。图为毛泽东在行军途中

“嗯！”周恩来会意一笑。

撤出延安第 5 天，我们住进瓦窑堡附近一个村子。毛泽东说：“就在这里住下吧。不要几天，就会听到捷报。”

我们都纳闷：毛主席怎么说得这么肯定？

3 月 25 日，我们刚吃过早饭，猛听到正南方向枪炮声大作，大地震颤不已。不到一个钟头，又突然沉静下去。什么战斗打得这么迅速利落？

过午，秘书给毛泽东送电报出来，兴高采烈地告诉大家：“我军在青化砭设伏，歼敌 31 旅的 4000 人，活捉了旅长李纪云。”

于是，我们想起毛泽东讲过的话：“不要几天，就会听到捷报。”

这时，我们恍然大悟：早在撤离延安之前，主席就已制定了在青化砭地区歼敌的计划。

旗开得胜，新华社发表社论说：“31 旅的歼灭，标志着胡宗南从此走下坡路。”

胡宗南在青化砭挨了一击，意识到我军主力在延安东北，忙令刘戡所统 6 旅之众由安塞后转，顺延榆公路反扑。

可是，敌人不过做了一次武装大游行。我军主力早已转移。中共中央机关也跟着转移到绥德城南的枣林沟。

在枣林沟，中央召开一次会议，讨论了许多重要问题。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五大书记作了分工。

毛泽东说：“现在我党面临的任务很多，但是第一位的是从军事上打败国民党蒋介石。没有这一条，其他一切都无从谈起。”

会议决定：由毛泽东负责全国军事指挥，他是事实上的最高军事统帅；由周恩来协助毛泽东实施军事指挥；朱德负责党的监察工

作；刘少奇负责党务和白区工作；任弼时负责土地改革工作。当然，所有的工作毛泽东都要管，但他的主要精力是在作战上。

枣林沟会议还决定，组成以刘少奇、朱德为首的中央工委，到河北平山工作。组成以叶剑英、杨尚昆同志为首的中央后委，率中央机关去晋绥根据地的临县一带，负责军械、弹药和粮食等供应。

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留在陕北组成中央前委，开始了艰苦的转战生活。

3 月 31 日下午 4 点多钟，刘少奇、朱德率队乘车出发，东渡黄河，去河北平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前委及机关人员，一律轻装，乘车北行十几里地，到达绥德南边田庄的时候，突然来个猛转弯，一直向西，弃了汽车，开始徒步行军。

这时，敌人十几个旅正沿着延榆公路气势汹汹地朝东北方向追来。他们不曾料到，毛泽东竟然逆着他们迎面走来，只隔一道山梁，两支队伍擦肩而过！

毛泽东不久前闹过一场肺炎，健康没有完全恢复。警卫员孙振国见毛泽东走路吃力，就把背干粮的柳木棍交给主席拄着。毛泽东试一试，很满意，笑着说："有这东西省力多了。"

这根柳木棍荣幸地伴随毛泽东转战陕北，立下了不小的功劳。

那次我们住到一个山沟小村，立刻将全国各战区的军事地图取出。墙上挂的是地图，炕上摊开的是地图，就连老百姓石板锅台和腌菜缸上摆的也是地图。秘书和参谋不停地送来各战区来电，然后又带走毛泽东下达命令的电文。

敌人用电台测向仪查到了我们的位置。刘戡率四个半旅疯狂扑来。骑兵侦察员一会儿一报："敌人距我们还有 30 里！""敌人已迫

近到 20 里！”“敌人进沟了，不到 10 里！”……

毛泽东想大事的时候是容不得人去打搅的。可是形势紧迫，一名卫士便接连几次“打搅”毛泽东。毛泽东发脾气了：“什么 10 里 8 里？中国 960 万平方公里！你去吧，不要婆婆妈妈……”

那时的形势确实紧张：北边的敌人已占横山，西边的敌人占了陇东，逼近三边（即万里长城的三个关防重地定边、安边和靖边），南面是十几个旅摆成一条线。只有东边算是“网开一面”，那是通黄河的路。

毛泽东斩钉截铁地说：“我们不能去那条路，我们要在这里和敌人周旋，牵敌人，磨敌人，来回和敌人兜圈子，直到最后消灭它！”

4 月 9 日，毛泽东向全党发出留在陕北的通知，号召“用坚决战斗精神保卫和发展陕甘宁边区和西北解放区”。

过了几天，中央机关与敌人兜圈子，转移到靖边县的王家湾。毛泽东在王家湾写了《关于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指出“蘑菇”战术这种方法“是最后战胜敌人必经之路”。仿佛是印证毛泽东的预见，就在同一天，彭德怀指挥的西北野战军主力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羊马河一带彻底歼灭了全副美械装备的敌 135 旅，活捉了代理旅长麦宗禹。敌人在瓦窑堡几进几出，扑来扑去，终于尝到“蘑菇”战的苦头。

敌人不甘心，将主力都集中到瓦窑堡一带来，企图寻找我主力决战。毛泽东一连两天没出窑洞，只有秘书拿着电报跑出跑进。周恩来大部分时间都呆在毛泽东的窑洞里，极少回自己的窑洞。大家猜测又要有大的战役行动了。

5 月 1 日黄昏，东南方向响起炮声。工夫不大，毛泽东披着那件

补了又补的灰棉袄走出窑洞，问哨兵："是炮响么？"

哨兵回答："是炮响！已经响过一会儿了。"

毛泽东微笑着点点头，反身走回窑洞。

秘书拿着电报匆匆朝毛泽东的窑洞里走，只听周恩来提高了的声音传出门外："好！占了制高点就有把握！"

窑洞外，大家已经议论成一片。这时我才明白，是蟠龙战役打响了。大家议论到最后，简直就变成了庆祝胜利。因为无数次实践证明，只要是毛主席指挥打仗，那结果只能是胜利，这已经成了不可改变的规律。

毛泽东又是两天两夜没有睡好觉，从门口望进去，他时而伏在石板锅台上查看地图，时而向作战参谋下令："给彭总发电，有一股敌人由拐峁向蟠龙增援，请他们注意！"

5月4日，我军果然收复蟠龙，全歼守敌7000多人，活捉敌旅长李昆岗，还用步枪打掉一架敌机。蟠龙是敌人的战略补给站，弹药、物资、军衣、粮食堆积如山。这一仗，沉重地打击了敌人，充分补充了我军。正如新华社的评论所说："胡军凶焰正在下降，胡宗南指挥无能，使这个下降来得更快，更剧烈，更富有戏剧性。"

捷报传来，毛泽东叫人将帆布躺椅搬出窑洞。他甩去披在身上的补丁灰衣，穿着细线毛衣，在帆布椅上一坐，沐浴着明媚的阳光，浑身轻松地说："来，晒晒太阳，照张相。"

"咔嚓！"叶子龙举起相机，摁下快门，及时地留下了一张历史性的照片，那是三战三捷的证明和纪念。

二　来到毛泽东身边

李银桥：决不过黄河

转战陕北的毛泽东，对全国局势了如指掌。5 月底，他在王家湾写了一篇政治评论《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指出中国事变的发展，比人们预料的要快些，号召人民为中国革命在全国夺取胜利迅速地准备一切必要的条件。

黎明前总要有一段黑暗。“只会打败仗”的胡宗南，利用我军主力远在西线的机会，又派了刘戡率领四个半旅向王家湾扑来。艰难的作战行军又开始了。

仿佛是要考验这支队伍的意志，傍晚出发时，一阵闷雷沿山梁滚过，天上落下大雨。队伍冒雨爬上西边的山梁，跌跌撞撞地向前摸索前进，天明走到了小河村。

雨后大地起了一层雾，房屋树木在朦胧中浮动。这里距王家湾 40 里，队伍停下来休息。

半晌午，后方传来激烈的枪炮声，飞机也在头上嗡嗡叫嚷着盘旋。侦察员报告，警卫部队和敌人接上火了！

战士们个顶个是英雄好汉，阻击在杨屹崂湾的制高点上，挡住

刘戡四个半旅的轮番进攻，连续打退敌人 3 次集团冲锋。无论是机关枪还是大炮，都打不开这道防线，三个半小时敌人寸步未进。直到完成任务，听到命令，警卫部队才主动撤离。

天黑下来，队伍继续出发。老天像是别有用心：队伍停下来，雨也停下；队伍一动，大雨跟着瓢泼而下。

我们爬上一道山梁，蓦然间发现左边山沟里一片火光，看不见尾，火堆一个接一个，将雨天烧得通红。那是追兵，就在我们脚下！

偏偏向导又迷了路。

毛泽东站在雨地里，站在冷气逼人的光秃秃的山梁上，时而仰望天空，时而俯瞰火光映红的山沟。敌人在沟里，我们在山上，前边传来命令：不许吸烟，不许咳嗽，更不许大声喧哗。大家的心几乎要提到嗓子眼了，一齐把目光投向毛泽东。

毛泽东习惯地吮吮下唇，开口了，可他说的完全是另一回事：

“这场雨下得好，再过半个月，就该收麦子了！”

这声音不但镇定，简直说得上逍遥。大家立刻松下心，有毛主席在，担心焦虑实在是没必要。

任弼时踩着泥泞走过来，说：“主席，向导找到了，我们走吧。这儿离田次湾只有 20 里地了。”

摸黑走到田次湾，敌人也顺沟出发了。毛泽东慢条斯理地说：“敌人上来，我们就走；敌人顺沟过去，我们就住下。”

侦察员不断来报：“敌人顺沟过去了！”“敌人全部过完了！”

毛泽东将柳木棍朝泥地一戳：“好！我们住下。”

这就是转战陕北时富有代表性的一幕。

1947 年 8 月 18 日，可以说是转战陕北期间最紧张的一天。屡屡

扑空，数次挨打的刘戡，重又率领 7 旅之众，朝我中央机关几百人的队伍紧紧追来。从绥德追到米脂，追到葭县，一直追到黄河边。

那几天，天天下大暴雨，身上的衣服难得有干的时候。河水猛涨，汹涌澎湃，十几里外就能听到咆哮声。

毛泽东心情很不好。形势严重还在其次，最使他恼火的是队伍里议论纷纷，说要过黄河了。毛泽东历来看重说话算数这一条，轻易不改变。他说过："不打败胡宗南决不过黄河。"

当时还没有打败胡宗南，屁股后面有 7 个旅的追兵，在这种情况下过黄河，毛泽东是决不答应的。何况，"毛主席还在陕北"已成为全国军民同国民党蒋介石殊死搏斗的精神支柱。大凡从那时过来的人都记得，一句"毛主席还在陕北"，那么千难万险流血牺牲便全不在话下。当时就是这样。

毛泽东在转战陕北的行军途中

周恩来指出，前面是葭芦河，过葭芦河不是过黄河。因为葭芦河在这里入黄河，老百姓叫它“黄河汊”。

最后还是决定过葭芦河。因为敌人已经占了对面的山头，子弹在头上飞，朝地底下钻，距离已经很近了。而我们的全部兵力只有一个骑兵连、两个步兵连、一个手枪连和一个警卫排，总共 900 多人，敌人却有好几万。

任弼时负责组织过河。此时，河水暴涨，轰鸣之声震耳欲聋；巨浪一道接一道，铺天盖地而来！羊皮筏子刚一下水，立刻就像片草叶似地被狂浪掀翻卷走了。

前有大水，不可逾越；后有追兵，几万之众。当时形势就是这么严峻。我是十多年的老兵了，面对这种险情也不免有些焦急。

“给我拿支烟来！”毛泽东突然伸出两根指头要烟抽。声音不大，却传遍整个队伍。

“烟，得胜同志要吸烟！”

“得胜同志要抽烟！”

“烟！”“有烟吗？”“快找烟！”

转战陕北期间，毛泽东使用化名李得胜，即一定会得到胜利的意思。周恩来化名胡必成（“你必成”之意），任弼时化名史林（“司令”谐音），陆定一化名郑位（“政委”谐音）。听说毛泽东前段时间闹肺炎，已经戒烟。卫士们没有准备烟，且连日大雨，人人像从水里捞出来一样，去哪儿找烟？

“烟呢？给我一支烟！”毛泽东有点焦躁了。

值得庆幸的是，队伍里终于找到了能抽的纸烟。记得是马夫老侯用油布包藏着的。在关键时刻，他立了“大功”！

“举起来，不要举得太高，朝东南斜点，好！”周恩来指挥卫士们打开背包，用一条薄棉被遮护在毛泽东头上，并亲自扯起了被子的一角为毛泽东遮避风雨点烟。

毛泽东的卫士钻在被子下，把一支烟插到毛泽东右手的指间。“嚓！”“嚓！”一连划了几根火柴，火光却只一闪便被风熄灭了。毛泽东几次把嘴凑过来都没有点燃，有点火了。

周恩来又叫另一名卫士，才把烟点着了。

毛泽东深深地吸了一口烟，紧接着又狠狠地连吸了几口，烟灰向下跌落着……

蓦然，毛泽东把烟头奋力掼在地下，用脚踩灭，嘴里还迸出一声：“不过黄河！放心跟我走，老子不怕邪！”

毛泽东从这次开了烟戒，一直到 80 岁才又戒烟。

李银桥：来到毛泽东身边

毛泽东不慌不忙地顺着黄河汊向前走去。卫士们抢上前保护，都被他喝退。他走在前面，身后带着几百人的中央纵队，不要说敌人射击，就是一颗流弹，都有可能造成震撼历史的严重后果。

但是，敌人的几万追兵忽然停止了追赶和射击，仿佛整个世界都沉默了，变哑了，敌人眼睁睁地看着毛泽东率领他的仅几百人的队伍，大摇大摆地走过去……他们实在是让毛泽东打怕了。

毛泽东率队走到一座山下，仰面望望云遮雾绕的山峰，把目光转向任弼时，意思是：怎么样？

任弼时会意地点点头，下令队伍：“上山！”并吩咐身边的刘长

明参谋："让后面部队把上山的痕迹擦掉。"

正朝山上走的毛泽东，闻声折回身，将手中的柳木棍在山脚草坡上一戳，说道："擦什么？就在这里竖块牌子，写上'毛泽东由此上山！'"

同志们劝道："还是擦掉吧！敌人跟脚就会追来。"

毛泽东戳着柳木棍说："给我竖，我看他敢追？我看他刘戡到底有多大本事！"

毛泽东上山了。周恩来扯一下刘参谋，小声嘱咐："主席的安全关系全党全军。为防万一，部队过后，你们还是照史林同志说的办，把痕迹消除干净。"

走到半山腰，忽听山上传来几声枪响，毛泽东闻声停住脚。当时雨已经停了，他把草帽拿在手里扇凉，问道："是敌人来了吗？"他边说边找了块石头坐下，索性不走了，接着很轻松地说，"好吧，我等着，我倒要看看刘戡是个什么鬼样子！"

过了一阵儿，侦察员气喘吁吁地跑上来报告："是对岸民兵打枪，误会搞清了。"

毛泽东缓缓立起身说道："没有事？没有事咱们就走。"

在山坡上一个叫白龙庙的村前，毛泽东坐在一块青石上休息。这时阳光从云脚照射下来，他遥望黄河，忽然唱起了京剧《空城计》中的一段唱词。

白龙庙是个七八十户人家的村子，树极少，缺水。老百姓为了求雨求水，便在村里盖了一座白龙庙。村庄因此而得名。

就在毛泽东进村不久，雨又下起来。老百姓纷纷传说毛泽东是"真龙下界"，给他们带来了雨水。刘戡的几万追兵在山下安营扎寨，

篝火望不到头。毛泽东在山上安安稳稳地睡了一夜。

当天晚上，中央纵队参谋长叶子龙和副参谋长汪东兴突然找我谈话。

“给你的工作变动一下，调你到主席身边去当卫士。”叶子龙讲话开门见山，“因为你过去一直干这项工作，有经验。”

“这是组织上对你的信任，我们是经过慎重考虑后决定的。”汪东兴讲话则注意强调原则性和革命道理。

我低下头没有马上表态，心想：昨天主席心情不好，把身边的卫士打发走了。我怕自己也干不好。

“怎么样，有什么意见吗？”叶子龙完全是习惯性地问了这么一句。天晓得我是怎么回事？我竟接着他的话头说：“不行啊，我怕干不好，况且我干这个工作太久了。”

解放战争初期的李银桥

叶子龙和汪东兴大概始料未及，有些惊诧和不悦。我的话说出口后也觉得不够妥当，便退一步说：“当然，组织决定我服从……”

“服从就好，相信你会干好的。”叶子龙松口气说。

“今天你先回去。”汪东兴思考着说，“最后怎么办等我们研究以后再决定。”

于是，第二天我便来到毛泽东身边。在行军时，我就走在毛泽

东和周恩来之间。可毛泽东始终不曾跟我说话，甚至不正面看我一眼。

我忐忑不安，心里直犯嘀咕：会不会是毛主席知道我的态度了？他是不是生我的气了？……

雨还在下个不停，我们几乎是被雨水冲着跌跌撞撞跑下山的。

山下一条小河发洪水，水流十分湍急。汪东兴和叶子龙指挥一批会水的战士连游带蹚到达对岸，去村里借来绳索和门板搭浮桥。水太急，门板不时被冲走，架桥工作进展缓慢。这时，追兵已经上山，山头上枪炮声大作。队伍里有些人心不太稳。

“我看还有段时间么。”毛泽东望望架桥现场，朝刘参谋吩咐道：“把电台架起来。”

真怪，电台一架，军心立刻安定了。毛泽东坐在我们用手撑开的棉军被下，审阅全国各战区发来的电报，并且用铅笔写下了一道命令，交刘参谋送电台发向各野战军司令部。

浮桥终于架好了。岸边垫土，河里垫大石头，再将对岸村里的门板铺在石头上。为了保险，有几名战士站立在急流中充当“桥墩”。毛泽东走到河边，望着将衣服脱得精光站在浪涛中的“桥墩”，深受感动，眼圈不由得红了，迅速向队伍说：“同志们先过。”

“请李得胜同志先过！”几百人的队伍异口同声地高喊道。

“请李得胜同志先过！”“桥墩”们也发出动人心魄的呼唤。

毛泽东仍坚持要同志们先过，同志们恳求领袖先过。看到彼此争执不下，周恩来便来到毛泽东身边小声说：“主席，你不过同志们是决不会过的。快上桥吧，时间久了河里的同志们会冻出毛病的。”

毛泽东扫视了一下周围，目光和我相遇了。想到我说过不想到主席身边当卫士的话，我的脸腾地一下子烧了起来。

毛泽东踏上了浮桥，我跟随他也踏上浮桥。脚下有些晃，我的心也无法平静……

李银桥：他小时候也拜过佛

行军一天，夜宿杨家园子。警卫排长阎长林同几名卫士点火烘烤湿衣。毛泽东坐在炕上，借着油灯查看军用地图。

柴草太湿，只冒烟不起火，窑洞里烟雾腾腾对面看不清人。毛泽东“吭吭”大声咳嗽，阎长林擦着呛出来的泪水喊道：“小李，快扶得胜同志出去透透气！”

我也咳个不停，一腿炕上一腿炕下去扶毛泽东：“得胜同志，出去透透气吧……等烟散散，再看地图。”

毛泽东甩开我的手，用铅笔在地图上画了几处符号，尔后自己下炕，一边咳，一边扶墙摸索着走出窑洞。

雨停了，天空露出灿烂的星河。毛泽东立住脚，迎风作了一个深呼吸，用力咳出几口痰，擦擦被烟呛出的泪，开始在院子里散步。为了避开地上的积水，他走得很慢，步子时大时小。他听到我跟随在他身后的脚步声，停下步，两眼望着星空，慢条斯里地问了一声：“你叫什么名字啊？”

主席终于同我说话了。我迅速立正回答：“报告！我叫李银桥。”

“李、银、桥。嗯，哪几个字啊？”毛泽东依然不紧不慢地问道。

“木子李，金银的银，过河的桥。”

“银——桥。为什么不叫金桥啊？”

“金子太贵重了，我叫不起。”

“哈哈，你很有自知之明嘛。”毛泽东的口气转热烈，转身望着我问：“你是哪里人呢？”

“河北安平县。”

“父母干什么呢？”

“我父亲种地拉脚，农闲时倒腾点粮食买卖；母亲操持家务，农忙时也下地干活。”

“我们的家庭很相像么。你喜欢父亲还是喜欢母亲？”

“喜欢母亲。我父亲脑子好，多少账也算不糊涂。可是脾气大，爱喝酒。吃饭他单独吃，他吃馒头我们啃窝头，稍不称心就打人。我母亲心善，对人好，我喜欢母亲。”

“越说越一致了么。你母亲一定信佛。”

“主席怎么知道？”

“你说她心善么。出家人慈悲为怀啊。”

“您，您母亲也信佛吗？”我问。

“我也喜欢母亲。”毛泽东说，“她也信佛，心地善良。小时候我还跟她一起去庙里烧过香呢。后来我不信了。你磕多少头，穷人还是照样受苦。”

“磕头不如造反。”

“好，讲得好。”毛泽东点点头，继续散步，走过一圈，又停下脚问：“怎么样，愿意到我这里工作吗？”

我低下头。怎么回答呢？唉，与其说假话落个虚假，不如闭上眼睛说真话，做个老实人。

“不愿意。”我小声喃喃着。

一阵难熬的沉默。

毛泽东终于轻咳一声，打破了沉默："你能讲真话，这很好。我喜欢你讲真话。那么，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为什么不愿意在我这里工作？"

"我干太久了。从三八年参军，我一直当特务员、通讯员。我想到部队去。"

"噢，三八式，当卫士，进步是慢了些。就这一个原因吗？还有没有别的原因？比如说，在恩来那里当卫士就愿意，来我这里就……"

"没有，决没有那个意思！"我叫起来，"我一直想到部队去。我在周副主席那里也说过这个意思。我在他那里干过一段，他了解我的情况，形势缓和后提出走的要求也容易。如果到主席这里来，怎么好刚来就提出走？"

"你怎么知道我会不放你走？"

"主席——恋旧。"

"什么？恋旧！你听谁说我恋旧？"

"反正我知道。"我说，"听人说你骑过的老马，有好马也不换；穿过的衣服，用过的笔砚茶缸，一用就有了感情，再有了多好的也不换。就比如你那根柳木棍，不过是孙振国背行李的木棍子，有了好拐棍儿你肯换吗？我们要是有了感情，主席还肯放我走吗？"

"哈哈哈，"毛泽东笑了，"小鬼，什么时候把我研究了一番？嗯，可是我喜欢你呢，想要你来呢。怎么办？总得有一个人妥协吧。"

"那就只好我妥协了。"

"不能太委屈你，我们双方都作一些妥协。"毛泽东认真地望着我说，"大道理不讲不行。你到我这里来，我们只是分工不同，都是为人民服务。可是，光讲大道理也不行。三八式，当我的卫士，地

位够高，职务太低。我给你安个长，做我卫士组的组长。”毛泽东略一沉吟，作了个手势，说，“半年，你帮我半年忙，算是借用，你看行不行？”

“行！”我用力点头。

“好吧，你去找叶子龙谈谈。他对我更了解。”毛泽东将手轻轻一挥，我便轻松地退下。他独自回窑洞办公去了。

后来我听说，毛泽东在与我谈话前，已经知道我不愿来，但他还是对叶子龙和汪东兴说：“你们不要再考虑别人，我就要他！”

这就是毛泽东的性格。

韩桂馨：初见江青

就在我转为正式党员后的不几天，中央军委卫生部副部长傅连璋同志通知我去找他。在延安时，我们托儿所就直属卫生部领导，我常常能见到傅连璋同志。我对这位在长征时就把自己的医院和全部家产献给红军的领导同志非常尊敬。他历经二万五千里长征，医术非常高超，他曾多次给毛主席看病，并受到过毛主席的好评，但他本人非常谦虚，对下级也很关心，谈话态度非常和蔼，跟他谈话能在不知不觉间得到很多教益。

没想到这次谈话傅连璋同志带给我的是令人激动的消息。他看着我，笑眯眯地说：

“韩桂馨同志，李若要调走了，你去接她的班，到主席身边工作。你愿意吗？”

李若是带毛主席女儿李讷的阿姨。这么说我要去带毛主席的孩

子，要和毛主席一家生活在一起了！这是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事啊。我很激动，从傅连璋同志的眼神中我也感觉到这是组织上对我的信任。我不知怎样表达自己的想法，只使劲地点了一下头，回答了一句话："愿意。"

"那好，主席现在住神泉堡。陕北形势现在有了好转，江青同志已经来到河东接李讷，你随她一起去吧。孩子到上学年龄了，因转战陕北上不了学，你不是有高小文化吗？要帮助她识字读书。"傅连璋同志边说，边写了几条要求、希望，一一向我交代清楚，还特意叮嘱我说："江青是毛主席的生活秘书，管你们这一摊，遇事多向她请示，注意搞好关系。"我回去交代了一下自己的工作，就去新的工作单位报到了。

我于1947年10月23日来到了临县三交镇双塔村，由于急着赶路，我都走热了。在一名警卫战士的指点下，到了一个大院里。到院门口时，我心中忐忑不安，脚步也随之慢了下来。刚走进院子，就听到几句京剧清唱，是《打渔杀家》中肖桂英的唱段。声音是那样稚嫩，又是那么清脆，显然是个孩子。我在托儿所工作了两年多，对孩子有了一种职业性的关心。我情不自禁地被这声音引到一间房前，从窗口看到了一个脸蛋圆圆的小姑娘，头上包一块花头巾，腰间系一根布带子，手里抓一根棍子作船舵，边舞边唱。她的前边站着一位细高个子的妇女，穿军装没戴军帽。她头上盘着一个发髻，从侧面看皮肤白白净净的。她在旁边为那女孩击掌作拍，还不时指点示范。我想这就是江青母女吧，想不到江青还会唱京剧，连孩子也唱得这么好。我正想着，孩子头一抬，见到了我，立刻闭紧了小嘴巴不唱了。于是，我喊了声："报告！"

江青转过身来，我上前报告说：“江青同志，傅部长派我来向您报到。”她把我让到屋里坐下，然后简单地问了一下我的情况，并说：“你的档案已看过了，新党员么，不错。”接着又拍着依偎在膝前的李讷说：“小韩阿姨，我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真像拖了块豆腐似的。前段形势紧，整天行军打仗，只好送后方来。现在形势好些了，主席也想女儿，我接她回去。孩子爱闹扁桃腺炎、爱发烧。阿姨，你要对她多爱惜着点。”

我说：“请放心吧，我会尽最大努力的。”

那时江青还年轻，虽然有夫人的身份，但只是协理员，没担任什么重要职务，架子没有那么大，脾气也没有那么暴，还是比较容易接近的。李讷从小过的是动荡的艰苦生活，而且一直生活在革命

延安时期的毛泽东夫妇

队伍这个集体环境中，所以她不认生，对人也很懂礼貌。加上我也有一段保教工作经验，懂得一些儿童心理，所以我和李讷很快便从陌生到熟悉，从熟悉到亲热了。江青显然对这一点很满意。

有一天，江青打开行军时随身带的包袱，从里面挑选了几件衣物送给我，一件夹克航空服，一件列宁装，一条西裤。她说："这些都送给你穿。"我不肯要，但江青不依，一定要我收下，并且要我试穿。我参军前一直在农村，只穿过中式的衣裤，参军后一直穿军装，从没有穿过这种衣服。我穿上江青送的几件衣服之后就像换了一个人。江青得意地围着我身前身后地看，上下打量着，嘴里发着赞叹声："很合身么！这些衣服我平时都舍不得穿，我要送给你，一定要送给你。李讷也交给你，我相信你会带好她。"

我不能再坚持说不收了，但我也隐隐地有些疑惑：我来给主席带孩子是组织上交给的任务，这就是我的工作。以江青这种身份的人，办事怎么也带了某种社会上常见的习气？但那时我主要还是从正面理解，看做是她对我的关心，对我表示的热情。"来，现在让我给你理理头发。"江青用毛巾围在我的脖子上，用剪刀替我理发。那时候我们的头发长了，就互相用剪刀剪短些，谁也不懂得发型什么的。从江青那里，我第一次受到关于发型美的启蒙。她一边用剪刀给我理发，一边给讲什么样的脸型要配什么样的发型。她说我这种椭圆型脸，梳这种直通通、齐刷刷的头就显得土里土气，应该修剪得有层次、稍短一些，才能达到既符合自己年龄、又文静秀气的效果。她说着说着，就扯到大城市上海，讲到城里姑娘的打扮，讲到舞台和电影演员的现代生活。我知道了江青曾是上海一个有名的演员。她的叙述，使我感到新奇、神秘。这一切对于我这 18 岁的农村

姑娘来说，都是闻所未闻的。而我的孤陋寡闻，又使她的表现欲得到了满足。她边说边给我修剪头发，剪好后她把一面小镜子举到我面前问："怎么样？是不是漂亮多了？完全变成一个城市姑娘了。"我朝镜子里瞟一眼，脸立刻红了。我承认，她确实会打扮。

接触多了，我发现江青很争强好胜，不放过任何表现自己的机会。在她和我们一起过黄河回陕北的路上，她给我讲述转战陕北的故事，绘声绘色，滔滔不绝。是啊！毛主席、周副主席、任弼时等领导同志在胡宗南进攻延安时，始终在陕北的大山中和敌人捉迷藏，牵制住敌人的一部分部队。毛主席化名李得胜，指挥我军取得了青化砭、蟠龙镇几场大战的胜利，歼灭了敌人的大股有生力量，取得西北战场的胜利。同时毛主席还密切注视华北、华东、东北几大战场，指挥各路大军同国民党作战。

那时一切为了前方，好马都送到作战部队，后方使用的全是老马劣马，连毛主席骑的也是一匹老马，唯独江青骑的是一匹雄健的好马。这匹马本来是贺龙同志从前方给毛主席送来的，但毛主席没要，他认为这样的好马应该让前方的同志骑，因为前方同志们辛苦，危险性也大，更需要脚力好的马。那时我们部队机械化水平低，马在战场上相当重要呢。毛主席执意不肯留。但江青一眼相中了这匹马，她找贺老总要了下来。听说后来毛泽东还为此事严厉斥责过江青呢。

那时，江青对于她的工作安排常有不满，有牢骚。进城以后，根据工作需要才被提升为毛主席的五位秘书之一。至于江青成为"四人帮"的首要分子，那也是随着她地位的变化，私心恶性膨胀的结果，当然还有各种复杂的因素。这不是我一时能说得清楚的。不过

有一点我是清楚的，江青的变，也是有个过程的。

韩桂馨：勇敢的小李讷

李讷长得天真可爱，白白的皮肤，黑亮的头发，漂亮的大眼睛，神采奕奕的。特别是她那宽阔的额头，透出一种聪慧。在我所了解的许多的孩子中，比较来说，我最喜欢、最心疼的还是李讷。在毛泽东的孩子当中，唯有李讷从生下来就生活在父母身边，过着比较幸福的生活，但是她又在比较小的年龄，遇上了战争环境，六七岁就随父母转战陕北了。经过战争锻炼的孩子，懂事也早。刚六七岁的孩子就经受过敌机的轰炸扫射，会躲空袭。她行军时像个小大人似地随部队行军走路，并且一本正经地和大人比赛。行军休息时，她会在向阳的坡地上为大家唱段戏或唱支歌，无形中为大家鼓了劲。你想啊，那时粮食那么紧张，吃也吃不饱；再说行军走路饿得也快，大人们都顶不住劲，何况一个孩子。李讷和我们工作人员一起在大食堂吃饭，肚里没有什么油水，大人歇下来都不想动，她还能给大家唱上一段，也真难为了孩子。

李讷性格好强。行军时，你说她走不动，让她骑会儿马，可她偏不骑，一股劲地走下去，甚至会累出病来。我摸准了她的脾气，再让她骑马时，就得用激将法："李讷，你敢骑马吗？"她马上会响亮地回答："敢！"这样就可以顺顺当当地把她抱到马背上。在行军路上，我和李讷的感情也越来越深了。

有一次，李讷有点不舒服，小脸儿红红的。牵马的岳成邦小心翼翼地走，生怕李讷从马背上摔下来。我看她那难受样儿，就把她

抱下马，想背着她走一段路。我连哄带劝地把她背起来了。

走了一会儿，我身上渐渐发热，头上也冒汗了，汗水流下来，脖子痒痒的，我不由得仰了仰脖子。忽然一只小手在我脸上轻轻擦过，软绵绵、热乎乎的小手，孩子在为我擦汗呢。我心里热乎乎的。没想到，李讷把嘴唇贴在我的耳朵旁边，悄悄地说："阿姨，我长大了一定背你行军打仗。"

我心里倏地一热，眼圈立刻湿了。

多好的娃娃啊！

我们过了黄河，已进入陕北地界。由于胡宗南的进攻已被粉碎，形势开始好转，老百姓欢欢喜喜地开始搞土地改革了。

江青带着我和李讷往李家坪走的时候，毛主席也从他搞农村调查的南河底村前往李家坪迎接江青和李讷。中午时分，我们几乎同时到达。

毛泽东一家会合了。当时的情景我至今记忆犹新，因为那天我第一次见到生活中的毛泽东。

"爸爸——"小李讷叫着，像小蝴蝶一样向毛泽东飞去。毛泽东微笑着，高大的身躯一弯，一把将李讷高高地抱起，他亲亲孩子的小脸蛋，用大手轻轻拍打着爱女的后背，口里叫着："我的娃娃，大娃娃，好娃娃，爸爸真想你哟！"他全然不在意身边的工作人员，全身心地陶醉在重逢的喜悦中。没想到李讷也那样俏皮，她在父亲怀里撒着娇，叫着："小爸爸，乖爸爸，我天天想爸爸。"

江青见自己此行竟为丈夫和女儿带来这么大的快乐，也很高兴。她招呼女儿给爸爸和叔叔们表演一个节目。李讷从父亲怀里跳到地上，摆好架式，像站在舞台上一样，一本正经地为大家唱了一段新

李讷与她的父母在一起

学会的京剧《打渔杀家》。几个工作人员拍响了巴掌，为孩子叫好。我看到毛泽东的眼里有泪花在闪动，原来毛泽东是很重感情的啊。我刚见到毛泽东时的紧张心情不知不觉地放松了。

看完李讷的表演，毛泽东转过身来对我说："我知道要调来一位新阿姨，你——"

"她就是新来的小韩阿姨。"李讷嘴快，她抢先作了介绍。

面容慈祥的毛主席，就这么近地站在我面前。我感到很温暖，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记得来延安时，父母叮嘱我：到了毛主席的队伍上要好好干，见了他老人家要替我们问好。那时我想，自己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姑娘，哪能有机会见到毛主席呢？但这个愿望一直存在我的心里。毛主席伸出他那温暖的大手来同我握手："小韩阿姨，

欢迎你。”

“……”我双手紧握毛主席的手，激动得把想说的话都忘了，只是掉泪。

“你来这里，我们都高兴。”毛主席说，“我工作很忙，家里的具体事，你就帮忙了。我们分工不同，都是为人民服务的。”他又接着问了我一句：“你愿意到我这里来工作吗？”这是我早就想好的，我说：“主席要考虑党和国家的大事，身边的一些具体事就不用操心了，我能帮助主席做一些事，可以使主席更好地为人民办大事。我愿在主席身边工作。”毛泽东听了很高兴，夸奖说：“小韩阿姨讲话很有水平么，你读过书吧？”

我回答说：“上过高小。”

“那很好么。你家是哪里的啊？”

“河北安平县。”

“银桥是你的老乡嘛。”毛泽东转身朝他身边的一名卫士招了招手，我看到一个英俊的小伙子走过来，他有点腼腆。“小韩阿姨，他是我的卫士组组长，叫李银桥，也是安平县人。你们都到我这里来工作，这也叫缘份，你们握个手吧！”

我不好意思去握手，我见李银桥脸红了。我的脸可能也红了。主席又说：“他也是党小组长，以后你就归他领导，有什么事多在一起商量。”主席又指了指李讷，“孩子就交给你了，今后你就是我们家的人了。”

我们在李家坪住了一夜，第二天就跟随毛泽东到了葭县的神泉堡。

三　粉碎“重点进攻”

李银桥：毛泽东诗赞“彭大将军”

毛泽东又是通宵工作。他时而查阅地图，时而翻翻《辞源》、《辞海》，时而凝神默想，时而抓笔圈图。

忽然，他皱起眉头，少顷，抓起纸匆匆向外走去。

我忙紧随其后。他在门口向我交待说：“我要解手，你扛一把铁锹帮我挖坑。”我忙找一把铁锹，拿上手电筒，紧跟毛泽东后边出了村，一直走到野地里。

雨后的田野潮湿而宁静。毛泽东来到一个隐蔽处朝地上指了指说：“就在这里吧。”

第一次为毛泽东挖便坑，我心里没有底。心想，就照一般便坑来挖，大概不会错吧。我先挖一个长形坑，一锹宽，一锹深，最后再将坑两边踏脚的位置垫高铲平。

“主席，你试试吧。”

毛泽东试了试，说：“嗯，好么，很好。”

他大便很困难。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他终于安静下来了，就那么不声不响地蹲着。据我所知，许多领袖人物大便时间都长，其间

要看点什么。如周恩来习惯看报纸看文件；贺龙喜欢看小人书……毛泽东也喜欢看书。1949 年全国解放进北京后，毛泽东在中南海他的厕所里就摆着各种书籍。不过，此时此地不可能看书，安静得很。

以后我才知道，毛泽东有时便秘，常两三天才大便一次。

回来路上，我忍不住问道："主席，你为啥不在厕所大便呢？"

"我嫌它臭，……"毛泽东嘟哝着说。

"可是，"我犹豫一下，但还是把想说的话讲了出来，"我见你跟老乡聊天时用手捏碎粪肥，拍拍手又拿烟抽，你可没嫌臭呀。"

"此一时，彼一时也。"毛泽东望望我茫然的样子，反问道："你说，什么时候思考问题好？"

"大概……躺在床上吧？"我胡乱猜测道。

"不对。"毛泽东忽然贴近我，幽默地挤挤眼，笑说道，"告诉你吧，就是拉屎的时候。拉屎的时候正好想事情。"

我噗哧一声笑了。

毛泽东却一本正经地提高声音问道："你说，厕所那么臭，能想出好主意吗？"

"不能。"我嘴里这样说，仍然忍不住笑。

那次便后回来，毛泽东就向周恩来谈了自己想好的一个歼敌计划："钟松自以为'援榆有功'，狂妄到了横行无忌的程度。他的 36 师一到镇川堡，立刻分兵两路，派 123 旅东进乌龙铺，他奔沙家店，企图与刘戡部会合，迫使我军背水一战。敌强我弱，形势对我们似乎很不利。其实不然，我们是有惊无险，他们可是走入绝地。我看，在沙家店给他布个网，36 师绝没处逃！"

周恩来完全赞同毛泽东的想法。两个人研究之后，具体作战方

案很快便确定下来。电话尚未架设通，毛泽东命令警卫员马汉荣和邵长和将作战方案直接送到了西北野战军司令彭德怀手中。

第二天清晨，起了风，乌云散去，山谷里涌出一股浓雾。毛泽东说，沙家店战役对整个西北战局有着决定性意义，梁家岔距主战场沙家店 10 公里，他可以在梁家岔就近指挥战役。

毛泽东在延安

梁家岔只有 20 来户人家，坐落在靠山顶的东坡。中央机关几百号人马，在数万追兵面前显得敌众我寡。但在这小村子里却显得声势浩大，简直挤得无插足之地。勉强给毛泽东和首长们借到两间窑洞，又给工作人员弄了一间小窑，其他人员全部露宿。于是，崖畔下，大树周围，以至老百姓的牲口圈都住满了人。

不久，司令部与西北野战军总部的电话接通了。毛泽东立即下令："要彭总，我要跟他直接通话。"

很快，电话铃响起来了。电话放在石板锅台上。毛泽东几步走到锅台旁，抓起电话听筒："喂，是呀，我是毛泽东！"

我们这些守在窑洞前的工作人员恰似听到一声春雷，都兴奋地从地上跳起来。从 1947 年 3 月撤出延安以来的近半年时间里，毛泽东一直使用化名李得胜。今天是第一次公开恢复使用毛泽东的名字！这说明形势发展已经到了一个伟大的转折点，敌人就要走下坡路了！

彭德怀司令员在电话中报告了敌 36 师被围的情况。毛泽东听后大声说："向全体指战员讲清楚，这是对整个战局有决定意义的一战，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敌人，不让一个敌人跑掉！"

彭德怀又汇报了几句，毛泽东仍大声说："要挖壕！侧水侧敌，大意不得！"

过了片刻，毛泽东大概是针对彭德怀的请示，大声说："初战一定要打赢，赢了就争得主动……部队没有粮食了？没有粮食就杀马吃！打完仗再说！"

放下电话，毛泽东回头问我："银桥，我们还有酒吗？"

毛泽东不善饮酒，即使喝一杯葡萄酒也会脸红，所以极少喝酒。但是有两个例外：一是安眠药用完的时候，他为了睡觉，要喝一杯。喝一杯就会晕，喝三杯肯定躺倒。另一种情况就是打仗或者写作，连续几天不睡觉，也需要喝点酒，以刺激神经兴奋。酒对毛泽东好像既能提神又可以安眠，关键是掌握好用量。

这段时间恰好安眠药告缺，我为他备下了酒。听他问酒，我忙回答："要什么酒？白酒行不行？"

"不要白酒。"毛泽东想了想，摇摇头，风趣地说，"钟松没有那

么辣。”

“那就拿葡萄酒？”

毛泽东想了想，又摇头说：“这一次敌人有十几万，我们又是侧水侧敌，仗也没有那么好打……嗯，有白兰地吗？”

“有！还是外国货呢。”

“我看就是白兰地吧！”毛泽东的手指头敲在地图上，敲在被红色箭头（表示人民解放军）包围的蓝圈里（表示敌军），敲在钟松的“脑壳”上。看来他把钟松划入白兰地的水平：没有白酒辣，也不像葡萄酒那么柔和。

我拿来白兰地，放在地图旁。酒瓶旁边放着一盒烟一盒火柴，酒瓶另一边顺序摆开油灯和蜡烛。锅台旁摆一张帆布躺椅。

战役打响后，毛泽东便守在电话机旁，一边和前线联系，一边查看地图。前线无大事，就看解放区各战区来的电报，或回到锅台旁写电文。电话铃一响，放下笔又去抓听筒，听取前线指挥员的汇报，作出各种指示，下达各项命令。脑子疲劳了，就呷点白兰地刺激刺激。烟是一支接一支地吸，茶水更是不断。泡过水的茶叶用手指头一抠便进了嘴，嚼一嚼咽下去。头一天是一包茶叶冲三次水后才吃掉茶叶，到第三天已经是冲一次茶，喝完水就吃掉茶叶。他决不出屋，也不上炕，累到极点就在帆布躺椅上闭目养几分钟神，眼皮一掀就又接着工作。

第三天清晨，天又下起雨，其势凶猛，如注如浇；雷声隆隆，大地颤动。人们看到秘书和作战参谋跑进跑出，便有几个人围上去打探消息。

毛泽东忽然走出窑洞，朝大家喊道：“你们到山上听炮声去吧！

炮声激烈时，来向我报告！”

哈，原来不是雷声而是炮声！大家都欢呼跳跃着朝山上跑去。

我不能离开主席，守在窑洞里。我军在两小时之内，便将敌 36 师的一个旅歼灭，活捉了敌旅长刘子奇，实现了毛泽东首战必胜的计划。另一支部队也把企图增援钟松的刘戡部队阻击在葭县一带。

司令部里最热闹的是电台。从收听到的敌台得知，钟松惊恐万状，急于突围。胡宗南在无线电话上，指名道姓地骂钟松，命令他“固守待援”。刘戡遭阻击，生怕被我军消灭，在黄河边上打转转。胡宗南又指名道姓大骂刘戡，下令要把刘戡撤职查办。沙家店战役序幕一揭，敌人便乱成一团。乱归乱，却是规规矩矩地照着毛泽东为他们摆下的棋子一步一步走的。

沙家店战役打了三天两夜。毛泽东三天两夜没出屋，不上炕，累了就坐在帆布躺椅上养养神。吸掉 5 包烟，喝掉几十杯茶。没有大便，小便不计其数。歼灭钟松的 36 师，俘敌 6000 余人。这一战役的胜利，标志着西北野战军反攻的开始和国民党军对陕甘宁解放区“重点进攻”的彻底破产。毛泽东很是兴奋，挥毫给彭德怀写了 12 个大字：

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写罢，毛泽东把笔一掷，抓起剩下的大半瓶白兰地酒，晃一晃：“拿错酒了。”

我说：“什么敌人遇见主席，白酒也得变成葡萄酒，想辣也辣不起来。”

李银桥：吃肥肉补脑子

沙家店战役结束后，毛泽东对我说：“银桥，你想想办法，帮我搞碗红烧肉来好不好？要肥肉。”

我说：“打了这么大的胜仗，吃碗红烧肉还不应该？我马上去搞。”

已经三天两夜不曾合眼的毛泽东疲倦地摇摇头：“不是那个意思。这段时间用脑子太多，你给我吃点肥肉对我脑子有好处。”

我告诉厨师高经文烧了一碗红烧肉，毛泽东先用鼻子深深地吸吮香气，两眼一眯，轻轻赞叹道：“啊，真香！”然后，抓起筷子，三下五除二，转眼就吃了个碗底朝天。

他放下碗，发现我目瞪口呆地立在旁边，忽然变得像个孩子一样，不好意思地笑了：“有点馋了……打胜仗了，我的要求不高吧？”

我的眼圈一下子红了。俘敌6000余人，他只要求一碗红烧肉！我用力摇头：“不高，不高，主席要求的太少了，太低了。”

“不低了。战士们冲锋陷阵也没吃上红烧肉，只能杀马当粮食吃。”

从那天起，我知道毛泽东爱吃红烧肉，吃红烧肉是为了补脑子。此后，每逢大战或者他连续写作几昼夜，我都要千方百计替他搞一碗红烧肉来。

可是，战争岁月，有时粮食都没有一粒，大家常常吃黑豆，到哪里去找红烧肉？

谢天谢地，西北军区司令员贺龙从河东给毛泽东捎来一块腊肉，虽不好红烧，但炒一小碟吃吃也可以补补脑子啊。

谁知腊肉端上桌，毛泽东却叫撤走。他说：“你们想叫我吃得好

一些，可是我怎能吃得下去呢？”

“这是为了工作，为了补脑，可不是为了享受！”我忍不住叫了起来。

“脑子是要补的，可是也要讲条件。条件不同，补的方法也不同。银桥啊，你给我篦篦头吧。”毛泽东朝椅背上一靠，闭上了眼。我给他篦头，他给我讲黑豆的营养价值，说什么它的蛋白质足够脑子使用了。又讲篦头的好处，说它能促进头部血液循环，把有限的营养首先满足大脑。他不讲还好，我听着听着就掉泪了。

那块腊肉以后再没有人动，一直保存到1948年新年前，才用它款待了由华东赶来开会的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

毛泽东说补脑子要讲条件，可是当后来到了河北平山县西柏坡，特别是全国解放以后，条件好了，毛泽东仍然保持爱吃红烧肉这个习惯，一切山珍海味他都不追求。他曾对我说：“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不是为了吃世界，而是为了改造世界。这才叫人，人跟其他动物就有这个区别。”他这句话至今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这天，毛泽东向解放区有关野战军下达命令后，仍然没休息，又与周恩来、任弼时匆匆赶到西北野战军司令部驻地东原村。

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副司令员张宗逊、副政委习仲勋和其他首长远远迎了出来。四下里立刻响起热烈的喧笑声。

“你们打得好啊！”毛泽东大声夸赞。将军们都抢上来同毛泽东握手。

“主席，您可是瘦了！”王震说。

“瘦点好么，走起路来方便。”

“给主席牵马！”彭德怀吩咐卫士，便握了毛泽东的手朝司令部走。“主席，你们几次遇危险，我可是真担心哩。”

“我也替你们担心哩。面对十倍以上敌人打歼灭战，又是侧水侧敌，如吃不掉，他援兵一到就麻烦大了！”

“有主席亲自指挥调度，我才不担这份心哩，料他刘戡也没那个胆！就是便宜了钟松那龟儿子。本来是抓住了，他龟儿子装成马夫，趁天黑下雨又逃了。”

“逃了今天逃不了明天，我看刘戡的日子也不多了。”

“下次一定把刘戡的脑壳拿来献给主席！”

“我不要他的脑壳，我要他的 7 个旅。”

走进司令部，周恩来和任弼时在锅台旁坐下。毛泽东则朝炕上随随便便一歪，侧躺下来，望着墙上的军用地图说：“老总，讲讲吧。”

彭德怀手里拿了个小口袋，朝锅台上一倾，一袋炒黄豆哗地撒了出来。他给毛泽东抓一把，又捏起几颗往自己嘴里丢。这是他们当时能吃到的最好的零食。

彭总咯嘣咯嘣地嚼着炒黄豆，走到地图前，一边指点，一边讲述地形选择、兵力配备、火力分配以及战斗经过。他讲话快得像机关枪连射，几乎不容人喘气。毛泽东在炕上举起手摆一摆：“慢点慢点，怪不得钟松就很快完蛋了，即使我们几个也都吃不消么。”

周恩来风趣地说：“一枪一枪来，别连射。”

彭德怀略显尴尬地笑笑，放慢了速度，一句一句重新讲。可没讲两句便不耐烦了，把手在面前一攥：“嘿，这么讲话我非出汗不可。干脆，我带你们到战场去看看。”

屋里所有人哄一声都笑了。

来到战场，彭德怀将望远镜递给毛泽东，一边指点，一边介绍情况。毛泽东频频点头："好，那好。"

随后，毛泽东、周恩来等又看望了伤兵和指战员，并"检阅"了前不见头后不见尾的6000余名俘虏兵。

彭德怀请毛泽东回窑洞休息。窑洞里的炕上坐满了人，门里门外也都挤满了，大家都在等着听毛泽东讲话。

毛泽东吸着纸烟，用他那浓重的湖南口音抑扬顿挫地说："胡宗南是个没有本事的人，阴险恶毒，可惜志大才疏。他那么多军队，把我们没有一点办法！我们打了这么多次，就没吃过败仗。"

有人插话说："他也有本事呢，他的本事就是一切照毛主席的计划行动，决不走样。"大家都笑了。

毛泽东继续说："陕北战争已经'翻过了山坳坳'，最吃力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战争的主动权握在了我们手里。"说到这里，将大手一攥，笑了笑，又迅速张开手扳起手指头，数道："青化砭，羊马河，蟠龙，沙家店，整个凑起来吃掉他六七个旅。我们打垮了胡宗南自命的常胜将军，活捉了他四大金刚中的三个。他们四座'金缸'被我们搬来三座：何奇、刘子奇、李昆岗。只剩下一口'缸'，叫什么……"

"叫李日基！"窑洞一角有人喊。

毛泽东用他那湖南口音将"日"念成"二"，打趣地说："对了，叫'李二吉'。这次没抓住他，算他一吉；下次还许抓不住，再算一吉；第三次可就跑不了啦！"

毛泽东煞有介事的表情引得会场里又哄声大笑起来，兴奋的将军们有几个用力鼓起掌来。

毛泽东笑着继续说："我看国民党那些有名的人物，像蒋介石、胡宗南之流，也许有个一吉两吉的，但终究是很不吉。不管他逃到哪里，总要缉拿归案，依法惩办的。同志们，有信心没有？"

"有信心！"

接着，毛泽东详细分析了全国战局和西北战场的形势，同将军们讨论了转入外线作战的问题。

回到梁家岔，机关已转移到朱官寨宿营。毛泽东顺河沟徒步 10 公里来到朱官寨，号房子的同志又说主席的住处在一公里外的后沟，那里环境清静。

连日来没有休息好的毛泽东笑着说："我现在不需要安静，只需要睡觉呢。"

同志们临时腾出一孔窑，让毛泽东先睡一觉。可是毛泽东没有睡，又召集周恩来、任弼时等首长开起了会……

毛泽东庄严地说："辛苦些是应该的，是值得的。我们将要创造崭新的历史！"

四　时刻不忘为民兴利除弊

李银桥：在黄河边上搞农村调查

朱官寨是个小村子。同志们为毛泽东腾出的一间破窑洞长年被烟熏火燎，窑壁窑顶乌黑，光线很暗，大白天字迹也看不清楚，毛泽东不得不搬着小凳到窑洞门口借着阳光看地图。

就在这个乌黑的窑洞里，毛泽东起草了《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向我军提出了以主力打到国民党区域的任务。

在朱官寨住了十多天，毛泽东又转到神泉堡。此时，国民党已停止向解放区的进攻，往回收缩，形势变得缓和起来。毛泽东便分出一部分精力在黄河边搞农村社会调查。他帮老乡推碾子，打场，唠家常；转了几个村子，用去了十多天的时间。

有一次，毛泽东蹲在粪堆旁，用手捏开粪肥看了看，问老乡："你们都往地里施什么肥？"

老乡回答："主要是上粪肥，有时也上草肥。"

毛泽东回身指指窑洞，说："我住过好几个窑洞，墙上的土皮都熏黑了，这是很好的肥料，为什么没人用呢？"

老乡憨笑着说："都说这个黑土上地壮，可就是用不习惯。"

毛泽东说："你们试试么，你们是重实际的，亲眼见了才信。你们试试之后，看到黑土能多打粮食就向大家宣传推广，好不好？"

老乡不再憨笑，认真想了想，用力点头说："行！这是个好办法。"

毛泽东高兴地说："将来打败了国民党，咱们要过好日子，就要生产更多的粮食，需要更多的肥料。一个窑洞清下的黑土我看够上一亩地，既有利生产，又有益卫生，你们看是不是这个道理？"

"是这个道理！"老乡们纷纷点头。

毛泽东很善于同群众谈心，用最通俗的语言讲明各种道理。他不止一次地对我们说："我们走到哪里，都不要忘记为民兴利除弊。我们共产党的干部战士，都是为人民服务的。"

毛泽东搞农村调查来到葭县南河底村。谢觉哉和王明也从河东来到南河底村，向毛泽东汇报土改和《婚姻法》起草情况。当时中央工委日常工作由刘少奇主持，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草案。为了制定正确的土改政策，毛泽东在调查中对农村中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各占多少人口，各有多少土地，对农村封建剥削的方式、剥削的程度，以及各阶级各阶层对土改的态度都作了科学的研究和分析。

听完谢觉哉和王明的汇报后，毛泽东来到田里帮农民干活。这是解放区土改后第一个秋收，农民们喜气洋洋。毛泽东帮老乡刨山药蛋，又到麦场拿起槎枷帮老乡打谷子。我怕他干这活太累，劝他休息，他又跑到场角去跟娃娃们掰玉米。显然，毛泽东和分得土地的农民一样的高兴。

毛泽东一边掰玉米，一边煞有介事地巡视娃娃们，放粗嗓门问："你们谁是地主呀？"

娃娃们认真分辩道："地主都让我们斗倒了，谁也不是地主。"

毛泽东仍然压低粗嗓门逗孩子们："不是地主，怎么会有这么多粮食呢？"

有些紧张的娃娃们似乎松了一口气，抢着说："土改了，我们有了地，这是好几家的粮食呢。"

毛泽东笑了："哈，原来是大家的。"

娃娃们立刻又叫又跳地拥了上去："你逗我们，你逗我们呢！……"

毛泽东笑得更加开心了。

南河底村在白云山下，山上有座白云寺，规模宏大。毛泽东突然问我："银桥，你到过寺庙吗？"

我说："见过小庙，没见过大庙。"

"我是去过大庙的。"毛泽东垂下眼帘，仿佛沉入遥远的回忆中，"在湖南长沙读书时，我同一个同学徒步走了5个县，作社会调查。我们身上一文不名，有一次到了微山寺，讨得一顿斋。那寺庙好大哟，方丈是个很有学问的人……"

片刻，毛泽东抬起眼皮，问道："想不想去看庙？"

我犹豫道："都是一些迷信……"

"片面，片面！那是文化，懂吗？"毛泽东纠正我说。

我当时只懂写字看书是学文化。

"那是名胜古迹，是历史文化遗产。"毛泽东解释着，并定下决心说："明天我们去看庙！"

第二天早晨，天晴气朗。毛泽东仍是拿着那根柳木棍儿，顺着盘山的松柏林阴道向山上走去。葭县县长闻讯由县城赶来陪毛泽东一道上山。

抵达山顶，毛泽东俯瞰大地，脸上露出惊喜的神色，深深地吸一口清新的空气，说："可惜今天没有云，否则我们就真成了一群腾云驾雾的神仙了！"

话音刚落，从茂密的柏树丛里转出一个老和尚。他虽然不认识毛泽东，但看到是县长作陪，便料到是位首长，忙合掌施礼。

毛泽东与他握手，说："老师傅，我们来参观参观你这个大寺庙。"

老和尚躬腰说："欢迎欢迎，首长请。"

毛泽东笑了："你们过去是称'施主'么，不要破坏了规矩。"

只此一句话，老和尚便像受到什么触动，显出肃然的表情，重新认真打量了一眼毛泽东。

老和尚把毛泽东引到方丈室，忙着掸桌椅，请客人落坐。毛泽东说："不要费事，我们坐下聊聊么。"老和尚还是坚持给毛泽东献上一杯香茗，而后才坐下。

"你们现在生活怎么样？"毛泽东问道。

老和尚望一眼县长，含糊其词地说："好，好得很哩。"

"出家人不打诳语。"毛泽东微笑着，诚恳地说，"你们是超脱的，更要讲实话。"

老和尚深受感动，实话实说道："不瞒施主，以前信神的多，出家人也多，布施的人多，收入也多，生活很好。后来信神的人少了，出家的人少了，布施的人也少了，生活一时有些困难。"

"嗯，"毛泽东点点头，"你能讲实话，这就好。有什么困难你都说说。"

"布施的人少，遇到庙会也收不了几个钱，吃穿都有些困难，庙里散去不少人。后来人民政府叫我们自力更生，种点地，搞些农业

生产。开头不习惯，现在手脚灵便了，倒也能劳动。”

“这不错呀，这是一大改变呵！”毛泽东又问：“现在生活到底怎么样呢？”

“现在打的粮食够吃，其他穿衣、治病、修理寺院，一概由政府包下来。再加上收布施香火，生活倒也满好的了。出家人不打诳语，确实好的了。”

毛泽东脸上浮现出笑意：“你觉得这样安排还妥当吗？”

“托毛主席的福，安排很周到。出家人也得随着社会进步呵！”经县长介绍后，老和尚已知道毛泽东的身份。

“讲得好！社会变了，人也要变。过去，和尚一不生产人口，二不生产粮食。现在要变，不生产人口可以，不劳动不行。边区是保护宗教信仰的，但是要劳动。参加劳动后，身体好了，也不剥削人了，这就对了。今天我在你这里‘取经’了。”

老和尚高兴得边笑边头点：“不敢不敢。”

毛泽东又询问他种多少地、打多少粮食、白云寺建于何时、扩修于何时、鼎盛时期有多少和尚等等。然后由老和尚领路去参观寺庙。

寺庙很大，有 50 余座殿、堂、庑、阁。各式各样的佛祖、菩萨、金刚、力士，栩栩如生。毛泽东尤其对那些雕刻、塑像、石碑和牌匾感兴趣，看得很仔细，一字一字地读，表情肃穆，不时发出感叹之声。

“这些东西都是历史文化遗产，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宝贵财富。一定要好好保护，不要把它毁坏了。”

老和尚频频点头：“主席说的对，主席说的对。”

毛泽东似有所动，回忆着说：“我在长沙读书时，暑期里走了 5 个县，搞社会调查。我去了微山寺，和尚们叫我施主，我说我不是

施主，我一文不名，我只是讨一顿斋饭……”

毛泽东忽然把头转向县长：“请县里拨一些经费，把庙修一修。”

县长说：“我回去马上办。”

毛泽东继续向前走去，脚步似乎轻松了许多。我想，这一定是因为有了了却一桩心事后的愉快之感吧。

告别时，老和尚依依不舍地送出寺庙，殷勤地说：“明天这里有庙会，还有大戏，主席也来看看吧，热闹着哩！”

毛泽东笑道：“谢谢了，我们就来看看戏。”

第二天一大早，大路上就热闹起来了。老乡们三人一伙，五人一群，喧嚷着去白云山赶庙会。

毛泽东兴致很高，说：“走，咱们也去赶庙会，看大戏。”

我说：“人这么多，乱糟糟的……”

“你们又怕不安全吧？赶庙会就是赶热闹，人少了还有什么意思？”毛泽东已经拿起了他那根柳木棍，嘴里仍在说，“看庙看文化，看戏看民情；不懂文化，不解民情，革命是搞不好的。老百姓利用庙会去行善做买卖，我们去可以学到很多知识，了解这一带的民情和习俗，这对我们接近群众有很大好处。今天只留两个人看门，大家都去！”

就这样，我们又随毛泽东上了白云山。

这天是正会，人最多，山上挤挤挨挨，万头攒动。庙里香烟缭绕，还摆了许多吃食挑子。山顶最高一层庙院里搭了戏台，锣鼓震天响，山西梆子开场了。毛泽东在群众后边兴致勃勃地朝台上望。他喜欢京剧；没有京剧，山西梆子他也看。后来接触久了，我发现，凡是中国的民族文艺他都喜欢，对于外国艺术他兴趣不大。

会场忽然起了骚动，有人认出了毛泽东。

“毛主席，毛主席来了！”

越来越多的人传递着这句话，老乡们兴奋得连戏也不看了。有人搬来长条凳请毛泽东坐。毛泽东连连摇手：“不要不要。大家都站着，我一个人坐着，那不是太孤立了吗？”说着便朝人群里挤。

可是，连台上的演员也停下了演出，都挤出来看毛泽东。

毛泽东悄声招呼群众：“看戏吧，老乡们，咱们都是来看戏的。”又朝台上招呼：“你们快演吧，我是来看你们演出的，大家是来看戏的，不是来看我的。”

好一阵子人们才平静下来，演出继续下去。毛泽东始终站在群众中，专心致志地欣赏台上的山西梆子。

在黄河边调查结束后，毛泽东为了帮助我提高文化水平，叫我写出日记来。我却写了个《旅行集》，交给毛泽东。他看后笑了，抓笔改作《旅行记》。我在里面写了调查中看到的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乡土风情、生活状况。毛泽东用笔给我修改一遍，特别给我讲了一番“的、地、得”的区别和用法。最后，他大笔一挥，批道：“写得很好，大有希望。”并且签了“毛泽东”三个字，对我说道：

“银桥，把你写的这个旅行记寄回老家去，叫你父母看看，叫他们知道你参加革命后的进步，你父母也会高兴，放心你在这里工作。”

我照毛泽东的意思把《旅行记》寄回家。父母看了很高兴，村里人也争着传看毛泽东的批示，可惜传来传去就传丢了。

韩桂馨：一把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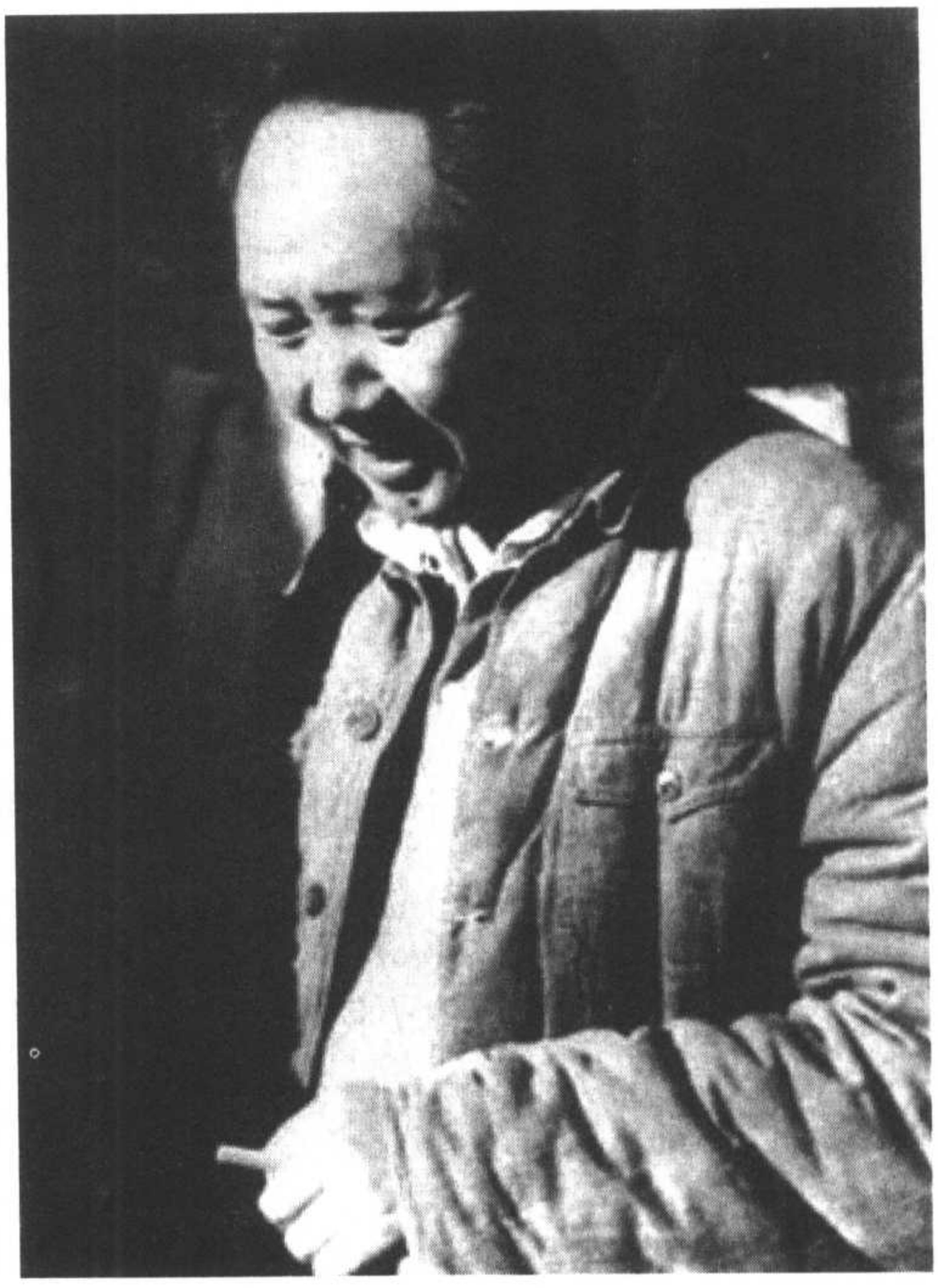
我们跟着毛主席从李家坪来到神泉堡。

当时陕北地区村庄比较小，相隔也较远，往往走半天也看不到一个村。记得一天中午，我们走到一个小村旁，大家又累又渴又饿，领导下令在村边休息。

吃过饭，精神也好了，我领着李讷在村庄附近转一转。秋天的太阳照在身上，浑身暖融融、懒洋洋的，很舒服。

我们走着走着，看到了一棵大枣树。那树很高很大，枣子熟了，红红的枣子挂在树上，很好看。树底下散落着一些被风刮掉的枣子，特别诱人。我看看那棵枣树，又望着地上的枣，仿佛回到了家乡，站在自家的果树旁。于是不由自主地捡起几个来尝尝，还真甜，就顺着给李讷两个。我想：这么好的枣子掉在地上，太可惜了。

我们俩正津津有味地吃甜枣，没想到毛主席带着卫士们散步，也来到这里。那段时间里，毛主席每到一处，都要搞农村调查，他甚至帮老乡推碾子，打槌枷，还和老乡们谈话。



毛泽东在神泉堡

这次是短暂的休息，他也要到村子里转转。他见我们手里有枣，便问："你们怎么摘老乡的枣？我们有纪律，不能拿老百姓的一针一线。"我解释说："这枣不是我们摘的，是掉在地上的，我们只捡几个尝尝。"

"你们在这里吃枣，群众见了，怎么知道是摘的还是捡的呢？这影响可不好啊。每个人都要自觉遵守群众纪律。"

我的脸红了。我向主席承认这样做不对，并且保证以后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

主席笑了笑，转身走了。

毛主席对这件事提出批评，在当时还有一个特殊的意义，那就是 10 月 10 日毛主席刚刚起草《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毛主席从红军初创时期起就为军队制订了严格的纪律。他把执行纪律作为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我也亲眼看到毛主席每次行军前都要求卫士们上好门板，打扫窑洞。而我却……我越想越惭愧，暗暗责备自己不懂事，把自己混同于一个普通老百姓。虽然这只是几个枣，但这关系到群众纪律呀。我怎么就想不到呢？

后来我们部队打锦州时，战士们不吃掉在地上的苹果，受到了主席的表扬。只有这样的军队才能打胜仗。

行军是很累的。我们宿营一般都安排在老百姓家里。由于村子小，住处紧张，所以每到一处，卫士组的同志们都是赶快安排主席住的地方。一般情况下，我都是与李讷住一起，离主席住处也比较近，因此对主席的生活习惯也有些了解。

卫士们尽量把主席的生活安排好，这是他们的职责，我也很理

解。比如毛主席不习惯睡热炕，而是喜欢用硬板床。陕北哪有木板床啊。卫士们总是想办法找来门板，放在大炕上，给主席把床铺整理好。毛主席长期以来工作紧张，睡眠很困难，让他睡个好觉，是大家的共同心愿。虽然我到主席身边不久，但大家的这种心情我也很快理解了。

有一次，我们到驻地后，天已经墨黑墨黑的了。那时没有电灯，窑洞只有一个小窗户，点上灯也只能照亮一小块地方，卫士们忙着为主席的住处做安排。毛主席到住地后，找了个地方坐下休息，不声不响地考虑问题。他皱了一下眉，招手把李银桥叫到身边说："我经常有些紧急的事情要处理，每次行军住到一个地方时，你们不要先给我安排睡的地方，而要先给我安排个办公的地方。我要发电报、写东西、批文件。"

行军驻地都是临时安排的，有时住一天，有时住两天。老百姓的窑洞里哪有什么条件办公啊？幸好，陕北老乡家的锅台都是大块石板做的，不像我们老家是用砖砌的那种。而且石板比较光滑、平整，于是李银桥他们就用布把锅台擦一擦，摆好纸墨，银桥打开自己的背包，把自己随身背的两套工具书——《辞海》和《辞源》（共四大本）放在临时的"办公桌"上，放好纸和笔，主席就可以随时工作。顺便说一下，毛主席行军时，有专用的牲口为他驮书和文件，那些书装包打捆比较费事，银桥索性就将主席常用的两套工具书打在背包里，可以及时拿出来供主席使用。这两套工具书，一直背到北平。

周副主席一到驻地也是马上到主席这边一起商量工作、批文件、拟电稿。他们经常坐在锅台边的土墩上或小板凳上。周副主席很细

心，天凉了还在主席坐的小凳上垫上件棉袄，他自己就坐在木墩上用膝盖当办公桌批文件。毛主席已经50多岁，周副主席比他小5岁，他们那么大年龄，行军不比我们走得少，到驻地大家都休息了，他们还要工作，领导比我们更累、更亲苦。后来我才知道，毛主席和周副主席那时正与华北、华东、西北各野战军联络。他人在陕北，胸中装着全局，他正指挥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上歼灭敌人。

韩桂馨：两个馒头

陕北农村生活条件比较差，特别是冬天一到，天寒地冻，再也见不到新鲜蔬菜了。老乡们过冬都是靠秋天腌的咸菜，或者是积的酸菜。老百姓的家里，每家都有口大菜缸。

秋天正是腌菜的季节。家家忙着腌菜，做过冬的准备。我们每到一地，家家老百姓都热情地给我们腾出窑洞，所以对陕北老乡的这一生活习惯我也了解了。甚至每到一家，我也关心他们缸里的菜，看看腌了多少，腌的什么菜。

有一天晚上，我们刚要准备睡觉，忽听外面有争吵的声音。虽然声音不大，但听得出是老乡与哨兵为件什么事正在争执。我走了出去，想看看到底出了什么事。原来问题就是由咸菜引起的：那位房东腌了两大缸咸菜，他说菜刚腌进缸里不久，晚上要进来搅一搅缸，把菜在里面翻个身，倒一倒，不然的话，菜腌不好不说，也许会烂掉。哨兵说首长正在办公，你进去搅菜缸，就要影响首长工作。我认为哨兵的意见对，就向李银桥建议：毛主席住在这里，最好不要让老乡进来，否则保卫工作不好做。

门口的嘈杂声大概惊动了主席。他询问情况时，卫士把经过情形报告了。没想到毛主席马上表态说："不要因为我影响了老乡的生活。人家把房让给我们住，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房东搅搅菜缸还不应该吗？告诉那位老乡，他愿来就来。"

后来我听卫士说，毛主席还和那位老乡亲热地拉家常呢。

行军时，毛主席骑的是一匹矮个头小白马。那马很老实，走得稳稳当当。四、五名警卫员在左右随护。大家在主席身边都摸到了一个规律：如果他骑在马上不说话，那就是在考虑问题或在构思文章、打腹稿呢。这时候尽量不要去干扰他。

每到一地宿营后，毛主席不是忙着批阅文件、起草电文，就是埋头写文章。他写文章时，精神很集中，往往连饭都忘了吃。这时候他最不喜欢有人来打扰。

有一次，我们住在一个村里，毛主席住房前面有一个碾子。大清早就有老乡来推碾子磨面，这家用完另一家接着用。院里充满了大娘、大嫂们的说笑声、吆喝毛驴声、咣咣的萝面声及碾棍磨擦的吱吱声，构成一曲交响乐。作为农户，生活安定了，有米有面吃了，是好事。可是这声音对于正在写作的人来讲，就有些干扰了。卫士排的同志一起商量：是不是请老乡暂时到远处找地方去磨面，因为太吵闹了会影响毛泽东的办公和休息。

这事被主席知道了，他坚决不同意，并语重心长地说："要尊重老百姓的生活习惯。我们在这里就不要扰民嘛！"

领导同志之间工作配合默契，生活上互相关怀、照顾。

陕北地区属大陆性气候，在三、四月份也常受寒流袭击。有一

天，前委机关在老君殿西边的小山庄上宿营，炊事班很快熬好了小米稀饭，让大家喝了暖暖身子。毛主席端起热乎乎的稀饭，正准备吃，周副主席的卫士关兰轩送来两个雪白的馒头，并说："主席，这是周副主席送给你的。"

主席看到这两个馒头，高兴地问："周副主席吃过了吗？"

主席拿起馒头看了看，对李银桥说："弼时同志有病，把这两个馒头给弼时同志送过去。"

任弼时收到馒头后，马上想到这是主席关心自己的身体。馒头肯定不多，也不一定再送给更多的人。他认为周副主席比自己更辛苦，年龄也比自己大，应该送给周副主席。于是这两个馒头又回到周副主席手里。

五　在杨家沟的日子

韩桂馨：他对自己的孩子要求很严格

1947 年底，我们又随毛泽东从神泉堡转移到米脂县的杨家沟。

米脂因在古代出了美女貂婵而闻名。这里的经济文化比较发达，封建势力也比较大。杨家沟是个大村子，住着 200 多户，有钱有势的人也不少。

离村五、六里，我们就见到拦路搭起的一座座石牌坊。路旁还竖立着许多石人、石马和高大的石碑，一直排到村里，显示着昔日的繁华。村里既有整齐的砖瓦窑，也有破旧的土窑。从住处不难分出主人的身份，破土窑里肯定住的是贫苦的农民。村里的土墙上刷了一些标语口号，还抄上了《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全文。这说明我们党在这里已经有了一定的工作基础了。那时我在部队受到的教育，使我自觉或不自觉地去用阶级斗争的观点看问题。

从杨家沟的名字，你可以想像出这个村的地形。村里的路是顺着山势修的，窑洞也是在山坡上修成一排一排的，远看就像现在的楼房似的。我之所以这么详细地介绍一下环境，是因为整个前委机关，包括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领导同志都住在这里，而且住

了半年。我的印象也比较深。

我们进村往上走，都是一排排的砖瓦窑，这显然是地主住的地方。有一段路像吊桥似的，路面窄窄的，两边是深深的山沟。过了这条路，前面就开阔起来，迎面矗立着一座油漆彩绘的高大门楼。宽敞的院子里青砖铺地，正面一处带玻璃的洋房，飞檐彩绘，很有气派。门前还有个阳台，颇有些城市味。据说这家地主的儿子是个留学生，所以房子也造得洋气。

周恩来已经先一步到达这里了，他引导着毛泽东参观了一遍。毛泽东幽默地说："这房子三面临崖，崖深数十丈，只有一条通路。北面这制高点上的围墙碉堡，土枪土炮是难攻进来的。看来这家地主不简单，不但会剥削人，还懂点军事常识哩。"

走进"洋楼"才发现，这建筑其实是中西合璧。外面看到的只是一道玻璃走廊，里面仍是窑洞式结构，中间部位比较突出。东面 6 孔窑洞归毛泽东使用，西面 3 孔窑洞归周恩来。任弼时住在另外一个院子里。毛泽东这面的 6 间分别住着毛泽东和江青及卫士组的同志。我和李讷就住在第 3 间，紧挨着毛主席办公室那间屋，我们这些人组成了一个大家庭。

由于胡宗南 20 多万大军在陕北又吃又毁，使得农业生产遭到很大损失。我一到河西便对这种困难的局面深有所感：由于粮食的缺乏，我们一日三餐都吃粗粮，并且多数是黑豆代饭。黑豆本是喂马的料，人吃了很不容易消化，吃到肚里胀气，老是放屁，挺难受的。小李讷和父母团聚后，仍然吃的是这种饭。

记得那天的饭是"钱钱饭"。就是把黑豆黄豆压扁了放点小米煮熟，放点盐。毛主席则吃炒辣椒下饭。因为有父母在身边，李讷很

兴奋，饭吃得很香，话也很多。我想：这孩子离开父母亲有一年了，想说的话实在是太多了，真难为了孩子。毛主席心情很好，有问有答，饭吃得有滋有味。

毛泽东对女儿的疼爱是显而易见的，这从毛主席的神情中显露得清清楚楚。吃过饭，毛泽东对我说："阿姨，以后你就带李讷到大食堂用饭吧。"

我毫无思想准备，听了有些发怔。我们大食堂伙食做得粗，一天两餐盐水煮黑豆，连豆皮都不去，实在不适合孩子吃。于是我对主席说："我们大食堂每天吃粗粮，大人吃了还不容易消化，孩子怎么行呢？李讷还是和爸爸妈妈一起用饭吧。"

"应该到大食堂去，"主席不以为然，"现在这已经比岸英、岸青他们小时候好多了。"

"李讷身体弱些，还是在您身边一起吃吧，这样孩子心情也好。"

毛主席还是不同意，他对我说："阿姨，不要以为毛泽东的孩子就特殊，从小就不要灌输这种思想。要教育我的孩子和老百姓的孩子一样。不能叫孩子打着我的招牌享受特殊待遇。"

这时卫士组长李银桥望着江青。江青大概不好出面说话，但是眼神中已经把意思表明了。于是李银桥开口劝道："孩子还小，还是和爸爸妈妈一起用饭吧。"

毛泽东不容置辩地说："陕北老乡的娃娃吃粗粮一样长得壮。"说着将大手向外一挥："就这样吧，不要再说了。阿姨费心教孩子认字去吧。"大家都不作声，以后再也没人去提这事。

以后我发现，毛泽东对家人说定了的事，轻易不允许别人反对。他对孩子的严格要求，这是我第一次领教到。

1947 年 12 月韩桂馨(后左)与李讷(前左)等人合影

李讷随我到大食堂去吃饭。她很懂事，每到开饭时也像战士们一样自己拿着小碗，打一碗饭、一份菜。最困难时，一个多月天天吃黑豆，但她从没喊过一声苦。可是有一天，李讷发起愁来，那是因为毛泽东与警卫战士的一句玩笑话引起的。

警卫员朱老士是陕北人，由于陕北的食物和水质问题，他的牙齿有点黑。毛主席在闲暇时为了换换脑子休息休息，有时也喜欢开玩笑。有一天，他一本正经地说："朱老士同志，你的牙齿怎么这么黑呀？是不是吃黑豆吃的？"

大家大笑，毛泽东自己也笑了。

谁知这句玩笑话使李讷小小的孩子有了心事。从那以后，她总是悄悄地用嘴唇吮牙，有时到镜子跟前照一照。我看出孩子不如此前那么活泼了，以为是孩子生活上不习惯。终于有一天，李讷自己吐出了自己的心事。她跑到毛主席跟前说出了自己的顾虑："爸爸，我的牙齿很黑吗？"主席开始没明白是怎么回事，还兴致勃勃地逗着孩子说："张嘴，张嘴叫爸爸看看。"李讷蹙紧双眉："我也是天天

吃黑豆……”她望了望周围，朝父亲张开嘴，露出缺了门牙的两排洁白牙齿。毛泽东抱住女儿，拍打着她后背说：“我的娃儿，黑豆怎么能把牙齿吃黑呢？爸爸是跟叔叔开玩笑呢。黑豆是好东西，营养价值高，越吃牙齿长得越白越结实。”

李讷看看我，我也点点头，表示赞成毛泽东的意见，让孩子放心。李讷又蹦蹦跳跳的了。

李银桥：毛泽东后悔和江青结婚

1947 年 10 月底，毛泽东从葭县的神泉堡转移到米脂县的杨家沟。

米脂县的经济文化比较发达，封建势力也比较大。杨家沟更是远近闻名的封建堡垒，200 多户居民，地主富农占 70 多户。

离村五、六里，便有拦路搭起的一座座石牌坊。路旁竖立着许多石人、石马和高大的石碑，一直排到村里。

进了村，路两旁出现了破旧的窑洞，显然这是贫苦农民的住处。土墙上用白灰和锅底子灰刷了一些标语。有一堵墙上还抄写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全文。

再往上走，就是一座座整齐的砖瓦窑，这是地主居住的地方。走过一段吊桥式的窄路，迎面矗立一座油漆彩绘的高大门楼，门内院落宽敞，青砖铺地。正面一所带玻璃、纱窗的洋房，飞檐彩绘，门前还有凉台。据说这家地主的儿子是个留学生，所以房子造得这么洋气。

毛泽东在周恩来的引导下参观了一遍，笑着说：“这房子三面临崖，崖深数十丈，只有一条通路。房子北面的制高点上有围墙碉堡，

土枪土炮是难攻进来的。看来这家地主不简单，不但会剥削人，还懂点军事常识哩。”

走进“洋楼”才发现，这建筑其实是中西结合。外面看到的只是一道玻璃走廊，里面仍是窑洞式结构，中间部位突出。东面 6 孔窑洞归毛泽东。西面 3 孔窑洞归周恩来。任弼时住在另一个院子里。

当时，正是共产党与国民党在全国范围内总决战的前夕，双方都在做决战的准备工作。

毛泽东在杨家沟过了将近半年相对安定的日子。在这里，他写下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十多篇文章，为我党夺取最后胜利做好周密的思想准备，并提出了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做好总决战的组织准备。领导了土地改革运动，以调动农民支持党和军队夺取决战的最后胜利。

由于革命形势发展迅速，一些不纯分子趁机钻进党内，在农村中把持政权、歪曲党的政策，阻碍和破坏着革命进展。为了迎接总决战的到来，毛泽东提出在全党全军进行一次以“三查”、“三整”为中心的整风运动。就在这次整风运动中，毛泽东与江青大吵了一场。

毛泽东是 1938 年与江青结婚的。1940 年 8 月 3 日，他们的爱女出生，取名李讷。毛泽东非常喜欢这个小女儿。

现在有人说，毛泽东当初不该与江青结婚。我认为这种说法是不全面的。

江青与毛泽东结婚时，中国共产党的处境还十分困难，夺取全国胜利还只是一种理想和信念。实际上中国大部分地区的报纸还把我们骂作土匪。在投奔延安的大批青年中，也有的吃不了苦就当了逃兵。江青毕竟是留下来了。当时，她还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员。但

是，正如毛泽东批评的那样，她是带着自身的种种毛病和缺点——“个人主义”、“剥削阶级作风”——来到革命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尾巴没有割掉”。

毛泽东与江青结婚是经政治局批准的。社会上盛传的“约法三章”，我没见过哪个人出面作证。总之，世界上没有未卜先知的神仙，30 年前就能知道 30 年后江青要祸国殃民。就我所见，是毛泽东不允许江青插手政治大事。直到 1956 年，由周恩来提议，常委们都同意，将江青与陈伯达、胡乔木、叶子龙、田家英一道，任命为中共中央主席的五位秘书。那是晚上研究的，快天亮时，毛泽东少数服从多数同意了。江青转战陕北时只是机关任命的机关协理员。进城后，主要是负责毛泽东的生活。这次常委会她被提为中央直接任命的五位秘书之一，负责国际方面的问题，开始步入政治活动。

那次开常委会时我就站在毛泽东身后。

彭真同志说，毛主席教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这是历史的事实。毛泽东思想是我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同样，毛泽东本人也是我党老一辈革命家的代表。所有回忆革命前辈的文章，你看吧，一切的思想、品质、作风、业绩，都可以在毛泽东身上找到。他是一代革命家的集中代表。某些年轻人思想解放，喜欢发表言论，这时，你不但要看现在，还应充分思考当时的历史背景；更不要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比如见到几个人在延安整风运动中被冤枉了，便看不到这场运动对纯洁队伍、统一思想、保证革命胜利所起到的巨大的历史性贡献。

那时大批有理想有文化的女青年投奔延安，许多首长都是在这批女青年中选择了自己的终身伴侣。作为全党领袖的毛泽东，在这

样众多的女青年中，不可能同一位坏得一无是处的女人结婚。我们的党也不会同意自己的领袖同一个坏透了的女人结婚。任何事物、任何人都是在变化之中，江青变坏，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为“四人帮”头子，那是其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发展的结果。

大凡谈恋爱时，人们总喜欢表现自己的优点，而将缺点和毛病掩饰下来。一旦结了婚，朝夕相处，缺点和毛病便渐渐暴露出来。普通人是这样，江青也不例外。比如她的虚荣心，爱出风头，争强好胜，小心眼儿容不得人；她的自私自利，只考虑自己，不考虑他人；她的脾气恶劣，反复不定；她的喜欢走极端，喜欢记仇报复，等等，都在日后有了一定气候时陆续暴露出来。这一切，都使毛泽东大伤脑筋，甚至大发脾气。在“三查”、“三整”运动中，毛泽东与江青吵架，是我见到的最激烈的一次。

事情是这样的：在“三查”中，查出了江青的入党时间问题，她自己说是 1932 年，但找到的证明是 1935 年。毛泽东耳闻后，对江青很生气，发了脾气。

撇开此事不谈，这时的江青也的确变得令人生气，也变娇了，变得脾气大了。几个月前，粮食紧张，生活困难，她也算没叫苦。现在有肉吃了，她一会儿嫌咸，一会儿嫌肥的挑捡起来，口味越来越高。她变懒了，房间里装了电铃，动不动就用指头按一下。前一段天天行军，她还能和大家一道走。现在呢？暖水袋就放在身边，她就不肯起身拿一下，只知伸手按铃。卫士张天义跑进去，以为有什么大事，其实就是把身边的暖水袋拿起来交到她手中。从江青房间出来，卫士张天义伤感地说：“形势刚好转，她就这样了。要是夺取了最后胜利，她……唉！”

江青的脾气也越来越大。前一段行军打仗，有危险有艰苦，但是也有欢笑。走在路上，住宿后搬个小凳靠墙一坐，她常给大家讲点历史故事或出个谜语，像个大姐的样子。有个谜语我至今记得很清："日行千里不出房，有文有武有君王。亲生的儿子不同姓，恩爱的夫妻不同床。"

"打一件事，你们谁能猜得出？"江青笑着大声问，洋溢着革命战士的乐观精神。

谜底是唱戏。

可如今，江青怎么变成这样呢？她严厉地对我们说："你们的任务就是替我们服务。我们高兴了，就是你们工作做好了。我们不高兴，就说明你们工作没搞好！"

她讲这些话时以及她讲话的神情态度，深深刺伤了我们的心。跟这样的人在一起，共患难可以的，同享福看来是不可能。

一天，我给毛泽东送茶。他正在窑洞里踱步，像是思考什么重大问题，脸色不大好看。我不便惊动他，将茶水轻轻放在桌上，便悄步退出。

可是，身后传来毛泽东的召唤："银桥，你不要走，我要跟你谈谈呢。"

我转回身，问道："主席有什么事吗？"

"今天是19号。"毛泽东扳着手指头说道，"8月到9月，9月到10月……半年，正好半年……"他望着我，迟疑一下，小声试探："你，还想走吗？"

毛泽东一直记着他与我订好的"借用半年"的协议！我心里一

热，刚要说什么，忽然又想起了江青……于是，我垂下了头，小声说："想走。"

毛泽东显出怅然若失的暗淡神情。那一刻，他忧国忧民，力挽狂澜的种种情景闪电一样从我脑际掠过。我震动了一下，不安地说："如果主席需要……"

"不，咱们有言在先。"毛泽东做出一个断然的手势，是忍痛割爱的意思，说："你是老实人，工作兢兢业业，对我照顾得很好。我喜欢你，但我不食言。你可以走了。"

我没有走，眼睛有些酸。毛泽东是感情丰富的人，我也不是没有感情的人。我说："主席已经同意我走，那么，上次订的协议算是圆满实现了。如果需要，我们还可以订协议。我愿意再订一次协议。"

毛泽东笑了，说："好，那好。我们重新定约。半年，你再帮我半年忙，看我彻底打败胡宗南。"

从毛泽东那里出来，我很高兴。我认为这件事处理得很好。我直奔厨房而去，因为江青该吃饭了。

毛泽东工作起来不分昼夜，吃饭也没个钟点，总要人一催再催才草草吃几口饭。江青不然，她生活很讲究规律，睡觉吃饭都是按钟点准时进行。

我替她端来饭，摆放在桌子上。盘子里难得有一条鱼，那是贺龙托人捎来的，他知道江青喜欢吃鱼。

江青今天对我格外热情，叫我一起吃。我不肯吃，可她已经把筷子倒过头来给我挟了一筷子鱼，我无法再推辞，可心里直嘀咕：今天是怎么了？

"见他妈的鬼了！"江青忽然愤愤地骂了一声。我一怔。她安慰

说："不是说你呢。我是说有些人呢，对我的党籍发生了怀疑。我明明是三二年入党，硬说我是三五年！"

这样的事情我怎么好插嘴呢？只能默默地听着。江青自己仍在那里发泄积愤，说"三查"运动查来查去竟查到她的头上，查起她的历史来了。有人就是想搞她。她说："那时，是个姓王的介绍我入党的，名字我忘记了。现在这个人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见我始终不吱声，她忽然望着我说："对了，他们还说我对你好，给你衣服。我给过你吗？"

"没有！"这下子我憋不住，叫喊起来："谁说的？"

"你看，这不是造谣吗？"江青没讲是谁说的，她只是为了证明其他事也都是造谣。她咬着牙说："有些人吃饱了不干事，整天琢磨着整人，运动一来就上劲。整么，这次你整别人，下次别人也可以整你！"

我心里哆嗦一下。江青是喜欢报复人的。

那天饭后，江青询问了毛泽东近来的生活情况。她是生活秘书，管我们卫士组这一摊，按理说我应当随时向她汇报主席的生活起居。这一次江青问得很细，可以看出，她是想摸清主席近来的情绪怎么样，有没有什么不愉快。我隐隐感觉到，江青担心她的历史问题传到主席耳朵里去。

第二天早晨，我送工作一夜的毛泽东回卧室休息。进门时，看见江青拥被而坐，还没起床。我便退出屋，侍立在走廊里。

屋里隐隐约约传出他俩的谈话声。开始声音不大，是江青在向毛泽东诉说什么。从毛泽东的声音里可以听出他很不高兴，很不耐烦，其中有几句话声音很大："按组织原则办，谁也不能特殊！""你

既然那么革命，还要我讲什么话？”“心里没有鬼，还怕审查吗？”

显然，江青想让毛泽东替她讲句话，毛泽东不答应。谈话声越来越大，江青哭了，变成了争吵。最后，毛泽东吼了一声：“你给我滚！”

江青披着衣服哭哭啼啼冲出门，稍一犹豫，跑到隔壁周恩来那里去了。她跟毛泽东闹别扭总是去找周恩来哭诉。那天她在周恩来那里一直呆到中午 12 点，出来，恢复了平静。

午后，我去服侍毛泽东起床。毛泽东心事重重，皱着眉头抽烟，良久，叹了一口气，说道：“唉，江青是我的老婆，要是我身边的工作人员，早把她赶跑了。”

这种时候我只须听，无须讲话。毛泽东和所有普通人一样，心里烦闷时，希望有个人听他诉说，说一说心情可以好受些。他的身份决定了他不能随便向其他领导人诉说，他总是向身边的工作人员诉说。

“没办法，跟她凑合着过吧。”毛泽东吸一阵儿烟，想一阵心事，冒一两句话，“我跟你说，我现在有些很难办。当初结婚没搞好，草率了。唉，草率了。”

我始终不讲话，只是认真听。

毛泽东重新燃起一支烟，继续深深地吸，紧皱着眉头。片刻，又叹一口气：“唉，我现在的情况，我的身份，离婚也不好。江青没大过，没大错，现在要胜利了，跟她离婚，日后也要有人说。没办法，背了个政治包袱……”

我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生活 15 年，深深感到他的家庭生活是不愉快的。他和江青在饮食爱好、生活习惯上都合不来。1956 年毛泽东

曾很认真地对我说："江青是个是非窝子，刀子嘴，尽伤人。"1957年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时，住在克里姆林宫，有一天下午，起床后，他又一次向我说了同样的话。这两次有关江青的谈话深深地印在我的脑子里，粉碎"四人帮"后，我非常佩服毛泽东有先见之明。

韩桂馨：主席说："她跟谁也搞不到一起"

我们到杨家沟时，已是初冬了。陕北高原的冬季天寒风硬，准备冬衣是件大事。

李讷是个孩子，个子长得快，再说离开父母的这一年正是转战陕北的艰难时期，经常行军，李讷的旧棉衣也不知哪去了。江青找出一块花布，拿来一些棉花，用旧衣服做里子，忙着为李讷做棉衣棉裤。江青的针线活不错，她教我缝衣服，李讷的衣服基本上都是她做。她还会织毛衣，织出的毛衣都是有花样的，灯笼袖、蜂窝花什么的，很漂亮。按理说，我是李讷的阿姨，李讷的衣服本应由我做。无奈我针线活不好，又不会织毛衣，老插不上手。江青说："这样吧，针线活你慢慢学，李讷的衣服你不用管了，你给老板补衣服吧。"

江青称主席为"老板"，那是自撤出延安后开始的。当时为了转战中保密，毛泽东化名为"李得胜"。江青叫"老板"叫得顺口，后来叫习惯了。直到全国人民都喊惯了"毛主席万岁"，她才改口称毛泽东为主席。

毛主席的衣服都很旧，那上面的补钉是很明显的，看那粗针大线的，好像是卫士们缝的。有时补钉的颜色和衣服的颜色也不一样，毛泽东穿着居然也毫不在意。我想自己虽然手不算巧，但补个补钉

总不会比那些小伙子们差。

第一次给主席补衣服，是补衬衣衬裤。那衣服全糟了，指头稍一用力就能捅出一个洞来。我小心翼翼地缝。毕竟不是行家里手，我越小心越出错，一下子把手扎了，手一哆嗦，袖子上又出个洞。这一来我可有点沉不住气了，一来恨自己手太笨，二来不明白怎么让主席穿这种衣服。我找到卫士组长李银桥反映情况："银桥，主席的衣服全都糟了，补也补不住，换件新的吧！"李银桥摇头："不行呀，这要江青说了算。"我说："那我去找江青。"他又摇头："江青也得听主席的，主席不同意，谁也不敢给他换新的。"

"我去找主席说！"我年轻气盛，拿了衣服去毛主席办公室。他正在写作，听我说完，抬起眼皮望住我说："阿姨，麻烦你了。我们现在还困难，一切为了前方，节约一点是一点。你就辛苦些吧，谢谢你了。"我只得退了出来。

毛主席不但衣服又旧又破，袜子也是补了又补。那时穿的是棉线袜，不像我们现在的尼龙袜那么结实。脚后跟、前脚掌等吃劲的地方容易坏，因此补袜子更是常事。

有一次，我对李银桥说："毛主席穿的也太旧了，咱们还发新棉衣，为什么不给主席领呢？"他说："毛主席的生活俭朴惯了，别说新衣不让领，就连条新毛巾也不让我去领呢。"那次李银桥跟我说了这么一件事：在陕北行军时，李银桥见毛泽东擦脸擦脚合用一条毛巾，就建议主席再领一条，谁知主席幽默地说："脚总是走路，它比脸辛苦，合用一条还不应该么？"李银桥说："那就领条新毛巾擦脚，用旧毛巾擦脸行了吧？"谁知主席说："嗨，你这个同志么，账不是这么算。如果我们每个人少领一条毛巾，节约下的钱就可以再打一

场沙家店战役了。”

我明白了，毛主席这样做，是为了省出钱支援前方。

我接受为主席补衣的任务后，对针线的事开始留心。有两件小事促使我下决心要学好针线活。一件事是毛主席的枕头破了，卫士组长李银桥买了白布，拿出去请老乡缝了一个新枕套。我拿起枕套一看，那细密匀称的针脚，像机器轧的。我往里面装荞麦时，非常羡慕人家那手好针线活。还有件事是李银桥拿来了一双老乡给主席做的棉布鞋。毛主席年纪大了，部队统一发的鞋很硬，银桥便请老乡给做了一双软一些的鞋给主席穿。当时我想：自己要是有一手好针线多好啊，那样就能更好地为主席服务了。

江青的手艺不错，她会裁剪，也会出样子。她教我针线活，也教我织毛衣。在和江青的接触中，我对她的脾气也渐渐了解了。有一次，我把补好的衣服给主席拿去，恰好江青也在。毛主席正低头写作，江青接过了我手中的衣服。她以挑剔的眼光查看我补的补钉，不以为然地摇了一下头，撇了一下嘴说：“老板，你看看阿姨补的补钉，你看她干的这活，针线活多粗呀！”我脸上热辣辣的，我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江青嘴里还喊着：“老板你看看呀……”

毛主席工作非常专心，开始时并没有理会我们俩干什么，听江青这么一喊，他抬了一下眼皮，正要低头写作时，眼光和我相遇，他停住了笔，待他听清江青的话以后，对江青说：“阿姨缝的怎么了，她是革命同志，是帮助我们来工作。你对她态度要好些！”

我低着头往外边走，在屋里毛主席还在批评江青。时间不长，江青到我房里来，一脸和气地说：“阿姨，刚才的事是怪我，我不是故意的，我这个人就是这种急脾气。”

江青教会了我做针线活却损伤了我的自尊心，我们之间像隔着一层什么。毛泽东曾经对我和李银桥说过："她这个人哪，跟谁也搞不到一起。"

韩桂馨：既当"先生"，又当学生

生活一安顿下来，我这个老师也该给学生上课了。

一个老师教一个学生，这课还真不好上。怎么说呢？首先就是没有正规的课本，附近也没有小学校，从何教起呢？

猛然间，我想起一个名字：陶瑞予。在延安时，大家都知道文教战线有个特等劳动模范陶瑞予，她发明了先进的教学方法，如"形象有趣的识字法"、"联系实际的学习法"等。我因为不搞教学，只是听说过她的事迹，具体怎么教我就不清楚了。我想：反正事在人为，只要认真，没有办不好的事。

为了教李讷认字，我凭着自己的那点文化水平，加上能看到的报纸、书籍，从中挑出一些字先教李讷认，李讷首先学会的一些字是"人民"、"群众"、"革命"、"战士"等。为了使教学有个系统，我由浅入深地编了一套识字卡片，有的字是描绘自然景物的，如：日、月、风、云、山、水、河流等；有的字是反映周围事物的，如：地图、桌椅、学习、办公等。教李讷学什么，一般地我都征求一下江青的意见。江青对孩子的学习是很重视的。

那时我给李讷上课，既没黑板，也没粉笔。我就用铅笔或毛笔在纸上写，李讷就在她的小本上练。那些练习写字的本子都是我随手找来些纸订上的。天气暖和的时候，我们就到外面向阳的地方用

树枝在地上画字。

李讷很聪明，识字也快。她对学习似乎比对做游戏还感兴趣。这对我来说是个好事，但也有件事让我犯了愁。

大家知道，练毛笔字要从临摹开始。那时很讲究写毛笔字，练字是念书识字的一项基本功。可我没有字帖，拿什么让李讷临摹呢？毛主席的字好。对！我心头一亮，何不找毛主席讨个帖子呢？他的字那么棒，给我出个帖子不会有问题吧。于是我找到了毛主席：

“主席，李讷要练字，可我没有字帖啊。您给我们写个字帖吧！”

毛主席看了看我，连连摇头：“不行不行，我的字不行。叫她妈妈写，她妈妈的字好。”于是我又去找江青索字。

江青的字的确不错，毛笔字铅笔字都行，尤其楷书写得很好。我从她那里取来字帖，让李讷照着练字。后来我才知道毛主席的字体是大草，没有楷书基本功的人，只能临其形，不能临其神。毛主席让李讷开始先练楷书是有道理的。

由于李讷的字有基本功，现在她的字画都相当有水平。

在杨家沟的日子里，正是我们党积聚力量准备与国民党展开决战的前夕。虽然表面上生活比较平静，但是一场更猛烈的风暴即将到来。

毛泽东的工作依然很忙，他那窑洞的灯光总是整夜整夜地亮着，卫士们打扫房间总是倒出一堆一堆的烟头。那时我就知道毛主席有爱吸烟的习惯，知道毛主席又在动脑筋写文章了。

毛泽东常勉励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学习文化知识，做一个有文化的人，打败蒋介石后，为新中国的建设出力。因此，在教李讷识字读书的同时，我自己也加强了学习。我喜欢医学知识，喜欢诗，看

到有关这方面的资料或报纸就留下来，有空就往笔记本上誊一遍，慢慢记了一大本。

一天夜里，李讷已经睡了，我就伏在油灯下摘抄“四八烈士”王若飞、叶挺等人的生平事迹。四周静悄悄的，我被烈士的革命精神所感动，越写越来劲，一点也不觉得困。

“啪，啪”几声轻轻的敲门声。我连忙开门，一看是主席站在门前。原来主席工作累了，到院里散步时见我和李讷的房间还亮着灯，便走了过来。我连忙请主席进屋。毛主席看看熟睡的女儿，转过头来问我：“阿姨，你做什么呢？”“我正在抄笔记。”

“我看看行吗？”

我连忙把笔记本递到主席手里，他接过去，随便翻了一下：“字写得蛮漂亮么。为什么要重抄呢？”显然主席发现我的本子里出现了重复的内容。“多抄几遍增强记忆，丰富知识，也能更好地教育孩子。”我回答。当时由于不懂更好的学习方法，总认为多写几遍，才能记得牢，知识才能巩固。

毛主席不同意我的说法，他说：“这个方法不见得好。知识多得很，那个小本才有多少知识？青年人脑子好，应该多读多看，不要把时间浪费在抄笔记上。”

我说：“我的字老写不好，抄笔记也是为了练字。”

“当然，字也可以练，但不要这么练。你看的东西多了，知识丰富了，字写得差点也没关系。”

我从主席的谈话中得到一些启发，摸到一些学习门道，也丰富了教育孩子的方法。毛主席说：对孩子既要严，又要放得开。乱淘气不行，不淘气更糟，还是有点小淘气的好。孩子太老实了没出息，

说不定还生病。能淘气会淘气的孩子，一是健康，二是聪明。

韩桂馨：平易近人的长者

每当翻开我的相册，观赏我保存的那一幅幅照片时，那逝去的岁月又重新浮现在我的眼前。其中一张 40 多年前的已经发黄的照片引起了我的一段回忆。

那是在杨家沟时，由于生活相对安定一些，一些久不见面的朋友又有机会相聚了。有一天，我的战友江燕来找我，我一见到她，特别高兴。我们是一道从冀中到延安的，又在洛杉矶托儿所一起工作过。自从江燕调到卫生部工作后，我们已有一年多没见面了。

我们说了一会儿话，江燕跟我说："我很想见见毛主席，并且跟毛主席合个影。"我想这有什么不可以的呢？江燕的爱人李得奇是我们卫生部的牙科主治医生，曾给毛主席看过牙，也是熟人了。于是我就一口答应下来："这可以，我领你去就行。"

在毛主席身边呆的时间久了，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亲切随便。他常和我们说："你们在我这里，应该像在你们自己家一样，遇到什么事可以找我，我会帮助你们的。"我在主席面前早就不感到拘束了，但主席工作忙，这点我是知道的。我去请主席照相前，已请主席的机要秘书徐业夫同志做好了拍照的准备。

我那时天真幼稚，请主席照相的事既没有和领导讲，也没有事先报告主席，就冒冒失失地推开毛主席的房门，叫了起来："主席，你出来。我有一个战友想见你，还想和你照相。"

正在办公的毛主席怔了一下，看看我，又看看桌上的书稿，笑

着说："好吧，我服从。"他站起身，随我走了出来。在窑洞外等候的江燕，见毛主席出来了，激动地立正给主席敬了个礼，并向主席问好。毛主席伸出大手和江燕握了握，于是我和江燕一边一个，在毛主席住的窑洞前合了个影，留下了这张十分珍贵的照片。这张照片的背景就是一个窑洞的窗户。看，我的身后有一明显的弧形，方格的窗棂上糊着白纸，只有中间靠顶部的地方镶了一块玻璃，为防空袭，玻璃上还贴上了细细的纸条。毛主席就在这间窑洞里写下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十多篇文章，武装了全党的思想，为夺取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47 年 12 月，在米脂县杨家沟与毛泽东合影，左为韩桂馨，右为江燕

后来从陕北到山西，从河北到北平的一路行军中，我都是小心翼翼地把这张照片随身带着。现在每看到这张照片，就想起了陕北的生活，想到在毛泽东身边的日子，怀念之情油然而生。同时又想

到当时自己那么冒失地拉主席出来照相，心里深感内疚呢。

为了增强李讷的体质，我经常带她到户外活动。有时去村边看石人、石马，有时带她拿把小铲，让她在外面的地上挖土玩。有一次她挖了两个坑，在两坑中间又挖通了一个小沟槽，提来一小桶水，看着水经过水槽从一个坑里往另一个坑里流。我问她干什么呢？李讷认真地说："我在引水浇地。"

在农村，又是战争时期，没有什么适合孩子的玩具和图书，我给她制作的小玩具也离不开当时的条件，所以李讷的生活也是很简单的，不像现在的孩子有一堆一堆的玩具。

毛泽东办公常常是白天黑夜连轴转，很难得和孩子在一起。有时白天工作累了，出来在院子里散步时恰巧和孩子相遇，也挺有意思的。有一次李讷和她的小朋友燕燕、丽亚（叶子龙同志的女儿）和胜利（胡乔木同志的女儿）一起玩，见毛泽东出来了，她对我说："小韩阿姨，我和爸爸玩一会儿。"我说："你去玩，我在这儿瞧着你们。"李讷边跑边叫："我要和小爸爸玩。"毛泽东微笑着，对孩子们招了招手，开始在院子里散步。他喜欢摆动两个胳膊，扭着腰走。这时李讷就和她的小朋友排成一溜，跟在后面，模仿着扭腰摆臂。小家伙们觉得好玩，格格地笑成一片。毛主席见娃娃们很开心，就越扭越起劲，头、颈、肩膀、身子和腿扭出几道弯，样子滑稽得很。小姑娘们也跟着加大动作幅度，越扭越欢，终于嘻嘻哈哈摔倒成一团。过了一会儿，主席要走，孩子们还没玩够，要求再玩一会儿。毛主席说："娃娃们，我要赶快去办事了，你们也要去学习了。等到把国民党反动派消灭了，我们就可以有更多的时间玩了。"孩子们这才放

他走了。

有一次，毛泽东出来散步，恰巧只有我和小李讷在院里。她见父亲闷着头背着手走了一圈又一圈，就一声不响地也背着小手学父亲的样子迈大步。她腿短，追不上父亲，走几步就需跑几步。过不多久，她耐不住寂寞就装出大人嗓音干咳几声。毛泽东猛一回头，做一个抓人的姿势。李讷尖叫一声，格格笑着躲藏。主席说："你和我笑着藏猫猫，还学我，我早发现了呢。"李讷说："开始发现了吗？我跟了你好久呢。""啊，是吗？开始就跟了，那我可没发现。"李讷得意了，自信地说："我知道，爸爸扭着腰走就是不想事，背着手走就是想事情呢。对不对？"

毛泽东开心地大笑。一把抱起女儿："娃娃，我的好娃娃，你也学会观察哩，不简单哟！"

陕北的冬天，干冷干冷的。

一天早晨，李讷还没醒，我起床后出来打洗脸水。一出屋门，就觉得冷风刺脸，不由得缩了缩脖子。一抬头，看见了门口站岗的警卫员。咦？他身上穿的不是毛主席的那件棉大衣吗？大衣怎么到他身上去了？我扭头看了看主席的那间窑洞，一丝动静也没有。

吃早饭时，在大食堂的饭桌上，警卫员孙振国给我解开了这个疑团。

他说："昨天夜里突然降温，小风飕飕的，吹在脸上像有小针在扎似的。我上岗时，已经是下半夜了，从热乎乎的被窝里出来，叫凉风这么一激，一点困劲都没了。我望着毛主席窑洞里透出的亮光，心想：这么晚了，毛主席还在工作，他真辛苦哇！像每次站岗时一

样，我都警惕地注意周围的动静。保卫毛主席的安全，这是每个警卫战士的责任。”

“月已偏西，清冷的月光像水银一样泻下来，星星在夜空中是那样的亮，光秃秃的树枝在夜风中摇曳。渐渐地，寒风透过了我的棉衣。为了取暖，我不时地跺着双脚，搓搓感到发僵的双手。”

“‘吱——’门开了。毛主席工作累了，从窑洞中出来到院子里散散步。”

“我习惯地立正站好，目光注视着主席。毛主席伸伸手臂，扭动了几下腰，慢慢踱着步子，来到了我的身边。”

“‘主席好！’我敬了个礼。”

“‘晚上站岗冷不冷啊？’主席关切地问我。”

“‘不冷。’我是个农民的儿子，小时吃过不少苦，参军后感到生活有了奔头，所以从不觉得苦和累。再说不就是冷点吗？活动活动手脚，也就挺住了，我不愿让主席为这点小事分心。”

“毛主席稍微活动了一下，就又进了屋。不一会儿，毛主席又走了出来，手里抱着大衣，直接朝我走来。我眼眶一热：毛主席像父亲一样关心自己的战士啊。我刚要推辞，主席拍着我肩膀说：‘你们晚上站岗放哨，很辛苦。现在天气冷了，要注意身体。你就把我这件棉大衣穿上站岗吧。’我接过大衣，穿在身上。毛主席身材高大，衣服也大，从上到下都包得严严实实，正好挡风。”

“毛主席满意地打量着我，说：‘这件衣服你也不要还给我，你下哨时传给下一班，让站岗的同志们挡挡寒吧。’”

听孙振国讲完，我也很感动，心里好像有一股暖流。

这件灰粗布棉大衣，就这样留给了警卫战士们。他们在杨家沟

的一个冬季里，就轮流穿着它站岗放哨。

1947 年的最后几天里，杨家沟这个小山村突然热闹起来。陕甘宁边区、晋绥边区的领导同志们来了，西北军区团以上的指挥员们也来了。那几天连续开大会，毛主席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我没有资格参加会议，但从大家兴奋的神情中，猜想到这次会议不同寻常。

为了庆祝会议的召开，西北平剧团（当时称京剧为“平剧”）也来到杨家沟唱戏，戏台就在村中大庙里。在农村，赶庙会、搭台唱戏可是件稀罕事，连远道的老乡也有赶着毛驴来看戏的。那时说的平剧，也就是现在的京剧。记得那次演出的剧目有《宇宙锋》、《三娘教子》、《空城记》等。虽然天气很冷，但唱戏的、看戏的都特别来劲，气氛很热烈。

毛主席是非常爱听平剧的，但那些日子他非常忙，只看了一场《宇宙锋》。李银桥见主席太紧张了，就想搞点活动调剂一下，让主席得到积极的休息。有人提议：“26 日是主席 54 岁生日，咱们庆祝庆祝吧！”李银桥考虑了一下说：“毛主席向来不主张为个人过生日，咱们就开个舞会，大家在一起热闹热闹吧。一来是庆祝这次大会的召开，二来是庆祝前线的胜利，这也是最有意义的生日纪念。”

那天晚饭，厨师为毛主席做了面条，汤里多放了一点油。毛主席、江青、李讷和叶子龙的两个女儿燕燕、丽亚 5 个人吃了顿面条，就算是过了生日。

晚饭后，中央机关的同志们高高兴兴地来到大饭厅，准备参加舞会。大饭厅在我们住的院子下头。那天晚上，大饭厅里挂上了汽灯，明晃晃的。机要科的小伙子们担任了演奏任务。他们有把二胡、

一架手风琴，还有支笛子。别看乐器简单，但大家兴致很高。自从撤离延安，很久没有举行过舞会了。现在形势好转，机关里又增加了许多女同志，大家早就想开展点文娱活动了。别说年轻人愿意跳舞，就连任弼时的夫人陈琮英、叶子龙的夫人江英等大姐们也都来了。我和好朋友江燕也早早地来到了舞场。舞会开始前，大家唱歌、互相拉节目。一向沉稳的孙勇同志那天也露了一手，他唱了一段京剧《捉放曹》，还有警卫排的李文奎、张林二人说了一段相声，我们使劲为他们鼓掌。

乐曲一响，大家踩着乐点开始跳起来。过了一会儿，毛主席、周副主席、任弼时等领导同志都来到大饭厅，大家的情绪更热烈了。没想到，舞会开到半截，汽灯灭了。小伙子们七手八脚地忙着给汽灯打气。当灯光再次亮起来的时候，大家又尽兴地跳了起来。毛主席跳着稳稳当当的四步舞，周副主席的舞姿很潇洒。女同志都愿意找领导同志跳一圈。我不怎么会跳，在旁边和江燕学。我发现李银桥一直在那里站着看，就邀他跳。他害羞，连连摆手说："不会不会。"后来跟着江燕学了一会儿，还闹了个大红脸。

六　惜别陕北

李银桥：遗憾未曾游过黄河

还在葭县神泉堡时，毛泽东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重订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他心潮起伏，带我们去葭县县城看黄河。

葭县县城高高矗立于直陡陡的山顶上。敌人远遁，城里店铺开了张，人来人往很热闹。我们十几个人簇拥着毛泽东走进城，虽然把他护在中间，走过半条街，还是被一些年轻后生发现了。

“毛主席，毛主席来了！”

这惊喜的喊声立刻像春雷一般滚过全城。刹时间，群众潮水一般从四面八方涌过来，把一条街堵得满满的似要胀裂一般。后生们举起森林般的肩膀，娃娃们欢呼雀跃，老汉们拥挤在人群中擦拭泪花迷离的眼睛，婆姨们站在高处翘首相望。“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此起彼落。毛泽东也很激动，挥动着大手向群众致意。

来迎接毛泽东的县长在前面开路，可是沸腾的人群越围越紧，哪里能挤出一条缝？无奈，只好折入一家院落，穿院进了县政府，又绕小胡同，来到东门外。

毛泽东敞开衣服，两手插腰，迎风而立，俯瞰脚下：黄河就在

县城脚下穿过，宛如一条金龙。夕阳西下，余晖洒在河面上，万点碎金。河岸上，柿树林红得像燃起一片大火。毛泽东被眼前的景致陶醉了，不禁叹道："真美呵！"

县长指着山下说："从黄河上葭县城，只有这一条小路可通！"

我们望去，果然脚下只有一条崎岖小路穿过苍郁的树丛，蜿蜒曲折，盘山而走，迤迤逦逦通向黄河岸边。

毛泽东的目光沿小路重新回到黄河水，久久凝视着，若有所思地说："自古道，黄河百害而无一利。这种说法是因为不能站在高处看黄河。站低了，便只看见洪水，不见河流！"

我们咀嚼着毛泽东这段话，只觉得哲理深奥，回味无穷。

"没有黄河，就没有我们这个民族呵！"毛泽东将大手一拂，像是抚摸那条民族的河，无限深情地说："不谈5000年，只论现在，没有黄河天险，恐怕我们在延安还呆不了那么久。抗日战争中，黄河替我们挡住了日本帝国主义，即使有害，只这一条，也该减轻罪过。将来全国解放了，我们还要利用黄河水浇地、发电，为人民造福！那时，对黄河的评价更要改变了！"

我们顿觉眼界开阔。不尽黄河，万里峰峦，尽收眼底。

全国革命胜利后，成立了治黄委员会，对黄河进行综合治理，40年来黄河没有决过一次口；同时，在它的上游先后建起了三门峡、青铜峡、龙羊峡等现代化大型水力发电站，使它成为中国的"能源之河"；在下游引黄灌溉，对夺取两岸的农业丰收发挥了不小的作用。黄河正按照毛泽东规划的蓝图为人民造福！

第二天清早，毛泽东一起床，送江青去河东接李讷，便又招呼大家顺便去看黄河。

我们循着那么一条独一无二的羊肠小道，七拐八弯地下到黄河边。

旭日当空，万里无云。眼前的黄河狂放不羁，奔腾翻卷，水花飞溅，散发出一种浓郁的黄土气息。

河里出现一条小船，船工包着白羊肚毛巾，赤膊摇桨，破浪穿行，古铜色的肌肤在阳光下闪闪发亮。毛泽东用手一指，大声说："这就是我们民族的精神！"

小船拢岸，船工们跳下船来。毛泽东激情洋溢，大步迎上去，同船工们握手问候。他们热烈地谈论着黄河。毛泽东夸奖船工们是黄河的儿子，真正的英雄。一阵冷风吹过，细沙扑面。毛泽东关切地说："快穿上衣服，不要伤风。"船工们豪放地笑着说："没关系，习惯了。穿上衣服干活反而不方便。"

告别时，毛泽东握住船工们的手说："将来我们要过黄河，请你们给摆渡好么？"

直到这时，船工们才认真打量毛泽东，忽然高兴地叫起来："毛主席，原来你是毛主席！"

这一声喊，几个在船上干活的船工立刻跳下来，飞跑过来围住毛泽东，争抢着同毛泽东握手。这些豪迈憨厚的船工竟激动得满眼是泪，用粗哑的嗓子说着："毛主席，我们天天等着你呢！你只要说一声，我们一定安全地送你过河。"

"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同志们了！"

我们随毛泽东走出很远很远，那些船工依然赤膊立于水中，久久地、久久地向毛泽东挥手致意。

1948 年春，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以主力 5 个纵队转入外

线作战。从2月24日到3月3日，一举攻克宜川城，全歼国民党整编第29军3万余人，并当场击毙敌军长刘戡，从而改变了西北战场的形势。

宜川大捷的第二天，周恩来向中央机关排以上干部庄严宣布："我们的党中央和毛主席准备过黄河到华北去了！"

1948年3月23日，中央机关队伍行军来到了黄河西岸的吴堡县川口渡口，准备从这里登船东流。为了防备国民党从西安派飞机进行袭扰，毛泽东、周恩来和任弼时决定将渡河时间安排在下午。河滩里，山坡上，站满了欢送的群众。岸边停泊了十几只船，船工都是粗犷慓悍的小伙子。毛泽东上了第一条船，周恩来、任弼时上了第二条船，陆定一和胡乔木等首长上了第三条船。

一上了船，毛泽东就和船工们一一握手，说："劳累你们了！"

船工们回答："送毛主席过河，这是我们的光荣任务。"

毛泽东说："谢谢，谢谢。"

木船缓缓离岸，我们几名卫士紧靠毛泽东身后左右站立。我们劝他坐下，他不肯坐，挥动双手向送行的群众致意。

可是，船开始摇晃了，浪花拍打着木船。我忙扶住毛泽东，说："主席，快坐下吧。"

毛泽东推开我的手，望望浊浪滔滔的黄河，望望渐渐远离的西岸和岸上聚集的人群，变得呼吸有声，两眼湿漉漉地放射出异彩。他忽然朝叶子龙说："脚踏黄河，背靠陕北，怎么样？子龙，给我照一张相吧！"

"对，应该照一张！"叶子龙匆匆拿出照相机。

毛泽东倏而敛去笑容，立稳身体，脸上显出庄严肃穆的神色。于

毛泽东乘木船东渡黄河

是，叶子龙“咔嚓”一声及时按下了快门。

“好啊，”毛泽东点头笑道，“把陕北的高原和人民，把黄河水照下来，这是很有意义的纪念。”

正是凌汛时期，黄河巨浪滚滚，夹杂着磨盘大的冰块汹涌咆哮着，冲撞着，发出一片轰轰巨响。小木船忽而跃上浪尖，似要腾空飞驰一般；忽而沉落波谷，浊浪像墙壁一样遮住我们的视线；冰块撞击木船发出惊心动魄的砰砰声。可是船工们镇定自若，热烈亢奋，划动木桨，挥动杉篙，船上响彻沸人热血的号子声：“嗨唷，嗨唷，嗨唷！……”

毛泽东面对此情此景，情绪激荡，深深地吸口气，突然转身望着大家，问道：“你们谁敢游过黄河？”

警卫人员中很有几名水性好的。

“马汉荣行，发大水那次他游过黄河汉给彭老总送信，他能游！”有人喊。

“发大水的时候我游过延河。”石国瑞大声说。

一向沉稳的孙勇瓮声瓮气地说：“我在枯水季节游过黄河，还可以试一试。”

毛泽东紧接他的话头大声说：“那好极了！来，咱俩不用坐船，游过去吧！”

这一声倡议，把船上所有的人都惊呆了。

经过片刻尴尬的沉默，有人小声嘀咕：“哎呀，今天不行哪，现在可是凌汛期……”

孙勇好像刚从水底冒出来似地喘过一口气，忙附和道：“是呀，今天河里有大冰块，不能游了。”

毛泽东大笑：“哈哈，不能游了？你们是不敢游呵！”他转而凝望像陕北的小米粥一样浓稠的黄河水，望着那泡沫飞卷的浪花和漩涡，陷入了深思……他毕竟没有下水，长长吁口气，摇摇头说：“你们可以藐视一切，但是不能藐视黄河。藐视黄河，就是藐视我们这个民族……”

行船绕过一片河洲，渐渐靠近东岸。大家都热烈地望着东岸成群结队赶来欢迎的群众，毛泽东却再次回望黄河，长叹一声：“唉，遗憾！”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游遍了全国的江海湖河，不管走到哪里，只要有水他就要游，而且总是带着挑战的神情下水，带着征服者的骄傲上岸。

但是，我始终也没有弄明白：为什么他一次也没有游过黄河？

韩桂馨：东渡黄河

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军转入外线作战，从2月底到3月初，一举攻克宜川城，全歼国民党整编第29军，击毙军长刘戡。至此可以说已经彻底粉碎了胡宗南对陕甘宁边区的进攻，从根本上扭转了西北战场的形势。

宜川大捷之后，周副主席向中央机关排以上干部庄严宣布："我们的党中央和毛主席准备过黄河到华北去了！"

要过黄河了！听到这个消息，大家都很兴奋，同时又有种依依惜别的心情。毕竟大家对陕北、对延安还是有感情的，况且现在延安还未收复。

我们从杨家沟出发的那天，村里的大人孩子都涌到村口送行。毛主席、周副主席、任弼时等领导同志向乡亲们挥手致意。乡亲们依依不舍，送了一程又一程，毛主席走了好久，多次回头，频频招手，在卫士们的劝说下，才骑上了一匹马。

3月23日，中央机关队伍行军到了黄河西岸的吴堡县川口渡口，准备从这里登船东渡。记得那是个下午，太阳距西面的山头还一竿高的时候，毛主席、周副主席、任弼时等领导同志向渡船走去。渡口上十几条木船一字排开，二十多名精壮的水手整装待发。

西面的天空开始被晚霞染上一层淡淡的红晕，山峦和丘陵显得格外的美丽。毛主席面对陕北的山川，感慨地说："陕北是个好地方！"毛主席在警卫员和卫士们的护卫下，登上了第一条船，在这条船上还有叶子龙、江青等人，李讷和我也上了这条船。毛主席上

船后就和船工们一一握手，说："劳累你们了！"船工们显然非常兴奋，他们说："送毛主席过黄河，这是我们的光荣任务！"

毛主席连声说："谢谢！谢谢！"

俗话说：黄河无风三尺浪。3 月份正是凌汛期，船颠簸得很厉害。凌汛是黄河特有的一种现象。因为它的上游纬度低，气温高，而中下游纬度高，但气温低，春天上游的水流过来，中下游的冰还没有化开，大的冰凌被冲进河道，严重时形成一道冰坝。解放后空军多次执行炸冰坝的任务。这都是后话了。

我们过黄河时，小船被冰凌撞击，晃得很厉害。我吓得一手使劲抓住船帮，另一只手拉住李讷，生怕翻了船出事故。毛主席在船上站着，大家劝他坐，但他不肯。船开了以后，毛主席向岸边送行的同志挥挥手，然后两眼望着浊浪滚滚的黄河，他的眼睛渐渐湿润了。

主席对叶子龙说："脚踏黄河，背靠陕北，怎么样？子龙，给我照张相吧！"

叶子龙匆匆拿出相机，镜头对准了主席。

毛主席收起了笑容，立稳了身体，脸上露出庄重的神情。主席曾这样评价黄河："没有黄河，就没有我们这个民族。不谈 5000 年，只论现在，没有黄河天险，恐怕我们在延安还呆不了那么久……将来全国解放了，我们还要利用黄河水浇地、发电，为民造福。"

"咔嚓！"叶子龙按下了快门。

"好啊！"主席笑着点了点头，"把陕北的高原和人民，把黄河水照下来，这是很有意义的纪念。"

小船走到河中心的时候，磨盘大的冰块撞过来，发出了惊心动魄的巨响，我紧张得闭上了眼睛。但船工们很镇定，他们粗壮的手

臂挥动着，木桨在浊浪中上下翻飞，在船工们浑厚的号子声中，小船快速地行进着。

毛主席是位感情丰富的诗人，他在船工们亢奋的号子声和轰轰作响的浪声中，也激动起来，他望着船上的警卫人员，提出一个出人意外的问题："你们谁敢游过黄河？"

石国瑞说发大水时他游过，孙勇说枯水时他也游过。毛主席说："好极了，来，咱们不用坐船，游过去吧！"

大家惊呆了。过了片刻，有人小声嘀咕："现在河面上尽是冰凌，危险哪！"

主席哈哈大笑："不能游了？你们是不敢游啊！"大家松了一口气。

毛主席指着奔腾咆哮的黄河水，若有所思地说："你们可以藐视一切，但是不能藐视黄河。藐视黄河，就是藐视我们这个民族……"

船渐近东岸。上了岸，我们就到了晋绥解放区。

从陕北到山西，毛主席凡是在行军时，手里从没离开过那根转陕北时用的柳木棍，在崎岖的山路上，这棍帮了大忙。有时毛主席也骑骑那匹白马，以马代步，因此主席对马也有感情。

我们过了黄河以后，一路行军到了山西临县三交镇双塔村，这儿是中央后委领导机关的所在地。我们到来的时候，叶剑英已率领一部分同志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去了，只留下杨尚昆同志负责安排接待中央前委这一行人。西柏坡是中央工委领导机关的所在地，毛泽东在陕北转战时，刘少奇、朱德两位领导人就是在西柏坡领导着中央工委的工作。我们听说前委也准备前往西柏坡去与工委、后委的同志会合。这说明解放战争的形势已有了根本性的好转。

双塔村——我半年前在这里认识了江青和李讷，从这里到陕北杨家沟，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现在又回到了这里，并且将从这里到河北。在双塔住了两三天，我们又接到了出发的命令。听说以后行军可以坐汽车了。我以前还从来没有坐过汽车呢，听到出发的命令我很兴奋，除了想过过坐汽车的瘾之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我将要回到华北平原——我的故乡了！

出发前，我领着李讷在村口转转，算是告别这个村子，然后和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一起在汽车前面等着。记得那天是3月25日，大家高高兴兴沐浴在明媚的春光里，等候毛主席吃过饭后出发。

毛主席吃过饭，并没有径直上车，而是朝着马棚的方向走去。

他走到马夫老侯住的地方，当时老侯正在拨火给牲口煮料，毛主席走上前去握住老侯的手，亲切地说："老侯，谢谢你啦。咱们在陕北一起转战，全靠你喂马。今天我们要坐汽车了，你不能和我们一起去，要随机关一起行军。你年纪大了，走路不方便，就骑上这匹老马走吧。机关可能老弱病号多，你也是老人，又有病，你就骑上这匹马吧。你同你的领导说，就说这是我的建议。"

老侯青筋突起的一双大手紧紧地握住毛主席的手。他用袖子擦了擦眼角，说："主席，你放心吧，我能走。主席头里走，我牵着马随后就来，翻越太行山的时候，兴许还用得上这匹马。我有困难走不动了，一定会按主席说的去办。"他见主席要走了，恋恋不舍地送出来，向主席挥手，注视着主席登上汽车。

汽车开动了，我看见老侯还在那里站着，目送着主席。

这位马夫叫侯登科，是河南人，年龄甚至比主席还大。背有一点儿佝偻，绑腿打得紧紧的，腰间的皮带上别着个烟荷包，饱经风

霜的脸上满是皱纹。他在长征时就跟着毛主席，为主席喂马，对毛主席有很深的感情。毛主席的三匹牲口都是他一个人负责，他把牲口调养得膘肥体壮，牲口从没出过什么毛病。别看他年纪大，可行军时从没掉过队。他常说："我不能拿起枪上前线，又不会拿起笔来写东西，我只会铡草煮料喂牲口。毛主席骑着我喂的牲口指挥部队打胜仗，我越干越有劲头。"

平时干活累了，老侯爱抽口旱烟。听李银桥说，老侯的烟，在转战时还立过一功呢。那是1947年8月，连日暴雨，河水猛涨。敌人7个旅的追兵在中央机关几百人的队伍后面紧紧地追赶，直到葭芦河的边上。前有河水，后有追兵，子弹在头顶上飞。在这万分危急的关头，毛主席却很镇静，他伸出两个指头："给我拿支烟来！"毛主席因患肺炎，已经戒了烟，卫士们没有准备。再说人的身上都湿透了，衣服像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哪有烟呢？"李得胜同志要吸烟。""有烟吗？""快找烟！"终于在队伍中找到了能抽的烟，就是老侯用油布包藏的纸烟。

毛泽东深深地吸了一口烟，慢慢地吐出来。就这样想好了歼敌的计划，下了决不过黄河的命令。这几百个人牵着敌人的几万追兵，又在陕北的山上转，把敌人拖得又累又饿。在毛主席指挥下，西北野战军打了几个漂亮的歼灭战，粉碎了胡宗南的进攻。

李银桥：最后一次徒步行军

中央机关于3月23日渡过黄河。在河边的沙滩上，毛泽东、周恩来和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和前来迎接的地方干部亲切握手问候。他

们说了一会儿话，就上路了。

从黄河东岸的沙滩到寨则山村，大约有十多公里远的路程。当太阳刚要西下时，我们顺着一条河沟，来到了目的地。

座落在山根下的寨则山村，是晋绥解放区的老根据地。

晚饭后，毛泽东又在油灯下开始工作，一直到天亮。天亮后，他走到院里散了散步，才睡下。

中午时分，机关工作人员已经出发上路了。可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胡乔木等首长都在等着毛泽东起床后一道登程。

毛泽东睡醒后，走出窑洞门口，一见太阳已经偏西了，就焦急地问我们："我告诉你们 12 点叫我起床，为什么不叫我起床？"

我忙解释说："周副主席说了，不让叫醒你，叫你多睡一会儿。周副主席已经安排好了，机关已经出发了。周副主席说，我们留下的人少，什么时候出发都可以。"

听我这么一解释，毛泽东再也没有说什么。他马上回到屋里，洗了脸，吃了饭，就去向房东告别。然后他嘱咐我们把他住的屋子打扫干净，该还的东西归还给老乡，还叫我们把他睡的门板安好。

等我们把一切事情办完了，毛泽东对我们说："好，去告诉周副主席，现在可以出发了。"

离开寨则山，我们沿着崎岖不平的山路，顺着一条小河一直往北行进。

以往行军，都是毛泽东走在前头，我们警卫人员在后边紧跟着，最后才是周恩来和任弼时等。如果毛泽东有什么事情要对周恩来讲时，不是让我们去问周恩来，就是毛泽东停下等着周恩来。这是周恩来叫我们这么做的。这次行军，为了让首长们讲话方便，除了几

个警卫人员跟着毛泽东以外，其他的人都在后边。

继续走了一段路以后，毛泽东又和我们交谈起来。

毛泽东对我们说："今天咱们应该多走路，少骑马，这是走路的一个好机会，以后这样的机会就不多了。"

毛泽东这么一说，我们一时还没有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因此，都看着毛泽东，等着他继续往下讲。

毛泽东说："今天是最后一次步行军了。从明天开始，咱们就要乘汽车了。"

一提到要坐汽车了，大家就议论起老周来。

老周，名叫周西林，还是在延安的时候，他就给毛泽东开汽车。在转战陕北到绥德时，毛泽东对老周说：

"老周，以后我不坐汽车了，你开着汽车过黄河吧。"

老周说："主席，我已经把汽车交了，我要跟着主席打游击。以后缴获了敌人的汽车，我再给主席开车。"

毛泽东听了很高兴，他说："那好哇，咱们一块打游击。你不开汽车，还可以做党的工作嘛。"这样，老周就一直跟着毛泽东转战陕北，担任警卫科的党支部副书记。

"主席，这副担架，我们扛了一年多了，明天它也该上汽车了吧？"一个警卫战士这么问。

"我早就说过，担架我是不坐的，你们不要扛担架了，可你们就是不听。那好吧，你们不是有力气么？明天你们就把担架扛在肩上坐汽车吧。"毛泽东笑着说，把大家也逗乐了。

毛泽东最后一次徒步行军，来到了山西临县三交镇双塔村。

双塔村是中央后委领导机关的驻地。在我们抵达之前，叶剑英同志已先期率队前往河北平山西柏坡，杨尚昆同志留在这里安排接待毛泽东一行。

3 月 25 日上午，毛泽东起床后，穿着那件多年来一直穿着的旧灰布棉衣，手里拿着转战陕北时一直拿着的那根柳木棍，在院内散步。这是他的习惯，起床后总是先活动活动，然后再吃饭。他散步的时候，突然问一个哨兵："老侯住在什么地方？"

哨兵回答说："他住在南边不远。"

毛泽东再没有问什么，就回到屋里用饭去了。吃饭的时候，和毛泽东同行前往西柏坡的工作人员，都已经站在汽车附近，等着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首长上车。

毛泽东吃罢饭来到院里，问警卫排长阎长林："周副主席走了没有呀？"

阎长林说："没有走，刚才他还问主席吃过饭了没有。我们说主席正在吃饭，周副主席说他很快就来。"

毛泽东说："好吧，走！咱们先看看老侯他们去。"

走到了马夫老侯住的地方，看到他正在那里忙着给牲口准备饲料。毛泽东上前握住他的手亲切地说："老侯，谢谢你啦。咱们在陕北转战一年多，全靠你喂马。今天，我们要坐汽车了，你不能和我们一起去，你要随机关一起行军。你年纪大了，走路不方便，就骑上这匹老青马走吧。机关可能老弱病号多，你也是老人，又有病，你就骑老青马吧。你同你的领导说，就说这是我的建议。"

老侯听毛泽东这么一说，感动得流出了热泪。他说："主席，你放心吧，我能走，有困难了，走不动了，我一定按主席说的去办。"

老侯是河南人，毛泽东用的三匹牲口都是由他一个人喂。他常对人说："我不能拿起枪上前线，又不会拿起笔来写东西，我只会铡草煮料喂牲口。毛主席骑着我喂的牲口指挥部队打胜仗，我越干越有劲头。"

李银桥：城南庄遇险

毛泽东带领中央机关乘车离开双塔后，一路视察各解放区的工作。在山西兴县蔡家崖听取西北军区司令员贺龙和政委李井泉的汇报；在晋绥干部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接见了《晋绥日报》的编辑人员，勉励他们努力办好党报；登雁门关凭吊古迹；在代州府谈土改；风雪之夜上五台山，游览了这里的著名寺庙。终于来到华北军区司令部所在地——河北省阜平县的城南庄。

4月中旬，毛泽东在这里召开了重要的军事会议，与朱德、周恩来、任弼时、陈毅、粟裕、李先念、张际春等同志共商军情大事。

会议开了10天。结束后，送走与会人员，毛泽东很兴奋，没有休息，给挺进大别山创建根据地的刘伯承、邓小平拟了一份长长的电报稿，还起草了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通知。

写完通知，天已蒙蒙亮。毛泽东到院子里散步，扭扭腰，扩扩胸，做几下深呼吸，回屋将笔砚和文稿收起来，说："银桥，我休息吧。"

我取出两片安眠药，斟水请他服下。

我照顾他躺下，坐在一边替他轻轻按摩两腿。他工作量太大，休息极少，按摩可以帮助他尽快消除疲劳。

他躺下必看一会儿书报。半小时后，他将报纸朝枕边一放，眼

睛合上了。我明白，无须再吃第二次安眠药了，便蹑手蹑脚退出屋。

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也起来了，散了一会步回来，同江青聊着什么。他们每次见面都要握握手，彼此很客气。但是话不是很多，礼节性地聊过几句，聂荣臻便回自己屋里去了。他过去住的房间腾给了毛泽东和江青，自己搬到了后面一排房。

就在这时，城南庄北边的山顶上，防空警报突然响了起来。我心里“咯噔”一下，紧张得屏住呼吸，睁大眼睛仰视天空。

城南庄和延安不一样：延安是窑洞，石头砌的；城南庄是平房，没有窑洞厚实。在延安时，敌机一进陕甘宁边区，电话就打到延安，延安可以及时拉警报防空袭；城南庄距北平（今北京）很近，而且只能在山头上发现了敌机时才能拉警报，时间已经很紧张，毛泽东的住房距防空洞 30 多米，动作慢了便有危险。

我心里焦急，徘徊在毛泽东屋前。按理说有备无患，应叫起他进防空洞，但毛泽东历来日夜工作，休息很少，睡觉尤其困难，有时甚至吃两次安眠药都难以入睡。所以，一旦睡着，谁也不忍心惊醒他。

警卫排长阎长林踮着脚跑过来，急风急火，又是小心翼翼，压低嗓子问：“怎么办？怎么办？叫不叫醒老头？”跟随毛泽东时间久了，警卫战士之间谈话时，就亲切地称毛泽东为“老头”。

正拿不定主意，3 架敌机已经临空，就在我们的头上盘旋。我们一个个呆若木鸡，竟不知所措。幸好敌机转了两圈，哼哼着朝保定方向飞走了。

但我们马上意识到：这三架敌机是侦察机，轰炸机随后就会袭来。而军区大院建在村东空旷之处，盖的是一排排整齐规矩的平房，

目标明显，早被敌机侦察到了。

我们去请示江青，她也不知怎么办。聂荣臻派他的秘书范济生来参加研究，商量的结果是暂不惊扰毛泽东，我们先做好一切防空准备，把人员组织好守在毛泽东门口，担架放身边，一旦再拉警报，就说明是轰炸机来了，可以抬上毛泽东往防空洞跑。

正是吃早饭的时间，有人来叫我们轮流去吃饭，可谁也不肯去。

8点多钟，北山上的防空警报器又拉响了，那声音如雷一般在我们心中轰鸣。再不能犹豫，阎长林喊了声："照彭老总说的办！"说时迟，那时快，我已破门而入。

撤离延安时，彭德怀曾对阎长林讲："关键时刻，在危急情况下，不管主席同意不同意，你们把他架起来就跑，到了安全的地方再讲道理。主席会原谅你们的。"

"主席，主席，有情况！"我冲到毛泽东床前，叫道。

"哪个？"毛泽东被惊醒，朦胧着两眼望着我。阎长林已经不容分说扶他坐起身，大声报告说："主席，敌机要来轰炸了。刚才已经来过3架侦察机，现在防空警报又响了，肯定来的是轰炸机，请主席赶快到防空洞去。"

阎长林报告的时候，我已匆忙抓来棉袄，给毛泽东披上。

毛泽东终于明白了眼前发生的事情。可是，他竟然毫不在意地说："给我拿烟来。"

"主席，来不及了！"我忍不住大声叫了起来。

毛泽东仍不慌不忙地问道："丢炸弹了吗？"

阎长林急得跺脚，说："刚才是侦察机，没有丢炸弹。这次来的是轰炸机，一来就会丢炸弹，丢下来就跑不及了……"

毛泽东皱起眉头，说："丢炸弹有什么了不起？先给我点一支烟吸。"

"快快快！"江青神色惶惶，上气不接下气地冲进来，在门口喊道，"飞机下来了！飞机下来了！"话没喊完，她身子一闪，皮球一样跳出屋，远处继续传来她紧张急迫的叫喊："走走走！"

情况万分紧急！我不管三七二十一，粗鲁地将手一下子插入毛泽东腋窝下，和阎长林、石国瑞和孙振国一道搀扶毛泽东向防空洞跑。

聂荣臻司令员催促道："快呀！快呀！飞机要丢炸弹了！飞机要丢炸弹了！"

跑出门几步，头上一阵尖啸，我们本能地一缩脖子，朝后倒步。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脚下的黄土地猛然一颤，一声钝响，我们全都惊呆了。

"啊！"江青在远处喊。

天哪，3 颗炸弹捆作一束，就落在房前，伸手可及！

冷汗刷地冒出来。我们 4 名警卫人员不约而同地喊了一声"快跑！"搀扶毛泽东朝防空洞猛冲。

"快呀，快！飞机又丢炸弹了！"聂荣臻在防空洞那边挥手呼唤。

我们的步伐更急了。可毛泽东却连连说："放开，我不要跑了。"

这时，我们已跑出军区大院后门。接近山脚的防空洞时，身后轰隆隆一阵巨响，敌机丢下的炸弹在院子里爆炸了，黑烟滚滚，弥漫半天空。

"不要紧了。"毛泽东说："它轰炸的目标是房子，我们离开房子就安全了，还慌什么？"

"主席，到里边去吧。"我催促道。

毛泽东站在洞口不往里走，说："给我点支烟吸，我还没吸烟呢。"

敌机飞走后，我们跑回大院，发现落在毛泽东门前的 3 颗捆在一起的炸弹没有爆炸。毛泽东很想去看看，大家不允许。他争不过我们，只是从院子里走过时，远远望了一眼。

我们都去现场看了。炸弹落在院子里成梅花形，四周围的都炸了，恰好中间那卡在一起落在房前的 3 颗炸弹没有爆炸。敌机投下的是几颗杀伤弹，屋里飞进了不少齿状弹片，桌椅上落了厚厚一层灰尘土块和砖瓦片。两个暖瓶全震倒打碎了，水流了一地。床椅也有损坏。见此情景，我们都有些后怕。要是那 3 颗炸弹爆炸了，要是我们动作再慢一步，要是朱德、周恩来、任弼时、陈毅、粟裕、李先念等首长再晚走几天，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聂荣臻司令员神色严厉地思考着，询问军区保卫部许部长："飞机轰炸时，有没有敌特活动？"

许部长说："现在还没有发现敌特活动。不过，今天飞机来轰炸，肯定有坏蛋告密。主席、朱总司令、周副主席、任弼时等中央首长在这里住了二十多天，敌人肯定得到了情报才来轰炸的。"

聂司令员说："肯定是有坏蛋告密。你们要抓紧破案！"

后来，我军解放保定，从敌档案查获，这次敌机轰炸城南庄，果然是有坏蛋告密。

原来毛泽东在城南庄召集中央工作会议，首长们来了许多。华北军区后勤部所属大丰烟厂的副经理孟宪德是一名国民党潜伏特务。他得知中央开会的消息，就急急忙忙来到军区司令部小伙房司务长刘从文家里。刘从文在毛泽东来城南庄之前刚被孟宪德拉入特务组织。他们密谋往饭菜里下毒，毒死中央首长和聂荣臻司令员。可是聂荣臻派了专门的可靠人员为毛泽东等中央首长做饭，防范很严，特

务分子无法接近。何况，凡送毛泽东吃的食品，总要先经我们卫士之手，他们根本无法实现毒死毛泽东等中央首长的阴谋。无奈，他们商量之后便传送情报，让敌人派飞机来轰炸城南庄。

情报送到了保定特务机关，又向蒋介石的保密局作了详细汇报。保定的特务机关转向北平的特务机关作了报告，于是，国民党军队派出了轰炸机轰炸城南庄。

案情大白后，由华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张致祥主持召开了公审大会，枪毙了这两个罪大恶极的特务分子。

七　在西柏坡的日子（一）

李银桥：打谷场上的欢庆舞会

敌机轰炸城南庄后，聂荣臻司令员安排毛泽东转移到花山村居住。这里山清水秀，环境清幽隐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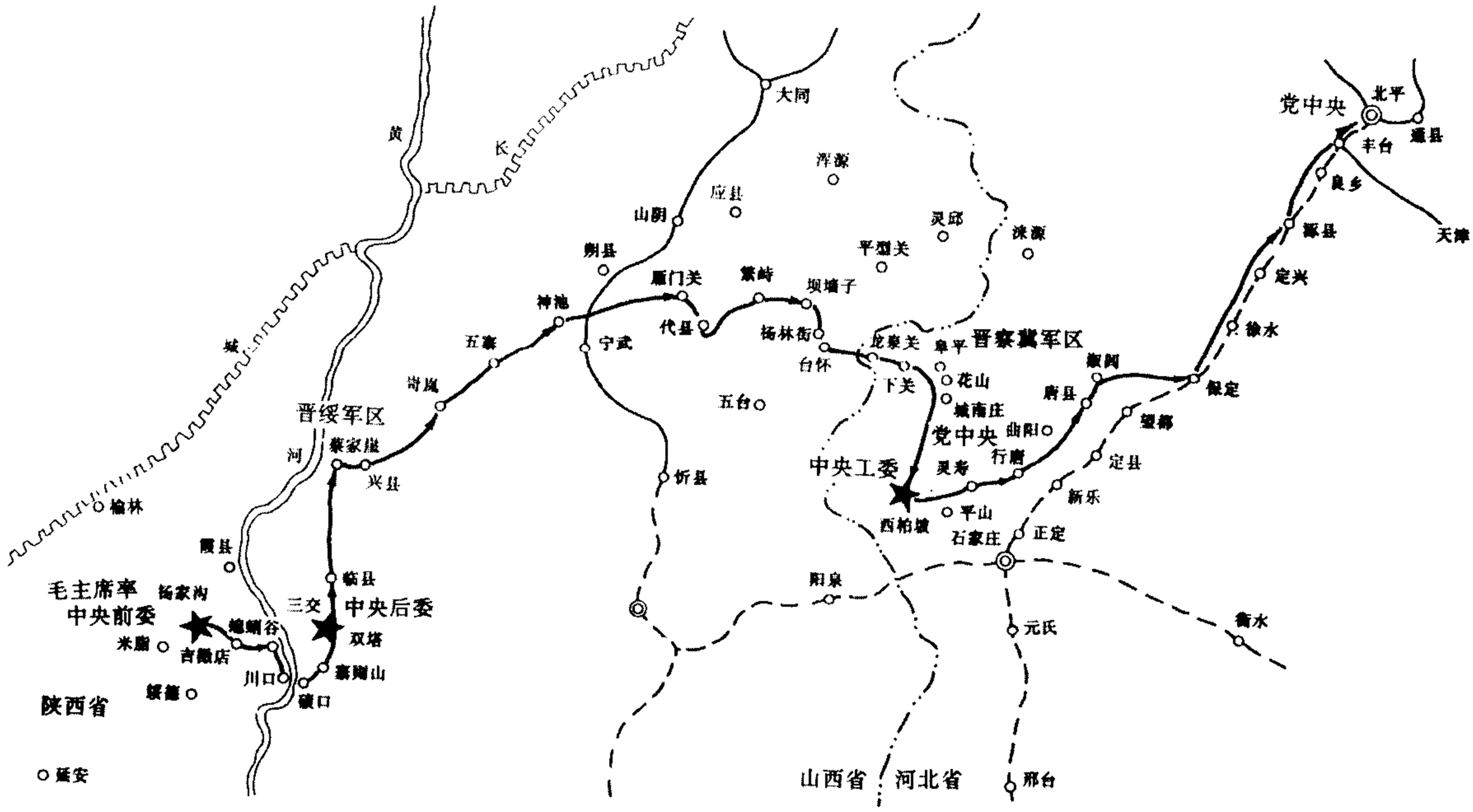
1948 年 5 月 26 日，毛泽东离开花山村，乘车向党中央和解放军总部的所在地西柏坡前进。这是他惜别陕北后长途行军生活的最后一天。汽车一直在太行山脚下奔驰着，太阳快落山的时候，就到了目的地。

西柏坡是一个小山村，滹沱河水从村前急促地流过。沿滹沱河西上，就是巍巍太行山脉；顺河东下是华北大平原。西柏坡地处河北平山县境内，距离石家庄近 100 公里。

这一带是老革命根据地。1947 年 3 月，胡宗南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时，朱德和刘少奇就率领中央工委来到西柏坡。不久，董必武等也来到了这里。1948 年 4 月下旬城南庄会议后，周恩来和任弼时等也到了西柏坡，与朱德、刘少奇会合。如今，毛泽东又来到了这里。这样，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五位书记，在西柏坡会面了。

我们没有到达西柏坡以前，周恩来已经把毛泽东住的地方安排好了，并亲自察看了毛泽东的住房和周围的环境。因此，当毛泽东乘汽车一进西柏坡村，中央机关办公处副处长叶子龙就把毛泽东领到了住处。这个院里有两间北房，一间大约16平方米，是卧室，里面放着一张双人木板床，一个小沙发，一个茶几，一个小衣柜。相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从陕北到西柏坡和北平路线图



通的一间房子大一些，约20平方米，是毛泽东的办公室，里面放着一套沙发，还有圆桌、茶几和一张藤躺椅，墙上挂满了地图。

另外，这个院里的两间西屋和两小间南屋，则是毛泽东的书房和江青以及李讷住的地方。前院还有水房和卫士值班的两个房间。

在毛泽东住处的北面，是周恩来和任弼时的住处，南面是朱德

和刘少奇住的地方，离这里都很近。

住下以后，叶子龙说："这一带有好几个村子，每个村子里都住着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这里的老百姓非常好，为了解决中央机关的住房问题，老百姓都克服了困难，宁肯自己挤着住，也要把房腾出来。这一带老百姓的觉悟很高，如果有什么事情，只要我们一提出来，他们就坚决去办。他们知道，现在离全国解放的日子不远了，个个都非常高兴，都愿意为最后彻底打败国民党反动派贡献力量。"

毛泽东听后，高兴地说："我们在陕北的时候，陕北的老百姓非常好。我们到了河北，河北的老百姓也非常好，越是这样，我们越要努力工作，争取解放战争早日胜利。等革命成功了，让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

农民家庭出身的毛泽东，无论走到哪里，都惦着农村，惦着农民。

来到西柏坡后，一天，我们随毛泽东到村外散步。毛泽东看到这里的麦子和水稻长势很好，非常高兴，对我们说："这里的庄稼比阜平城南庄的庄稼长势更好，看起来这一带可能富裕些。"

在滹沱河边，毛泽东看到河床很宽，流水很浅，河滩里到处是石头和沙土，便关心地问一个正在浇地的中年农民说："河里的水这么少，浇地够不够用？"

农民说："够浇地用的。别看现在水少，到了雨季一发大水，河里的水就多了，鱼也多了。"

毛泽东说："这么说，你们这一带不错嘛，有大米吃，有鱼吃，再多种些青菜，就和我们南方差不多了。"

接着，他又问道："你们这里种稻子，每亩地能产几百斤？"

"好年景不缺水，可以产到四五百斤，要是遇上天旱缺水，那就

收不了这么多了，二三百斤也有，一二百斤也有。”农民说。

“这地一年能种几季庄稼？”

“只能种一季。割了稻子可以种麦子。第二年就不能再种稻子了。”

“现在种稻子，割了稻子种麦子，在麦田里再插种秋庄稼，这不两年可收三季吗？”

农民说：“我们就是这么一块好地，指望它吃饭呢。种其他庄稼没有肥料也长不好。这块地里种稻子，其他庄稼在坡地上种，雨水多了，收成也就好了。”

毛泽东告别了那个农民以后，他又对我们说：“北方种地不像我们南方那样。在南方，是很讲究精耕细作的。”

我们走了一段，回头看时，那农民还在望着我们。他很可能猜出，刚才与他谈话的人是一个大首长，但这个首长是谁，看样子他并没有猜到。

毛泽东来到西柏坡不几天，工作人员就提出要组织一个舞会，想借这个机会，见一见首长们，和首长们在一起娱乐娱乐。这样，经办公处同意后，就确定要举办一次舞会。因为大家都觉得跳舞这种形式比较自由，气氛也显得热烈。过去在延安时，差不多每个星期六都组织舞会。

舞会的时间定下来以后，有关人员就开始选择场地。经过比较，场地确定在毛泽东、周恩来和任弼时的住房门前。这里原来是打谷场，比较宽敞。

就举办舞会的事，警卫排长阎长林特地向毛泽东报告说：“我们来到了西柏坡，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已经会合了。为了对首长们表

示欢迎，庆祝这个大团圆，今天晚上要组织一个舞会，大家都希望主席也参加。”我也在旁表示赞同，因为当时我刚学会跳舞不久，又正在和带毛泽东小女儿李讷的阿姨韩桂馨热恋。

毛泽东当时正忙着看文件，他只说了一句：“好嘛，我也想看看机关的同志们。”

这一天吃过午饭，同志们便开始忙了起来，有打扫卫生的，有抬桌子板凳的……很快就把舞场布置好了。

吃过晚饭，中央机关各部门的同志都陆陆续续地来到了舞场。大家又说又笑，舞场顿时热闹起来。

夜幕降临了。舞场里汽灯亮了，灯光照耀着一张张笑脸，机关业余乐队的同志们在轻轻地弹拨着琴弦。

不久，朱德和夫人康克清、刘少奇和正在热恋中的王光美、任弼时和夫人陈琮英先后来到舞场，大家都使劲地鼓掌，抢着跟他们握手，并把他们围了起来，问这问那。等了一会儿，还不见毛泽东和周恩来来，几个心急的小青年催着让叶子龙去请毛泽东来跳舞。

叶子龙说：“好吧，我先派我的小兵去请主席，她们请不来，我再去。”接着，他就对毛泽东的小女儿李讷和他的孩子燕燕、二娃说：“你们回去把毛主席拉出来，叫他到这里来玩一玩。你们就对他说，外边可热闹啦，大家都在跳舞，叫他出来休息休息，他要是不来，你们就拉着他，一定让他出来。”

李讷她们很听指挥，扭头就往毛泽东的住处跑。叶子龙就在后边跟着。叶子龙还没走到毛泽东住处的门口，三个孩子已经拉着毛泽东走了出来。我和卫士们也跟了出来。

叶子龙迎上来对毛泽东说：“休息休息吧，机关的同志们都想看

看你。”

毛泽东说：“我有什么好看的呀。”

叶子龙说：“撤离延安以后，到河东来的同志们说，有一年多没见过你了，都想见见你。今天来的人特别多，一些不会跳舞的也都来了。”

毛泽东说：“那好吧，今天要听你们的指挥了。走吧，咱们走吧。”

毛泽东已经答应走了，可孩子们还是拉着他不松手。

大家见毛泽东来了，又是一阵热烈的掌声，都抢上前跟他握手并致问候。毛泽东坐下后，一大群青年人又把他围了起来，问这问那。

不一会儿，周恩来和邓大姐也来到舞场上，气氛就更活跃了。周恩来坐下后，又是一群青年人把他围住了。

和大家说一阵话以后，周恩来就对大家说：“今天晚上是舞会，不要把这个舞会变成分片座谈会。你们看，主席那里那么多人，少奇同志那里，朱总司令那里，任弼时同志那里，都有好些人。你们快请主席他们跳舞嘛。”

经周恩来这一提醒，勇敢的女青年们就一个个拉着首长，在音乐的伴奏下，欢快地跳起舞来。

毛泽东是喜欢跳舞的。在延安的时候，他就经常跳舞，有时还和斯特朗在一起跳。

这次伴奏的不是专门乐队，只是十几个机要处里的小青年。也没有多少乐器，只有胡琴、锣鼓、口琴什么的，还有一个旧手风琴。但他们个个都很认真，也非常卖力气。

舞场因为是沙土石子地，地面疙疙瘩瘩。尽管这样，首长和同志们也不在乎，在“嘣嚓嚓……嘣嚓嚓”的乐声中，跳得兴致很高。

跳了几场之后，周恩来对大家说："我提议把延安晚会的那个热闹劲，也带到西柏坡来，会唱歌的多唱几首歌嘛，有的同志表演得不错，也可以在这里表演一下嘛。"

周恩来这么一说，晚会的气氛就更加活跃了。接着，大家就鼓掌，欢迎一些同志出节目。李伯钊（杨尚昆夫人）、李培之（王若飞夫人）、陶大姐（伍云甫夫人）、帅孟奇大姐等都兴致勃勃地给大家表演了节目。

节目演完后，接着又跳起舞来。跳着跳着，天空刮起风来。毛泽东仍然跟机要处的一个女青年在跳着。还是在休息时，这个女青年就抢先和毛泽东说好了，下一场她要陪毛泽东跳，因为这个机会是非常难得的。

风越刮越大，汽灯摇晃得很厉害。为了保证大家跳舞，负责组织晚会的警卫科指导员毛崇横就站在舞场中间，用手扶着灯，两只手轮换着一直扶了很长时间。

毛泽东走过去对毛崇横说："你是实心实意地为大家服务。"

因为时间比较晚了，毛泽东、朱德、任弼时便和大家告辞，回到了各自的住处。

接着，刘少奇和周恩来也说该回去工作了。临走之前，他俩还对大家说，很久没有跳舞了，希望大家多玩一会儿。

舞会在继续进行。因为演奏的同志们太累了，后来就改用留声机伴奏，一直跳到 11 点多钟才结束。

从此以后，西柏坡中央机关的所在地就经常在星期六晚上举办舞会。

韩桂馨：进驻西柏坡

西柏坡是一个只有七八十户人家的小山村，坐落在滹沱河北岸一个向阳的马蹄形山弯里。这里是大山与平原的交接处，地理位置适中，向前可以通向各大城市，向后可以固守迤逦巍峨的太行。这里河渠纵横，杨柳成行，是个环境幽静的好地方。

为了迎接中央前委的到来，这里做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动员老百姓腾房，同时也建了一些房子，还为主席准备了一套坚固的住房。这是三间并排的窑洞式建筑，没用一块土坯，未用一根椽檩，而是采来山上的青石，模仿陕北窑洞的形状盖起来的。房子里面墙壁、房顶粉刷一新。虽然只有朝南的一面安了窗户，但光线还比较明亮。从安全上考虑，这样的房子是弹片穿不进，坏人也掏不开的。

这套窑洞式房屋建在后沟。这里环境优美，房子周围的山坡上古柏青青，房前是片平地，防空洞就在房前 20 米处，房子西面是新华社，再往南就是转向西柏坡的山嘴，新盖的中央小礼堂就在那里。从工作上考虑，住在这里也很方便。因为朱总司令和少奇同志先来到西柏坡，一时找不到很合适的房子，就先安排总司令住在后沟的房子里了。

这所就地取材的石砌房，跟就地取材的土坯房，也就是个土石之差，仅比老百姓的坯房坚固一点。里面摆着几个借用的桌凳，一张木板床。这个标准，说不上好，更不能说过分。大家只希望毛主席在陕北转战之后，有个安静些的办公环境，因为主席要在这里指挥更大的战役。

我和李讷天天盼望毛主席快点来。毛主席终于来了。

记得那是5月26日下午，毛主席乘坐的吉普车开进了西柏坡。大家都去迎接毛主席。那天毛主席心情很愉快，主席休息了一会儿后，然后去看了给他安排的住处。大家劝主席早些休息，并且动手要将他的行李搬到后沟。主席却说："我不能住那儿。"

原来在参观后沟的房子时，主席顺便到附近转了转，也听了别人的介绍，他认为总司令年纪大，应该住好一些，他觉得只要有利于工作，住房条件好坏倒没什么，于是坚持要求去住任弼时的隔壁。在任弼时住房的西边，仅一墙之隔，那所小院有两间北房，两间西房，房子都不大，不丁点的小院。主席说："总司令跟少奇住一起太挤，后沟新房那里还安静些。总司令年纪大了，请他搬那里住吧！"

毛主席这一说，使大家都明白了，原来他不是不喜欢后沟，而是要把好房子让给总司令。在毛主席身边工作过的人都知道他的脾气，只要他决定的事，别人很难改变。但我们又从心里希望主席能有个较好的住处，因为他实在太累了，而且睡眠也很困难，后沟的环境确实比较理想。

总司令哪里肯去？他说自己住得很好，不要搬了，请少奇去吧，少奇同志身体不好。少奇同志自然也不肯去。

最后大家还是把总司令劝去了。

党的中央机关、特别是毛泽东来到西柏坡后，为了防止敌人破坏，中央机关对外的称呼就叫"劳动大学"，校长是刘少奇，其他中央首长则称为某某先生。因此，起初村里人并不知道党中央、毛主席在自己村里，只知来了许多老八路、"大先生"。由于毛泽东和老乡们很谈得来，他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关心群众，这个秘密在人

民群众中保不住了。毛主席来到了西柏坡，西柏坡人感到高兴、自豪和幸福。

人民对领袖非常热爱，领袖对群众也非常关怀。

西柏坡水源丰富、水温高、土地肥、日照长，很适合种稻子。但当地老百姓没掌握好水稻的栽培技术，就像种麦子那样撒了籽，稍加管理就等待收割了，产量一直上不去，一亩只收二三百斤。毛主席知道后，就对群众讲：把稻种先浸一浸，弄几块秧田，施足肥，先育好秧，然后再把秧插到田里去，产量就会提高的。许多农民按照这种方法一试，果然不错。直到全国解放后，毛主席还委托中央办公厅给西柏坡党支部写信，嘱咐他们到外地学习，提高粮食产量，改善人民生活。

毛主席不但关心群众生活，也带头执行群众纪律。他住的那家房东在院里种了棵梨树，树还不太高。我们来的时候正是梨花盛开的春天。秋天一到，黄澄澄的梨子挂在树上。毛主席嘱咐警卫员，等梨子熟了，摘下来给老乡送去。河北农村的老百姓一般都喜欢在院里搭个鸡窝，养上一群鸡。主席住的院子有磨盘。有的警卫员认为这些东西没有什么用处，不如先拆掉。主席坚决不同意拆。他说：不但不能拆掉，还要给老乡保护好，这些东西将来老乡们还要用。

开七届二中全会时，各解放区来的干部很多。当时只有少数人乘车，多数人是骑马来的。有人把马拴在树上，马啃坏了树皮，这样就会影响树木的生长。毛主席散步时看到这种情况后，就派人到村里调查，并按照老乡的要求进行了赔偿。

毛主席在西柏坡的住房，原来是老百姓的民房。抗战时期，这座房遭到日本鬼子焚烧，只剩下几堵墙壁，不久前才在原有的残墙

破壁上棚起了房顶。毛主席说："这比在陕北时好多了。"

毛主席住的地方是院套院，前院住工作人员，前院的北房，就是后院的南房，里面住着我和李讷。毛主席住的后院有两间北房和两间西房。北房两间相通，一间约 16 平方米，是主席的卧室，另一间约 20 平方米，是主席的办公室兼会客室。办公室里摆放着一套黑色沙发，一把藤躺椅，还有圆桌和茶几，墙上挂着地图。这里也是中央书记处办公和开会的地方。

在陕北时，中央机关的人爱说："五个杯子碰到了一起（指五大书记会合），蒋介石就该倒霉了！"现在五大书记齐集平山县，解放战争也真的到了决战时刻。人民解放军经过艰难曲折，已发展到 280 万人，国民党军队到此时为止已损失了 300 万人，还剩 360 万人。究竟由谁掌管天下，现在已到一决雌雄的时候。

前方战事如火如荼，捷报频传。人民解放军的总指挥部也很不轻松，五大书记经常在夜里开会。我看到地图上面的小红旗越来越多了，这说明我军迅速占领了好多地方。作为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我们一方面为前方的胜利而高兴，一方面又为主席健康而担心，因为这时天气越来越热了。毛主席已经习惯了夜晚办公，白天休息。但他住的这小平房屋矮，顶子薄，墙壁上像安了暖气片，屋里又闷又热。遇到不开会的时候，别人还能在夜里睡一下，但毛主席却在晚上来了精神。他夜里干通宵，白天又"打通昼"，身体哪能吃得消？我们催卫士组长李银桥快想个办法。

卫士和警卫员出去找过几次合适的地方，想让主席有个凉快的地方休息休息。因为这个院子里没有大树，只有一棵一拃粗的小梨树，树阴很小，顶不了事。他们到了柏树坡，那里的树虽大些，但

大老远的一棵，枝叶不密，树阴连不成片，也不凉快。他们又找到苇塘边的柳树林，那里有水，有树阴，但高高的苇子地像堵墙，密不透风，大家也不满意。后来走出去，走到一个山沟沟时，感觉到一阵阵凉风吹来，很舒服。原来这里有一道小河，河边是一片密林，林中又有一个池塘，塘水清澈明净。沟谷的风有些凉意，阵阵清风带来林中鸟雀的欢叫。这真是一个好去处。那地方离村也就十七八里地，开车只需几分钟。银桥他们也去看过了，觉得那里比较僻静，保卫工作好做，再有就是路较平，车也好开，大家都很满意。但是主席是什么态度呢？大家心里还没有数。因为不论怎么热，主席从没提过到外面找凉快地方，实在热得睡不着觉时，他就坐在藤椅上，摇着芭蕉扇，看书批文件。

有一天出奇的热，刚上午 10 点多钟，屋里就热得呆不住。我拿了个大盆，不停地给李讷擦身，怕她长痱子。我自己也不断擦抹身上的汗水。

过了一会儿，只见卫士组长李银桥、警卫排长阎长林他们提着帆布包、暖壶、帆布躺椅，从主席的办公室出来，往汽车上装。我忙问："你们这是干什么？"银桥神秘地说："我们给主席找了个'豪华宾馆'。"从他们走后我就纳闷，不知他们到底去了哪里，等到天黑汽车才回来。银桥抽空和我学说了一遍白天的情形：

他们早晨告诉主席找到了一个凉快的地方，既可休息也可看书。连夜工作的主席答应去试试。到了那个青山绿水、凉风习习的小山谷，主席显得很高兴，他感谢大家动脑筋、想办法，找到了这么个好去处。主席以蓝天做被，躺在帆布躺椅上，舒舒服服地在林间空地上睡了一觉。大家见主席睡得那么香甜，心里别提多美了。

只睡了不大一会儿，主席翻了个身。大家不敢惊动他，希望主席再接着睡。谁知他坐起来，到池塘边擦擦脸，又接着工作起来。那天大家都很开心。

有了这么个“休息胜地”（实则“工作胜地”），第二天他们带了顿饭，又出发了。

后来我和李讷也跟着去了几次。虽说那里是农村的自然风光，但我们却觉得美得不得了。毛主席在那边休息办公，我带李讷在别处看书识字。银桥说：就在这块空地上，毛主席批阅了前方来的电报，写了文章，准备了大会的讲话稿，甚至还用车把中央妇委的同志接到这里，在大树下接见了即将出席国际民主妇联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那天在场的有中央妇委的邓颖超大姐、康克清大姐、帅孟奇大姐、张琴秋和杨之华大姐，还有冀中区的代表高升、吴青等人。那天有的人坐马扎，有的人坐行军床，有的人坐在木墩上，高高兴兴地谈起了国际妇女会议的事，毛主席还风趣地给大家谈了古今中外的一些故事呢！

李银桥：他待我们像亲人一样

来到西柏坡不久的一天，毛泽东在院外散步，突然对身边的警卫排长阎长林说：“阎排长，你给我写份警卫排的名单。”

阎长林问：“现在就写？”

“现在就写。”

阎长林回到房间里，一会儿就把名单写了出来，不多不少，整整 20 个人。阎长林把名单交给毛泽东以后，他一边看名单，一边在

上边划圈圈，一共圈了14个人。他们都是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多年的老同志。

毛泽东对阎长林说："现在的形势发展得这么快，你们要抓紧时间学习。如果不抓紧时间学习，就会跟不上形势的发展，就会落后了。我圈的这14个人，要送他们去文化学校学习，等他们学习回来以后，再把你们6个人送去学习。你们留下的也要边工作边学习。"

说到这里，他又问阎长林："你们有意见没有？"

阎长林回答说："没有意见。"

在14个同志要离开毛泽东的前一天，为了欢送他们，毛泽东说要和警卫排的同志合影留念。听说要和毛泽东合影，大家都激动地站在毛泽东住的前院里，等着毛泽东的到来。

毛泽东一出门，就高兴地说："我跟你们照个相送行好吗？"

在西柏坡，毛泽东与身边工作人员合影。第二排左五李银桥，右四韩桂馨

“欢迎！”“欢迎！”“这太好了！”大家欢呼着鼓起掌来。

照完相，大家跟着毛泽东来到他的办公室里。在办公室桌上放着几张毛泽东写的“人民日报”4个大字。这是为《人民日报》题的名。毛泽东对大家说，全国就要解放了，我们要办一张《人民日报》。说完，毛泽东还让大家帮他挑一张，看哪一张写得好。大家挑了一会儿，忽然有人说：“主席，你给我们也写几个字吧。我们快要离开你了，给我们留个纪念吧。”

毛泽东立即回答说：“可以，去拿你们的学习本子来。”

14个同志很快跑回住处，都把自己最漂亮的本子拿来了。毛泽东把本子打开，在每个本子上面都写上了“现在努力学习，将来努力工作”这12个字，还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午饭时，毛泽东又和出去学习的同志在一起吃了一顿饭。毛泽东听说有人舍不得离开西柏坡，便一边吃饭，一边跟大家说，你们不愿意走，我也舍不得你们走。咱们在一起多年，你们对我的帮助很大，不管平时还是战时，不管走到哪里，我总是有房子住，能休息，能办公，有饭吃，有水喝。行军的路上，你们照顾我都非常辛苦，我也特别感谢你们。但是我也不能把你们都留在我身边，放一辈子哨呀。那样不是埋没人才了吗？不是把你们耽误了吗？你们现在才二十多岁，最大的也只有三十岁左右吧。今后的时间还长着呢，你们要好好学习，提高文化水平，一旦工作需要，组织上会交给你们重担子挑的，我对你们是很信任的。将来做什么工作，就看你们学习和锻炼得怎样了。路子是要靠你们自己去走的。我相信，你们将来都会成为党的好干部。

第二天，学习的同志就乘坐汽车，高高兴兴地到刚刚成立的中

央机关文化补习学校报到去了。

7、8、9三个月是西柏坡的雨季。

一天夜里，人们已经熟睡了，只有毛泽东、周恩来等几位首长的屋里还亮着灯。这时，忽然下起了倾盆大雨。就在这个大雨滂沱的深夜里，五位书记住的大院后边山坡上的两个窑洞突然倒塌了。

“快来救人呀！快来救人呀！窑洞塌了！”

人们一听到喊声，就朝窑洞跑去，不一会，那里就聚集了许多人。大家都没有带工具，一见用手扒不动，就又跑回去拿工具。一会儿，修缮队的同志把工具都扛来了。有了工具，大家就投入了救人的紧张战斗。

当时，谁也不知道窑洞里究竟压了几个人，有的说4个，有的说5个。不管是几个，一定得把这些同志赶快抢救出来。因为人多工具少，没有工具的也就只好用手扒泥土。

大家正挖的时候，周恩来闻讯急步走了过来。他老远就问：“怎么样，人救出来没有？”

有关同志对周恩来说：“挖了这么长时间了，还没见到人。土层太厚了。”

一听这样，周恩来把身上穿的雨衣脱下来往后一扔，要了一把铁锹就挖起土来。他一边挖一边高声地说：“同志们快挖吧，一定要把我们的同志救出来！”

经过大家的抢救，救出了三名干部和一名民工，理发员曹庆维因被泥土埋的时间太长抢救无效，不幸牺牲了。

还在救人的时候，有人来向毛泽东报告抢救的情况。最后，毛泽东听说曹庆维被土压死了，沉默了好久才说：

“小曹前几天还给我理发来嘛。多么可惜呀。告诉机关领导同志，一定要把曹庆维同志的后事处理好。我要去参加曹庆维同志的追悼会……”

小曹生长在黄河边上，家里很穷。日本侵略军打来后，他离开父母，参加了八路军。以后，组织上把他送到延安，学会了理发，为中央首长服务。

第二天下午，在西柏坡的大会堂里，召开了曹庆维同志的追悼会。因为毛泽东临时有要事不能参加追悼会，他便赶写了一幅挽联，由我交阎长林送到了追悼会上。毛泽东在那幅挽联上亲笔写着：“哀悼曹庆维同志”。追悼会上工作人员挑了一个最大的花圈，挂上了这幅挽联，放在了灵堂中央。

之后，由王惠同志负责给毛泽东理发。王惠个儿不高，留着大胡子。他也是河北人，抗战初期参加革命。直到 1959 年退休，一直在毛泽东身边服务。

韩桂馨：毛主席教我跳四步舞

到西柏坡之后，我的一个突出感觉就是孩子增多了，机关大院里热闹了。在陕北杨家沟时，很长一段时间机关只有 5 个小孩，后来任弼时的孩子才到陕北。而现在呢，起码有 20 来个。这些孩子中，有与李讷一起从陕北来的胜利、幸福、燕燕和二娃，有任弼时的孩子远志、远远，董老的儿子，机关办公处处长伍云甫的儿子伍绍祖，彭真同志的儿子傅瑞，少奇的女儿刘涛，叶剑英的孩子牛牛（妞妞）等人，他们的年龄与李讷不相上下，也就是七八岁的样子。

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正是应该读书的时候，可是环境不允许为孩子们办正规的学校。那时机关刚刚迁到这个小山村，好像是刚刚安置的、东西还没置办齐全的“家庭”，在这么简陋的条件下，毛主席、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五大书记经常连轴转，他们既要指挥前方决定中国命运的大决战，又要部署后方各解放区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兴办学校的事一直还排不上日程。因此刚到西柏坡那段时间，孩子们都各归各家的阿姨带着。

这种情况被中央机关的总支书记刘火同志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为了解决孩子们上学的问题，组织行政科的同志为孩子们盖起了一间房，准备办个学校。这间房子就在主席院子的斜对过，靠主席小灶间的角上，大约有 30 个平方。红砖砌的墙，里面还算宽敞。由于条件所限，学校没做桌椅，两块砖头支起一块长板子就当做凳子，教室里就几排凳子，算是课椅；桌子呢，就是每人发一块刨得平平整整的小木板，放在膝盖上就权作课桌了。组织决定让叶子龙的爱人江英同志任学校负责人，把学校办起来。

李讷也要去上学，她提出要和二娃他们一块去。我想：李讷身体较弱，让她去和一大群孩子们跑跑跳跳，万一又闹起病来怎么办？我把这个想法和卫士们谈了，大家说：小韩就是李讷的家庭教师嘛，孩子在家能照顾得好一些。去不去呢？大主意还是得家长来拿。银桥向主席报告时，主席说：“还是让孩子去过一过集体生活么。身体不好，也不能只消极地保养，还要积极地锻炼嘛！”

全校只有这么一间教室，孩子们当然也不能分班了。别看他们小小年纪，文化程度还参差不齐，这课还真不太好教呢。当时没有现成的小学老师，江英也把我拉去讲课。我也没有教学经验，开始

时上课乱哄哄的，后来老师和学生之间互相适应了，也建立了感情，上课也就不那么乱了。我们教学生识字，也给他们讲故事，还带孩子们做游戏，到山上挖云母片，去苇塘边乘凉。

为了提高自己的水平，我参加了在职干部的学习，采取了边学边教的办法，尽量把工作干好。

前方接连传来打胜仗的消息，大家也谈论将来我们会夺取大城市，建设新中国。不久，毛主席提出让一些警卫战士们去学习文化。

我们那时年轻，人人都有股要强的劲。毛主席那么重视我们的学习，我们谁也不甘心落后。当时我和主席周围的卫士们相比，文化算是高的，但和我周围其他同志们比，就自觉差得多。我想：凭自己这点文化，将来拿什么建设国家呀？心里暗暗想：一定要抓紧学习，提高自己的水平。我报名参加了专为中央机关工作人员举办的文化补习学校。给我们讲自然科学课的是于光远同志。有一次他在黑板上很潇洒地画了一个大大的圆圈，风趣地说：你们看，我画得多么圆啊！大家的注意力一下集中了，接着就听他讲那奥妙的自然科学知识。因为是业余学习，我白天的工作比较多，就把复习的事放在晚上。

顺便说一下，我们在西柏坡住的时候，用上了电灯，偶尔也能看上一场电影，在生活条件上可以说比在陕北好多了。毛主席住的前院里有个路灯，晚上一直亮到很晚，那是为了卫士们工作方便。我看这灯光可比延安窑洞里的油灯亮多了，也不用添油。不用它也在那儿亮着。再说天气也暖和了，晚上等李讷睡了，我就去院子里坐在灯下读书。有一天，我捧着本书正在津津有味地读着，只听一声

招呼："小韩阿姨，在学习呀？"我慌忙站起来，见主席已来到我跟前。我说："是呀，晚上安静，这会儿也不困，想看会儿书再睡。"毛主席说："这里灯光不好，会伤眼睛的。年轻人要保护好视力。以后不要再这样做了。"

顿时，一股暖流涌上我的心窝。

我在到西柏坡之前从没见过电灯。电灯比起油灯当然亮多了。但是我没想到自己距离电灯那么远看书，对视力是会有影响的。这是由于自己不懂得用眼的卫生常识。主席不但关心我们的学习，而且关心我们的健康。那天晚上主席的提醒我一直铭记在心。以后不论我在哪里读书学习，都按照主席的教导去做，因此我的视力一直很好。后来我又做了母亲，又提醒自己的孩子们注意保护视力。

前方胜利的消息不断传来，我们的"胃口"越来越大，"口味"也越来越高，好像吃酒席似的，拿下中小城市的消息就像上了盘家常菜，而攻下一个大城市，就像上了一道大菜，吃起来才来劲。

话又得说回来，前方捷报不断传来，我们的工作更加忙碌。谁不想为革命的胜利多出些力，谁不想全国的胜利早日到来呀！

领导同志的工作也更紧张了。我发现主席有时连续几天不出他那办公室。银桥说，每逢前方有大仗，主席就日夜连续工作，他操劳过度，头上已经有白发了。我们真为主席的健康担心啊。但我们又分担不了他的工作，怎么办呢？

不知是谁提议："咱们周末开个舞会吧！""好啊！"大家热烈响应。周末跳舞，在延安是个传统节目。那时候每逢周末，人们便高高兴兴地去舞场跳上一阵。跳舞，对年轻人来说既是娱乐节目，也

是社交活动。对领导同志来说，既是接近群众的一种机会，也是一种极有益的休息。因为跳起舞来，他们在乐曲声中会暂时松弛一下紧张的神经。

西柏坡的第一次舞会就在打谷场上举行。那个场地离主席住处很近，出大门就看到了。那天晚上，打谷场上挂上了汽灯，场边摆放了几条板凳，再放上一大桶开水。人们喜气洋洋的。机要处的小伙子们拿出简单的乐器，既有手风琴，还有锣鼓、口琴什么的，中西结合。孩子们围着他们说说笑笑、蹦蹦跳跳的。也有老乡来看热闹。看来机关干部们都做了些准备：他们有的换了干净衣服，有的只是洗了洗脸，把头发梳理了一下。那时的条件只能允许做到这些了。

吃过晚饭，我和李讷也早早到了舞场。李讷和别的小孩一样，也是这儿看看、那儿瞧瞧，显然很高兴来凑这个热闹。

舞会都快开始了，还不见毛主席出来。在场上张罗舞会的叶子龙同志在大家的催促下，心生妙计，他对李讷招招手，李讷和叶子龙的孩子燕燕、二娃都跑了过去。叶子龙一本正经地说："我现在交给你们一个任务，你们一定要把主席请到这儿来跳舞。"孩子们"肩负重任"，一溜小跑地去了，叶主任在后面跟着。过了不大会儿，仨孩子已经拉着毛主席的手朝舞场走来了。主席先向早于他到场的朱老总打招呼，又向在场的同志们招手问好，大家高兴得鼓起掌来。说笑了一会儿，周恩来招呼大家："快跳起来吧。"像约好了似的，刘少奇、任弼时等领导同志都来了。乐手们见领导同志都来了，情绪特别高。乐声响亮，大家翩翩起舞。

听说主席在延安时就喜欢跳舞，还和美国记者斯特朗跳过呢。在场的好几位女青年抢着和主席跳，与主席跳舞在女青年来说是件值

得自豪的事。主席跳舞不太跳花样，但步子平稳庄重；周副主席在场上很活跃，他舞姿也很洒脱；朱老总跳舞像在走大步，有种一往无前的气势；少奇同志当时正与王光美同志谈恋爱，他们舞跳得好，待人也热情。王光美同志常常让我坐在她身边，并问我为什么不去跳，我说我不怎么会。

我们正说着话，周副主席过来了。他叫我进场子里去跳，我说我不会。他笑了笑说："不会可以学嘛。"接着又幽默地说："阿姨你来跳吧，本来男同志就多，你再不下来，就更不合比例了。来，我教你。"他的话鼓起了我的勇气。周副主席教我跳三步舞。他一边教我如何迈腿，一边轻轻地数着："一二三——一二三。"可我开始有点紧张，老踩不到点上，尽踩他的脚。有人逗我说："小韩怎么不踩鼓点，专踩周副主席的脚啊？"我想打退堂鼓，周副主席却说："我教你，一定能学会的，要有信心么。"我心里不慌了，也踩上了乐点。就这样我学会了跳三步舞。

休息时，我到场边坐了一会儿，恰巧在主席身边。主席乐呵呵地说："恩来教你跳三步，我再教你多跳一步。"音乐响起，他那只温暖的大手已经握住了我的手。主席身材高大魁梧，步子很大。我幸好有刚才的经验，在心里默数着乐点，脚下尽力合上主席的大步，因此很少踩到主席脚上。不一会儿，我学会了四步。

我们跳舞的场地虽是平整的打谷场，但还是有点小土疙瘩，不像现在的舞厅那么光洁。但大家兴致很高，跳了一曲又一曲。

一会儿，起风了，汽灯也摇晃起来。我怕李讷会着凉，就拉着她的手，照顾她去早点儿睡觉。

那晚舞场的音乐响了很久，声音时断时续地飘进了我的小屋。我

躺下后，眼前又浮现出刚才和周副主席、毛主席跳舞的情形，就像演电影一样在我大脑的“屏幕”上一遍一遍地过。我感到自己很幸福。

八　在西柏坡的日子（二）

李银桥：做新衣

一天上午，聂司令员对我们说："除了岗哨，你们都坐车到后勤供给部去，他们要给你们发衣服和鞋袜。"

这衣服是用美国卡其布做的，衬衣也是用白洋布做的。参加革命以来，大家还是头一次穿这么高级的衣服呢。这是干什么呢？大家不禁七嘴八舌地议论了起来，但谁也说不清楚。

下午，聂司令员领一个人来到毛泽东房间，说："这位是裁缝师傅，给主席量体裁衣来了。"

毛泽东对聂荣臻说："我听你安排。"

一见也要给毛泽东做新衣，而且还给师哲同志（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俄语翻译）量了尺寸，我心中多少有了点底。看来是要跟苏联人打交道了，师哲是俄语翻译么。

在这之后的一天，我们随毛泽东去爬山。这是我们同他聊天的时机。上至天文地理下至鸡毛蒜皮，谈什么都行。提什么问题毛泽东都会回答。话题自然又扯到做新衣服上了。

警卫排长阎长林说："我猜是要到苏联去。"

“你怎么能想到要去苏联呢？”

“没有特殊行动，主席不会做新衣服，我们警卫排也不会发那么好的衣服。”阎长林分析着，“而且，主席说有些问题要向斯大林解释清楚的呀。”

我也跟着说：“主席身上的衣服全是补丁摞补丁，小韩补都补不住，可就是不肯换新的，说节约一件衣服前线就可以多几颗子弹。这次主席答应做新衣服，肯定是去苏联，在国内，主席才不在意穿什么衣服呢。到苏联可以让斯大林多援助我们一些武器，早点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

毛泽东用过的皮带

毛泽东笑了：“哈哈，叫斯大林援助武器就不如叫美国多援助蒋介石，蒋介石是我们的运输大队长，给我们送武器不要收条，也不要钱，那多好呀。”

我们都笑了。我说：“那也得跟斯大林说说，请他们跟蒋介石断绝关系，不要给蒋介石武器了。援助中国就直接交给我们……”

阎长林跟着说：“对，可别再像抗战时那样，援助中国的武器，蒋介石不但不分给我们一些，还用这些武器打我们。”

现在人们都知道了，毛泽东所开创的中国革命的道路，曾经不被斯大林所相信。为此，他想亲自去苏联说服斯大林。

可是，由于中国革命形势发展得迅速，与蒋介石的大决战就要开始，不能没有毛泽东指挥。加之去苏联路途遥遥，困难重重，毛泽东终于未能成行。

1948 年 7 月 1 日，王明来找毛泽东。那天正是我值班。

王明个子不高，四方长脸，白净面皮。我在很久以后才听说，他是很受斯大林赏识的。

我在院门口迎住王明，问他有什么事。

他说："我要见主席。"

当时毛泽东没有什么大事缠身，我点点头："请跟我来。"

我对王明礼貌，但是不热情。毛泽东曾经告诉过我："此人曾经想要我的命呢。"后来我又听人说，早在红军时期（1927 年—1937 年）王明他们就整过毛泽东。

毛泽东正在批阅文件，听到响动，抬起头，看见了王明，便从办公桌后站起身，绕出办公桌同王明握手，请王明坐在沙发上，自己坐到那张藤躺椅上。

毛泽东与亲密战友相交是很随便，不拘礼节的。比如朱德、周恩来、刘少奇、彭德怀等人进来，他会继续办他的公，招呼一声即可。只有对疏远的人才会表现出这种客气与礼貌。

两个人寒暄之际，我便出去沏茶。毛泽东待客就是清茶一杯。

送茶进去时听王明说"《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我还是想不通。有些意见我还要向中央陈述，要跟你谈谈……"

毛泽东面无笑容，严肃倾听。我明白气氛不适合我留下，放下茶水便悄悄退出。

回到值班室不久，他们的谈话声便越来越大。终于，变成了争吵。我跑出值班室去听，是争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牵扯到共产国际、苏联和国内许多人许多具体事件。毛泽东用浓重的湖南口音大声说的一句话我记得很清楚："到现在了你还想不通啊？现在

快胜利了，你还没有一个反省？”

那时，江青是毛泽东的行政生活秘书。我忙到江青房间向她报告，并提议：“要不，请周副主席来？”

江青点点头：“那就叫恩来去听听。”

我请来了周恩来，随他一道轻手轻脚走到窗口下。刚听了两句，他就回过身，一边挥手，一边用眼色示意：“去，你下去，不要在这儿听。”

我又蹑手蹑脚退下来。

周恩来俯身静静地听了很久。后来争吵声低落下来，王明的口气是要告辞了。周恩来迅速敏捷地避到江青的屋里去了。

王明板着面孔离开不久，周恩来便走进了毛泽东的办公室……

我的感觉，这次争吵决不是个人之间的意见，而是对于整个中国革命的看法。所以，毛泽东情绪那么激动，态度那么坚决。

李银桥：不吃死鱼的故事

1949 年 1 月 31 日，天亮之前，一架苏联军用飞机降落在河北省石家庄机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和苏联在东北铁路局的格瓦洛夫，以及翻译格瓦廖夫、警卫员共四位客人走下飞机。他们是秘密来访，由师哲和汪东兴迎接，并一同前往西柏坡。

吉普车驶到毛泽东住的大院门口。毛泽东热情地迎上去：“欢迎！欢迎！”

米高扬与毛泽东握手寒暄，然后在院子里洗了脸，走进毛泽东的办公室，坐下来喝茶休息。

朱德、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都来了。工作翻译是师哲，生活翻译是毛岸英。

米高扬说："斯大林同志讲，毛泽东同志和中共中央的其他领导同志在残酷的战争中，亲临前线指挥作战，两三年的时间打了这么多大胜仗，解放了大半个中国，真为你们的胜利高兴。向你们祝贺，向你们致敬。"

毛泽东笑着说："谢谢斯大林同志的关心，谢谢斯大林同志派你们来和我们一起研究我们的意见。"

米高扬说："我们是受斯大林同志委托，来听取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意见的，回去向斯大林同志汇报。我们只带了两个耳朵来听，不参加讨论决定性的意见，希望中国同志们原谅。"

毛泽东说："我是想要到苏联去，同苏联同志谈谈，以便你们能很好地了解我们的情况。我等斯大林的答复，现在斯大林同志派你们到中国来听取意见，这样安排也很好。"

米高扬解释说："斯大林同志很关心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经过研究，认为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正处在关键时刻，毛泽东同志不能离开指挥作战岗位。同时，中国境内交通不便，还要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往返苏联的时间会很长，不安全，恐怕影响毛泽东同志的身体健康。所以斯大林决定派我们来这里听取意见。"

就这样，中共中央的五大书记同斯大林派来的代表，在一周左右的时间里，举行了三次正式会谈。其间，毛泽东及其他中央书记，还分别到米高扬的住处探望过，米高扬也来看望过毛泽东。

会谈中，毛泽东反复重点地解释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强调中国有自己的国情，一切要从中国实际出发。毛泽东一再请米高扬转告

斯大林，关于这一点希望兄弟党的同志们了解和支持，不必有什么疑虑。

米高扬委婉地表示，把没收来的地主和富农的土地又分给农民太可惜了，照马列主义的观点，集中起来搞集体农庄才好。

毛泽东又解释了中国的实际情况，强调了中国的农业经济是落后分散的自然经济，农民分到土地才会感到是真正翻身得到了解放，才会踊跃参军参战。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就是因为有两百万农民参军，几百万农民支援前线，战争才取得今天的胜利，才有可能夺取最后的彻底胜利。

苏联方面又流露了“停止内战”，以长江为界与国民党南北分治的意向，担心再打下去美国会卷入。

毛泽东不容置疑地断然表示，一定要把革命进行到底。敌人不投降，就要命令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顽抗的国民党反动派。一定要解放全中国，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

毛泽东又阐述了他的关于“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观点。举例说：“我们攻打济南，已经进入青岛等地的美国第 7 舰队就没敢动。我们打天津，驻在塘沽的美国舰队没等我们打就逃跑了。请斯大林放心，如果他们和我们作战，我们会毫不客气地消灭他们。”

后来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正确的，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和支持。

在这一星期里，中共中央的五大书记招待米高扬一行喝过三次酒。

苏联人带来许多罐头食品，还有酒，拿出来摆了一桌子，挺洋气，挺花哨。米高扬穿戴也很好，圆领皮大衣，圆筒皮帽子，威风

得很。中国共产党的五大书记都穿着没棱没角的旧棉军衣，毛泽东的衣袖上还赫然补了块补丁（因未去苏联，新衣也没做）。小山村的西柏坡能有什么高级食品？无非是自己养的猪和鸡，还有滹沱河里捕来的鱼，用鲜鱼做了红烧鱼、溜鱼片款待客人。

苏联人很能喝酒。米高扬用玻璃杯喝汾酒，就像喝凉水一样，大半杯子一口气就能灌下去。中共五大书记中，为首的毛泽东是沾酒脸就红。朱德有喉炎不能喝酒。任弼时高血压严重更不能喝。刘少奇只能用小盅喝一点白酒。周恩来算是中国人里能喝酒的了，却哪里敢与玻璃杯子端起来咕咚咕咚灌的米高扬比？饭桌上的气氛是愉快的。但是我想，毛泽东不喜欢看苏联人大出风头，哪怕是在喝酒的问题上。工夫不大，他就招呼盛饭："吃饭了，吃饭了，尝尝我们滹沱河里的鱼。"

米高扬夸赞地说："谁都说中国的饭菜好吃，我们就是不会做。将来中国革命胜利了，我们要派人来学习中国的菜肴，增加西餐的花样。"

毛泽东很高兴，笑着说："我相信，一个中药，一个中国菜，这将是中国对世界的两大贡献。"

苏联翻译指着红烧鱼问："这是新捞的活鱼吗？"

他们得到了肯定的答复，而后才吃。我估计大概与此有关，一年后毛泽东出访莫斯科，向随行的中餐厨师严格下令："你们只能给我做活鱼吃。他们要是送来死鱼，就给他们扔回去。"

果然，苏联人送鱼来了，是特别警卫队的一名上校带人送来的。是死鱼。厨师遵照毛泽东"扔回去"的命令，拒绝接收。这位上校慌了，语言又不通，忙从克里姆林宫找来了翻译。这才明白毛泽东

只要活鱼，不收死鱼。

“我们马上逮一条活鱼来。”上校向中国客人郑重保证。

于是，克里姆林宫的大小人物都知道了，毛泽东吃鱼很讲究，不是活鱼他不吃。

其实毛泽东在国内时，死鱼剩鱼都吃，从不讲究。他只是讲究给苏联人看。到 1957 年我们随毛泽东第二次访苏时，莫斯科早早就准备好了活鲤鱼。据说赫鲁晓夫特意警告下边：“毛泽东这个人难对付，他是不吃死鱼的。”

韩桂馨：“谁叫你是毛泽东的儿子”

我们到西柏坡一个多月后，听说主席的大儿子岸英也要来了。虽然以前我没见过岸英，但他的事我已断断续续听到了一些。

毛岸英是主席的大儿子。大革命失败后，毛主席带领秋收起义的队伍上了井冈山，岸英和弟弟岸青、岸龙则跟随母亲杨开慧留在长沙东乡板仓的外婆家。妈妈常常带着他们，以走亲戚、串门的方式，秘密开展革命工作。1930 年，刚刚 8 岁的岸英和妈妈一起被敌人抓去，小小年纪就尝到了铁窗的滋味。不久，母亲被敌人杀害，他和两个弟弟被党组织营救到上海，又过了一段颠沛流离的日子。岸龙不幸病逝后，他和岸青相依为命，后又被党组织送到苏联去学习。

在苏联，岸英刻苦学习。在二次世界大战中，他积极投身于反对德国法西斯的苏联卫国战争，并参加过解放波兰等东欧国家的战斗。

1946 年 1 月，毛岸英回到了延安。那时他已经和父亲分别了 18 个年头了。父子久别重逢，他们都非常高兴。听银桥说，岸英虽是

喝过“洋”墨水、见过大世面的人，但他从没有因为是主席的儿子而妄自尊大，也没有因为自己是留苏学生而显得特殊。他回国后不几天，就按照父亲的指示，背着小米和一些菜种及行李，徒步几十里，走到吴家枣园去劳动锻炼。

胡宗南进犯延安时，岸英随中央土改工作团，东渡黄河，到晋绥解放区搞土改，又和主席分开了。所以我到主席身边后，一直没见过岸英。听说岸英要来西柏坡的消息后，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很高兴，看得出来，他们对岸英的印象都非常好。我听大家这样谈论岸英，心想他一定是非常英俊高大、精明强干的人，因此也希望能很快见到他。

6月，正是麦收时节。西柏坡的农民高高兴兴地开镰了，机关干部们也到各农户家帮助收麦子。

毛岸英就是在麦收时节来到西柏坡的。他没有顾得上休息，就跟西柏坡的乡亲们一起参加了劳动。他像庄稼把式那样，挥镰割麦，打捆垛垛。他不但会干庄稼活，而且谦虚、随和，很快就和老乡们熟悉了。

我现在印象最深的，也就是我第一次见到岸英时的样子：他一身劳动打扮，上身穿一件背心，裤脚高高地挽着，没戴草帽，脸上晒得红红的。

他一进院，一名警卫员跟他打招呼：“岸英，你怎么刚来就下地啊？”

“我正在上学嘛！”

“你那么有学问，还上什么学？”

“劳动大学呀。”

岸英在这一问一答中，亦庄亦谐，既透露出他的智慧，又显得自然。（因为中央机关的代号是“劳动大学”。）

大家都笑起来。

我和李讷那天都在院子里。他见了李讷，就走过来，亲切地拍了拍李讷的头，高兴地说：“小妹妹，又长个了。”并转身对我说：“你就是阿姨吧？辛苦了。”

岸英高高的个子，很魁梧，头发剪得短短的，走起路来很精神，有股子军人的气质。他不住主席这里，但常到主席这边来。天气热的时候，毛主席就在前院的藤椅上坐着，岸英拉个小板凳就在院子里坐着和主席说会儿话。岸英很喜欢李讷，他总是亲热地摸摸小妹妹的头，问问她的学习情况。李讷也很尊重这位大哥哥。有时兄妹俩都在主席身边坐一坐，一家人气氛很融洽。

岸英对我们工作人员很尊重。算起来，岸英的年龄比我大七岁，比银桥也大五六岁，但他总是称李银桥为“李叔叔”，叫我“小韩阿姨”。

毛岸英穿得很随便，在西柏坡我从没见他穿过新衣服，更没穿过西服什么的。记得天气转凉后，他竟穿了一套又肥又大的衣裤。我一看就知道那是主席的旧衣服。虽然岸英个子高，但他没有主席那么胖，衣服穿在身上咣里咣当的。我对他说：“岸英，这身衣服太不合身了，我给你改一改吧！”他说：“阿姨，不用了，能穿就行，这样挺好。”

岸英每次来，见我不是在洗衣服，就是在做针线、织毛活什么的，他总是说：“阿姨，你每天都这么忙，你辛苦了。”说得我心里热乎乎的。

西柏坡在表面上是平平静静的，充满了田园气息，实际上毛主

席、党中央在这里部署着两个战场的战斗。一个战场在前方，就是正在酝酿进行的三大战役。一封封电报，通过电波发往前线指挥员，前方的胜利捷报也如雪片般飞来。另一个战场在后方，在各解放区进行，那就是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这是消灭封建剥削制度、解放生产力的一场革命。中央派出了一大批干部下去搞土改试点。

毛岸英被分配到西柏坡附近的农村去搞土改。岸英在晋绥、山东的渤海搞过一段土改工作，积累了经验，所以工作很快就打开了局面。同他一道下去的有周副主席的养女、孙炳文烈士的女儿孙维世，还有刘谦初烈士的女儿刘思齐（齐是山东的简称，她父亲给她起名的含意是思念山东因此叫思齐）。由于工作地点不算太远，他们每晚回西柏坡来住。那时候邓颖超大姐在阜平县任县委书记，不常在家。有一次她回西柏坡汇报工作，在家住了几天，细心的邓大姐发现了一个秘密：每天早晨岸英都约思齐一起去下乡。从他们俩的神情里，邓颖超看出了他们有那么点意思，于是就把这个发现告诉了周恩来。周恩来称赞邓颖超眼光不错，一回来就发现了问题，他不但表示赞成，还请邓颖超同志从中帮帮忙。但邓颖超马上要回阜平县，就将此事托付给了康克清大姐，康大姐很乐意承担这个任务。

其实，毛主席对刘思齐也并不陌生。思齐小时候在延安参加过演出，在《弃儿》一剧中扮演一个孤儿。主席看过演出后，对小姑娘印象很深。当他得知这个小姑娘是烈士刘谦初的女儿时，对刘思齐很关心。后来思齐随母亲去苏联，路经新疆乌鲁木齐时，被军阀盛世才扣押，在狱中生活了三年多，继父也牺牲在新疆了。

当康克清在毛主席面前提到思齐时，毛主席马上表示："这是个好姑娘。只要他们两个同意，我没有意见。"没用几分钟，康克清就

把一件大事和毛主席谈妥了。两个年轻人高兴极了，他们一再表示感谢康妈妈。康克清对他俩说："赶快感谢你们的邓妈妈吧！是她托我来做这个大媒的。"

自从两个年轻人互相有意之后，岸英也早想把这事告诉父亲。但他见父亲终日忙于工作，也不知怎样去讲。现在见康妈妈主动为他们说通了，别提多高兴了。这年毛岸英已经27岁了，俗话说"男大当婚"，岸英确实不小了。

岸英和思齐的恋爱关系明确了，大家都为他们高兴。他们两个当事人也在康克清妈妈的帮助下，开始准备结婚用品。机关的同志们给了他们很大支持，大家挤出一间小平房，准备让他们在这里办喜事。毛岸英兴冲冲地来找父亲。不过他开始时还是绕了个小圈子，试探一下父亲的态度：

"我跟思齐的事，康妈妈跟你说过了？"

"嗯。"毛泽东正在批阅文件，这简单的回答，以及主席放下笔后脸上微笑的表情，意思很明确，主席对他们恋爱的事不但知道了，而且是支持的。岸英心里有了底，就把来意挑明了：

"那我们就办结婚手续吧？"

"结婚？"主席追问了一句：

"思齐多大了？"

"18岁。"

"周岁？虚岁？"

"虚岁，"岸英又补充了一句，"可也差不了几个月……"

"差一天也不行。我这里忙，你去吧。"

这简直像一瓢凉水，使岸英乘兴而来，败兴而去。他心里难过，

低着头默默地走了出来。

我们看到岸英难过的样子，心里也不好受。银桥安慰岸英，劝他不要着急，并给他出主意："别急，等你爸爸高兴的时候你再说。"岸英悻悻地走了。相比之下，我觉得主席对我们工作人员的婚事比对自己儿子的婚事要积极的多。不知怎么的，我也为岸英的事感到委屈。

过了些日子，大概是 8 月份吧，岸英和思齐一起来到主席住处。那几天，前方无大战，主席心情也好。我想，这次主席也许能松口了。我盼望这回有个好结局。哪知，不一会儿，俩人从主席屋里出来，看样子，岸英并不高兴。我忙问银桥是怎么回事？原来主席还是没有同意。我真有点为岸英抱不平：他年龄那么大了，为什么不能通融一下呢？再说大家都热心地张罗岸英的婚事，这样一来闹得岸英多下不来台呀。

也就一顿饭的工夫，岸英独自一人又回来了。不一会儿，主席屋里传出一句责备的话：

"你怎么又回来了？"

这话声音很大，我们在院里都听见了。

"我从来都是听爸爸的。可我今年快 27 岁了。我想结婚以后专心学习和工作，这样就不必在这上面花费那么多时间和精力了。"岸英一激动起来，说话声音也不小。我听岸英说得也在理。没想到主席却发了火：

"你还是现在就结婚呀？我说过的话为什么不听？"毛主席历来要求"交待了的就要照办"，这一点我可领教过了。但岸英面对的毕竟是自己的亲生父亲，他还在做最大的努力：

“我自己的事还是让我自己做主吧！”

“你找谁结婚由你做主，结婚年龄不到你做得了主吗？制度和纪律要做你的主！”

“岁数不到就结婚的人多着呢！”

“谁叫你是毛泽东的儿子！”毛泽东语气毫不松动，并大发脾气。“我们的纪律你不遵守谁遵守？我再说一遍：思齐不满 18 周岁就不许你们结婚！”

岸英又气又恼，从毛主席屋里出去后，躺在床上大哭，谁也劝不了。毛主席知道后，扔下笔径直出门，到了岸英住处。他站在窗外，提高嗓门吼了一声：“毛岸英，你想干什么？”

岸英立刻停止了哭闹。主席转身就走。

就这样，岸英的婚事又拖了一年，到 1949 年 9 月，他们才举行了简朴的婚礼。建国后，岸英在北京机器总厂当党总支副书记，工作出色，受到工人的拥护。1950 年 6 月朝鲜战争爆发，毛泽东又送儿子岸英去了朝鲜战场。为这事，江青和其他一些同志都曾劝阻过主席，但他还是那句话：

“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他不去谁还去？”

后来，毛岸英在朝鲜战场壮烈牺牲了。他的忠骨被安葬在朝鲜平安道桧仓郡志愿军烈士陵园里。

九　毛主席当红娘

李银桥：新来的“小韩阿姨”

那次江青去黄河东岸接回女儿李讷时，带来一位负责照料李讷的18岁的姑娘韩桂馨。

小韩原在卫生部系统的中央洛杉矶幼儿园工作，具有高小文化程度。李讷已经7岁，动荡的战争生活使她无法上学。毛泽东牵挂这件事，于是卫生部副部长傅连璋给出了个主意，由韩桂馨负责照看李讷，以便教她读书识字。

见面那天，毛泽东照例问韩桂馨愿不愿意在他身边工作。韩桂馨回答说：“主席要考虑党和国家的大事，身边的一些事忙不过来，我能帮助主席做一些事，可以使主席更好地为人民办大事，我愿在主席身边工作。”

毛泽东听了很高兴，夸奖说：“小韩阿姨讲话很有水平么，你读过书吧？”

韩桂馨说：“上过高小。”

“是个女秀才么。你家是哪里的啊？”

“河北安平县。”

“银桥，是你的老乡么！”毛泽东朝我叫着，“这也叫缘份，你们握个手吧！”

不知为什么，我的脸立刻烧红了。

“小韩阿姨，他是我的卫士组组长，李银桥，也是安平县人。”毛泽东介绍说，“他也是党小组长，以后你就归他领导，有什么事多在一起商量。”

就这样，我与韩桂馨认识了，一起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接触多了，我发现她积极热情，喜欢学习，工作责任心强，人也老实贤惠，渐渐便有了一些好感。

1947 年 10 月底，毛泽东移居杨家沟。进村时，路边有许多石碑。毛泽东每到一座石碑跟前总要停下一会儿，看看碑文，和他们说笑几句。

有一座石碑上刻的都是古老的篆字，我们看不懂，韩桂馨也不会看那种古字。大家请毛泽东看是什么意思。毛泽东抑扬顿挫地念了几句，笑着说：“这是一个相当于高小毕业程度的人。”说着回过头，对韩桂馨说：“你是高小毕业的，如果生在那个时代，也要给你立个牌坊呢！”

大家都哄笑着逗小韩。

毛泽东忽然小声问我：“你看小韩这个人怎么样？”

我和韩桂馨相识不久，彼此只是有好感，并没想到那种男女爱情的事。因此，我不假思索，随口应道：“不错。”

毛泽东望着我，笑得怪神秘，深有含意地说：“你们可以多接触，多了解一些么。”

我心里涌起热浪，低下头没言声，只觉得毛泽东是那么知心，可

亲近。

毛泽东的声调变得温和而亲昵，像父亲同孩子说悄悄话："多谈谈，互相多关心，多帮助，那多好呀。"

我明白毛泽东的意思，心里十分感激。可是到了实际中，除了谈工作，我实在不会也不好意思谈那种事。

韩桂馨：当面说合

李银桥是我的行政领导，也是我们的党小组长。他虽然只比我大两岁，但他参加革命时间长，1938 年就参军了，政治上比我成熟，工作也有经验，许多问题到了他那里都能妥善解决，我很佩服他。加上我们都是在毛主席身边工作，整天见面，不但工作常有接触，而且学习又在一起，彼此渐渐熟悉了，也互相了解了，逐渐对他产生了好感，觉得他是值得信赖的人。

在陕北时，男同志多，女同志少。少数女同志当然就比较"显眼"，追求过我的男同志也不少。江青对我的事也关心，曾先后给我介绍过两个老红军，由于我心里已经有了银桥的影子，我也就都没同意。江青关心我的生活问题，想帮我牵线搭桥，但她却看不透我的心思，我也说不出口。女孩子思想敏感，从言谈举止上，我看出李银桥心里也有我，只不过不好意思谈这事。我们俩单独见面时，我总觉得有些耳热心跳。

还是毛主席善于发现问题。有一天散步时，他忽然回身望着紧随其后的李银桥："你看小韩这个人怎么样？"

"不错。"李银桥不假思索，随口就答。

毛主席眯着眼，笑了：

“你们可以多接触，多了解一些么。”

李银桥听出了话外音，红着脸低下头不再吱声。

毛主席声音更加温和，像个慈祥的父亲：

“多谈谈么，互相多关心，多帮助。以后……那多好。”

话虽含蓄，意思很明确。但要当面把事情挑明，我们谁也没那本事。

到西柏坡之后，生活安定多了。有次散步，毛主席又提起此事，他悄悄问银桥：“你们谈得怎么样啊？”

李银桥又是红着脸低头不语。

“不要封建哟，你们谈我是赞成的。”主席侧脸望着银桥，微笑着鼓励他说：

“不要靠媒人。啊，我的卫士要自力更生，自由恋爱么。”

李银桥这人工作很出色，人也长得很精神，在主席那里工作，无论大事小事处理得也很妥当，不算不聪明。可到谈情说爱这事上，笨得就像换了个人，简直有点窝囊。事情就一天一天地拖了下来。

转眼到了秋天，银桥又拿来主席的毛衣毛裤让我补。我抖开一看，这身衣服不知穿了多少年了，上面有好几个窟窿，不少地方还脱了线。这样的衣服怎么还能让主席穿上身？我对他们火了：

“这么破了，你们还让主席穿呀！石家庄已经解放了，那里毛衣毛线都有。现在条件好了，你们去趟石家庄，如果现成的衣服不合身，就买毛线来，我负责织，保证天冷的时候让主席穿上。”

银桥说：“你来主席这里工作，还不知道主席的脾气，他哪里肯让你给他织新毛裤哇。”我那时气盛，就说：

“你们怎么不好好劝劝主席，我们战士还发新军装，为什么主席非得老穿破的？”

大家也认为我说得有道理，银桥也不再坚持。我看得出他也和我们想法一样。但没经主席同意，谁也不能擅自去办这件事。还是警卫排长阎长林想出了一个点子，他说：“小韩，你去请示主席吧。你年龄小，什么话你都可以讲。”银桥也同意这么办。但我可不能像上次江燕来的时候那么冒失了，再说我的任务是看小李讷，这事怎么闹来闹去倒落在我身上了？我摆摆手说：“这些都是你们的事，不应该由我去问主席。”

过了一会儿，阎长林又说：“你跟银桥一块去问主席行不行？”我看银桥不反对，也就答应下来，马上抬腿就要去。但银桥说：“这要找个机会才行，不能干扰主席办公，要等主席吃饭、休息或散步的时候再说。”但阎长林反对，他说：“先侦察侦察，有机会就说，别拖。”我也觉得不能耽误，催银桥快去办。

等休息看报的时候，银桥认为是个机会，我们就去了主席的办公室。我急急地往前走，李银桥悄悄地跟在我身后。我一推门进去，主席就发现了我。他放下手中的报纸，问：“你有什么事吗？”于是我走到主席的桌旁，把手里的毛裤亮了一下，张口说道：“主席，您这身毛衣太破了，实在不好补了。您就换件新的吧！”主席温和地笑了笑：

“小韩阿姨，你把李讷照看好了，又为我缝缝补补，帮了我的大忙。我非常感谢你。还是请你辛苦一点，把我的毛衣毛裤织补一下，能穿就行了。”

但我不死心，还是力求说服他：

“你的毛衣太破了，就算能补上，穿在身上多难看呀！”

主席笑了：“穿在里面还讲什么好看难看，能挡寒就行。现在全国还没有解放，我们还很困难。”

话已至此，看来一点松动的余地也没有了。我只好败下阵来，我想：再多说也没用，主席定下的事不能轻易改变，这点我是知道的。但没想到主席对自己的生活需要降到这么低的水平。我恨自己嘴笨，没能完成大家托付的任务。看到主席面前一堆报纸和稿子，我又有点后悔刚才凭一时气盛闯进来，打扰了毛主席的工作。我再不忍耽误他的宝贵时间，于是转身往外走去。

哪知，毛主席见我和银桥要往外走，他看了看银桥，又看了看我，突然转了个话题说：

“怎么，你们两个人今天找我就为了这事，还有没有别的事呀？”

我的心思都在毛线上，一时对“别的事”也反应不过来，就答道：“没别的事，就是动员主席买毛线。”主席又慈祥地望着银桥，只见银桥憨笑着，没有说话。我这才发觉进屋后一直是我唱独角戏。

主席站起来，在桌旁踱了几步，亲切地说：

“银桥，你今年 20 几啦？”

“21 岁。”

“小韩，你今年 19 岁了，对不对？”

想不到主席对我的年龄记得那么准，还是我到主席身边时问过我一次，主席竟记住了。我点点头说：“对，是 19 岁。”

毛主席忽然一笑：“那很好么，你们应该互相多帮助。”

我脸发热，一看银桥脸也红了。我只觉得毛主席像位慈祥的父亲，他是那样关心体贴儿女的心思，为我们想了许许多多。

李银桥：他教我如何“突破”

1948 年 5 月来到河北西柏坡后，生活安定，我与小韩接触也多起来。韩桂馨除了带李讷，还帮毛泽东做些针线活。

毛泽东的衣服全是穿了多年，补了又补的，所以针线活不少。没有他的同意，任何人不敢给他换新衣服，甚至连买条新毛巾都不行。他擦脸擦脚只有一块毛巾。我曾劝他买条新毛巾，擦脸和擦脚的分开。他想了想说：“不要分了，现在整天行军打仗，脚比脸辛苦。分开就不平等了，脚会有意见的。”

我噗哧笑出声，说：“那就用新毛巾擦脚，旧毛巾擦脸。”

毛泽东仍然摇头：“账不能那么算。我多用一条毛巾可能费不到哪里去，可是全军如果每人节约一条毛巾，省下的钱我看就够打一次沙家店战役了。”

唉，谁也劝不动他。

毛泽东原来有一件毛衣和一条毛裤，也不知穿了多少年头，上面有好几个大窟窿，不少地方还脱了线。卫士们拿着去求韩桂馨。

韩桂馨抖开毛衣毛裤，看一眼就叫起来：“这么破了还让主席穿呀？今年和去年的情况不一样了，现在条件这么好，西柏坡离石家庄很近，那里毛衣毛线都有。如果买现成的怕不合身，你们就买毛线来，我可以给主席织，保证天冷的时候叫主席穿上。”

大家听了觉得有道理，但没有毛泽东同意又不能买。阎长林便说：“小韩，你去请示主席吧，你年龄最小，什么话你都可以讲。”

韩桂馨没有马上答应阎长林，她说：“这是你们的事，不应该由

我去问主席。”

阎长林说：“你跟银桥一块去问主席行不行？”

韩桂馨瞟我一眼，不作声了。

我说：“这要找个机会才行，不能干扰主席办公，要等主席吃饭、休息或散步的时候再说。”

阎长林嘱咐我：“先侦察侦察，有机会就说，别拖。”

于是，我和韩桂馨来到毛泽东办公室，见他正坐在沙发上看书，我们便进去谈了买毛线的事。

毛泽东望着韩桂馨说：“小韩阿姨，你把李讷照顾好了，又为我缝缝补补，帮了我的大忙。我非常感谢你。还是请你辛苦一点，把我的毛衣毛裤织补一下，能穿就行了。”

小韩说：“你的毛衣毛裤实在太破了，就算能补上，穿到身上多难看呀。”

毛泽东笑着说：“穿在里面不讲什么好看难看，能挡寒就行。”

我明白没什么希望了，就朝小韩递眼色：不要再耽误主席的时间了。

毛泽东见我们要走，忽然说：“你们两个就为这件事来的吗？还有没有别的事呀？”

小韩嘴快：“没别的事，就是动员主席买毛线。”

毛泽东转望我，问道：“银桥，你今年 20 几啦？”

“21 岁。”我回答道。

“小韩，你今年 19 了，对不对？”毛泽东又问小韩。

“对，19 岁了。”小韩答道。

毛泽东忽然一笑：“那很好么，你们应该互相多帮助。”

我的脸立刻红了。我相信，小韩的脸一定也红了。

第二天，我陪毛泽东散步时，他悄悄问我："你们谈得怎么样啊？"

我不好意思地低下头，窘得光是笑。

"不要封建哟，你们谈我是赞成的。"毛泽东拉住我的手，鼓励地拍拍我膀子。

我又何尝不着急呢？西柏坡男同志多，女同志少，少数女同志自然就成了众多男同志竞相瞄准的目标。我知道有不少男同志托江青向小韩捎过话，而我却不好意思说，也不好意思托人……

终于，毛泽东帮我找到了一次"突破"的机会。

一天，我接到家乡来信，说父母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我拿了信去找毛泽东："主席，你看这事怎么办？"

毛泽东看完信，反问道："你说怎么办？"

我低头说不出来。

毛泽东哈哈笑出声："银桥啊，你就是太老实。你就不会去问问小韩？她比你文化高，你正好借口要她帮你写回信么！"

我心里顿时一亮。毛泽东不但善于办大事，就是谈恋爱也比我有办法啊。

"小韩，你看看这封信。"我找到韩桂馨，小心观察她看信的神色，试探着问："你看怎么办？如果，如果……不合适就推掉吧？"

"那就，那就推掉呗……"她越说越气短，脸孔也越红。

我的胆子便大起来，盯紧她问："你代我写封回信吧？你文化程度比我高，主席说互相帮助，是吧？"

她低着头，嘟囔着："你可真聪明……你也真够傻的。那么多人找我，我都没答应，就等……我就，就答应……"

我长长舒口气，笑了，说："要不然我还要傻呢，是主席教了我这个聪明办法，是他让我请你写回信。"

"哼，主席就喜欢你，叫别人都是叫警卫，就叫你叫银桥。"韩桂馨说着，声音忽然低下来："现在女同志少，将来进城了，女同志多，你，你可不能变心。"

我说："怎么可能呢？毛主席不答应，我自己也不答应呀。好歹我是你的领导，我要是变心还像个当领导的吗？怎么教育别人呀？"

韩桂馨轻轻说道："那你就领导我一辈子吧，我都听你的……"

回到毛泽东身边，我把经过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毛泽东像办成一件喜事那么高兴，把我的手一拉："走，银桥，散步去！"

毛泽东拉着我的手走到室外，另一只手抚摸我的胳膊，轻声说："谈下去，银桥，继续谈下去。你们都在我身边工作，又都是安平县老乡，走到一起来了。要说缘份，这就叫缘份。"

1948 年 12 月 10 日，我和韩桂馨写了申请结婚的报告，没两天，中央办公处和各位领导在报告上写满了批示，都表示赞成或庆贺。不过限于当时的环境条件，我们没有举行什么结婚仪式。

1949 年初进城后，毛泽东住在北京西郊的香山。他忙中抽空，对我说："过去条件不行，现在有些条件了，你们选个日子，把仪式补了。"

我说："现在多紧张呀，要建立新中国了，仪式就免了吧。"

毛泽东说："该补该补，一定要意思意思。"

于是，我们便选定这一年的"五四"青年节举行仪式。毛泽东听说了，频频点头："好，这个日子选得有意义。"

可惜，那天毛泽东连续开会，接见民主人士，未能喝我们的喜

報告

我們相處一年有餘，彼此深為瞭解，感情至為融洽，今蒙方均自願舉行結婚儀式，終身革命之伴侶，謹此具呈請核準。

辦公處　十一月廿七日

總支部　同意

黨委會　同意

組織處　同意

保衛處　同意

秘書處　同意

處長　同意

政治處　同意

處長　同意

黨委會　同意

主任　同意

總支部　同意

李銀橋

韓桂馨　敬上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日

李银桥、韩桂馨的结婚申请报告

酒，但是吃了我们送去的喜糖。如今，我们的孩子都有了孩子。但我们永远忘不了他老人家对我们的关怀和恩情。

韩桂馨：毛主席说：“好，这个日子选得有意义。”

毛主席虽然当面做了工作，但我和银桥的关系仍停留在原处，只是保持着工作上的联系，互相之间没有更多的接触。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们的关系有了一个新的“突破”。

起因是银桥的一封家信。

银桥和他家的通信联系没有断过。在陕北时，银桥有一个日记本，记载了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风土人情、生活状况。主席看了，批道：“写得很好，大有希望。”并签上了“毛泽东”三个字。主席让他把这个本子寄回家去，一方面让他家里人知道他参加革命工作后的进步，另一方面也是让他父母放心他的情况，叫他们高兴高兴。参军时只有初小文化水平的银桥，确实进步多了。可惜他那个小本子寄回家后，村里人都觉得是个稀罕事，争着传看，时间长了，也找不到了。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自从银桥的老人知道他在毛主席身边工作，就对银桥的情况很关心。农村的老人，关心自己的孩子有他们自己的方式：那就是早早地为儿子物色一房好媳妇。银桥家里的来信，就是谈的为银桥介绍对象的事。父母为他相中了一位姑娘，来信中把姑娘说成了一朵花。这信里有爹娘的一份心意啊。银桥对那从未见过面的姑娘当然谈不到什么感情了，而当时我们的恋爱关系还没有“敲定”，怎么答复家里呢，这可叫银桥为了难。

一天，我正在屋里干事情，银桥一推门走了进来，手里的信往我桌上一放，还没说话脸就红了。我问他有什么事，他吞吞吐吐地说：“小韩，你看看这封信……你看怎么办？”我拿起信来一看，心突突地跳，马上明白这是让我表态了。

我能说什么呢？这太突然了。我觉得脸上发烧：“那就……那就推掉吧。”谁知，我的话刚说完，银桥就高兴地说：“那么，你代我写封回信吧？”没想到他的进攻意识还真强。我奇怪他今天怎么了。看他那激动的样子，我也把埋在心里的话一点一点往外倒：“你，你可真聪明……你也真傻。那么多人找我，我都没答应，就等你……找我……”

他紧紧地握住我的手。不知怎么的，我的眼圈也湿了。问题来得太突然了，而且感情的闸门一打开，我就把憋在心里的话一古脑儿倒了出来：“现在男同志多，女同志少，将来进城，女同志多了，你，你可别丢了我……”他握住我的手不放，非常诚恳地说：“看你说到哪里去了。我是你们组长，还要做榜样，起模范作用呢。”

“你是我的领导，那就领导我一辈子吧。”

银桥兴冲冲地走了。等静下来以后，我心中浮起一个疑团：一贯腼腆木讷的李银桥，今天怎么变得这么开朗，这么机灵了？后来经我询问，他才告诉我，是主席教他如何“突破”的呢。

不久，银桥随江青去了趟济南，也算进了一趟大城市吧。回来时他拿出了给我买的礼物：一件毛背心和一些小日用品。

别看礼物小，情意却很重。那时我们实行的是供给制，根本没有钱。银桥的钱是他领的残废金，而且只有一点点。

说起来，银桥还是个残废军人。那是他在晋绥军区当战士时，有

一次和日本鬼子作战，他们被围困在山上，那可真是天寒地冻啊，有的人冻掉了耳朵，有的人冻坏了手，银桥则冻掉了一个脚趾头。自从我们俩确定恋爱关系后，银桥领到残废金后，就都给我买了东西，有时买个脸盆，有时买条毛巾或袜子什么的，那时候我就很知足了。

看看到了年底，我也20岁了。银桥和我商量："大家伙对我们俩的事情挺关心的，我们向领导打个报告，把这事办了吧？"我们商量了一下，拿来纸笔，给领导写了结婚申请：

报　告

我俩相处一年有余，相互深为了解，感情至为融洽，今双方均自愿举行结婚，谋结终身革命之伴侣，谨此恳请核准。

此呈

办公处

伍处长

叶处长

汪处长

赖处长

总支委员会

李银桥

一天时间，各位领导都在我们的报告上批了意见：

伍云甫批的是："大大好事，甚为赞成。"

罗道让批的是："同意，并致贺意。"

叶子龙批的是："完全赞成。"

赖奎批的是："同意。"

总支书记刘火也在上面庄重批示："总支委员会同意。"

这份结婚申请及批复，我们珍重地收藏着，一直珍藏到今天。

1948 年 12 月 13 日，我们在西柏坡结婚了。由于当时条件所限，我们也没举行什么仪式。到了北京香山以后，有一次，主席忙中抽空，对银桥说："过去条件不行，现在条件好些了，你们选个日子，把仪式补了。"银桥说："正在准备建国的大事，多忙呀，仪式免了吧。""该补该补，一定要意思意思。"于是我们选定在"五四"青年节举行仪式，主席很赞成："好，这个日子选得有意义。"

仪式由阎长林主持，开了两桌席。毛主席那天要会见民主人士，特别忙，没喝上我们的喜酒。但他吃了我们送的喜糖。看上去，他和我们一样，非常快乐。

十　他像父亲一样

李银桥：杨尚昆说：“主席真是大好人哪”

还在1948年3月，中央机关要离开陕北，前往西柏坡。毛泽东对从陕北入伍的老战士张瑞岐说：“张瑞岐，家里不是给你定亲了？都三十多了，还没顾得结婚，你不要去了！”

张瑞岐回答说：“我要把毛主席送到河北再回去。”

“那就照你说的办，去看看华北大平原吧……”

到了西柏坡，毛泽东日理万机，工作很忙。一天，他问阎长林：张瑞岐走了没有？得知还没走，就让把张瑞岐叫来。

张瑞岐来后，毛泽东问他什么时候走。张瑞岐说：“我不走了。”

毛泽东问：“为什么？”

他说要把毛主席送到北京去。

毛泽东思考了片刻说：“反正很快就要到北京了，那也好，去北京看一看，回去以后好好对你的老人、未婚妻讲一讲北京的故事。”

到了北京香山，毛泽东亲切地对张瑞岐说：“谢谢你把我送到了北京，现在该送你回陕北了。”

张瑞岐回到陕北后，大约1951年家庭生活遇到困难，给毛泽东

写信。毛泽东拿出三百元钱寄给了他。

转战陕北时警卫排的警卫员李二亭 1949 年转业后，生活遇到困难给毛泽东写信。毛泽东让秘书室给他寄去了三百元钱。去年春天我去石家庄，李二亭来看我，我们又回忆起这件事，都更加怀念毛主席他老人家。

毛泽东不仅关心我的婚姻大事，他像慈父对待自己的儿女一样，对身边的每一个工作人员都无微不至地关怀。

1953 年初，在天津铁路卫生防疫站工作的姚淑贤，调到毛泽东的专列上工作，当时不满 18 岁。

1956 年的一天，正在谈恋爱的姚淑贤和男友约好星期六晚上去中山公园见面，却突然接到命令，准备出车，毛泽东要去北戴河开会。

下午 3 点，毛泽东一登上专列，车子就启动了。毛泽东在客厅里忽然立住脚，回头望着我们所有工作人员问道："今天是礼拜六噢，你们有没有约会？"

"有，我有。"姚淑贤脱口冒出两句。

"跟什么人有约会？"毛泽东认真地望着她，嘴角含着亲切而逗趣的微笑。

"跟男朋友。"小姚大概感到腼腆，声音低了下来。

"哎呀，搅了他们的好事。"毛泽东望望窗外闪过的树林，又望望小姚，皱了眉问："怎么办？你们打算在哪儿约会？"

"说好去中山公园玩，在门口……不过，没事。"小姚喃喃说。

"怎么会没事呢？"毛泽东有些急了，"你通知他了吗？"

"没有。"

“你这个小姚哪，要是不见不散怎么办？”毛泽东又望窗外，似乎希望专列停下来，“你就连个电话也没有给他打？”

“我们只要接受任务就不能对外人说了……”

毛泽东吮了吮嘴唇，沉吟着。

“没事的，他知道我常有任务，会理解的。”小姚宽慰毛泽东。

“嗯——”毛泽东摇摇头，嘀咕着，“久了会出误会的，不要因为我而影响你们。”

晚上，小姚将一捧削好的铅笔给毛泽东送去。毛泽东掀起眼皮若有所思地望着她，目光一闪，忽然说：“小姚，你等等。有个东西你拿回去给你的朋友看看，你的朋友就不会生气了。”

“什么东西呀？”

毛泽东挑出一支铅笔，又铺开一张白纸，说：“我给你写个东西，你拿回去交给他，再把失约的原因讲给他听……”

说着，毛泽东已经开始伏案书写，边写边自得其乐地吟诵。“给，拿回去给他看看。”毛泽东将写好的诗交给小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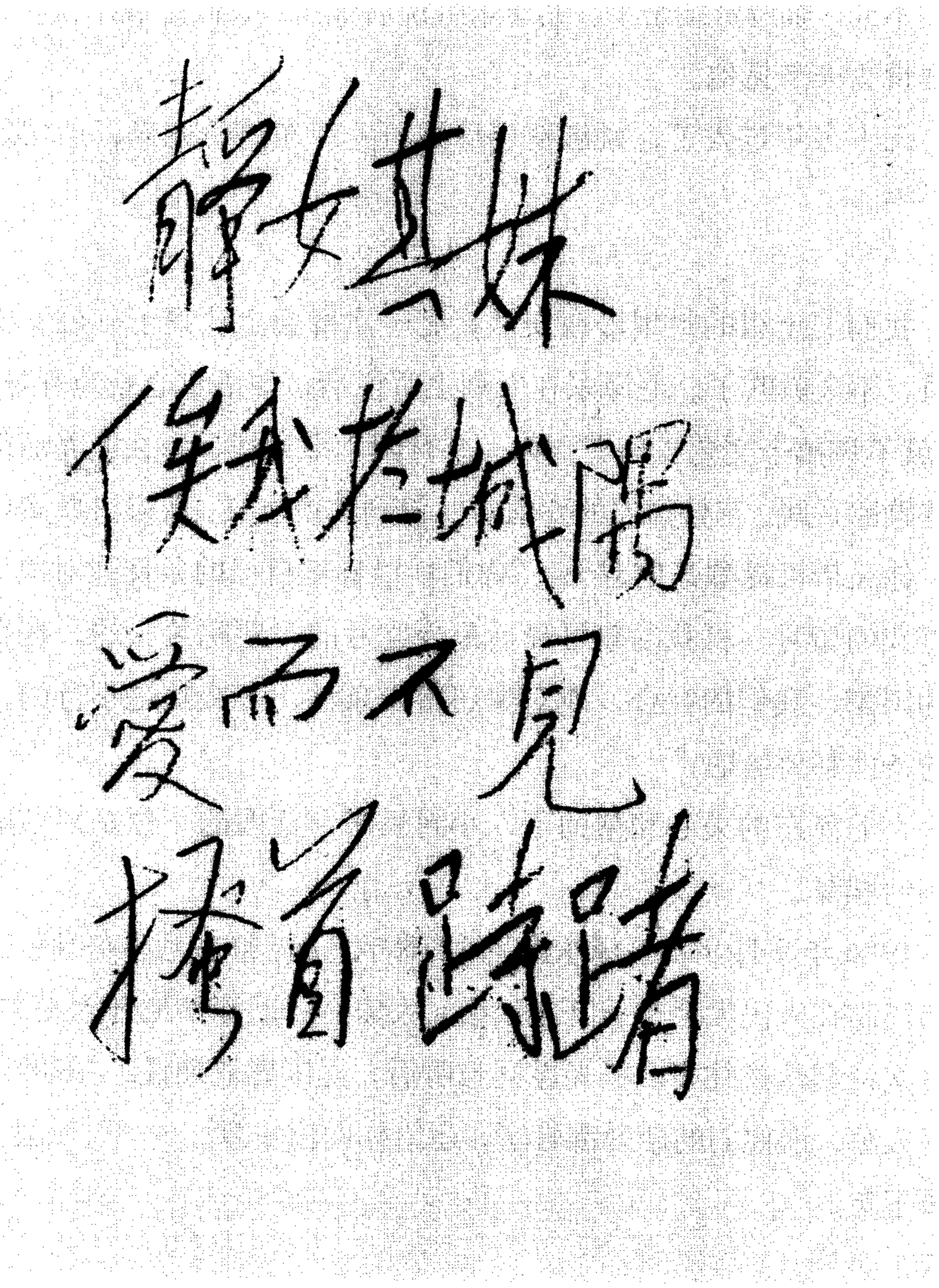
小姚接过来一看，原来是一首古诗：

静女其姝
俟我於城隅
爱而不见
搔首踟躇

大概明白了诗意，小姚的脸不由地红了起来，小声说：“主席，我们有纪律，凡是带字的东西都必须上交。”

“你为什么要那么老实？现在没有谁看到。我是不会打小报告的。”毛泽东说着，做了个手势，“藏起来，带给他。”

小姚从毛泽东那里出来，还是向我作了报告，并把毛泽东写的



那首诗给我看。说老实话，我当时并没有完全看懂，笑了笑，说："那就收藏好，带回去吧。"

姚淑贤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十几年，只违反这么一次纪律。

不久，姚淑贤结婚了。毛泽东听说后很高兴，向她表示祝贺，并让她带丈夫来见他。

三十多年过去了，姚淑贤仍珍藏着毛泽东这份充满了慈父之情的手书。

我们卫士组的封耀松在安徽合肥一次舞会上认识了一位女文工团员，不久就吹了。毛泽东在专列上听说后，便语重心长地开导说："你就不该搞个文艺工作者。你一个月四十多元钱，怎么能养活得起那些蹦蹦跳跳、花枝招展的女演员？没到共产主义，还得讲些实际。"

他又借机提醒其他卫士："你们就以你们自己的条件找对象，不要打我的旗号。打我的旗号最后是要吃亏的，要吃苦头的。现在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找对象还得讲条件，一头热是不行的，双方的条件都要考虑。"

在毛泽东的关心和帮助下，小封后来与江西的一位姑娘结成了美满的姻缘。

1986 年 9 月 9 日毛泽东逝世 10 周年之际，曾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同志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座谈会，大家在一起深情地怀念毛主席，又一次谈起这些往事。杨尚昆同志听后，无限感慨地说："主席真是大好人哪，连你们的恋爱都管了，还给你们出主意。……"说罢，冲我笑了笑。

韩桂馨：主席说："没什么，下次注意就行了。"

济南解放不久，大概是48年11月底或12月初，银桥陪江青去了一趟济南，来回有七八天的样子。同去的有警卫排长阎长林、汽车司机周西林等四位随行人员。他们出发时由周西林开一辆美国的中吉普，先到石家庄市，然后转乘火车到德州，再坐上那辆随火车运来的中吉普到济南。

江青到济南的目的主要是奔丧，因为她的母亲去世了。我和江青相处时间长了，她有时谈到她的父母亲。江青的生父叫李德文，娶了两房妻室，江青是妾生的，在旧社会叫庶出，又是个女孩，弄得母女二人在家中根本没地位。江青5岁的时候，人们正欢欢喜喜过元宵节，她的父亲不知为了什么，突然抓起一把铁锹，追赶她的母亲。江青扑上去保护母亲，也被撞坏一颗牙。开木匠铺的父亲脾气很暴躁，嗜酒尚武，经常虐待江青的母亲。因此她对比母亲大许多岁的父亲从来没有好印象，她只爱母亲，恨父亲。

元宵大战之后，江青的母亲带她出来在诸城（江青出生地）做保姆，先后还在别人家干过活。其中有一家姓张的大地主，这家的二少爷就是后来的康生。后来江青的父亲死于伤寒。母女二人又投奔到济南外祖父家。江青十二三岁时，母亲又带她到天津谋生，住在她同父异母的姐姐李云露家。江青在天津没继续上学，家里人也不同意她去烟厂当童工，只是在姐姐家帮忙，打扫屋子、洗衣服、买点东西等等，生活来源靠在军阀部队当军官的姐夫。过了一两年，江青又和母亲回到了济南。因此江青对她这个姐姐还是有好感的。

江青一行到了济南，受到市长姚仲明和市政府办公室主任陈秉忱的接待。他们到的时候，江青的母亲早已安葬了。江青下车后立即去济南公墓给母亲上了坟。江青爱动感情，又会演戏，她哭得挺悲伤，又不失大雅。江青故地重游，感慨颇多，在济南停了几天。

江青在济南停留时，恰巧赶上她异母兄长李干卿的婚礼，便去祝贺了一番。

李干卿在铁路上工作，当时50多了，是再婚，新娘子30多岁，是改造过来的妓女，长得浓眉大眼，嘴巴较大，胖胖的，模样还挺漂亮。江青送了钱，也买了礼品，当面向哥哥和新嫂子贺喜。出来后，江青撇了撇嘴，向工作人员褒贬起这位新娘子，大概是看不惯她嫂子擦口红、涂脂抹粉的样儿，江青说："没文化的人就这样，越打扮越俗气。"她的批评很尖刻，有些鄙夷不屑的神气。

相比较而言，江青对她姐姐的态度就好多了。这时她姐夫已过世，姐姐从天津回济南，一人拉扯着孩子，日子过得也挺艰难的。她姐姐的儿子王博文正念中学，读书很刻苦，也挺招人喜爱。相处几天之后，姐妹俩感情更深了。回西柏坡时，江青就把她姐姐李云露和处甥一起接了来。

李云露比江青大10岁，长得也不如江青，但她脾气比江青好，人也厚道一些。她来了以后没做什么工作，只是顺便照顾一下李讷。王博文学习一直都很努力，依靠助学金和奖学金读完了大学。现在清华大学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李云露搬出了中南海，和儿子一起生活，1988年病故。

生活稳定了，我发现江青也变了。

以前在陕北行军转战时，虽说江青喜欢出风头，但她骑烈马，驯

烈马，总还有那么股子泼辣要强的劲。休息时也和大家一起聊聊天，晒晒太阳，猜猜谜语什么的。现在可倒好，有大米白面吃了吧，她倒嫌口味不好了，一会儿说咸，一会儿嫌淡，一会儿又说太油腻了。她总挑剔饭菜不合她的口味。

而主席总保持着老习惯，饭菜不挑，只要有辣就香，累了就吃碗红烧肉。江青就埋怨主席不懂科学，不懂得营养，老吃大肥肉，还埋怨主席头发留得太长。但大家都知道，主席头发长，那是他没时间理呀。在小小的西柏坡指挥三大战役，稍有差错，前方的损失就大了。毛主席几天几夜吃不好睡不好觉，打了胜仗吃碗红烧肉当然是应该的。我们那时不懂什么营养学，江青那种劲，我们都看不惯。

我们不是讨厌她讲究，而是讨厌她挑剔。我们也不光是喜欢主席的不讲究，而是喜欢他的温厚。因此大家都觉得主席很亲近，江青有些难侍候。

但不侍候也不行，那是工作。每天早晨江青醒来后，不下炕，拥被而坐，按电铃叫卫士打洗脸水、漱口水。洗漱完毕，卫士再用托盘把早饭端进房里，她在床上吃早点。据她说外国人都是这样的。这还罢了，因为在杨家沟时她就这样，大家也习惯了。到了西柏坡，江青按电铃的次数比主席多得多了。她越来越习惯支派人，指使人。有一天卫士张天义听到铃响后，赶快跑进房间问江青有什么事。江青说：你给我拿暖水袋来。张天义一看，暖水袋就在她脚边，只要伸手就能拿到，但她就是不肯伸手去拿，而要别人给她放在手里。说完，卫士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我们也都沉默了。

五大书记经常夜里办公，他们工作确实太累了。为了给中央领导同志增加点营养，后勤部门养了一头奶牛，挤点奶让领导同志喝。

我虽然不是负责主席生活的，但卫士们忙不过来的时候，我也去帮忙。有一次，我去帮助热奶，由于过去没干过，不懂得怎样做。我把奶锅放在火上，以为和烧开水一样，转身就去干别的事了。哪知回来一看，锅已经烧红了，可锅里的牛奶全不见了，只有一屋子的糊味，特别难闻。想到主席喝不上奶，我急得哭了。江青见了，对我大发脾气。主席问清了事情的原委，安慰我说："没什么，下次注意就行了。"

事后江青训斥我们几个工作人员："你们是为我和主席服务的。只要我们不高兴，就是你们工作没做好！"李银桥悄悄撇撇嘴。江青刚走开他便小声说："你和主席吵架也是我们工作没做好呀？"卫士张天义说："到主席那儿告她一状，准够她受的。"李银桥给压住了，他说："大决战已经开始了，你们别给主席添乱。"

韩桂馨：请老乡看戏

主席的房东为了给中央机关腾房子，一家人都搬到村子西头去住了。他们家的两个小男孩，一个七八岁，一个五六岁的样子，特别活泼好动，他们有时也过这边来玩，没有多长时间，跟银桥就熟了。

收完了大秋庄稼，农村就进入"农闲"季节了。有一天，恰是学校放假的礼拜天，小哥俩各背了个小篓子，到河边的小树林里拾柴禾搂草。哥儿俩干完了活，就坐在土坡上休息。弟弟眼尖，他看见从正东方向走过来一队人，有抬箱的，有背鼓的，一路上说说笑笑。他们认出了警卫团演出队的大老张，这位老张到村剧团教过戏，所以村里人都认得他。大老张也认识这小哥俩，他见小哥俩愣怔怔

地看着他们的锣鼓家伙，就高兴地说："这一次我们是和军区演出队联合演出，这次添了个新演员，就是石家庄唱梆子腔的名角儿——金钢钻儿。我们歇两天就演。快告诉乡亲们，有空来看戏吧！"

哥儿俩背上小篓，像插了翅膀似的一溜烟地跑了。

以前，逢年过节的，村里耍狮子、扭秧歌、舞龙灯什么的，都在村东头。如今中央五大书记及陈云、董老等十多家住进去，周围垒了道土坯墙，老乡们都称这儿为中央局大院。有一次，中央机关偶尔弄到一部电影片，就在中央局大院的小礼堂放了一场。由于礼堂太小，老乡们没法进来看。看电影是个稀罕事，看不上就有点意见呗。这事不知怎么让主席知道了，主席指示第二天在打谷场专为老乡们放一场。这以后就形成了惯例。

如今条件更好了，因为在柏树坡后的小东沟，临时又建起了一座中央大礼堂。虽说不如现代的剧场正规，但比起在打谷场看戏还是气派多了。

谁知，第一天开演的时候，大礼堂早早地就坐满了人。小哥俩和爷爷，还有许多老乡都没进去。欢快的锣鼓、悠扬的琴声、清脆的梆子，一阵阵从礼堂里传来，小哥儿俩心里怪痒痒的。

第二天一早，银桥按主席的吩咐，兜里揣着一沓子戏票，给没看上戏的老乡送去。他走到村西头，拐进了小哥儿俩的家，一看小家伙还满脸的不高兴，见银桥进来，故意撅着小嘴不理人了。银桥想逗逗他们，也不作声。到底是小弟弟憋不住了，他说："你今天又想借铁锹去劳动呀？"

"嗯。"银桥装得一本正经。

"不借啦。"很干脆。

“为什么？”

“我有意见。”

“啥意见？提吧。”

“昨天不让俺们看戏。”

“不借我铁锹可以，戏看不上咋办？”

“俺们去找毛主席！”小家伙斩钉截铁，态度坚决。

“毛主席开会去了，不在家。”

“那怎么办呢？”小家伙着急了。

银桥憋不住劲，扑哧一笑：“毛主席早起时告诉我了，让我把票发给西柏坡的乡亲们。”

小家伙一蹦老高：“真的呀？”

那天晚上，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刘少奇……都到礼堂里，和乡亲们一起观看了《木兰从军》。

由于领导同志的到来，从台上的演员到台下的观众，情绪都非常高涨。小哥儿俩觉得和毛主席一起看戏真是太幸福了，昨天的那点不满情绪早跑到九霄云外去了。

十一　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李银桥：终于咬碎了核桃

1948年9月8日到13日，毛泽东在机关小食堂里主持召开了一次重要的会议。到会的除政治局委员外，还有十几位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及华北、华东、中原和西北的党和军队主要负责人。这是日本投降以来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会议，因为在这以前，绝大多数中央委员都分散在各个解放区从事紧张的解放战争，交通十分困难，不可能举行这样的大会。

这次大会以“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为中心议题，实际就是对各战略区打大规模歼灭战下达了动员令，也就是为后来的三大战役及渡江作战下达了动员令。决议要求将一切可能和必须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和中央代表机关手中，加强中央的统一领导，为夺取全国政权创造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必要前提。

毛泽东与各战略区的主要领导都做了个别谈话。与邓小平同志谈话时，毛泽东注视着他说：“我们每年见一次面，每次见面都有很大变化。明年我们再见面时，应该有一个根本性的变化。”

邓小平说："毛主席、党中央高瞻远瞩。我回去和伯承同志研究一下，我们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主席给我们的任务，我想一定能够完成。"

周恩来在旁边说："你们的位置太重要了，要靠你们去消灭国民党蒋介石的命根子，消灭他的主力部队，还要去剿蒋介石的老窝呢。"

邓小平点头："希望这一天能早点到来。"

9月会议以后，毛泽东把极大精力投向东北战场，因为他心中筹划的几场大战首先在东北大规模地展开了。

本来五大书记分工，由毛泽东在周恩来协助下负责全国的军事指挥。但这一次毛泽东讲了话。他说："现在到了最后决战的阶段，仗要越打越大，都是关系全国全局的大仗。不要还是我一个人说了算，重大决策要集体研究决定。"

此后，书记处几乎天天都开会。

夜里通宵办公是毛泽东养成的习惯，不好改。毛泽东是为首的领袖，其他书记是围绕他的，要随着他改。转战陕北时，周恩来、任弼时都随他改成夜间办公的习惯。现在毛泽东要求集体办公开会，朱德和刘少奇也只好改变习惯。

朱德总司令多年来养成早睡早起的习惯，生活很有规律。每天晚10点洗澡睡觉，清晨起床散步打拳。现在生活习惯全打乱了。他当时已年过花甲，在五大书记中是年龄最大的一位。毛泽东担心他的身体，有时劝几句："总司令啊，你年龄大了，可以早一点回去休息。"

朱德摇头说："这么重大的事，我回去也睡不着。"

话是这么讲，连续开会毕竟太疲劳了，有时会开一半，他就打盹了。

有人想叫醒朱德，毛泽东轻轻摆手："不要叫了，让他休息一会儿，决定重大问题时再叫也不迟。"

朱德总司令醒后抱歉地说："哎呀，糟糕，睡着了！"

首长们都笑了。周恩来说："没关系，你休息一会儿，就能坚持到底了。"

毛泽东关切地说："咱们这一段会议多，为的是彻底打败蒋介石。事情多，又很重大，少数人做主不行，咱们一起打一段疲劳战。总司令开会时稍微休息一会儿，精力更充沛，这是一件好事嘛。"

任弼时同志患有高血压，过度紧张后就头晕，靠在躺椅上闭目养养神。有时大家也劝他早点回去休息，他连连摇手说："我比你们都年轻，你们坚持工作，我回去休息怎么行呢，我应该比你们多做点事情才对。"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身体都很好，精力始终很充沛。特别是周恩来，他是军委总参谋长，要协助毛泽东指挥作战，整夜不离毛泽东左右，白天还有外交、侨务、统战、新闻宣传等方面的大量事情需要他处理。他精力之旺盛、能力之强和办事效率之高都是惊人的。

战时紧张，每天晚上 8 点，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都准时来到毛泽东的办公室，首长的卫士们和警卫人员也都跟来。首长们在办公室里开上层办公会，我们这些卫士和警卫人员就在值班室开下层民主会。首长们谈论的是打大仗，打大城市，打前所未有的歼灭战。我们这些人整天议论的也是包围什么地方了、歼灭多少敌人了，等等。

辽沈战役开始，毛泽东决定打锦州。这个决心是不好下的。打

锦州就是摆出了关门打狗的态势，就是下决心用差不多同样的兵力一举吃掉敌人40余万大军。毛泽东面对的不但是国民党的几十万大军，还必须考虑林彪的意见。

林彪顾虑打锦州会被锦西和沈阳之敌合围攻击，使我军骑虎难下。他更多的是从东北这个战略区考虑问题，仗怎么好打就怎么打。自然是从北往南追着打容易得多。但毛泽东是从全国考虑问题，不能让关外的敌人跑入关内。他需要的不是一般胜仗，而是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

为此，毛泽东前后发电报十几封，说服林彪，严令林彪撤离长春，南下北宁线，强攻锦州，以便全歼东北之敌。

首长们对战争的部署是严格保密的，但对胜利的消息是不保密的，随时告诉全体机关人员，让大家一道分享胜利的欢乐。

毛泽东和周恩来在西柏坡

一天，毛泽东疲倦的脸上出现了笑容："蒋介石飞到沈阳了，这下子我们胜利就更有了把握。"

我怔住了，不明白怎么回事。

周恩来说："蒋介石到哪个地方，哪个地方的仗就好打。他历来就是瞎指挥。"

果然，没多久，那天晚上首长们还不曾开始办公，毛泽东便拿出一封电报大步走出屋。我以为有事，忙迎上去。

"锦州解放了！"毛泽东兴高采烈，站在台阶上对我说："锦州解放了！要使机关的同志们都知道，解放锦州这是一个大胜利！"

锦州解放，整个辽沈战役也就势如破竹。

沈阳解放那天，几位首长的老厨师在一起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毛泽东在大战之后有个习惯，就是吃碗红绕肉，要肥点的，来补补脑子。那天晚上还准备了米粉肉和酸菜炒肉丝，有滹沱河里的鱼，有警卫战士打来的斑鸠。

毛泽东抓起筷子，讲了一句："东北告捷，蒋介石完蛋的日子就不远了。"

我见毛泽东开始吃饭，就用手指指酒瓶，提醒首长们喝口酒庆祝胜利。可是周恩来摆了摆手，表示不喝。

饭后，首长和作战部的有关同志就又接着开会，研究淮海战役。

怪不得不喝酒呢。

淮海战役中，华东野战军在中原野战军的配合下，在徐州以东围歼了黄百韬兵团，击毙了黄百韬。我中原野战军在华东野战军配合下，在宿县西南围歼了黄维兵团，俘虏了黄维。华东野战军在中

原野战军的配合下，在永城东北围歼了杜聿明指挥的两个兵团，生俘了杜聿明。共歼敌 55.5 万人。

毛泽东说，淮海战役粟裕同志立了第一功。这是因为中央书记处在华北军区司令部所在地城南庄开会时，粟裕同志首先提出集中三个纵队兵力歼灭长江以北国民党的主力部队。毛泽东和书记处采纳了粟裕的意见，现在保证了淮海战役在很短时间里取得了彻底胜利。

淮海战役胜利后，毛泽东会见刘伯承和邓小平同志。

上午毛泽东一般不会客。刘邓首长是下午 4 点多钟来的。两位首长问我："主席干什么呢？"

我说："等你们呢。"说罢便领他们来到毛泽东的办公室。

毛泽东的卧室与办公室相通。刘邓首长在沙发上坐稳，我便出去沏茶。端茶水进屋时，刘伯承正在汇报淮海战役经过。他说的话我至今记得很清："淮海战役，我们像嘴里含了个核桃一样，咬也咬不碎，吞也吞不进去。"

邓小平政委说："打得坚决，也很残酷。"

刘伯承接着又说："最后到底还是咬碎了！"

那次谈话谈了两个多小时，毛泽东没留客人吃饭。来过那么多客人，只要是党内同志，他几乎从没留人吃过饭。他待客就是清茶一杯。

李银桥：一纸吓退十万敌军

1948 年 8 月，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率大军从北平、保定出发南进，扬言要夺回早已被我们解放了的石家庄，袭击党中

央和解放军总部所在地西柏坡。

北平以南至石家庄，我军从来没有主力部队，傅作义的骑兵部队又很有些名声，行动迅猛，形势顿时变得险峻。

周恩来派汪东兴和中央警卫团干部带两个步兵连和一个骑兵排赴东北方向行唐一带警戒，遇敌人进攻要坚决抵抗，掩护毛泽东和党中央安全转移；同时安排中央各机关开始准备疏散。

毛泽东仍然以主要精力对付东北之敌，对傅作义的袭击似乎根本没放在心上。当形势已经非常危急时，他叫我收起东北地图，备好纸笔。

“给他点颜色看看。”毛泽东拿起笔时，说了这么一句。

他为新华社写了一篇述评，命令电台要全文广播，马上广播。

毛泽东在述评里轻松幽默地警告敌方：我们已经有了充分准备，你来对你没有好处，你还是老实一点为好。

毛泽东又用尖锐辛辣的语气讥嘲：这里发生一个问题，究竟他们要不要北平？现在北平是这样的空虚，只有一个青年军 208 师在那里。通州也空了，平绥东段也只稀稀拉拉几个兵了。总之，整个蒋介石的北方战线，整个傅作义系统，大概只有几个月就要完蛋，他们却还在那里做石家庄的梦！……

述评广播之后，傅作义的兵一枪未放便惊惶地撤回北平。不久，连保定驻军也撤回了北平。

一纸书吓退傅作义的大军，毛泽东唱了一嗓子京剧《空城计》。他的湖南腔唱京剧很有些意思：“我正在城楼观山景，忽听得城外乱纷纷，旌旗招展空翻影，原来是司马发来的兵……”

唱罢，意犹未尽，又加了一段《三顾茅庐》中诸葛亮的唱段：

“我本是卧龙岗……”

在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形势下，基于爱祖国、爱民族的热忱，以保护北平 200 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和古都文物为重，傅作义将军接受了我党关于和平解放北平的条件。平津战役又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他提出一个请求：亲自拜见毛泽东。

中央同意了这个请求。

傅作义到达西柏坡招待所，受到周恩来欢迎。傅作义说：“我戎马半生，除抗日战争外，我是罪恶累累，罪该万死。今后我要在共产党领导下，立功赎罪，以求得人民宽恕。”

下午，毛泽东起床后，周恩来把傅作义的态度说了一遍。毛泽东很高兴，说：“我去看他。”

招待所在后沟，毛泽东乘吉普车来到后沟。傅作义在周恩来陪同下等候在门口。车刚停，傅作义将军连忙迈着大步迎上去，伸出两只手，一把握住了毛泽东的手。

“我有罪！”傅作义的第一句话这样说。

“你有功！”毛泽东第一句话却这样说：“谢谢你，你做了一件大好事。人民是永远不会忘掉你的！”

傅作义在国民党将领中是比较能打仗的一个。抗日战争中他与八路军相处很好，在敌后站住了脚。但日本投降后，他受蒋介石的重用提拔，大举进攻解放区，占领了不少地方。据说攻占张家口后，他夸口说：“如果中共在中国真能够取得胜利，我甘愿给毛泽东当个小小的秘书。”

这话传得很广。阎长林便问毛泽东：“主席，傅作义真是这么讲的吗？”

毛泽东笑道："当个秘书太小了，他还应当留在政府里做官。他对水利工作感兴趣，将来可以当个水利部长。"

毛泽东说话算数，傅作义后来真的当了水利部长。

从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到平津战役，历时 4 个多月。首长们一直在毛泽东那间不到 20 平米的办公室里度过，取得了三大战役的伟大胜利。

毛泽东喜欢篦头，他说是一种很好的按摩，可以促进血液循环，消除疲劳。他指挥三大战役时是 55 岁，身体极健，满头黑发，篦齿从头发间篦过，沙沙作响。

忽然我眼前闪了一下亮，仔细看，是一根白头发。

"哎呀，主席，你有白头发了。"我叫出声。

毛泽东眉梢动了动，没作声。

我小声问："拔下来吧。"

毛泽东停了停才说："拔吧。"

我小心翼翼挑出那根头发，捏紧了，猛地一揪，拿到眼前看看，连根拔出来了。

"主席，你看。"我将白发拿到毛泽东面前。毛泽东没有接，只是用眼睛凝望着。

"噢——"他轻轻呵出一声，用略带沙哑的声音慢慢道："白一根头发，胜了三大战役，值得。"

回来，我把这件事讲给韩桂馨听，小韩立刻叫起来："银桥，你好大胆，敢在主席头上拔毛。"

我无心和她逗，深深叹口气："唉，主席太辛苦了……"

十二　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李银桥：“进京赶考去”

1949 年 3 月 5 日到 13 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举行了七届二中全会。这次会议是在中国人民革命全国胜利的前夜召开的，是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

会议开幕的那天，毛泽东作了一个重要报告。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中，提出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取得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说明了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转移到城市；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以及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任务和主要途径。

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中，特别警告全党，全国革命胜利以后，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将成为我们所面临的主要危险。他说：“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员，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七届二中全会以后，西柏坡的中央机关便开始做进城的准备工作了。

有一天，毛泽东问我："银桥，要进城了，你准备得怎么样啊！"

"东西都收拾好了，随时可以行动。"我满有把握地回答说。

"这里呢？"毛泽东指了指我的太阳穴。见我不解其意，便又说："小心，不要中了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不要当李自成。"

我像听到警钟一样肃然了。

毛泽东十分重视李自成的教训，早在1944年，他就把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列为整风学习文件，要全党引以为鉴。

郭老的《甲申三百年祭》发表在1944年3月19日至22日的《新华日报》（重庆）上，是一篇史学论文。文中阐述的是明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攻入北京后，部分首领腐化、内部发生宗派斗争，最后导致彻底失败的过程。

现在全国胜利在即，中央机关要进城了，而且恰恰也是进北京，所以毛泽东又想起了李自成的历史教训。

1949年3月23日凌晨3点，毛泽东才上床睡觉。

"9点以前叫我起床。"临睡前，毛泽东吩咐道。

可是，周恩来怕毛泽东休息不好，去北平的路上太疲劳，直到10点钟才让我叫醒毛泽东。

"让你们9点以前叫我，为什么现在才叫呢？"毛泽东醒来后有点不高兴了。当得知是周恩来的吩咐时，他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要出发了，汽车马达已经轰鸣。

"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毛泽东几句诙谐的话，把几个领

导人都说笑了。

周恩来笑着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

"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毛泽东信心十足地上了汽车。

这是一支由11辆小汽车、10辆卡车组成的车队。走在最前面的是带路的小吉普，第二辆是毛泽东乘坐的中吉普。

沿途都是土路，尘土很大。我们不得不让毛泽东戴上了眼镜、口罩，还披上了大衣。

车子进入华北大平原，大家的情绪活跃起来，毛泽东的话也多了起来。

毛泽东在"进京赶考"的路上

"现在又是3月份，为什么老在3月份咱们有所行动呢？你们记得这几次行动的时间吗？你们说说。"毛泽东问我们。

"1947年3月18号撤离延安啊！"

"去年3月份呢？"

"去年3月22号，由陕西米脂县的杨家沟出发，向华北前进啊！"

“今天是3月23号，与去年3月22号只差一天，我们又出发向北平前进了。”毛泽东说，“三年三次大行动都是3月份。明年3月份应该解放全中国了。等全中国解放了，我们再也不搬家了。”最后一句，毛泽东说得特别认真，认真到带有几分稚气的程度，逗得全车人都笑了。

汽车经唐县淑阎村，住一夜，第二天到保定。听过河北省委书记林铁的汇报后，驱车到涿州住下。

3月25日凌晨2时，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一行，从涿州换乘火车，驶向北平。

看到北平的城墙，前来迎接的北平市市长叶剑英感叹地说：“过去在军调部工作时，到过北平。这一次比大家先到北平，感到和以前到北平可大不一样呵：心情不一样，环境不一样，所担负的工作也不一样。”

叶剑英的话勾起毛泽东的回忆和感慨：“三十年了！三十年前我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还不错，吃了不少苦头，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帮助下我才成了一个马列主义者。他是我真正的老师，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道在哪呢！”

往事历历在目。

那是1918年8月，毛泽东陪同去法国勤工俭学的湖南学生，从长沙来到北京。

毛泽东在北京唯一可靠的熟人便是杨昌济先生。他以前是湖南师范学校的伦理学教员，当时是国立北京大学的教授。身无分文的毛泽东请他帮助找工作，他就把毛泽东介绍给李大钊。李大钊当时

也是北京大学的教授，兼任图书馆主任。

李大钊给了毛泽东一份工作，做图书馆的助理员。这是一种临时性安插，月薪八块大洋（银元）已是不低了。生活费用有了保障。

当时的北京大学就在现在中国美术馆西的沙滩。毛泽东的工作室紧挨着李大钊的办公室。毛泽东在这里居留了五六个月。在这里，他爱上了杨昌济老师的女儿、十九岁的杨开慧。更重要的收获是开阔了眼界，从李大钊等先进分子那里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为他一生的革命征程奠定了方向。

火车停在清华园站。我们随毛泽东改乘汽车前往颐和园。

听说颐和园里本来住了一些和尚和工作人员。我们跟随毛泽东来到颐和园时，里面已经空空不见人影。

人全被社会部李克农部长派人清理出去了。他这是从安全的角度考虑的。因为北平刚解放，潜伏下来的国民党特务很多，破坏暗杀活动猖狂，不能不严加防范。

可是，人全清走了，毛泽东来到之后，要水没水，找饭没饭。下午还要去西苑机场举行入城式呢。毛泽东不禁发了脾气："你们搞什么名堂？先来的人都干什么吃去了？"

社会部的同志忙解释，清走人是为了安全。

毛泽东大声说："你蠢么！你把水全排干了，你那个鱼还讲什么安全？你安安全全干死在那里，饿死在那里吧！"

毛泽东讲的是真理。社会部的同志们还得到人民群众中去才能解决问题，跑到颐和园外面的饭馆买来米饭和三菜一汤。

毛泽东抓起筷子对我说："入城式你不要跟着去了，你去香山打前站，帮我安排吃住，不要再学他们那样干蠢事。"

韩桂馨：第一次乘火车

离出发的日子不远了，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党总支也向下传达了，大家在讨论的时候，都说进城后要继续革命，不要中了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但我们那时思想很单纯，把资产阶级糖衣炮弹仅认为是吃好的、穿好的。

有一天，几个警卫战士正在讨论大城市是个什么样子，大家七嘴八舌。有个战士说："听说大城市的人多，房子也多，不像咱们的小村子，那里的村子连成片了。"马上有人反驳："城里尽是楼房，就是平房也是一道街一道街的，那不是村。"又有人接上了话茬："听说城里的马路又宽又平，汽车特别多，进了城可要少出门，免得出车祸……"

"怎么这么热闹呀？是开会吧？"

原来是毛主席散步回来了。显然是大家七嘴八舌的争论吸引了主席的注意力，而且那个战士的话尾巴也让主席抓住了，他说：

"有人说进城后少出门，那不对。应当多见世面，这样才能长知识。"他问大家："还有什么想法？都可以说一说嘛。"

有个战士说："进城后，不能看太阳上下班，要看表按时间办事了，进城后要买一块表。"

有的同志说："进城后就要吃大米白面了，有点粗粮也行。这小米饭大概是不用吃了吧。我这些年吃小米饭实在是吃伤了，看到小米饭不吃就饱了。"

有人说："人家城市的人皮肤白，哪像咱们这么黑。"

毛主席听着，看大家说得差不多了，就严肃地说："这不是思想问题出来了吗？有了钱买块手表是可以的，那是为了掌握好时间。小米饭我们吃了那么多年，不要忘掉我们是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和美蒋反动派的。就是革命胜利了，进了大城市，也不是想吃什么就吃什么，要看到我们面前还有很多困难。"主席还说："我们进城后还要建立新中国政府，很多人会在政府里当官。但是不管当多么大的官，做什么样的工作，都是为人民服务，都是革命工作，都需要努力奋斗。可不要以为当官了，就不求上进，不愿再过艰苦的生活了，那样，就和李自成差不多了。我们是共产党人，要经过我们的努力奋斗，把我们的国家建成繁荣富强的新中国。"

陪同主席散步的银桥非常感慨，我听他念叨了这番话，忽然冲口说了一句："到了大城市，你会不会变心？""不会的！我要是变了心，也对不起毛主席。"

1949 年 3 月 23 日，天气很好。临近中午的时候，中央领导的 11 辆吉普车开始发动了。乡亲们里三层外三层的围着送行。我一看，各位首长的家属们都上了车，我和江青、李讷也都早早坐在指定的车上，等领导们来了就开车。不一会儿，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刘少奇、任弼时、陆定一、胡乔木、叶子龙等同志都来了。

毛主席和乡亲们挥手告别。当卫士给他打开车门时，他一只脚踏在地上，一脚蹬在踏板上，大手一挥说："走！赶考去！"他这动作就像定了格，永远清晰地留在我头脑里。

中央领导机关的吉普车队浩浩荡荡地开出了西柏坡，在山间公路上向着东北方向进发了，由于道路多半是土路，又坑坑洼洼的，汽车开得本来就不快，再加上车子开动时扬起的尘土很大，车子之间

也拉大距离放慢了速度。就是这样我们还是弄得满身满脸都是土。江青捂紧了帽子，戴上大口罩和眼镜，脖子上也围了围巾。虽然路上颠簸一点，大家心情还是很好的。半路上陆定一一家乘的吉普还翻到路边一次，车队停下等了一会儿。因此，第一天晚上还没到保定，在唐县住了一夜，第二天上午才开到保定。

保定当时是河北省委所在地，省委的同志们要向中央领导汇报工作，我们就去逛街。这儿虽说才解放了几个月，但店铺都开张营业，人们穿的也比山区人民好一些，姑娘媳妇们穿花衣服的挺多。在这里我听到了乡音，感到很亲切。

24 日下午，我们又从保定出发，路面也是时好时坏，当天傍晚到了涿州县城。领导宣布在涿州改乘火车去北京。

由于 8 年的抗日战争和 3 年解放战争，铁路破坏得很厉害，当时保定的火车还没有通，工人们正加紧修复。一见到铁路，我就有点紧张。因为抗战时期铁路就是“封锁线”的代名词。我参军时过铁路，都有武装护送，就这样我们的同伴还有受伤的。我想：那时过铁路都叫“穿过”铁路，是横着过，现在我们要坐火车，顺着铁路走，而且是去北平，这变化多大呀！

火车是什么样呀？坐火车什么滋味呀？我们年轻人在一起叽叽喳喳地议论、猜测，大家都很兴奋。

半夜两点多，我们上了火车。车厢里灯火通明，就像一间间大房子。里面有椅子，还有床铺。我带着李讷在指定的卧铺上安顿好，就这里看看，那里瞧瞧，觉得什么都挺新鲜。从陕北出来才一年，我们真的像毛主席所说“不但看到了火车，还坐上了火车”。这真是像做梦一样呀！

火车拉响了笛声，轰隆一下，又一下，慢慢启动了。“哎呀，这火车这么稳哪，一点也不颠得慌。”不知谁这么说了一句。可不是，刚坐了一天多吉普车，也颠得够呛了，坐在这稳稳当当的火车上可真舒服呀！

那时，火车可不像现在这么快，而且也经常停车。毛主席、周副主席他们根本就没休息，而是研究工作，听取叶剑英参谋长关于阅兵安排的汇报。

天渐渐亮了。我们都趴在窗户上向外望。有人说：“北平快到了。”果然我们看见了北平的城墙，大家都欢呼起来。

火车一声长鸣，慢慢停下了。我们在清华园下了火车。这时天已大亮了。

主席一行刚下火车，就见到了前来车站迎接的聂荣臻司令员、北平市委书记彭真、中央社会部长李克农等领导同志。他们一见面就非常亲热地互致问候。今天可真是值得高兴的日子，一夜未睡的主席、周副主席，丝毫没有疲倦的样子。大家分别乘上了前来接站的小卧车。

古老的京城没有遭受战火的破坏，一片祥和景象。小车直接开进了颐和园。下车后，我就跟着大家走。我这是第一次进公园，两只眼睛都不够使了。我真有点被这么大的公园吓住了，被公园的美景惊呆了。我从来也没想过竟有这么大这么美的公园。走了一会儿，就开始爬山了。在山坡上，大家不停地驻步观望，蜿蜒的长廊、宽阔的湖面、壮丽的楼阁，真是美不胜收。毛主席说：“以后这里要让群众进来，这里是人民的公园。”

我们被引进了一个宽大的四合院，这里叫益寿堂。北边的 5 间

房子，已腾出了一间临时做了会客厅。吃过饭，趁首长们休息，我们又去外面转了转。

园子很大，却没有游人。听说颐和园内本来住着不少和尚和公园的工作人员，为了安全，全被李克农部长给清理出去了。因北平刚刚解放，潜伏下来的国民党特务很多，为了防止特务的暗杀破坏，当时这样做也是有必要的。可是主席对这种做法不满，认为不应该把群众赶走。

在颐和园，我也听到了毛岸英的事迹。岸英在北平解放的第二天，也就是 1 月 31 日就陪同两个扫雷专家，带领华北军区的一个工兵排，作为中央机关的先遣队，首批进入北平。他们的任务是负责排除地雷、炸药，以保证水电畅通、房屋和桥梁安全，任务十分艰巨。3 月 24 日，刚刚端起碗准备吃晚饭的岸英，又接到电话，得知第二天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要进城，先在颐和园休息，并在景福阁宴请民主人士。时间紧迫、任务紧急。岸英放下碗，火速带队赶往颐和园。他们连续作战，把室内都一一做了彻底检查。这时天已放亮，围墙还没有来得及检查，由于围墙外还残留着一些敌军遗弃的地堡、火力点，不怕一万，只怕万一……但光绕围墙走一圈就是 18 公里啊，时间实在不够了。这时参加扫雷的一位同志向岸英建议：

“这样吧，我们分成 5 人一组，胳膊挽着胳膊，划分好方向，顺着大大小小的道路走一遍，宁可牺牲自己，也要保证毛主席和中央首长的安全。”

岸英毫不犹豫地采纳了这个建议，他和 4 名战士一起手挽手，以自己的身体去探雷、扫雷，以大无畏的精神向着死神挑战。死神退却了。听到这些，我非常佩服岸英的忠心和勇气。

李银桥：筹建中央人民政府

入城式结束后，毛泽东乘车来到香山，住进双清别墅。

双清别墅地处香山西南的山坡上，据说当年孙中山住过这里。院子比较大，院内有一排座北朝南的平房，房子高大漂亮，会客厅能坐二十多人。

院子里还有个泉水池，水池北边有一个六角形凉亭。池子南边，靠近山脚的地方，有个防空洞。这是在毛泽东到来之前，华北军区工兵部队特地来挖的。他们还在两个洞口分别刻上“毛主席万岁！”“朱总司令万岁！”

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都住在双清别墅北面的一个大院里。那个院子里房子多，所以住得也比较集中。两院之间只有二三百米远距离，有一条石头铺的路相连，各种车辆都可以通行。

毛泽东在香山双清别墅集中精力抓了两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指挥人民解放军继续前进，打过长江，打到南京去，解放全中国。

当时，以张治中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已经到了北平。毛泽东明确提出了谈判八项条件。国民党内主张和谈的人认为，可以承认这八条为谈判基础，但仍然讨价还价。幕后的蒋介石则加紧扩军，准备作战。

那段时间，毛泽东常常带着深沉的思考散步。他常常将他与首长们谈论的话题以及与民主人士讨论的问题拿出来问我。

一次，我跟在他身后散步。他忽然立住脚，回身望着我问："你敢相信蒋介石吗？"

"不相信！"我立刻回答。

"这就对了。"毛泽东点头，"这个人尽耍手腕，从来说话不算数！"

说罢，毛泽东继续散步，仍是带着深沉的思考。

毛泽东喜欢看京剧，不同时期喜欢点不同的戏看。那段时间，他喜欢看《霸王别姬》。看到西楚霸王项羽同他的虞姬生离死别一幕，毛泽东睫毛颤抖着，眼里湿漉漉的。回来路上，他对我说："不要学西楚霸王。我不要学，你也不要学，大家都不要学！"

他号召所有的领导干部都要看看《霸王别姬》。

还有一次，毛泽东睡不安稳，起来散步，眉头紧锁。我小心翼翼随在身后。走了很久，他用沉重的声音问我说："有人劝我们不要打过长江去，你说要不要打过长江去？"

"要！到手的胜利哪能不要，对国民党蒋介石还有什么好客气的！"

毛泽东以手抚我后背，点头说："还是我们的战士聪明哟！"

4 月 20 日，南京政府拒绝了中共的和平协定。4 月 21 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4 月 22 日下午，我服侍毛泽东起床。我军已经顺利渡江，毛泽东很高兴，边朝衣袖里伸胳膊边说："蒋介石想拖延时间，重整军队，卷土重来。他以为我们还是好欺骗呢，他可不知道我们也需要这段时间调动军队，修船造船呢。他在那边修防线，我们在这边架大炮，谁也没闲着。结果呢，他只落得个拖延时间、破坏和平协定的恶名，什么便宜也没沾上。我们利用夜色，利用炮火掩护，一下子就过去 30 万军队。他们的军队垮台了，我们的军队就要打到南京去了！"

捷报频传，毛泽东也睡得安稳。4 月 23 日下午，毛泽东起床后，来到凉亭里看报纸，是《人民日报》关于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的“号外”。摄影师徐肖冰、侯波夫妇给毛泽东拍了一张照。毛泽东站起身，看到我们几名工作人员便走出凉亭说：“解放南京了，不要我一个人高兴，大家都该高兴嘛。来，照相也要一起照。”

毛泽东与身边工作人员合影，左一为李银桥，右一为韩桂馨

就这样，毛泽东又同我们这些工作人员合了一张影。

为纪念南京解放这一历史性的胜利，毛泽东于 4 月写出了那首著名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钟山风雨起苍黄，
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
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

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

人间正道是沧桑。

这期间，毛泽东抓的第二件大事就是约会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领导人，约会无党派知名人士，讨论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中央人民政府。

毛泽东在周恩来陪同下，进城看望过张澜、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和陈叔通等。

以后，毛泽东又在双清别墅接待过张澜、李济深、沈钧儒、陈叔通、何香凝、马叙伦、柳亚子等先生。

毛泽东对党内的同志是不拘礼节的，但是对这些民主人士却十分亲切有礼，每次都是走出屋门在院子里等候，汽车一到便亲自走到汽车跟前，搀扶这些老先生们下车、上台阶。当时，这些民主革命的老前辈们见到毛泽东，都习惯做一个动作，竖起大拇指，轻轻晃动着夸耀毛泽东。那时听到的最多的话是“真伟大”，“最伟大的人物”，“真了不起”，“打遍全国无敌手的军事家”，“我们都是经历过几个朝代的人，没有哪一个朝代的人能跟毛泽东比”……

那时，毛泽东对这些夸耀的话总是表现出不安和谦虚。他曾对李济深说：“我们都是老朋友了，互相都了解，不要多夸奖。那样就不好相处了。”有一位知名人士是毛泽东的同乡，散步时追着毛泽东竖大拇指，侧仰着脸望着毛泽东说：“毛主席呀，你真伟大哪，真伟大！”毛泽东皱起眉头拂了一下手：“不要这个样子。我们是私交，这个样子不好么。”

毛泽东接见张澜之前，吩咐我说："张澜先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了不少贡献，在民主人士当中享有很高威望，我们要尊重老先生，你帮我找件好些的衣服换换。"

我在毛泽东的"存货"里翻了又翻，选了又选，竟挑不出一件不破或者没有补丁的衣服。这就是毛泽东进京时的全部家当——没有一件像样的新衣服。因为他说过进京赶考的话，我便诉苦说："主席，咱们真是穷秀才进京赶考了，一件好衣服都没有。"

毛泽东说："历来纨绔子弟考不出好成绩。安贫者能成事，嚼得菜根百事可做。我们会考出好成绩！"

我说："现在做衣服也来不及了，要不先找人借一件穿？"

"不要借了，补丁不要紧，整齐干净就行。张老先生是贤达之士，不会怪我们的。"

这样，毛泽东只好穿了补丁衣服见张澜。此后又穿这件衣服见了许多民主人士。看到客人们穿得都很好，唯独毛泽东是旧衣服，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我们共产党打了天下，共产党的主席竟连一件没有补丁的衣服都没有……

不过，我相信毛泽东的话，"我们会考出好成绩！"

在筹建中央人民政府的过程中，有一件事要特别提到的，就是毛泽东邀请宋庆龄北上共商国家大事。

1949 年 4 月，邓颖超受党中央的委托，携带毛泽东的亲笔信，和廖梦醒一道，专程赶到上海，邀请宋庆龄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毛泽东在信中满怀激情地告诉宋庆龄："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同筹。"并诚挚恳切地说："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

候，专程欢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驾莅平，以便就近请教，至祈勿却为盼！”字里行间洋溢着对宋庆龄的敬佩、信任和期待。

这封信给宋庆龄带来莫大的喜悦和鼓舞。她不顾身体不适，欣然同意北上，到北平来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8 月 28 日，当宋庆龄在邓颖超、廖梦醒的陪同下抵达北平时，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等党中央领导人早已在前门车站站台上迎候她。当晚，毛泽东设宴为宋庆龄洗尘，热烈欢迎她前来共商国家大事。毛泽东的信任和热忱，使宋庆龄深为感动。

毛泽东是很尊敬宋庆龄的，以后他到上海视察时，曾亲自到宋庆龄家里探望她。

宋庆龄也非常关心毛泽东等领导同志的健康，每次从上海来到北京都要亲自问候，并送些礼品。毛泽东有躺靠床栏办公的习惯。宋庆龄送给毛泽东一个长枕头，很大，花布条，没套子，很软和，像是鸭绒的。由宋庆龄的卫士长隋学芳交给我。毛泽东习惯了荞麦皮枕头，享受不了鸭绒枕头，摆了一段时间便收入储藏室了。

宋庆龄每年都要给毛泽东寄贺年片。1956 年元旦，毛泽东收到了宋庆龄寄来的贺年片，十分高兴，提笔给宋庆龄写了一封既生动有趣又热情洋溢的信。在信中，毛泽东亲切地称宋庆龄为“亲爱的大姐”，对她送来贺年片深表感谢。接着，毛泽东以幽默的口吻，关心而风趣地写道：“你好吗？睡眠尚好吧。我仍如旧，十分能吃，七分能睡。最近几年大概还不至于要见上帝，然而甚矣吾衰矣。望你好生保养身体。”短短数语，表达了毛泽东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对战友的诚挚情意。

十三　从双清别墅到菊香书屋

李银桥：长安大戏院的欢迎晚会

1949 年 4 月里的一天，戏剧界组织晚会，欢迎毛泽东及中共中央迁来北平。

“几点钟出发？”毛泽东问道。

“路不好走，在路上估计需要一个小时，我们 6 点半出发，就可以按时到达。”我答道。

毛泽东慢慢地踱着步子，若有所思地说：“看戏也是工作呵。梅兰芳这位戏剧界的名人可不简单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以后，他就留须隐居，再也不演戏了。他不顾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威逼利诱，罢歌罢舞。这位艺术家的民族气节是多么可贵呵！我们今天去看梅兰芳的演出，就是提倡这种民族感、正义感，号召人们向他学习。”

毛泽东乘车来到长安大戏院，朱德、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等领导人已经到了。毛泽东被安排在二楼正中间的一个包厢里。现在，环境已不允许他再当普通观众了。

这天晚上的压台戏是梅兰芳的《霸王别姬》。梅兰芳一出场，台

下就报以热烈的掌声。

54 岁的梅兰芳先生演的是虞姬，刘连荣先生演霸王项羽。两人都是京剧界名流，唱做俱佳，不断赢得观众的喝彩。

演出结束时，梅兰芳和全体演员出来谢幕，全场一阵暴风雨般的热烈掌声。毛泽东也使劲地鼓掌。

“是啊，这真是一次高水平的艺术表演！这些人都是新中国的戏剧家，在政治上将要有地位了，将要受人尊敬了。”毛泽东满怀信心地说，“新中国成立以后，肯定我国的戏剧能很好地发展起来，能够在新中国的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

回到双清别墅大院时，毛泽东说：“我再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明天晚上还在长安戏院看程砚秋先生演戏。”

接着，毛泽东又把程砚秋介绍了一番：“他和梅兰芳先生一样都是京剧界名流。他也是在抗日战争中隐居农村不给敌人演出。像这样有名望的艺人，我们不仅是看他的艺术表演，更重要的是尊敬他的民族气节和正义感，号召人们向他们学习。”

第二天晚饭后，又是 6 点半从香山乘车出发。

这天晚上，毛泽东还是坐在二楼正中的那个包厢里。

第一出演的是《法门寺》。程砚秋演的《荒山泪》，放在最后做压轴戏。整个演出过程中，毛泽东特别高兴，他跟观众一起，经常鼓掌，看到高兴处，也笑出声来。程砚秋演出时，他还不时地夸赞。

在参加了长安大戏院的京剧晚会之后，没过几天，叶剑英和彭真同志又为中央领导人安排了一场文艺晚会。他们希望借这个机会，让毛泽东和市委、市政府的工作人员见见面。

晚会在东交民巷的市委机关礼堂举行。最精采的节目是侯宝林

和郭启儒合说的相声《婚姻与迷信》。他们二人往台上一站，观众们就鼓起掌来。侯宝林的逗哏，逗得全场哈哈大笑，毛泽东也是笑声不断。薄一波笑声最大。

“侯宝林是个人才，是个语言研究家。”毛泽东边看边称赞。

彭真接上说：“侯宝林学艺很刻苦，他干好这一行，在这一方面很有研究，这真是行行出状元，他也是这一行的状元了。”

毛泽东点头表示赞成，又接着说：“这一行很好，能促使人们欢乐，能促使人们从反面中吸取教训，能促使人们鼓起革命的精神，做好工作……”

演出结束后，毛泽东等领导人还与侯宝林握了手，盛赞他的表演。

以后，侯宝林曾多次到中南海去说相声，常常逗得毛泽东大笑。

李银桥：政协筹备会

1949 年 5 月 1 日，毛泽东约柳亚子先生同游颐和园。当毛泽东乘坐的汽车来到颐和园东门时，柳亚子已在那里等候。

毛泽东一下汽车，就走到柳亚子面前，两人高兴地握手。

当时，百万雄师冲破长江天堑，解放了国民党政府的首府南京，人们正为此而兴奋、欢欣鼓舞。

“共产党伟大！毛主席伟大！人民解放军伟大！”柳亚子半举着拳头，兴奋地说。

“人民伟大！包括你，也包括我。”毛泽东立即接上。

两人边交谈着，边朝颐和园里走去。

看过大戏楼，游了谐趣园，又爬坡至益寿堂。

在益寿堂喝茶休息后，毛泽东提议说：“咱们今天都很高兴，走，游园去。”

“好，游园去。”

从益寿堂下来，直接进入了长廊。

柳亚子感叹：“慈禧太后腐败无能，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签定了许多不平等的条约，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和灾难。她把中国人民的血汗，搜刮起来，奉献给帝国主义，建造她的乐园，真可耻。”

毛泽东说：“她用建设海军的钱，建了一个颐和园，当时来说，这也是犯罪。现在看来，就是建立了海军，也还是要送给帝国主义的。建了颐和园，帝国主义拿不走，今天人民也可以享受，总比她们挥霍了要好呀。”

毛泽东与民主人士游览天坛公园

柳亚子被这种辩证的妙论折服了。

看了慈禧太后买的那个小火轮、石舫之后，登上游船，泛舟昆明湖。

船快到湖心时，

柳亚子又挑起了话题。他说："今天胜利了，这是我们盼望已久的。共产党要胜利，这是肯定的。共产党的路线和政策正确，合乎民意，人民拥护支持，这就是胜利的基础。但是，我们没有想到胜利会这么快，人民解放军很快渡江成功，并且占领了南京，我们不知道毛主席用的是什么妙计。"

毛泽东笑了笑说："打仗没有什么妙计，如果说有妙计的话，那就是知己知彼，根据实际情况，作出正确的决策。还有，就是先生说的，人民的支持是最大的妙计。一百万军队要渡江，又没有兵舰、轮船，如果没有人民的大力支持，是不能成功的。靠人民用土办法靠木船、木排划子，在漫长的江面上，几万只木船一齐出动，直奔对岸，加上我们有很多大炮掩护，很快就过去了三十万军队。你能说这是妙计吗？这是一般的常识。但是，像这样一个普通的常识，蒋介石是不知道的。他想的是长江天险，是美帝国主义的援助……"

游船绕过湖心岛，又穿过十七孔桥，在东岸靠岸。

毛泽东上岸后，与柳亚子一起步出大门。在门口握别后，毛泽东乘车回香山双清别墅。

自从住进双清别墅之后，毛泽东便开始进城办公了。作为临时休息的地方，毛泽东、周恩来来到中南海的菊香书屋。

北平解放后，住进菊香书屋的第一位中共领导人是林伯渠。当时，林伯渠住在北屋。毛泽东和周恩来就在东屋和南屋里临时休息。

临时进城主要是会见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负责人，召开一些小型座谈会，地点是在颐年堂。座谈的中心仍旧是广泛听取各界对召开新政协会议的意见。

毛泽东一般在下午进城，晚上 12 点多钟再返回香山住处。

为减少路途中来往的时间，7 月份，毛泽东从香山搬到中南海，住进了丰泽园里面的菊香书屋。

林伯渠从这座古老的四合院里搬出去了。

这是一个四方形的四合院，四面各有三间。北房三间，正中一间是门厅。江青就住在西头一间屋里，毛泽东住东头一间。北房高大，跨度大，很宽敞。在毛泽东住的那间房里，放一张大木板床，一套沙发，一张写字台和一些书，在中南海毛泽东故居保持了原样。只是西头那间屋，后来改做藏书室了。

东房三间，中间一间是门厅。毛泽东在这里吃饭，也是他全家的餐厅。毛泽东及来宾的衣服也挂在这里。靠北头的一间是办公室。书记处的五大书记经常在这里开会。靠南头的一间，是毛泽东的会客室。

南房三间，正中是穿堂，其余分别是毛岸青、李敏、李讷住的地方。

西房三间，正中一间是穿堂过道，也是当时从菊香书屋院里外出的主要通道。西房的南头那间，是江青的会客室，后来改为乒乓球室。北头那间，是毛泽东的书房。

菊香书屋四面房子形成一个封闭的小院。院内南北、东西两条小路交叉成十字形，把草坪对称分开，整个草坪又构成一个“田”字形状。几株百年松树，又使院里添几分幽雅。夏天，五大书记常在树下开会。

1949 年 6 月 5 日下午，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的大厅里开幕了。

勤政殿是一座古老的建筑。听说，这是过去的皇帝处理朝政和

休息的地方。它的规模很大，进了大门，通过一个小院子，就到了过厅。这个过厅约有 50 米长、10 米宽，是木板地，中间铺的是地毯，两边摆了许多名贵的鲜花、古物和工艺品。大厅有两三层楼高，是中南海里的最高建筑，在北海公园里景山公园都可以看到它。大厅里摆着一排一排的条桌和软椅，四周的大、中、小型会议室、宴会厅、卫生间也很配套。所以，新的政协的筹备会就选在这里举行。

那天，毛泽东穿了一身新做的灰蓝布衣服，手里拿着文件袋，走出菊香书屋院北门，来到了勤政殿。

毛泽东走进大厅，会场里的全体代表起立，热烈鼓掌。毛泽东在主席台前向大家招手、鼓掌。他先在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席位上坐下，大会通过主席团人选之后，毛泽东等会议领导人走上主席台入座。接着，会议秘书长林伯渠就请毛泽东讲话。

毛泽东在热烈的掌声中走到了麦克风前。他微笑着，向大家招手致意。

毛泽东高兴地说："我们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会今天开幕了。这个筹备会议的任务就是：完成各项必要的准备工作，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以便领导全国人民，以最快的速度肃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力量，统一全中国，有系统和有步骤地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国防的建设工作。全国人民希望我们这样做，我们就应当这样做。"

讲到这里，会场里响起了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

毛泽东在讲话中还说，全国人民拥护自己的人民解放军，取得了战争的胜利。这一次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是从 1946 年 7 月开始，到现在，业已三年多了。这一次战争是由国民党反动派在获得外国

帝国主义的援助之下发动的。国民党反动派背信弃义，撕毁了1946年1月停战协定和政治协商会议决议，发动了这一次反人民的国内战争。可是，仅仅三年时间，即已被英勇的人民解放军所打败。不久前，在国民党和平阴谋被揭穿以后，人民解放军即已奋勇前进，横渡长江。国民党反动派的都城南京，已被夺取，上海、杭州、南昌、武汉、西安已被解放。现在，人民解放军的各路野战军，正向南方和西北各省，举行着自有中国历史以来未曾有过的大进军。三个年头中，人民解放军共已消灭反动派的国民党军队559万人。截至目前为止，残余的国民党军，包括它的正规部队、非正规部队和后方军事机关学校在内，只有150万人左右了。肃清这一部分残余敌军，还需要一些时间，但已为期不远了。

全场又是一阵热烈的掌声。

毛泽东最后说，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

毛泽东在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上讲话

毛泽东讲完了

话，全体代表起立，以热烈的掌声向毛泽东表示敬意。

为了庆祝大会的胜利召开，当晚，全体代表在宴会厅会餐。吃的饭菜，都是北京饭店送来的。毛泽东高举酒杯，向全体代表敬酒，祝大会成功。他还特意走到几位老人跟前，向他们敬酒。

筹备会议从 6 月 15 日至 19 日，一共开了 5 天。会议通过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和《关于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规定》，选出了以毛泽东为主席的筹备会常务委员会。

连日来，毛泽东的心情特别好。

1949 年 9 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举行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制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选举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韩桂馨：双清别墅

双清别墅的主建筑是一排坐北朝南的平房，房间高大漂亮，室内光线充足。像中国所有老式建筑一样，这排房子的中间是正厅，用来作为主席的会客室，里面可以坐 20 个人左右。正厅的西面依次是办公室、卧室、卫生间，正厅的东面也是办公室、会客厅（较小一些）。过了会客厅就是小餐厅，有一个走廊将小餐厅与厨房连起来。主席的家属和孩子们，住在院子西面山坡上的平房里。院里还有些平房，就作为工作人员的办公室、会客室、储藏室和小厨房。

卫士值班室就在北门里，警卫班在东门外另一个院里住。

双清别墅院里，有许多古老的松柏，冬天能挡风，夏日能遮阳。

最妙的是院里有个泉水池，泉水清澈，大概有半个游泳池那样大。泉水边还有一个六角凉亭，正好对着大厅的门。

水池南边，靠近山脚，有一个新挖的防空洞，主席在西柏坡时，房后面百米处也有一个防空洞，那时主要是为了防空袭。可是这里防空洞的两个洞口处，刻上了两个口号，一个洞口刻着“毛主席万岁”，一个刻着“朱总司令万岁”。据说这是华北军区的工兵们在主席进城前赶着挖出来的，他们刻上标语表达自己对领袖热爱的心情。

天气转暖了，毛主席脱掉进城时穿的棉裤，又换上了那条旧毛裤。散步仍是他的一种习惯，他有时在院子里围着泉水池走走，有时信步走出门，在山路上转一转。总司令、周副主席、少奇、弼时他们住得不远，就在离主席住处 300 多米的大院子里，两处有汽车路相通。

毛泽东与家人，左起：毛泽东、江青、李讷、李云露、王博文

有一天，毛主席信步走到东门外警卫班的院子里。战士们见主席来了都很高兴，主席对战士们的工作、思想、身体也是处处关心。主席指着院子的空地说："这个院子很好，阳光这么充足，又有泉水流过。你们可以挖个游泳池，也可以开出一个足球场，还可以种地呀。"

主席这么一讲，大家商量开了。商量的结果还是认为种点菜合适。因为春天正是播种季节，而且大家知道主席喜欢吃辣椒和新鲜蔬菜，种点菜不但主席有辣椒吃，大家也可以把新鲜蔬菜当水果吃。夜里值勤如果饿了，摘俩西红柿；中午渴了，吃根黄瓜，多美呀。大家一经讨论决定，动手就干。

山上的石头很多，战士们翻了片地，施上底肥，到菜农那里买来秧苗种上。小苗喝了泉水，绿油油的。过了些日子，主席又同李讷一起散步来到东院，一看到菜地，高兴地说：

"我只几天不来，你们这里就大变样了。"

大家看主席这么喜欢，也纷纷谈了起来。有的说："这些辣椒是给主席种的，保证您永不缺辣子吃。"有的说："我们这么多秧苗，才花了不到 10 斤小米钱。"

主席连连点头，呵呵地笑着，他说：

"谢谢你们，这么干很好。俗话说，不劳动者不得食，我没有参加劳动，怎么能白吃呢。下次浇水时，我也来浇。我参加了劳动，以后吃的时候就理直气壮了，吃起来也就更香了。"

毛主席在双清别墅居住期间，主要处理两件大事：一是指挥百万雄师过大江，解放全中国；一是筹备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些引起天翻地覆的大事件，许多人已经写过了，我只记几件主席家中的小事。

主席对长子岸英是很喜爱的，这已众所周知，对次子岸青，主席也是同样疼爱，并寄予厚望的。我刚到主席身边工作时，就听说岸青已经从苏联回国了，暂住哈尔滨。主席把这一消息告诉了在晋绥解放区搞土改的岸英。1947 年 10 月 8 日，毛主席以欣喜的心情写道：

“告诉你，永寿回来了，到了哈尔滨。要进中学学中文，我已同意。这个孩子很久不见，很想见他。”

短短几句话，字字饱蘸了父亲的爱。

在苏联学习期间，岸青曾用杨永寿这个名字，岸英叫永福。他们在十年制学校里，都跳过级。毕业后，毛岸青考取了东方大学继续深造。他比岸英晚回国一年。

在香山的生活安定下来后，岸青就来了。岸青也是个子高大、英俊魁梧的人，脸型像父亲，宽宽的额头，方脸盘。也可能是生活不太习惯，也可能是语言不通，岸青比较沉默、腼腆，不太喜欢讲话。但他也喜欢小妹妹李讷，因为在苏联学习时，主席曾给岸青寄去两张李讷的剪纸，感情上有些联络。

岸青也像岸英那样叫我阿姨。我知道岸青脑子受过伤，也想在生活上多照顾他一点，但是他总坚持要“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有一天，我看他在洗衣服，舀了一大盆水，用搓板使劲搓，劲倒用了不小，但是肥皂沫和水却把两只袖子和衣服前襟都搞湿了。我心想：这个人哪，虽说在洗衣服，照这么干法，脏衣服没洗干净，那刚换的干净衣服倒弄脏了，还不如我给揉一把算了。于是我对他说：“岸青，我正要洗衣服，不如我帮你搓两把。”谁知他说：“爸爸跟我说的，要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不要麻烦别人。”

十多年不见的儿子，换了别人疼都疼不过来，但主席也像对岸

英那样严格要求岸青。

新中国成立后，岸青曾在中宣部马列著作编译所从事翻译工作，参加翻译了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等五六本书。不幸的是，哥哥的牺牲对他刺激太大，加上他脑部旧伤，种种打击使他身患重病。他先在北京医院治疗，后去大连疗养。

主席对岸青的病情非常关心，不断写信去询问，并安慰他，劝他安心治疗，与医护人员配合，不要自己改治疗方案。

1960 年岸青的病有了很大的好转。他的嫂嫂思齐和她的妹妹邵华一起去探望他，给了他很大安慰。以后岸青和邵华经常通信，建立了感情，1962 年喜结良缘。现在毛岸青已经离休在家，每日读俄文，学英语，弹弹琴，下下棋。一家人的日子过得安宁又幸福。

韩桂馨：主席有个“洋女儿”

1949 年 5 月，江青要去苏联治病，也把李讷带去了，因为李讷扁桃腺总发炎，这次到苏联打算把扁桃腺割了，以求根治。

李讷走后不久，有一天，银桥对我说：“过些日子主席的大女儿娇娇也要到这里来，跟主席一起生活。李讷生活的事以后让她姨多管点儿，你主要照顾娇娇吧。”

接到这个任务后，我就想法了解一些娇娇的情况。

原来娇娇是个吃了不少苦的孩子。她 1936 年生于陕西保安的窑洞里。她的生母是贺子珍，怀上娇娇时已是在长征受伤之后，那时母亲身体不好，生活条件又差，娇娇出世时又瘦又小。邓颖超、康克清、刘英、钟月林等一起长征的女红军来看贺子珍，发现孩子不断地

哭。邓大姐抱起了婴儿，顿时产生一种怜惜之情，她说：“真是个小娇娇呀！”后来大家都叫她“娇娇”，叫习惯了，就喊她“娇娇”了。

娇娇一岁时，贺子珍离开了毛主席，远走苏联。为了安慰贺子珍，1940 年主席把娇娇送到莫斯科，让她和妈妈一起生活。在苏联卫国战争期间，物质极度匮乏，生活苦不堪言。娇娇与妈妈及两个哥哥（岸英、岸青）相依为命，度过了难关。有一次娇娇患了肺炎，医院已经认为没法救了，只等送太平间时，贺子珍变卖了自己的所有东西，换回了牛奶和白糖，一口口喂娇娇，硬是把她从死神手里夺了回来。

在苏联生活的那几年，正是娇娇开始懂事的时候，她心中只有妈妈，没有爸爸，她离开爸爸时确实太小了。

在苏联国际儿童院的礼堂里，挂着各国共产党领袖的巨幅照片，其中有列宁、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加里宁、毛泽东和朱德。老师们经常对孩子们进行国际主义教育，讲述各国共产党领袖的革命业绩，娇娇是以崇敬的心情上这些课的。有一次，岸青特地到国际儿童院看妹妹，并给妹妹带了糖，兄妹俩在礼堂里坐着聊天。突然，岸青指着主席台上的毛泽东照片，问娇娇：

“你知道他是谁吗？”

“是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

“他就是我们的爸爸。”

毛泽东的大女儿李敏

“你瞎说，我没有爸爸。”

“我没瞎说，是他送我们来苏联学习的。”

娇娇看哥哥严肃的样子，也相信了。但她还是觉得这太遥远了，只得再去问妈妈。

从妈妈简略的叙述中，娇娇知道了：自己的爸爸在中国，正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着轰轰烈烈的解放战争。

她慢慢地了解爸爸了，也很想见到爸爸。

贺子珍的胞妹叫贺怡，她是主席的小弟弟毛泽覃的妻子。贺怡带着主席的重托，到哈尔滨接娇娇。她已经走了好几天了，怎么还不回来呢？正在我纳闷时，娇娇来信了。

信是写给主席的，信封上的毛笔字非常清秀。当主席拆开信之后，却皱起了眉头：原来上面都是俄文，一串串的字母，像淘气的孩子在跳舞。显然封面的字是贺子珍写的了。主席找人把娇娇的信翻译出来，原来是小家伙自己来找爸爸核实情况，她的信是这样写的：

毛主席：

大家都说您是我的亲爸爸，我是您的亲生女儿，但是，我在苏联没有见过您，也不清楚这回事。到底您是不是我的亲爸爸，我是不是您的亲生女儿？请赶快来信告诉我。这样，我才好回到您的身边。

娇娇

主席提笔写了回信：

娇娇：看到了你的来信很高兴。

你是我亲生女儿，我是你的亲生父亲。你去苏联十多年一直未见过面，你一定长大长高了吧？爸爸想念你，也很喜欢你，希望赶快回到爸爸身边来。爸爸已请贺怡同志专程去东北接你了。爸爸欢迎你来。

毛泽东

回信写完以后，秘书正想发出去，主席又改变了主意，吩咐有关同志将此信用加急电报发出去。主席也是望女心切啊！

娇娇听母亲一句一句念完父亲的电报，高兴得跳起来："啊！我爸爸来电报了！我要到北平见爸爸啦！"

贺怡带着娇娇一路风尘仆仆地来了。听到娇娇已到的通报后，毛主席连忙走出自己的办公室，站在院里，老远就和贺怡打招呼，与她同去的还有阎长林同志。我也站在一边，悄悄地看这一幕父女重逢的喜悦场面。娇娇仰头望着主席，亲热地叫了声"爸爸"，似乎没有更多的话要说，也可能不知从哪里说起。这时，还是主席的幽默打破了僵局，他说：

"你怎么知道我是你的爸爸？"

"你怎么知道我是娇娇？"

"我有你的相片呢。"主席确实接到过贺子珍从哈尔滨寄来的娇娇的照片。

娇娇呢？只会说几句常用汉语，却熟练地说着俄语。虽然不能尽情地用语言交流，但父女亲情却溢于言表。那天娇娇穿着花裙，戴了一顶遮阳帽，13 岁的女孩，已出落得很漂亮了，细挑的身材，白

净的皮肤，可能像母亲，但那五官有点像父亲。

我们都为主席高兴。

当天晚上，主席约请了几位中央领导，他乐滋滋地对大家说：

“我给你们带来了个洋宝贝。”

大家正在猜测是什么洋宝贝时，只见贺怡领着娇娇进了客厅。主席指着娇娇说：“洋宝贝来了，我有个外国女儿，喏，这就是。”接着把娇娇一一介绍给客人。娇娇半懂不懂地听着客人的谈论。当客人们向她问话时，她急了，汉语本来就不熟练，客人们又带点口音，娇娇弄不清到底都问了什么问题，即使弄懂了，也一时想不出怎么表达，情急之下，她说了一串俄语。毛主席拉着娇娇的手，放声大笑，他说：“英文嘛，我倒会一点，俄文我是一窍不通。恩来在就好了，他会。”

首长们这个拉拉她的手，摸摸她的头，那个拍拍她的肩，亲亲她的脸蛋，热闹了一阵陆续告辞了。

娇娇的到来，给了主席很大慰藉。主席经常牵着她的手到香山公园散步，慢慢和娇娇进行交谈，问她在苏联的生活和学习情况。娇娇真是聪明过人，她的语言能力进步飞快，父女能够自如地交谈了。主席勉励娇娇，要好好学习，做一个有作为的人。

有一天娇娇趴在桌上练毛笔字，专心致志的，连我喊她去洗澡也没听见。

我走过去，问她：

“写什么呢？”

娇娇不好意思地看了看自己写的字，我顺着她的目光，看到纸上写了大大小小的“李敏”两个字。我不禁问她：

“谁是李敏？”

“我呀！这是爸爸给我取的大名。”

娇娇在苏联上完了小学，主席打算送她读中学。那天，主席在晚饭后没有马上去办公，她把娇娇叫到身边，对她说：“娇娇，你就要上中学了，爸爸给你取个正式名字好吗？”

“爸爸，我不是有名字吗？我叫毛娇娇。”

主席笑着说：“那是你刚出生时取的小名，现在长大了，该取个大名了。”他见女儿不反对，就说：“那我就给你取个有意义的名字吧。”

主席随手翻开了一本线装书《论语》，指着《里仁》篇中的一句话，念出声来：

“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主席见娇娇一副茫然不解的样子，就伸手从桌上拿本《辞源》，翻了翻，指着“敏”字给娇娇讲：

“敏，有好几种解释，如敏捷、聪慧、勤勉等等。中国有好多成语或诗歌中用这个敏字，像‘敏而好学，不耻下问’、‘聪敏通达’、‘灵敏迅速’。”主席灿然一笑，随口吟出一诗：“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

娇娇听得入了神，她觉得爸爸特别有学问，同时对学习汉语也有了兴趣，认为是件很有意思的事了。

“好吧，我就用这个‘敏’字。我就叫毛敏吧。”

“你的名字叫敏，但不一定叫毛敏，也可以叫李敏。”

“为什么？大哥叫毛岸英，二哥叫毛岸青，我为什么不能跟爸爸姓毛？”

主席用手拍拍娇娇的头：“娇娇，爸爸姓毛，这是不错的。但为

了革命工作的需要，我还用过别的名字，在这些名字里，爸爸最喜欢李得胜这个名字。”

“那你给我讲讲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吧。”

主席讲了转战陕北时，中央的一个纵队几百人牵着胡宗南20万大军的鼻子在大山中“转九曲”。当时为了保密，毛主席用了李得胜的化名。现在胜利了，但主席对那段生活还是很留恋的，尤其是对陕北人民，很有感情。

父亲传奇般的战斗经历，引起了娇娇更大的兴趣。现在她明白了，爸爸给她取名的用意，是勉励她继承革命事业，将来能够成为对人民“敏于行”的有用之材。

韩桂馨：菊香书屋

主席在香山双清别墅住下不久，就开始进城办公了。那时，他一般要下午起床后进城，晚上12点左右回来，夜里还要看文件，早晨才能入睡。

为了照顾主席的身体，减少路上往返时间，再加上工作越来越忙，9月份主席就搬进中南海丰泽园里面的“菊香书屋”居住了。我因为分娩，在北京医院生下大儿子后，又在香山住了两个多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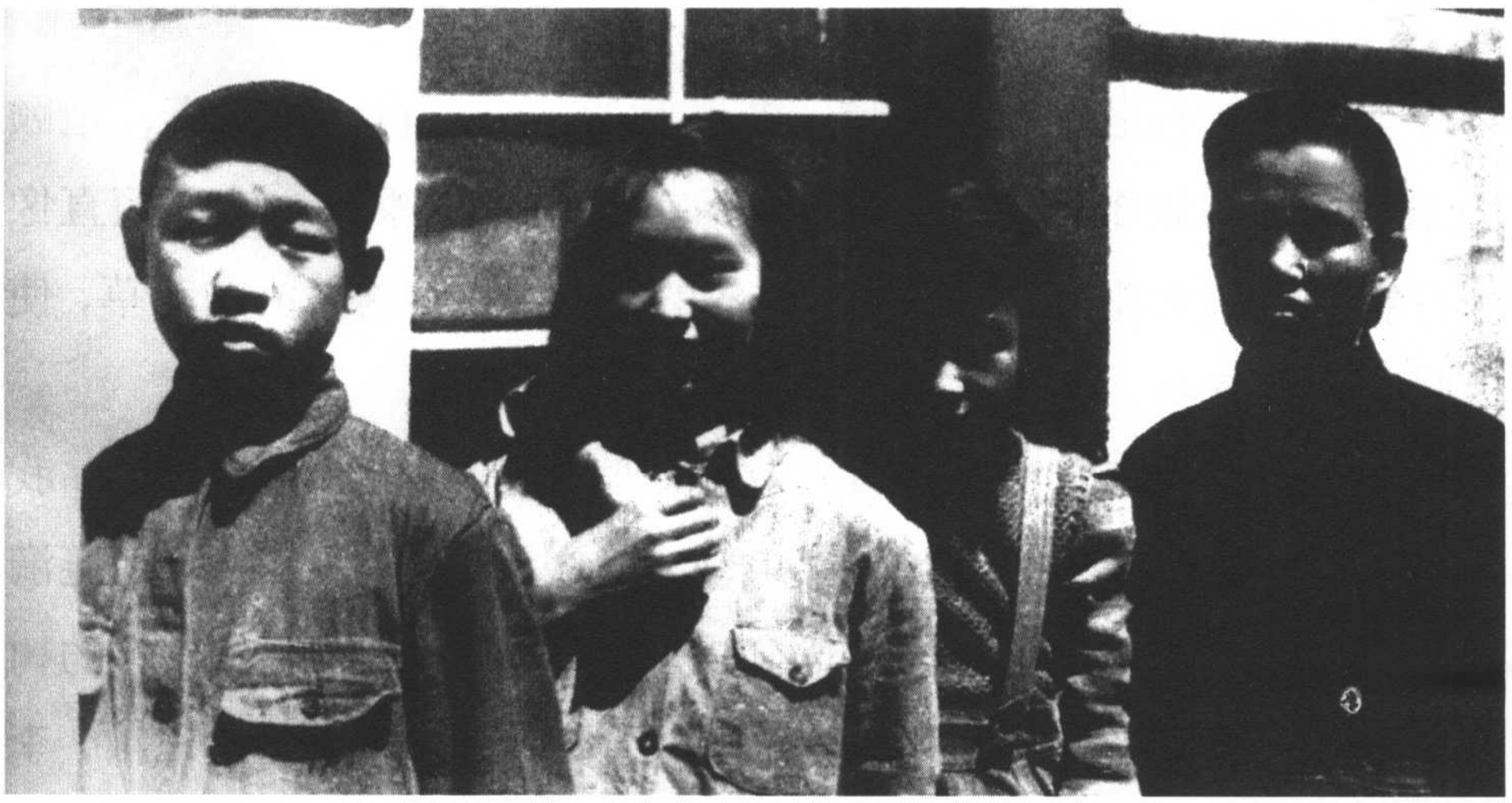
丰泽园在南海的岸边，除勤政殿、政事堂之外，丰泽园几乎是整个南海北岸主要建筑群的南大门，棕黑漆底、金色大字的一块横匾挂在两扇大门的上方，“丰泽园”三个字浑圆清秀，也很有气势，这是乾隆皇帝的御笔。

毛主席的住所从丰泽园进去往右走，也是一个四合院。挂着“菊

香书屋”四个字匾额的是一个过厅，这是主席院里西厢房的中间一间，南北两间都与过厅隔开了，北边的一间是主席的藏书室，名副其实的书屋，只是没有菊花罢了。南侧还有一间，一度江青用来会客，后改为乒乓球室。

通过菊香书屋，就进了一个四合院，南北向稍长，是一个长方形四合院。北房是正厅，一排 5 间，过厅上也挂着一块匾，上书“紫云轩”三个字，因此有人也称主席是“紫云轩主人”。这北房也是一明两暗的形式，中间是过厅，东侧两间是通着的，里面很突出的是主席的大床，有半床都是书，瞻仰主席故居看到的，基本维持了原样。北房西侧的两间隔开了，靠过厅的一间曾作为江青的卧室，但她很少住，很快她就搬到南屋东侧的两间去住了。里面的一间与西厢房相通，也摆满了书柜。

四合院的南房也是 5 间，李敏、李讷长大后住过西侧。东厢房又是 5 间，中间是过厅，也做餐厅，北边两间作为主席办公室，中



1949 年在香山，左起：王博文、韩桂馨、李讷、李云露

央领导同志开会就常在这里。东厢房的南侧是会客室。

穿过院子的南房过厅，又是一个院子。这里住的主要是主席亲属，有江青的姐姐李云露，女儿李敏、李讷、大儿子毛岸英、儿媳刘思齐、二儿子毛岸青、江青的外甥王博文，后来又来了主席的侄子毛远新。真是个大家庭呢。

我的孩子 3 个月时，就把他送到了老家，这是我离家后第一次回去。家里帮我找了个奶妈照看儿子。安顿好后，我也来到中南海。我和银桥就住在菊香书屋的东面。主席院里的东北角有条通道，那里通卫士值班室。和卫士值班室隔着一堵墙，有一个小门可以到我们的家。我们住的也是平房，一溜 5 间，两间是储藏室，我们住两间，还有一间住着卫士张仙鹏，张结婚后还住了一段时间。

毛主席还未正式搬到中南海以前，进城开会或会见民主人士一般在颐年堂。颐年堂离菊香书屋很近，主席和周副主席也常来菊香书屋休息。当时因北房里住着林伯渠一家，他们就分别住东屋和南屋。自主席搬来后，林老一家就搬到别的院子去了。

为了布置会场和美化环境，花匠师傅使出了自己的本事，把颐年堂和菊香书屋布置得特别漂亮。在鲜花盛开的季节，这里简直像个百花争艳的大花园。特别是在炎热的夏季，看到这美丽的花草，使人顿觉神清气爽，仿佛暑热也被赶跑了。

主席休息时喜欢到南海边去散步，偶尔也划划船。刚进城时，我们不知道主席会游泳，只知道他喜欢到水边休息、散步。波光涟漪的湖水，确实令人赏心悦目。对于长久用眼的主席来说，绿色的树木、碧蓝的湖水，对他消除疲劳也确实有益。学校还没开学以前，李敏也常跟着父亲散步。

有一天，主席从湖边散步回来，面对着院里的鲜花对阎长林说：你叫人把这些花都搬开。当时大家都不明白主席的意思，以为他不喜欢花，但主席的一席话却使大家心悦诚服地去执行这一任务了。主席说：

“过去，这里是公共场所，由他们随意布置，我们不干涉。可现在我住在这里，就不要摆这么多的花了，少摆几盆花，再摆一点松柏树就可以了。你们知道，到我这里来的人很多，以后还会有工人、农民的代表来。他们来了，就是为了看看我，看看我住的地方。如果我这里摆了那么多漂亮的花，那他们也会上行下效，向我看齐，养成这种风气就不好了。”

警卫员和卫士们忙活了好长时间，把花一盆一盆地搬出去，送到花房。在花匠师傅的帮助下，挑选了两盆棕树、两盆无花果，又在窗台上摆上了两盆绿草。这样院里既不显得空阔，也不像原来那么花哨，很适合这里的环境和主席的身份。主席对这样的布置很满意。他说：“这不是很好嘛，我不是不喜欢花，摆得太多了不大合适。”

以我们现在的观点来看，古代建筑虽壮丽辉煌，但住在里面未必舒服。主席刚搬到中南海时，也遇到过这种问题。

首先是感到屋里光线较暗，因为老式建筑的房檐较大，窗棂多，窗子小；院里的房子多，树木也挡光。工作人员给主席配上台灯，也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过去菊香书屋的房间都没有暖气，冬天取暖靠老式的地炉子，地道都是通的。但因年久失修，主席搬过来时，地道都堵了，要修复也要费时费工，即使修好了，也不一定适用。行政处准备为主席安装锅炉和暖气片，解决热水和取暖的问题。但主席搬进来时是大热天，取暖问题还是次要的，当时感到最不方便的是上厕所难。

因为在毛主席办公室附近都没有厕所，要去厕所，就要到后院去，要走很长的一段路。主席经常在这里召开会议，有时客人来了要去趟厕所也很不方便。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修缮队的同志到主席院里查看了一遍，决定在主席办公室后窗外，按卫生间的要求，盖个平房，等设备装修完毕后，再把主席办公室打通。这样既解决了问题，也不会干扰主席办公。由于这是件突击任务，再加上又是为主席办事，工作进展极快，没几天一个卫生间搞起来了。有一天上午，趁主席睡觉时，又打通了办公室的墙，安上个门，工作很快就完成了。主席起床后走到办公室，见到了这个变化，他非常高兴，还表扬大家想出了这个好办法，并感谢修缮队的同志们。

毛主席在陕北的时候，腿就有点疼，那是长期劳累加上受寒的原因。但那时没有条件，宿营的时候，卫士就用个木桶，烧好热水让主席泡一泡脚。在西柏坡时主席洗澡还是用的大澡盆。现在有了卫生间，条件确实改善多了。后来又盖起一个小锅炉，热水龙头一开，更方便了。主席对卫士们说：

“以前，我每次擦澡，都是你们给我用脸盆端水。擦完了澡，还得请你们帮我把水一盆一盆端出去倒掉，真是麻烦你们了。现在可好了，已经是自动化了。”

丰泽园的大门和外边的门柱油漆脱落了不少，有的柱角剥蚀严重，连麻皮都露出来了。行政部门准备修一下。有一天，毛主席看到工人们正在搭架子时，立刻叫来警卫排长阎长林同志，对他说：“你告诉行政部门的领导，这里现在不需要刷油漆，过几年再修理吧。我住的地方不要和公共场所一样花那么多钱，搞那么漂亮。这样就很好了。”

直到我离开主席身边时，他仍是这样，要求大家要保持艰苦奋

斗的作风。银桥说，1961 年主席外出时，后勤部门派人来菊香书屋做了较彻底的维修工作，主席回来后发了脾气，搬出去住在游泳池的休息室里去了。

十四　开国大典

李银桥：凌晨六点他仍伏案工作

1949 年 10 月 1 日清晨 6 点，周恩来已经是第 3 次把电话打到我们卫士值班室。

“主席睡觉了吗？”

“还没有啊。”

“你们要催促他休息么，下午 2 点还要开会，3 点钟还要上天安门，你们要想办法劝他早些休息。”

我走进毛泽东办公室，屋子里烟味不小。毛泽东仍在伏案办公。

“主席，休息吧。”我小声劝着，把周恩来讲的话报告给他。

毛泽东不作声，继续看着写着。直到写完，才立起身，走到院子里散步。

这是睡觉前的活动。10 分钟后，他说：“银桥，我睡觉吧。”

我服侍他洗澡，上床。那天没有替他按摩。他说：“没事了，你去吧。下午 1 点钟叫我起床。”

我退出来，在值班室坐守。毛泽东床头有电铃按钮，直通值班室。值班室有桌椅，有个床铺。卫士值班分正班副班两名。正班负

责毛泽东的休息，通宵不能睡觉。副班负责江青的休息，晚上可以睡觉。

那天我是正班，一上午没敢合眼。毛泽东虽然破例早睡，但凭我的经验推测，他不会很早入睡的，辗转反侧，思绪不断，很可能到午前才能入睡。所以，我不能等他按铃召唤，须主动去叫醒他。误了开国大典可是“历史性错误”。

下午 1 点，电铃没响，我就径直走进毛泽东卧室。

“主席，主席。”我叫了两声。

“嗯？”毛泽东睁开眼，看见了我。“嗯！”他又哼一声，发出声响地做了一个深呼吸。

“1 点了。”我将毛毯搭在床栏上，枕头垫在毯子下，扶他依栏而坐。

我将一杯热茶放在床头柜上，他左手端茶呷一口，右手照例一伸，抓起放在床上的报纸，浏览起来。

毛泽东历来起床后都不会马上下地，总要在床上呆一个小时左右，喝茶读书。今天要参加开国大典，他也不改这一习惯。

我轻手轻脚地为他准备参加盛典的“礼服”。

这是一套中山制服。料子是生活秘书叶子龙送来的黄色美国将校呢。我拿到王府井请王子清师傅做的。王子清从法国留学回来，专门剪裁服装。他工作的那个服装店就是王府井雷蒙服装店的前身。毛泽东和江青的衣服都是由王子清师傅裁剪缝制，我也曾带李敏、李讷去那里做过衣服。

“主席，1 点半了。”我卡着时间，打断他读报，将这套专为参加开国大典缝制的制服帮他穿好，然后照顾他下地。我围绕他转着打量，将衣服抻平理顺，请他去吃饭。

毛泽东吃饭很快，不一会儿便放了筷子。稍事休息，2 点钟步行至勤政殿。

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张澜、李济深、宋庆龄等国家领导人已在这里集合，他们召开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委员们宣布就职，并宣布中央人民政府即于本日成立。

会后，大家都很兴奋，愉快地交谈起来。

2 点 50 分，领导人分别上车，车队从勤政殿的门口出发，出中南海东门，5 分钟后便到天安门城楼的后边。大家互相招呼着集合好，毛泽东在前，其他领导人顺序跟上。

那时，没有电梯，我便搀扶毛泽东从城楼西头的楼梯，一步一级上了一百个台阶，登上了天安门。途中，毛泽东不时停下来，等后边年纪比他更大的领导人。3 点钟，准时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我听到广播员激动的喊声：

“毛主席来啦！毛主席健步登上天安门城楼！”

那时的天安门广场是个十字形，东西从太庙到中山公园，南北从中华门到天安门的一个大十字，可容纳 20 万到 30 万人。从天安门城楼上远远望去，无数面翻卷的红旗汇成一片波浪起伏的大海。红旗下面，一片片穿了各种颜色服装的队伍五彩缤纷，像精工规划的花圃。天安门城楼下，金水桥两边搭起两座台：一座是指挥台，一座是苏联代表的观礼台。

李银桥：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

林伯渠秘书长宣布大典开始。毛泽东走到麦克风前，庄严宣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刹那间，广场上欢声如雷，呼声如潮，与城楼上互相呼应。毛泽东这时的表情庄严神圣，按照预定程序，他按动装在城楼上的电钮，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面五星红旗升了起来。

毛泽东望着广场上徐徐升起的五星红旗，情不自禁地大声喊了一句：“升得好！”

话音才落，礼炮在军乐声中惊天动地地鸣响了。那是由 54 尊大炮同时发出 28 响，将那伟大、庄严、团结的气氛推向了高峰。据说 54 尊大炮代表了全国 54 个民族（现为 56 个），象征全国各族人民坚如钢铁的团结力量。那 28 响则代表 28 年，即中国共产党从 1921 年诞生，领导全国人民经过 28 年奋斗，到 1949 年终于建立了新中国。

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

礼炮响过，毛泽东向全世界宣读了政府第一号公告，明确指出中央人民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它愿意与任何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外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

接着，阅兵式开始了，由朱德担任检阅司令员，聂荣臻担任总指挥。

朱总司令驱车检阅各兵种部队以后，回到天安门城楼上，下达阅兵令。他的左右站了 4 位野战军将领：贺龙、刘伯承、陈毅、罗荣桓。受阅部队由聂荣臻站在指挥车上率领，4 个师的部队以连为单位列成方阵，从东向西入场。步兵、骑兵、坦克、大炮、汽车，都是比齐了一字形，在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的军乐声中，一阵接一阵由主席台前的金水桥边走过。

由十几架飞机组成的编队飞临上空时，30 万人的广场沸腾了。人们挥动帽子、手帕，一个劲儿地欢呼、跳跃。

阅兵式进行 3 个小时，直到黄昏。天安门广场上忽地一下子灯火齐亮，花炮竞响。在热烈的气氛中，欢呼的群众开始游行。当群众队伍经过天安门时，都高兴得手舞足蹈，呼喊声一阵高过一阵：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毛主席万岁！”

毛泽东已经站了好几个小时，周恩来再三劝说让他休息一下，他才走进休息室坐下来，一边吸烟一边跟程潜先生交谈。可是，周恩来又走进来了，说：“主席，游行的群众看不见你了，他们都停下来不肯前进了。看来你还得站下去。”

毛泽东起身说：“好吧，疲劳也得去啊！”他把香烟熄在烟缸中，向程潜先生抱歉地笑了笑，又回到主席台上。

晚上，城楼下遍地点起灯笼，紫红、大红、桃红、金黄、橙黄、明黄……像人民的希望在广场上跳跃闪烁。群众举着灯笼蜿蜿蜒蜒，交互环绕，就像一幅巨大无比的活动起来的织锦。歌声口号声海潮一样起伏不停，最响亮的声音始终是“毛主席万岁！”

面对群众的欢呼，毛泽东脸上始终焕发着庄严慈祥的光辉。服务员搬来一张椅子，我请毛泽东坐下，他不肯坐。从午后 3 点到晚上 10 点（除吃饭外），始终与人民在一起，始终举着一只手，时而庄严地停在空中，时而迅速有力地挥动几下。右手举累了就换左手，左手累了又换右手。当万岁声越响越高时，毛泽东情不自禁探身栏杆外，去伸手招呼群众。终于，他面对麦克风高呼：“同志们万岁！”“人民万岁！”

退场群众发现领袖仍在他们中间，并且通过广播高声和他们讲着亲切的话，便改变了原来向东西分走的路线，潮水一般涌向天安门，挤在金水桥上，拼命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毛泽东也在城楼上激动地呼喊：“同志们万岁！”“人民万岁！”

城楼上下一呼一应，群众沸腾了！跳跃舞蹈，沉浸在狂欢的热烈气氛之中。

陈毅同志激动地放开大嗓门：“看了这，总算此生不虚度！”

大典结束后，毛泽东乘车回到菊香书屋，激动地说：“人民喊我万岁，我也喊人民万岁，这才对得起人民呀。”

李银桥：毛泽东的开国大典礼服

那时，人民解放军的军衣还没制定统一式样，人们对军装的概

念似乎只是以黄色为标准。所以，毛泽东对他那套开国大典的黄呢子制服也视为“军衣”。参加大典之后，因为叶子龙送来的黄呢子料还有不少，我又请王子清师傅为毛泽东做了3套相同式样的制服。

朝鲜战争停战协定签定之后，毛泽东对我们卫士说：“我们可以脱军衣了。我脱，你们也脱。”

此后，我们卫士都脱下军衣，再不曾穿过。毛泽东也再不曾穿过那套开国大典穿的“军衣”。

几个月后，就是1954年初，毛泽东对江青说：“黄军衣我不穿了，你看送给谁就送给谁吧。”

江青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沙发上放了4套黄制服。江青说：“银桥，这些衣服主席不穿了，送你1套，马武义1套，越鹤桐1套，李家骥1套。”

我“嗯”了一声，动手翻翻那几件衣服，说：“还有孙勇怎么办？”

“噢——要不这样吧，你和孙勇一人两套吧。”江青说道。

我负责内卫，孙勇是负责外卫的副卫士长。在分衣服时，我将那4套黄军衣打开，特地挑出了毛泽东参加开国大典穿的那套衣服，再从另外3套里拿了1套，抱回自己家。剩下的两套就送给了孙勇。

可是，毛泽东的衣服我穿着肥大，实在有碍观瞻。我决定把衣服改一改。我爱人韩桂馨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你可别瞎改呀。这要是在旧社会，那衣服就算皇帝登基的龙袍呢。”

我说：“现在不是新社会吗？主席一再说：‘我是国家主席，是人民公仆，不是皇帝。’你瞎扯什么？”

就这样，我将具有历史意义的这套衣服裁剪了，改成了适合我身材的衣服，穿起来精神了，当时很满意很高兴。

1967 年，天津历史博物馆收集重要历史文物，来找我。听说开国大典毛主席穿过的衣服在我这里时，他们就收走了这套衣服。后来，天津历史博物馆又给我复制了一套新衣。

毛泽东主席逝世后，中国历史博物馆寻找开国大典毛泽东穿过的衣服。我说："被天津历史博物馆的同志收走了。"中国历史博物馆让我跟天津要回来，天津那边没有给。至今仍然在天津历史博物馆放着。

十五　毛泽东和他的儿女们

李银桥：毛岸英的婚事

毛岸英是毛泽东的长子。1946 年，他从苏联留学回到延安，毛泽东送他几件带补丁的旧衣，叫他下乡跟着边区劳动模范去学习种田。

“抗大”有位北平来的女学生，姓傅，长得很漂亮。江青对毛泽东的长子还是热情关心的，见到傅小姐美丽出众，立刻动了一个念头。星期天，她把毛岸英和傅小姐都约到她那里，吃饭聊天，高高兴兴玩了一天。

傅小姐走后，江青问岸英：“你都二十三四了，该找对象了。你看傅姑娘怎么样？”

毛岸英脸红了。延安不比大城市，像傅姑娘这么漂亮的女孩确实不容易见到。片刻，毛岸英喃喃地问：“我爸有这个意思吗？”

“只要你同意，他那儿我说一声准行。”江青兴冲冲跑去向毛泽东说。毛泽东却摇头：“见一面就定终身，也太轻率了吧？孩子年轻沉不住气，你也沉不住气？你叫岸英来。”

江青关照毛岸英：“你爸叫你去呢，现在可就看你的态度了。”

毛岸英来见父亲，红着脸表态：“我觉得人还挺不错……”

毛泽东笑了，不失幽默地说："不漂亮不聪明你也不会动心，这一条我理解。可是，见了漂亮的就都动心，这一条我就不敢理解你了。"

毛岸英低头不语。

毛泽东换上严肃口吻："除了漂亮，你还了解她什么？理想、品德、性格，你了解吗？她刚从北平来，我们都不了解。婚姻对你来讲，既是终身大事，也关系着我们的革命事业。谁叫你是毛泽东的儿子呢？一定要慎重，不能轻率从事。"

果然应了毛泽东说的，江青只是一头热，傅小姐根本看不上前程未卜的毛泽东一家，也受不了延安的艰苦生活，不久便跑回北平，并且在报纸上写文章辱骂延安。

毛泽东说："看来漂亮靠不住，还得靠理想哟。"

中央机关来到西柏坡后，毛岸英与烈士刘谦初的女儿刘思齐被分配到附近农村搞土改，接触中渐渐产生感情。经邓颖超和康克清帮忙，毛泽东同意他俩确定恋爱关系。就在毛泽东帮我出主意，使我和韩桂馨确定恋爱关系的同时，毛岸英也来找父亲了。

"爸，我跟思齐的事，康妈妈跟你说过了？"

"嗯。"毛泽东正在批阅文件，头也不抬地应了一声。

"那我们就办理结婚手续吧？"

"思齐多大了？"

"18。"

"周岁虚岁？"

"虚岁。可也差不了几个月……"

"差一天也不行。我这里忙，你去吧。"

毛岸英乘兴而来，败兴而去。相比之下，毛泽东对我的婚事要

积极要关心得多。

那天，我们蹲在院子里吃饭，见岸英这个样子，我小声出主意："别急，等你爸高兴的时候你再去说。"

康克清热情善良，在中央首长的夫人中，她是很受人尊敬的一位大姐，她和朱德总司令一样，对我们这些工作人员总是那么亲切和蔼，从不发脾气。她尤其喜欢孩子，曾劝说毛泽东多关心岸英、多关心孩子的生活问题。毛泽东决定和刘思齐谈谈话。

1948 年 8 月的一天，毛岸英和刘思齐一起来到毛泽东的住处。

谈话中，毛泽东问思齐："你正在学校学习，还没毕业，现在结婚不怕影响你的学习吗？"

思齐说："只要安排好，不会影响的。"

毛泽东说："岸英是 1922 年生的，你是哪一年生的啊？"

"我是 1931 年出生。"

"他比你大八九岁，你知道吗？"

"知道。"

"嗯，"毛泽东轻轻点点头，说："你还不到 18 周岁，着什么急呀，过几个月满 18 周岁再结婚吧。反正我同意你们结婚，等一等好不好？"

思齐听话地点点头，又向岸英递眼色。毛岸英勉强表态："好，听爸爸的。"

两个人离开毛泽东住处，工夫不大，岸英自己又回到毛泽东房间里来。

"你怎么又回来了？"毛泽东有些皱眉头。

"我从来都是听爸爸的，可我今年快 27 了，我想结婚以后专心

学习工作，这样，就不必在这方面花费那么多时间和精力了。”

“你还要现在就结婚呀？”

“我们本来准备好了，这两天就结婚……”

“我说过的话为什么不听？”毛泽东历来要求“交待了的就要照办”，对于儿子的反复他显然火了，“不是告诉你暂时不要结吗？”

“我自己的事还是让我自己做主吧。”

“你找谁结婚由你做主，结婚年龄不到你做得了主吗？制度和纪律要做你的主！”

“岁数不到就结婚的人多着呢……”

“谁叫你是毛泽东的儿子！”毛泽东发了脾气：“我们的纪律你不遵守谁遵守？我再说一遍，思齐不满 18 周岁就不许你们结婚！”

毛岸英也气得脸色发白，转身就走。

毛岸英仍然想不通，心里又急又恼，便躺在床上哭闹起来，谁也劝不住。阎长林报告江青，江青作为继母不好出面，怕引起矛盾，说：“还是让他爸爸去说说吧。”

于是，阎长林报告了毛泽东。

毛泽东听后勃然大怒，掼下笔大步出门。我怕他要打儿子，忙紧紧跟上，准备劝他。

可是，毛泽东连儿子的门也没进，就站在门口吼了一嗓子：“毛岸英，你想干什么？”

就这一嗓子，正在床上哭闹的毛岸英立刻老实了。

毛泽东转身就走，再不说第二句。

几个星期后，毛泽东在村边散步，碰到毛岸英从邻村下乡回来。毛岸英想溜过去，被毛泽东叫住了。

“你不要躲我，”毛泽东抬手叫住儿子，“结婚的事想通了吗？”

“想通了。”毛岸英垂头丧气，“是我不对。”

“思齐呢？”

“她也想通了。我们已经商量好，过年以后再结婚。”

“这才像我的儿子嘛！”毛泽东满意地摆摆手，“你去吧。”

后来，毛泽东曾问过我：“银桥，你说我跟儿子亲还是跟你们亲？”

我想了想，说：“主席跟我们接触多，感情也更深些。”

毛泽东不置可否，若有所思地说：“我跟我的儿子难得见一面，就是到了一起，一年也难见几面。我只是和你们朝夕相处，形影不离。我和我家里这点事，瞒天瞒地也瞒不过你们。我活着的时候你们不要讲，我死了以后可以讲，要讲实话。”

后来，到 1958 年，报社号召工农兵写文章。警卫队的张木奇写了一篇文章，介绍毛泽东的工作、生活片断，登在《中国青年》上。毛泽东看了以后，对我说：“我活着的时候你们不要写，我死了以后你们可以写，要如实地写。”

1949 年 9 月，毛岸英和刘思齐商量好了，决定过一些日子结婚，随后，又征求刘思齐的妈妈张文秋的意见。

婚期初步定下以后，毛岸英来到父亲这里。

毛泽东说：“我同意，你们准备怎么办婚事呀？”

毛岸英说：“我们商量了，越简单越好，我们都有随身的衣服，也有现成被褥，不用花钱买东西。”

毛泽东非常高兴：“这是喜上加喜，应该艰苦朴素。但你们结婚是一辈子的大事呀，我请大家吃顿饭。你们想请谁就请谁。你跟思齐的妈妈说说，现在是供给制，她也不要花钱买东西了。她想请谁

来都可以，来吃顿饭。”

毛岸英和刘思齐经过商量，写了一个参加吃饭人的名单，名单上有邓（颖超）妈妈、蔡（畅）妈妈、康（克清）妈妈、谢觉哉伯伯、陈瑾昆伯伯等。

毛泽东看了名单，说：“你们只请邓妈妈不行，请了邓妈妈，还应该请恩来；请了蔡妈妈，还应该请富春；请了康妈妈，还应该请总司令；请了谢老，还应该请王定国；请了陈瑾昆，还应该请梁淑华；还有少奇和光美同志也要请；弼时同志有病，住在玉泉山休息，就不要麻烦他了……”

1949 年 10 月 15 日，婚礼在中南海里举行。毛岸英和刘思齐在晚饭前都赶到了中南海。毛岸英穿的是平常穿的衣服。刘思齐穿的是灯芯绒上衣，裤子是半新的，只有方口布鞋是新买的。

毛泽东与长子毛岸英

在菊香书屋的西屋里，只准备了一桌饭，首长们并没有都来吃饭，但是都来表示祝贺了，还给毛岸英和刘思齐送了礼物。礼物也很简单，只是枕套之类的日用品。

婚礼结束后，毛岸英和刘思齐临行时，毛泽东送给岸英一件呢大衣，并风趣地说："我没有别的东西送给你们，这件大衣，晚上可以当被子盖，白天岸英穿上可以防寒。"

在场的人，都忍不住大笑起来。

李银桥："唉，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呢……"

1950 年 6 月，朝鲜战争爆发后，毛泽东考虑出兵不出兵，连续几天不能入睡，吃安眠药也睡不着。开会那天，他的东屋里坐了一屋子人，除五大书记外，记得还有高岗、彭德怀、林彪、彭真等人，满屋子烟雾腾腾。从五六点钟开始研究，一直到后半夜。最后研究决定派彭德怀率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

出兵后，毛泽东又是几天几夜不能上床睡觉。那天上午八九点钟，毛泽东服过安眠药，刚躺下，聂荣臻代总参谋长来汇报情况。他在东屋办公室等候，我请他坐，他不肯坐，在屋里转着圈走来走去。我见他急得坐不下来，就去主席卧室察看。毛泽东仍然睡不着，不停地翻身。我就进去小声报告："主席，聂荣臻同志来了，在办公室等着。"

毛泽东闻声坐起身："我起来吧。"

我忙帮他穿好衣服。他两脚一落地，就朝东屋走。

聂荣臻见主席来了，上前一步立正敬礼："报告主席，志愿军已

经过江，前线的形势……”

我只听到这么半句就退了出来。

半小时左右，聂荣臻走了。毛泽东没露任何神色，只交待一句：“我睡觉吧。”

我送他上床。毛泽东没有再吃药，躺下工夫不大就睡着了，鼾声均匀，睡得很香。

全国掀起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热潮。这期间聂荣臻几乎天天来。一个是军委主席，一个是代总参谋长，联系不能断。

毛泽东决定送儿子出国参战。江青和其他一些同志都曾劝阻毛泽东，说岸英在单位里负有重要责任，离不开，不要去参战了。毛泽东讲了应该去的道理。给我印象最深的仍然是那一句话：

“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他不去谁还去？”

毛岸英告别结婚刚一年的妻子，跨过鸭绿江，奔赴朝鲜前线，在志愿军总部充当俄语翻译兼机要秘书。

1950 年 11 月 25 日，志愿军打响第二战役的第一天，志愿军总部遭到敌机轰炸，毛岸英不幸牺牲。彭德怀给毛泽东、党中央发来了电报。

机要主任叶子龙拿到电报后，忙同周恩来商量，没有立刻告诉毛泽东。过了一段时间，毛泽东办完公，到万寿路新六所一号楼休息时，叶子龙和江青才把消息报告了毛泽东。

当时，毛泽东正坐在沙发里。听到消息，先是一怔，盯着江青和叶子龙一声不响。

江青和叶子龙不敢说第二遍，也不好说什么劝慰的话，不约而同垂下了头。

于是，毛泽东眨了一下眼，目光开始缓缓移动，望着茶几上的烟盒。

他去拿烟，两次都没将烟从烟盒里抽出来。我忙帮他抽出一支烟，再帮他点燃。

屋里静了很长时间，谁也没说一句话。能够听到的只有毛泽东咝咝的牙缝往里吸烟的声响；陕北农民吸烟都喜欢发出这种咝咝声。

大概烟雾熏了毛泽东的眼睛，大概他想起了儿子许许多多的往事，我见到毛泽东眼圈红了，湿润了。

叶子龙一声不响地退了出去。

又沉默了很久，毛泽东吸完第二支烟，把烟头熄灭在烟缸里，用略带沙哑的声音，发出催人泪下的一声叹息："唉，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呢……"

我顿时泪溢眼堤。

毛泽东没有哭，又点燃一支烟，开始听江青汇报儿子牺牲的经过。大意是敌机轰炸，扔燃烧弹，被烧死了。

毛泽东最后只交待一句："这个不要急着告诉思齐了。"

此后不久，彭德怀回国向毛泽东当面汇报志愿军入朝作战情况时，心情沉重地谈了毛岸英的牺牲。

毛泽东点燃了香烟抽着，沉默了好一会儿，才缓慢地说道："革命战争，总是要付出代价的。岸英是一名普通战士，为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尽了一个共产党员应尽的责任。不能因为他是我的儿子，就不应该为中朝两国人民共同事业而牺牲。世上哪有这样的道理呀！哪个战士的血肉之躯不是父母所生？"

同普通的志愿军战士一样，毛岸英的忠骨被安葬在朝鲜平安道

桧仓郡志愿军烈士陵园里。

这就是伟大领袖毛泽东的胸怀!

毛岸英牺牲的消息公开后，毛泽东对刘思齐说：“今后，你就是我的大女儿。”

从那时起，毛泽东就格外疼爱刘思齐，时常亲自过问她的衣食住行。在每次去信中，总是称她为“我的大女儿”，“思齐儿”，“娃”。

1961 年，毛岸英牺牲已经 10 年了，29 岁的刘松林（刘思齐已改名）仍是孤身一人。毛泽东更加关心她，希望她尽早成立一个新的家庭。

不久，刘松林与空军学院强击机教研室教员杨茂之相识。刘松林在莫斯科大学读书时，杨茂之早她一年到苏联红旗空军学院学习指挥。他们在中国留学生的集会上见过面，但没有说过话，更没有想到对方会成为自己的终身伴侣。

1962 年 2 月，他们结婚了。毛泽东抄录了一幅他刚创作的《咏梅》词，算作贺礼，另外给了 300 元钱，叫刘松林代买礼品。

婚后个把月，刘松林和杨茂之一起去中南海看望毛泽东。那次，毛泽东和杨茂之谈得很投机，他对杨茂之似乎颇为满意。

韩桂馨：劝儿媳改嫁

就我所知，毛主席对刘思齐一直比较关心。在延安时，主席就认识了这位烈士的女儿——刘思齐。建国初，刘思齐与岸英结婚，成为主席的儿媳妇，在岸英牺牲后，主席仍视思齐为女儿。

岸英牺牲的消息，开始时瞒着思齐。主席是一位感情丰富的人，

儿子的牺牲带给他的是心灵的震颤。但他强忍悲痛，把心血倾注在党和国家的大事上。只是思齐每次来看他时，对主席简直就是感情上的折磨，因为思齐总要问岸英来信了没有？怎么好几个月不给我来信呀？……主席总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宽慰她。

毛泽东作为爸爸，不能总扮演这种难堪的角色。为了让思齐有个思想准备，两年后，主席慢慢地向思齐说起毛家为革命牺牲了的烈士：杨开慧、毛泽民、毛泽覃、毛泽建、毛楚雄……思齐越听越不对劲，朝鲜停战协议都签订了，为何岸英没寄片言只字？难道他……离开中南海时她心慌意乱。

该把实情告诉儿媳了。思齐再次到中南海时，客厅里与她谈心的除了主席外，还有周总理。总理委婉地告诉思齐：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无数战士牺牲了生命，人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们，“岸英也是其中之一！”总理的话音很轻，思齐却如五雷轰顶。她伏在主席肩上哭呀、哭呀。主席神情忧伤，脸色苍白。总理让思齐在沙发上躺下，镇静一下。无意中他的手碰到了主席的手，急忙对思齐耳语：“你要节哀，你爸爸的手指都冰凉啦！”思齐一愣，忙又哭着安慰爸爸。主席说：“今后，你就是我的大女儿。”

20 岁刚出头的思齐经受不住这巨大的打击，她寝食难安，神经衰弱，于是给爸爸写信。主席回信安慰她：“你的心要清闲些，把身子养好要紧。”

为了学技术，思齐经组织批准赴苏联留学。主席同意她换换环境，并写信鼓励她：“争口气，学成为国效力。”

思齐回国后，江青扬言：“刘思齐不是我们家的人！”并派人将她出入中南海的特别通行证收了回去。思齐不能看望爸爸，内心十

分痛苦。主席对思齐的关怀丝毫未减，经常给她写信。请看一封写于 1959 年的信：

思齐：

不知你的情况如何，身体是否有起色，极为挂念。要立雄心壮志，注意政治理论。要争一口气，为死者，为父亲，为人民，也为那些轻视、仇视的人们争这一口气。

父亲　一月十五日

主席在外地巡视时，稍有空闲，也会给思齐写回信。

娃：

你身体是否好些了？妹妹（指思齐之妹邵华）考了学校没有？我比在家时好些。你愁闷时可看点古典文学，读诗句，可起消愁解闷的作用。久不见甚念。

爸爸　八月六日

1961 年，岸英牺牲 10 年了，思齐仍孤单一人。主席多次劝她找个合适的男朋友，早些结婚，他给思齐写信，望她组成个新的家庭。

女儿：你好！

哪有忘记的道理？你要听劝：下决心结婚吧，是时候了。五心不定输得干干净净。高不成低不就，是你们这一类女孩子的通病。是不是呢？信到回信给我为盼！问好。

父亲　六月十三日

不久，思齐（这时她改名为刘松林）与空军学院强击机教研室教员杨茂之相识并相爱了。

再婚后的思齐，过上美满的家庭生活。

李银桥：两个女儿

李敏是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女儿，小名叫“姣姣”，又叫“娇娇”，1936 年冬生于陕北保安。

1937 年 10 月，贺子珍带着娇娇离开延安，离开毛泽东，到西安住了一段时间，后经兰州去苏联治病和学习。

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贺子珍靠每天织几双袜筒子送到厂里换卢布的钱，勉强维持母女俩的生活，同时尽量照顾在苏联读书的毛岸英、毛岸青。娇娇和岸英、岸青虽属同父异母，但他们手足情深，亲密无间。

1947 年秋，贺子珍携带 11 岁的娇娇随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稼祥及其夫人朱仲丽从莫斯科回到了哈尔滨。不久又转到沈阳。

1949 年初夏，受毛泽东的重托，贺子珍的胞妹贺怡把娇娇从沈阳带到了毛泽东身边。贺子珍留在沈阳等候通知。

那天，毛泽东听说贺怡带娇娇回来了，连忙从办公室出来迎接。娇娇激动地扑上前去，叫了声“爸爸”，就依偎在父亲的怀抱里。毛泽东也激动地一下把娇娇抱了起来，亲了又亲。

娇娇上中学时，毛泽东就以自己最喜欢的化名李得胜和《论语》中的一句话“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给娇娇取名叫李敏。

李敏中学毕业后考取了北京师范大学。不久，与北京航空学院

的高材生孔令华相爱。李敏把心中的话告诉了爸爸。

毛泽东主张，对儿女的婚事大人们不要干涉，只要孩子们认为自己满意就行。

可是，孔令华的父亲孔从洲对这门亲事颇有顾虑。孔从洲原是杨虎城将军部下的军长，在西安事变中作过有益的贡献，建国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炮副司令员，中将军衔。

毛泽东得知后，对孔从洲说，儿女们的婚姻大事，由他们自己做主，我们做父母的不要干涉人家的自由嘛！孔从洲非常敬佩毛泽东，原先的顾虑就烟消云散了。

1959 年，李敏和孔令华结婚时，毛泽东亲自在中南海自己家里为他们主持婚礼，并请孔从洲全家和王季范夫妇、王海容、蔡畅大姐、邓大姐以及我们这些身边工作人员参加婚礼。

李敏、孔令华结婚后，同毛泽东一起住在中南海里。一年后，李

1959 年夏天，毛泽东与参加李敏（前排左四）、孔令华（前排右四）婚礼的亲友及身边工作人员合影（前排左二为邓颖超、左三为蔡畅、左五为孔从洲、右三为王季范，后排右一为毛远志、右五为李银桥）

敏生了个男孩。毛泽东经常抱抱、亲亲这个小外孙。

但江青不容，经常找岔，李敏被迫搬出中南海；从此，李敏难见爸爸。毛泽东曾经伤感地说："哎，手心手背都是肉。"

李讷是毛泽东的小女儿，1940 年 8 月为江青所生。在毛泽东的子女中，李讷是我看着她长大的。

我至今记得那个小人儿，刚刚 7 岁的小姑娘，行军之余，举着一个小搪瓷碗，和战士们一样，排队吃大锅饭。

李讷考入大学之后，只有星期六回家。学校在郊区，一旦有活动，天黑才能离校。一个女孩子独自走夜路总是不太安全，我便瞒了毛泽东派车去接。汽车停在校外僻静之处，然后我进校找她，出校后再悄悄坐车回家。我认为这样做学校里的同学们不会知道，不

前排贺子珍，后排右一为孔令华，右二为李敏，左二为李银桥

会造成什么不良影响。

可是，这事被毛泽东察觉了，他严厉批评了我。我争辩说：“天太黑，一个女孩子走夜路不安全……”毛泽东严厉地盯住我问：“别人的孩子就不是孩子了？别人的孩子能自己回家，我的孩子为什么不行？不许用车接，说过就要照办，让她们自己骑车子回来。”于是，我便从天津给李敏、李讷每人买了一辆飞鸽坤车。

由于不许接送，孩子常常两三个星期才回家一趟。那段时间李敏身体不好，在家里休息。李讷仍在学校吃住。我派卫士尹荆山去看望李讷。李讷脸色不大好。小尹问是不是生病了？孩子忸怩半天才小声说：“尹叔叔，我确实很饿……”

尹荆山回来向我汇报，我听了心里又急又难过。且不论她是毛泽东的女儿，单凭当年一起转战陕北的情谊，想到她吃了黑豆仍然为我们表演京剧的情景，我也不能不管哪！我搞了一包饼干悄悄给孩子送去。

李讷眼睛骨碌碌转，观察附近没人，忙把两片饼干塞进嘴里，匆匆嚼了吞下。吃这点东西就像作贼一样怕人发现。我心里一阵阵酸楚。她舍不得多吃，小心翼翼藏好，准备慢慢“享受”。我说：“吃吧，我还给你送。”

然而，事情被江青知道了，狠狠训了我一顿。我顶了她几句。因

青年时期的李敏

为有教训，她不敢像训卫士那样训我，怕我跟她吵架，便跑去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把我叫进屋，声色俱厉："三令五申，为什么还要搞特殊化？"

我不怕江青发脾气，但是害怕毛泽东发脾气。我小声嘀咕："别的家长也有给孩子送东西的……"

"别人可以送，我的孩子一块饼干也不许送！"

我再不敢言声，也再不敢给李讷送饼干。回到家里，我向爱人发牢骚，说江青向主席打小报告批评我。

事隔不久的一个星期天，李讷回到家里来。卫士尹荆山在倒茶时提醒毛泽东："主席，李敏和李讷回家了，两三个星期没见，一起吃顿饭吧？"

毛泽东掀起眼皮，目光柔和："嗯，那好，那好。"

毛泽东没有专门吃饭的饭厅，每次都是卫士用食盒把饭提到卧室或办公室吃。今天搞了四菜一汤，还有辣子、霉豆腐等四个小碟。炊事员得意地说："我今天多下了一倍的米！"

女儿们在毛泽东卧室里向父亲汇报学习情况。末了李讷委婉地说："我的定量老不够吃。菜少，全是盐水煮的，油水也少，上课肚子老是咕噜叫。"毛泽东教育女儿说："困难是暂时的，要和全国人民共渡难关。要带头，要做宣传，要相信共产党……"

尹荆山进去招呼："主席，饭好了。"

"嗯，今天一起吃饭。"毛泽东拉住女儿的手，一起走到饭桌旁。

李讷抓起筷子，鼻子伸到热气腾腾的米饭上。那是红糙米，掺了芋头。她深深地、深深地吸吮着香气："啊，真香哪！"她望着父母灿然一笑，那么天真可爱！

江青望望女儿，望望毛泽东，想说什么，可是卫士们侍立旁边，她便忍住了。勉强一笑，夹一筷子菜放到女儿碗里。

“吃吧，快吃吧。”毛泽东用筷子示意。

李讷大口地向嘴里拨饭。

“吃慢点，着什么急？”毛泽东尽量平静地说。他轻轻笑着，但是笑得越来越不自然。

李讷瞟一眼侍立的卫士，腼腆地说：“在学校吃饭都快，习惯了。”

“现在是在家里么。”毛泽东说话声音很低，已经变成苦笑。

“吃菜，多吃菜。”江青不停地往李敏、李讷碗里夹菜。

李讷在父母面前不拘束，慢吃不了几口又变成狼吞虎咽，几乎嚼也不嚼就把一口口饭菜吞下去。

开始，毛泽东还在慢慢陪女儿吃，一边有一句没一句地说点什么。渐渐地，他不说话了，默默地夹一筷子菜或饭往嘴里送，嚼得那么慢，那么慢……终于，他停了筷子，停了咀嚼，怔怔地望住女

李银桥夫妇与李敏、李讷

儿出神。

江青早已停了筷子，看看女儿，又看毛泽东。她接连几次喘粗气，便盯着毛泽东不动了。她有时心里有想法并不说，而是希望毛泽东能够理解，能够先说。

“哎，你们怎么不吃了？”李讷好容易把嘴离开饭碗。“哦，”毛泽东不着边际地笑笑，“老了，吃不多。我很羡慕你们年青人。”

晚上，江青进了毛泽东卧室，叫卫士们退出。半小时后，江青出来了，眼圈红红的，显然哭过。我们明白这是为什么，都走进毛泽东卧室。

“主席，孩子们太苦了，你看是不是可以……”

“不可以。”毛泽东什么都明白，“和全国老百姓比起来，她们还算好的。”

“可是……”

“不要说了。还是恪守本份的好，现在这种形势尤其要严格！”

韩桂馨：“不要煞孩子们的风景”

搬进中南海以后，大概是 1953 年，毛远新也来到了主席身边。毛远新比李讷还小一岁，个头也不高，大家都叫他“小豆豆”。这样算起来，主席家里的孩子有李敏、李讷、毛远新和王博文。

按理说，这样一大家子人应该是热热闹闹的吧。可是在菊香书屋，却很少有一家人凑齐的时候。首先就是主席的生活习惯与平常人不一样，孩子们玩耍时，他在休息，当他工作时，时间已是深夜。因此，主席很难得和孩子们一起吃顿饭。再一个原因就是主席对孩

子要求严，主席要求孩子生活上要自立，因此，孩子们上学后都住校，平时在家的时间也不多，再加上主席有时还外出，与孩子一起在家的时间就更少了。

主席对孩子的要求很严格，仅举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李敏、李讷和毛远新小学时都在育英小学读书。学校在北京西郊的万寿路，离中南海很远，孩子们就住在学校里，一个礼拜回来一次。李敏大一些，对集体生活很能适应，她在小学主要是补习一段中文课，很快就升入中学了。而李讷和毛远新还小，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开始时，工作人员用小汽车送孩子们上学，星期六则早早接他们回来。当时别的首长以至工作人员也有许多人用小车接送孩子的，大家并没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妥。但主席知道后，不同意用小汽车接送，而是让他们去坐集体接送的大轿车。

为了不使孩子有特殊感，也为了减轻学校领导的精神负担，在孩子入学登记表的家长一栏里，主席从来没有写过自己的名字。主席还委托李银桥做孩子的监护人。每次李讷和毛远新从学校带回老师与家长的联系本，需要签名时，都是由李银桥签名，然后把有关内容向主席汇报。王鹤滨医生在主席身边兼生活秘书时，也遇到了类似的事情。那是李敏考取了北京师大女附中时，王医生要带李敏去学校报到。临行时，王医生拿着学生注册登记表，想请主席在家里先签上自己的名，他想：自己总不能替他老人家签名啊。哪知，主席说：

“你带去，就填你的名字嘛！”

这样，王鹤滨就成了“家长”。主席的孩子在同学中生活得很自然，也很随便。孩子们不但没有优越感，反而对工作人员很亲近，有

什么话也愿意和王医生说，仿佛他真的成了家长似的。有一次，小李讷却流露了对这位“家长”的不满。起因是主席随便的一句问话：“你说叔叔好不好哇？”哪知李讷有她的想法，她说：

“王叔叔不好，他把我们往学校一放就走了。”听话听音，主席也猜到了小女儿的心思，她是不习惯住校生的生活。主席没有正面批评或讲大道理，他反而呵呵地笑着说：

“王叔叔怎么不好啊，你想想，每个星期六还不是王叔叔接你回来吗？”说得李讷也笑了。

毛主席关心孩子们的身心健康，常告诫李云露老太太，不要过多地干涉孩子们的事，不要管得太严束缚了孩子们的行动。他的口头禅是：“不要煞孩子们的风景。”

因为工作忙，主席实在是无暇享受天伦之乐。1953 年夏天，孩

江青与姐姐李云露

子们都放了暑假回来了，毛主席拜托保健医生带孩子们去北戴河玩一次。他说："王医生，我很忙，抽不出时间来陪孩子们玩玩，请你带他们到北戴河去度暑假。我身体很好，这边不会出什么事。你能带孩子们去玩，就是对我很大的帮助了。"

要去北戴河，去看海，李讷很高兴，毕竟是出远门了嘛，她和李敏、毛远新、王博文兴高采烈地随王医生、罗秘书一起出发了。这一行人中还有李云露老太太。

王医生带孩子们游泳、爬山、观日出、赶海潮，孩子们玩得高高兴兴，回来时，个个晒得黑黑的，脸儿红红的，他们争相向主席汇报暑假期间的愉快见闻。毛主席一脸的笑容，显然他很满意，仿佛了却了一桩心愿。

十六　俭朴的一生

李银桥："挥泪斩马谡"

新中国成立伊始，不法资本家从经济上发动了一次猖狂的进攻。他们利用金钱、美女，贿赂、拉拢、腐蚀国家干部；大肆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在国家定货中偷工减料，丧心病狂地用垃圾堆中拣来的废棉花加工成药棉，致使受伤的志愿军战士使用后反而伤口感染而死；把劣质胶鞋卖给志愿军，一穿就裂，许多战士的脚因此冻坏；盗窃国家经济情报，大搞投机倒把活动，非法牟取暴利。他们的非法活动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怒。

在资产阶级糖衣炮弹进攻面前，革命队伍中的一些意志薄弱者贪污受贿，被敌人拉下了水，成为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同时，国家工作人员中挥霍浪费、追求享乐思想和官僚主义开始冒头，给国家造成了严重经济损失，败坏了党和人民政府的声誉。

为巩固新生政权，党中央和毛泽东于 1951 年底开始至 1952 年初，发动了一场全国性的"三反""五反"运动，大张旗鼓地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和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反腐败斗争。

毛泽东十分重视这场斗争，亲自批准处决了腐化堕落分子刘青山、张子善。这就是震惊全国的“刘张事件”。联系当前的实际，越发感到那场斗争的必要性和重大意义。

刘青山和张子善，一个是天津地委书记，一个是天津专署专员。天津地委和专署就设在天津西郊的杨柳青镇。

据揭发，刘张二人的问题早在 1949 年底就有所暴露。刘青山住在原来一个大汉奸的别墅里，生活奢侈腐化。一天，副专员李克才同志去找他谈工作，发现他竟在抽大烟。李克才非常吃惊，当即向他提出，这是党纪国法所不允许的。他却满不在乎地说：“老子从小革命，现在革命成功了，也应该享受享受了。”他不仅私下吸毒，而且毒瘾发作时，在公开场合也吸。为遮人耳目，他将“白面”（海洛因）卷进纸烟里。张子善则投其所好，把专署公安处缴来的毒品送给他享用。

当时，天津地区连降暴雨，洪涝成灾。河北省政府为此下拨了救灾款、救灾粮。刘张合谋把救灾物资和运输任务交给机关生产处，并指使生产处从中牟利，侵吞了灾民 40 多万斤粮食。他们还贪污、挪用救灾款、治河款和地方财政款项，进行非法活动。刘张的行为，严重地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声誉，激起了极大的民愤。群众纷纷向李克才反映他们的问题。李克才于 1950 年二三月间向省委反映了刘青山吸毒和他挪用公款等问题，但未能引起重视。

1950 年下半年，刘青山为贪图享受，又用公款从香港购进两辆小汽车，一辆留作他自己使用，一辆送给别人。刘张还与不法资本家串通一气，盗用公款倒卖钢材，以饱私囊，使国家蒙受了很大的

经济损失。

1951 年六七月间，《人民日报》又披露了天津地委倒卖木材的事件。刘青山却公然说："这是老子和张子善商量搞的，谁敢处理！"经刘张四处活动，这件事竟不了了之。

1951 年 11 月底，河北省委在省会保定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在会上，李克才同志把刘青山、张子善的问题公开揭露了出来。天津地区的代表纷纷上台发言表示支持李克才，进而又揭发出刘张的许多其他问题。省委组织部长代表省委当即在会上表态，要严肃处理。通过调查证明，刘青山、张子善严重触犯了党纪国法。12 月 4 日，省委通过决议：开除刘、张的党籍，依法对其拘留审查。

"刘张事件"上报华北局。华北局又申报中央。那天，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彭真、薄一波等书记处领导在颐年堂开会，专门研究杀不杀的问题。毛泽东说："非杀不可。挥泪斩马谡，这是万不得已的事情。"1952 年 2 月 10 日，河北省特别法庭判处刘青山、张子善死刑。

那天参加会议的还有公安部长罗瑞卿，一起讨论了公安部行政处长宋德贵利用盖办公楼大量受贿和生活腐化问题，会上决定枪决宋德贵。

而后，由周恩来主持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了高干会议。会上，薄一波同志传达毛主席的讲话和书记处决定，并作"三反""五反"动员报告。轰轰烈烈的"三反""五反"运动便在全国展开。

刘张等人受到严厉制裁后，大大地推动了"三反""五反"运动的顺利开展，仅用半年时间就击退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为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打下了坚实基础。

李银桥：共产党人的美德

有一天散步，毛泽东望着我问：“你有贪污没有？”

我说：“没有。”

“你现在不贪污，你以后贪污不贪污？”

“我永远不贪污！”

“这就好。我们是共产党人，永远不能搞贪污，要经得起考验！你不贪污，你有浪费没有？”

“没有！”

“不贪污，也不能浪费。勤俭节约是共产党人的美德。做不到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

我说：“我一定努力做到。”

毛泽东用大手亲切地抚着我的后背：“要节约。比如洗衣服，袖口领口多擦些肥皂，这些地方容易脏。其他地方揉揉搓搓，一捋就行。这样可以节省肥皂。”

这段话我向当时的警卫科指导员毛崇横同志汇报了。

1955 年，供给制和包干制都改为工资制。我每个月 50 多元，毛泽东 200 元多点，江青大约是 100 多元。毛泽东的家庭账都归我管理。我写了个计划开支的明细表，穿衣、吃饭、房租、家具折旧费、支援困难同志及节约几项。毛泽东对其他开支赞同，对他的伙食费有意见：“一天 3 元高了吧？”

“不高，招待客人也要从中支出呢。”

毛泽东提笔在我的计划表上批了两个大字：照办。

毛泽东生活是非常俭朴的。没有他的亲口允许，是不能为他添置新衣服的。从 1953 年底到 1962 年底，毛泽东没做过一件新衣服。他总是用清水洗脸，从未用过一块香皂。手染了墨汁或是油污洗不掉，就用洗衣服的肥皂洗。他从没用过什么“膏”、“霜”、“油脂”一类护肤品，甚至没用过牙膏。他只用廉价牙粉。他说：“我不反对用牙膏，用高级牙膏。生产出来就是为了用，都不用生产还发展不发展？不过，牙粉也可以用。将来经济发展，人们生活水平都提高了，大家都用了高级牙膏我也会使用。”他的牙刷什么时候用秃了，什么时候才肯换新的。他一直使用竹木筷子，大饭店里的象牙筷子从来不用。他说：“太贵重，我用不习惯。”

毛泽东使用的被褥都是普通棉布棉花做的，里外白布，几十年保持不变。还有用白布包起来的荞麦皮枕头，补了又补的毛巾被、睡衣和一条薄毛毯。进城就是这些东西，逝世时仍是这些东西。他的内衣内裤以及长筒线袜子更是补了又补，以至于坐下来，一不注意伸出腿，就会露出袜子上的补丁。他接待客人时，我们常要提醒他“家丑不可外扬”。

饮食方面尤其能说明问题。

毛泽东办公离不开茶水，喝过茶的残茶他就用手指抠进嘴里吃掉。他喜欢吃粗粮，进城后一直吃红糙米，里面还常常要掺上小米或绿豆或芋头。这是战争年代养成的习惯，一直保持下来了。

毛泽东正经吃饭，一般是四菜一汤。这其中少不了一碟火煸的青辣椒或辣椒酱，一碟霉豆腐，一碟苦瓜。但是毛泽东正经吃饭的时候并不多。他从来不愿意事事循规蹈矩，不愿束缚他的个性。他工作起来不分钟点，吃饭也没有钟头，只以感觉饥饿为标准。一天

吃两餐的时候多，还有只吃一餐的时候。他一直保持着战争年代的吃饭方式。我们值班室有个电炉子和大搪瓷缸子，经常是由我们卫士在电炉子上煮一缸子麦片粥加牛奶、鸡蛋，就着秘书叶子龙为他做的霉豆腐吃下去就算一顿饭。

有这么一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毛泽东因连续工作，又是两天没睡觉，只吃了一顿正经饭。凌晨两点，值班卫士封耀松小声劝道："主席，您已经十几个钟头没吃饭了，给您搞点吃的来吧？"

毛泽东摇摇头又点点头，勉强说："不要搞了，你给我烤几个芋头来就行。"

封耀松来到厨房，自己动手烤芋头。在陕北时我们就是这样，毛泽东怕影响炊事员休息，夜里只让卫士烤馒头片来吃，不许惊动炊事员。

可是，侯贵友师傅还是被惊醒了。他眨着两只睡意朦胧的眼睛嚷道："你胡闹！主席一天没吃饭了，你怎么就烤几个芋头？"

封耀松摇头苦笑："主席说让烤两个芋头么。你不胡闹，你做饭你送。"

侯师傅闭口无言。"交待了的就去办"，这是毛泽东的原则。侯师傅也懂得，不照办才是"胡闹"。

封耀松烤熟 6 个小芋头；放在一个碟子里端去。进门一看，毛泽东头斜靠在床栏的毛毯上，呼噜呼噜地睡着了，左手还拿着文件，右手抓着笔。这种情况不少见，不能叫醒毛泽东。封耀松将碟子放在暖气上，便退到门口坐等。刚坐下眼皮就发沉，忙又站到门外，让冷风吹一吹。

封耀松在门外站了十几分钟，听到毛泽东咳嗽一声，忙轻手轻脚进屋，捧起碟子，小声说："主席，芋头烤好了。"

毛泽东放下笔和文件，双手搓搓脸说："想吃了。拿来吧。"

毛泽东在床上坐好，拿起一个芋头认真剥皮。轻轻摇晃着身子，吟诵过去的一首词："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

封耀松朝窗外望望，可不是吗？天快要亮了。毛泽东剥出半个芋头，便咬下一口，边咀嚼边继续剥皮，嘴里嘟嘟囔囔还在吟。封耀松见毛泽东自得其乐，便悄悄退出屋，继续吹凉风以驱走疲困。

大约又过了十几分钟，屋里的呼噜声隐隐又起。封耀松轻手轻脚进屋，碟子里只剩下一个芋头了。毛泽东头歪在右肩一侧睡着了。

封耀松踮脚过去，端起碟子准备退出。忽然感觉呼噜声不对，探过头去仔细打量，天哪，毛泽东嘴里嵌着半个芋头！另外半个还抓在手里。嘴里的那半个芋头随着呼噜声颤栗着。封耀松鼻子一酸，眼睛立刻模糊了。忙镇定下来，揉揉眼，放下碟子，轻轻地去抠毛泽东嘴里的芋头。

芋头抠出来了，毛泽东也惊醒了。

"哪个？"毛泽东不高兴地问道："怎么搞的？"

"主席。"封耀松叫喊一声，哽住了，泪如泉涌。他双手捧住那抠出来的半个芋头，嘴唇只是抖，再说不出一句话。

"唉，"毛泽东叹了一口气，"我不该跟你发火。"

"不，不是的。主席，不是因为你……这芋头是从你嘴里抠出来的。你该睡觉了。我求求你，求求你了……"

毛泽东说："那我就睡觉吧。"

毛泽东喜欢游泳，喜欢京剧，也喜欢雪。

毛泽东诗词中，我最喜欢的是《沁园春·雪》。是雪赋予了诗人伟大的灵感，抒发出磅礴千古的胸怀。

1951 年冬，北京落下这年的第一场雪。

那时，“三反”“五反”正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毛泽东工作一夜，批阅了大量文件材料，天亮时，放下笔。他舒个懒腰，搓搓脸，朝门口走去。

打开门跨出门坎一步，他便猛地立住了脚。门外正纷纷扬扬地下着大雪。他像孩子似地睁大眼睛，凝望这银白色的世界。他被雪激动了，陶醉了。

一名卫兵见毛泽东站在门口不走，忙抓起扫帚匆匆去扫路。

“不要扫！”毛泽东急切地喊，眉头皱起来。他发现铺砖路上的雪比别处的雪薄，大声问：“这路是你扫过的吗？”

卫兵连忙解释：“黎明时我已扫过两次，雪一直下，所以……”

“一次也不能扫。”

卫兵放了扫帚，怔怔地望着被扫过的雪地，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毛泽东已经走出廊檐，走下台阶。小心翼翼，步子迈得极慢极慢，像怕惊醒一个甜梦的梦。走出两步，他又停下来，回头看自己留在雪地上的脚印，目光里闪耀着孩子一般新奇惊喜的神色！他不忍心再向洁白无瑕的雪地落下脚去，把抬起的脚缩回来，重新落在原来留下的脚印里。

他开始粗重有声地深呼吸。他休息时喜欢做这种呼吸运动，以畅胸怀。他叹了一口气：“唉，空气多新鲜！”

他仍然不忍心踏破雪，两脚始终保持一前一后的姿势立着不动。抬起手，用手背和衣袖接雪。他入神地观望落在手背和衣袖上的雪

花，欣赏这大自然的创造。

“主席，走一走吧？站久了会感冒。”卫兵远远提醒，同样不敢迈步，怕践踏了毛泽东所迷恋的雪。

毛泽东不理睬。他手背上的雪花融化成一颗晶莹的水珠颤颤欲滴。毛泽东伸出舌头，舌尖一触，水珠不见了。他咂响嘴，舒畅地笑了。

他松口气，开始在没有雪的廊檐下踱步，而后又出门，沿中海走。我追上他，发现他爱雪爱得“自私”。他舍不得踩自家的雪，可是不怕踩外面的雪。他不走扫净的路，专走雪地，入迷地倾听着脚下咯吱咯吱的碾雪声。不时回身望自己的脚印，不时停在松柏旁欣赏枝丫上的积雪。

他的思想太活跃，你简直无法追踪。他凝视片刻枝丫上的雪，忽然又一次问我：“银桥，你有没有贪污？”

我稍微有些吃惊。怎么又扯到这上面了？

“没有。”我坦然回答。

“你现在不贪污，以后贪污不贪污？”

“不贪污。”

“那就好。你来的时候像这些雪。”毛泽东指着松枝上洁白耀眼的积雪说，“以后也要保持，反腐蚀，不要让糖衣炮弹打中。”

“是。”我答应着。

毛泽东继续在雪地上走，又问道：“你喜欢雪吗？”

“喜欢。”

“农民喜欢雪，瑞雪兆丰年。害虫不喜欢。一下雪，苍蝇就没了。我也喜欢雪，我们都喜欢雪。”

于是，我知道毛泽东对雪有特殊感情。我布置下去，庭院里的雪以后不要再扫，留下来，供毛泽东观赏。

陈毅同志很了解毛泽东迷恋雪的心情，到毛泽东的住处来，从不厌弃他庭院中的雪。有的首长却不知道情况，一边皱着眉头跺去沾在脚上的雪，一边大声说："小鬼们好懒哟，院子里的雪也没扫一扫！"

我发现，只要下雪，毛泽东一定会格外精神焕发。很少有东西能中断毛泽东工作，唯有下雪例外。

韩桂馨：家庭会议

1950 年初，我休完产假来到中南海，又回到主席身边，这时李讷已从苏联回国了。

开国大典我没有见到，很可惜。但是新中国的诞生，带给人们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人人都在努力工作，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当中。

听银桥说，我生小孩不久，主席曾出国访问苏联。那次本来随卫人员名单中有银桥，而且汪东兴同志已经宣布了，但主席为了让他照顾我，就把银桥的名字勾掉，换了别人。我们知道主席出远门特别需要跟惯了的人在身边照顾，但为了我们母子，主席宁愿换人，让银桥留下，主席对我们这样爱护，我们就像生活在慈爱的长辈身边。安排好孩子，我以更充沛的精力回到了工作岗位上。中南海的工作条件当然比西柏坡好得多了，特别是对于我们生长在农村的人来说，繁华的都市，昔日的皇家园林，简直像作梦一样。虽然生活实行供给制，但我已相当满意了。在这段时间，主席的一家生活也

李银桥、韩桂馨夫妇与他们的孩子

相对稳定。出于对主席的热爱，工作人员也尽心尽意地做好服务工作。

有一天晚上，我正在做事，值班的同志到我家通知银桥，说主席要召集大家开个会。银桥回来时，已经很晚了。由于长期跟随主席，银桥也习惯很晚睡觉了。我看他还默默地抽烟，就问他有什么事。银桥慨叹一声，慢慢讲起了刚才开会的事。他说：

“主席让我把管生活的秘书和炊事员都找到他的客厅里，参加了主席的家庭会议。江青、李敏、李讷早早地来了。大家到齐后，毛主席从他的办公室过来，坐在当中的沙发上。主席点着根香烟，慢慢对大家说：‘中国人民经过多年的奋斗，才赢来了今天的胜利。这个胜利是很大的，但和今后的胜利比起来，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主席顿了顿，又说：‘大家知道现在是国民经济的恢复时期，我们刚建国不久，面临的困难还有很多，大家要自觉保持艰苦奋斗精

神，要自觉保持延安作风。现在我们检查一下，是不是都做到了呢？’”

主席看了看自己的女儿，指出她们姐妹二人在吃饭时提出特殊要求是不对的。特殊要求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李敏曾说过：在苏联习惯吃面包的话。再加上李讷也去过苏联，对苏联的生活习惯也懂得一些。孩子的要求并不难满足，再说生活条件也允许，李敏、李讷也是每个星期才回家一次，工作人员不认为这一小小的要求特殊，就让炊事员为她们准备面包。主席知道后，却很不高兴。他不但制止孩子们这样做，而且专门开会，对类似的事进行检查，并再次对伙食方面的标准作了规定，不允许随便改动。

这种气氛对孩子们是种无形的压力。李敏主动作了检讨，她说：“我在苏联一直吃面包，我认为这就是饭，却不知道现在这样做就是特殊。今后我要注意按爸爸的话严格要求自己。”李讷抽抽答答地哭了。

孩子做完检查，工作人员和炊事员也表了态。我听完银桥的叙述，也受到了教育。

我知道主席对孩子严格要求可是一贯的。在陕北吃黑豆时，他就要求自己的孩子和老乡的孩子一样吃黑豆。现在，中国的大多数人还在吃窝头咸菜棒子面粥时，自己的孩子却要求吃面包，主席认为这不是个小事情。他总是要求自己的孩子要和老百姓的娃娃们一样，不能有任何特殊。

十七　毛泽东劝和

李银桥：牌桌上的风波

50年代和60年代初，江青没什么事干。毛泽东给她看的材料她才能看，不给就看不到。江青闲得发慌，每天就是打扑克。她在玩的方面不同于毛泽东。毛泽东输得起，她输不起。

毛泽东极少打牌，休息脑筋时偶尔玩一下。他会算计牌，打得很好，就是不大玩，进城后基本不再玩。下棋也不多，偶尔同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副主任康一民下盘围棋，也是输的时候多。

江青则不然。她一定要赢才行，赢不了就发脾气，埋怨对家。

她总是跟我打对家。我要是出错牌，有时免不了遭白眼。遇上对手弱，比如同其他卫士打，他们牌艺不比我们强，我们赢起来不难，牌也好打。若遇上对手强，比如那些聪明伶俐的女护士，这牌就难打了。对方若是不让着我们，我们就很可能输，但是让着我们又不能露出破绽，露出破绽麻烦更大。

1952年春，我跟江青在万寿路新六所一号楼打扑克。

所谓新六所就是中央在万寿路建造的六栋小楼。中央五大书记毛、刘、周、朱、任每家住一栋，工作人员住一栋。毛泽东有时住

中南海，有时住新六所，来回跑。直到1959年以后，毛泽东才不再去新六所居住了。

那天打牌，一坐下我就发现江青脸色不好，心里不免犯嘀咕，越犯嘀咕越出错牌，越出错牌江青脸色越难看，纵然对方想让我们赢也不容易做到了。

我又出错一张牌，这时，江青忽然把满手牌摔在桌子上。

“不打了！”她一下子立起身，怒气冲冲地指着我：“你为什么说我躲风？啊！”

我心里“咯噔”一下，紧张地站起来。糟了！我心里暗暗叫苦，这事怎么会被她知道了？

那时，全国还在开展“三反”“五反”运动。从延安时期江青就不满意党内的各种整风运动，特别是“三查”“三整”运动中，跟毛泽东发生一次大争吵后，更是恼火运动，害怕运动。不论大小运动，一来她就躲走，很少参加。我曾多次听她说对搞运动不满的话，什么“有些人吃了饭没事干，整天琢磨着搞别人”，什么“哼，这次你搞人家，下次人家就会搞你！”

这次“三反”“五反”运动起来，江青又躲出去一段时间，不参加组织活动。机要秘书徐业夫问我：“为什么运动一来，江青就走？”我随口说了一句：“躲风呗。”

现在，话传到江青耳朵里去了，她趁打牌机会把火发泄出来。我无言以对，心里有些慌张。

“哼！”江青恼火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我跟在后面走，想解释，又不好解释。

“你为什么说我躲风？说话呀！你说没说我躲风？”

“我说过。可是……”

“你为什么说？”

“我不是有意的。徐秘书问我为什么运动一来江青就出去，我是随口讲了一句。”

“你这个没良心的！”江青眼睛都湿了，“我政治上保护你，你反而政治上诬蔑我！”

“我真不是有意的，我没有诬蔑你……”

“我再问你，你为啥挑拨我跟李敏的关系？”

“这是绝对没有的事！”

“我叫你派车去学校接她回家，你为什么不去接？”

“接了。我去接，是李敏不肯回来。”

“是你挑拨！”

“这一条我绝不承认！”

江青顿着脚越吵越凶。我看看腕上的表，已经快下午 5 点钟，毛泽东该起床了。

我冷静一下情绪，尽量沉稳些语气，说：“江青同志，主席该起床了，我得去照看。”

我匆匆赶到值班室，恰好毛泽东按响电铃。我理理衣冠，忧心忡忡地走进毛泽东卧室。

毛泽东擦过脸后，照例靠着床栏吸烟喝茶看报。我犹豫一下，小声说：“主席，我跟江青同志吵起来了。”

毛泽东自顾看报，漫不经心地问：“你为什么跟她吵啊？”

“不是我跟她吵，是她跟我吵。”我斟酌词句说，“我说她躲风，她说我是政治诬蔑。”

“噢，躲风？”毛泽东掀起眼皮，开始注意了，问：“那么，你有没有说啊？”

“是徐秘书问我，我随口讲了这个话。”我把事情经过叙述一遍，然后解释：“主席，我真没有诬蔑她的意思啊！”

毛泽东沉思着点头：“嗯，没有就好。”

“她还说我挑拨她和李敏的关系。”

“你有没有这个事？”

“没有。”

毛泽东想了想，说：“好吧，你下去。叫江青来，我跟她谈谈。”

我退出来。江青还在院子里团团转呢。我小心翼翼地走过去说：“江青同志，主席请您去一下。”

“你可真行哪！”江青斜我一眼，意思大概是说我“恶人先告状”。我没解释，这个时候越解释事越多。

工夫不大，值班室的电铃又响了。我忙赶到毛泽东的卧室。江青这时已经不在屋里。

“看来问题不好解决哟。”毛泽东望着我，慢条斯理地说：“你得承认错误，写检查。”

“怎么写？”我犯愁地问。

“你怎么说的就怎么写么。”

“她说我政治上诬蔑她，我没这个意思。”

“那就写没这个意思。”

“她说我挑拨她跟李敏的关系，我没有。”

“没有就写没有。”

“写要写我们两个人的名字，写主席、江青同志，然后另起一行。

躲风的话说了，承认，要检查说的不对，要道歉对不起。再写个但是，在但是后面多做点文章。话是说了，但没有搞政治诬蔑的意思。至于挑拨，根本不存在。去接李敏了，李敏不回来。交待的事办了，只是没办成，以后争取办成。检查写完先交我看看。”

我赶紧回自己屋里写检查，写完马上送毛泽东看。

“嗯，可以。”毛泽东点点头，把检查放床头柜上，望着我说：“检查交了，问题还没解决。你到中南海去躲一躲。”

我茫然地望着毛泽东。

毛泽东笑了，说：“只好委屈你先躲躲风了。”

于是，我从新六所“躲”进了中南海。

韩桂馨：江青的疑心

李敏到了主席身边，她的母亲贺子珍却留在了东北。

李敏初到时，贺怡也住了几天。我不知贺怡和主席谈了些什么，只听说主席写了一封信，托贺怡带给她的姐姐贺子珍。听说信的大意如下：

子珍：向您问好！

娇娇在我身边很好。我很喜欢她。望您要保重身体，革命第一，身体第一，他人第一，顾全大局。

之所以不要贺子珍回北京，原因可能如信中所讲吧。后来贺子珍到天津和上海以后，每逢寒暑假，主席就让李敏去看望妈妈。

贺子珍怀着一种良好的愿望，满心希望自己所爱的人幸福、快乐。她嘱咐女儿，要她和江青和睦相处，不要使爸爸为难和心烦。

自从让我照料李敏后，我就注意观察她，因为李敏毕竟大些了，对事情也会有自己的想法，加上在国外生活多年，我担心自己工作做不好，反而干扰主席的工作。哪知相处一段时间后，我看得出李敏是个非常好的孩子。她很要强，能吃苦，遇事有主见，独立生活能力强。更难得的是，她丝毫没有因为自己是主席的孩子，而看不起我们工作人员。很快我就和李敏很谈得来了。再加上李讷有好几个月不在国内，我就把全部心思放在岸青和李敏兄妹俩身上，想方设法把他们照顾好。

谁知江青回国后，发现我对李敏很好，就对我渐生恶感，后来把李银桥也连带上，江青和我们的关系紧张起来。她经常“敲打”我，阴阳怪气地说：“你要注意呢，不要讲什么亲娘后妈之类的话，不要把李敏教坏了，不许提贺子珍！”

主席一个人的工资要养一大家子人，经济条件并不富裕。江青穿过的旧衣服常拿给李敏穿。由于李讷小，有时捡不了旧衣服，只能做新衣。这在一般人家，也算不了什么。但江青很少考虑到，她毕竟是后妈，这样做李敏能高兴吗？只要是遇到李敏闹情绪，江青就怀疑是我在背后挑唆，因为她惯于猜疑别人、挑剔别人。有一次不知又为了什么事，江青怒气冲冲地质问我：“你背地里说我什么了啊？你不要挑拨我和李敏的关系！”

这种情况在我离开后也没有改变，而是越来越严重。李敏上大学以后，曾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有回家，江青派银桥去接，还是没有接来。于是江青大发雷霆，对着银桥大吵大叫：

“我让你派车去接李敏回家，你为什么不接？”

“我去接了，她不来。”

“你要诚心接还会接不来？你是成心捣蛋！你就是搬弄是非！”

没办法，江青吵闹够了，银桥才沮丧地走开。这种事既劝不了，也不能让主席烦心。工作人员成了江青的出气筒。

李银桥：毛泽东帮我解决问题

“躲”了十多天，毛泽东叫值班卫士打电话，叫我马上到新六所去。

我匆匆赶到新六所。一见面，毛泽东就笑着说：“银桥啊，问题解决了！江青病了，住在北京医院。你带着东西去医院看看她。明白吗？”

“明白。”我一阵高兴。

“先不要忙，在你房间里等着，等机会成熟了再去。”

我有些莫名其妙，回房间里等候。十几分钟后，北京医院一名护士忽然打来电话，点名找我，说江青要烟和一些水果，让我送去。

我乘车赶到北京医院。一进病房，没见到人。卫生间里有水声，我便站立着等候。片刻，江青擦着手出来，一见我便微笑着过来握手：“你来了？”我说：“来了。”江青说：“坐坐坐。”

我把东西放桌上，坐下来，心情也松快下来。

“你对我有意见没关系，但你不要背后讲我。”江青态度已经变柔和。我又解释一番不是故意的，以后一定注意之类的话。

“你以后有意见直接来找我，不要背后讲。当面讲什么我也不会怪你。”江青说完，马上转开话题，谈起工作上的问题。研究如何照

顾好毛泽东的休息和饮食。她说："我身体不太好，主席主要靠你们照顾，你们多操操心吧。"

事后我听说，我在房间里等候时，毛泽东给江青打了个电话，说："心胸不要总是那么狭窄。银桥一听说你病了，很着急，买了东西要去看你。你要主动么，要有胸怀么。"

于是，江青便叫护士给我打电话。她从毛泽东那里已经知道我要带什么东西去，就"主动"提出让我送什么东西去。一场矛盾就这样被毛泽东轻轻松松化解了。

五十年代初的李银桥、韩桂馨夫妇

可是，这件事还是意想不到地留了条小尾巴。

去北京医院看望江青之前，毛泽东将我写的检查退还了我。他完全是随意说了一句："拿去吧，你自己保存起来。"

千不该万不该，我不该当真保存下来这份检查。"文化大革命"中，这份检查被"造反派"抄家抄去，成为我一贯反对毛主席和江青的"铁证"，为此，我被关被批斗。幸亏1970年11月毛泽东路经天津时打听我的情况，得知消息后立刻命令放人，解放了我，并且很快恢复了工作。

我的这份检查现在还在天津档案馆同志的手中，要也要不回来。

十八　建国后第一次出行

李银桥：下不了的黄鹤楼

1953 年春节，我们随毛泽东乘专列到达武汉。毛泽东一再要求到民间去看看，安全部门同意了；有个条件，就是必须戴上口罩。

毛泽东戴了口罩，在我们的簇拥下游览龟山、蛇山。正是春节，游人非常多。参观黄鹤楼时，遇到一家人，大人带着孩子出来春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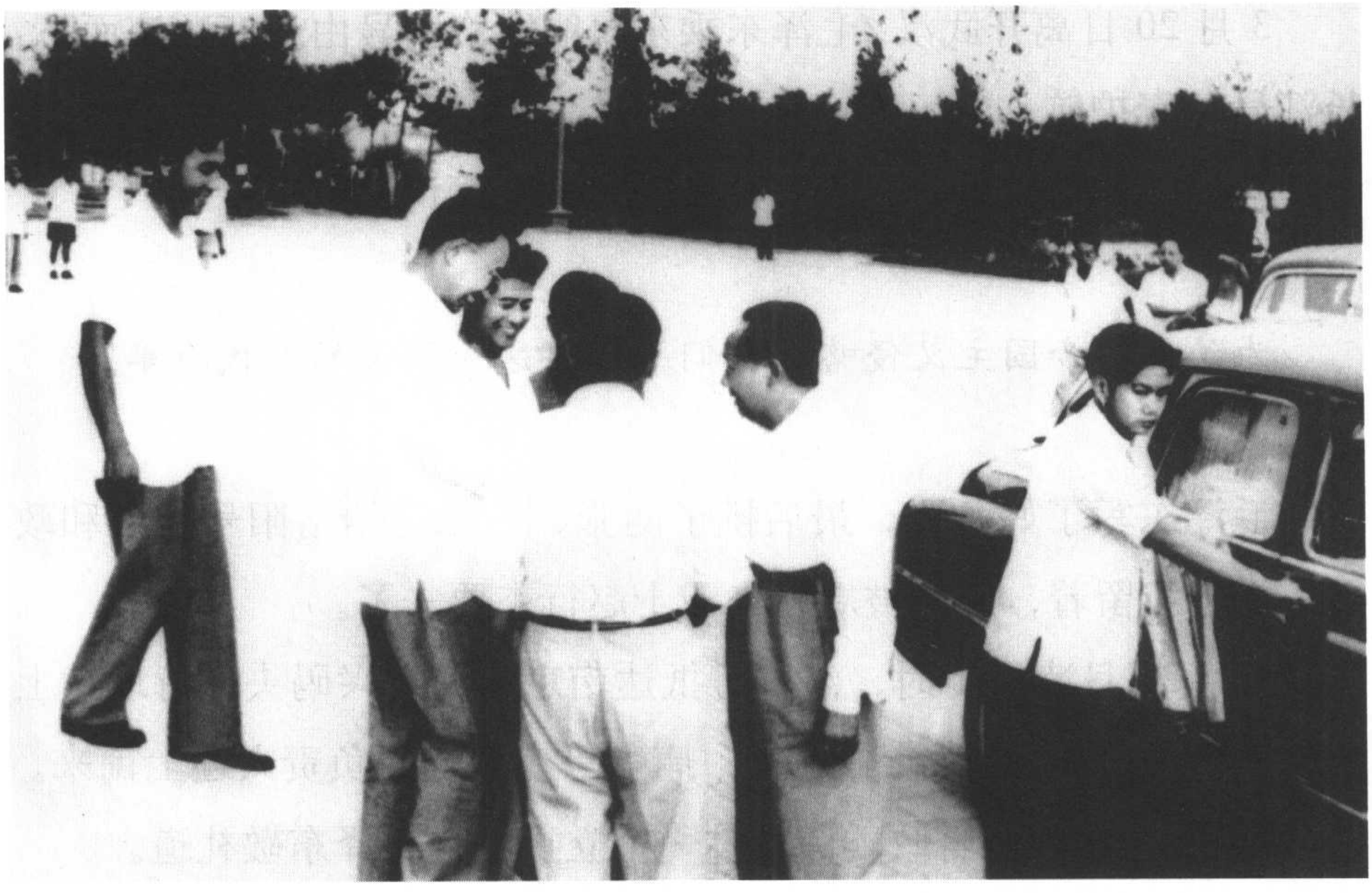
小孩子的眼睛是非常尖的，一双大眼睛朝着毛泽东忽闪忽闪，他隔着口罩居然认出来了，忽然尖着嗓子叫喊起来：

“毛主席！他是毛主席！毛主席万岁！”

这下子不得了啦！群众哄然大乱，潮水一般涌来。当时我们正跟随着毛泽东从黄鹤楼下来，猝不及防，前后左右顿时变成了人的海洋，人的城墙。

我们卫士们和当地警卫人员忽啦一下围住了毛泽东，跟随行动的首长们也慌了手脚。罗瑞卿、李先念、杨尚昆、王任重、杨奇清、武竞天等首长立刻向毛泽东靠拢，在我们卫士围成的圈外，又围成第二圈。当时只剩了一个念头：尽快保护毛泽东安全脱离。

真是谈何容易。一眼望去，万头攒动，人挤人挤成了团。我们



毛泽东在武汉(右一为李银桥)

前呼后拥，使出全身的力量往山下挤。人太多了，我们随着人群的涌动而摇晃着，反正到处是人，怎么摇怎么歪也摔不倒，就那么人挤人地朝山下一点一点移动。也不知挤出多少汗，头都挤晕了，卫士赵鹤桐随身带的两个铁壳暖水瓶都被挤扁了。终于到了江边。我们喊着，连拥带挤，好不容易分开一个缝，保护毛泽东上了船。

毛泽东一登上船，便摘去口罩，回身向群众招手。

顿时间，群众如大海一般起伏，掌声雷动，万岁声直冲九霄，震耳欲聋。我看到不少人又喊又叫又跳，那种狂喜之态简直无法形容。

罗瑞卿和杨奇清坐不住了，深感不安地作检查，说安全保卫工作没搞好。事后还主动向中央政治局作检查。

毛泽东却丝毫没有责怪他们，毛泽东还笑呢，只说了一句话：

“真是下不了的黄鹤楼。”

3月20日离开武汉，毛泽东乘东海舰队洛阳号由长江顺流而下；长江号负责护航。

在船上，毛泽东欣然为新建的人民海军题词：

为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人民海军。

毛泽东写了好几张，最后挑了两张，一张送给洛阳号舰长和政委；一张我留着，后来被周恩来卫士赵行杰要去了。

3月22月凌晨1时，洛阳号抵达南京下关大兴码头。特地从上海赶来的陈毅和谭震林、柯庆施、唐亮等有关方面负责人迎上前来。

“主席好！”三野政委谭震林一个立正，向毛泽东敬礼道。

“嗯，谭老板还是那么精神。”毛泽东微笑着说。

“主席，你要保重身体啊！有事我们可以去北京向你汇报嘛。”谭震林考虑到毛泽东的安全，关心地说。

“不，还是自己下来走走好，心中有数么。”毛泽东顿了顿，“有罗长子在，我的觉就能睡得稳。”

毛泽东在西康路33号省委招待所中楼下榻，听取了华东军区和江苏省委主要负责同志的汇报。

毛泽东对江苏的工作还是满意的，尤其对南京市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所取得的成果非常高兴。22日下午游览玄武湖时，还兴致勃勃地对陈毅说：“陈老总啊，我倒听得这么一首诗来：唐宋元明清，匪盗未肃清。国民党当道，特务大横行。有了共产党，镇压反革命，社会大安定，人民享太平。”毛泽东抑扬顿挫地把这首刚听来的打油诗念得特别富有韵味。

“这是群众的心声嘛。”陈毅态度潇洒地说：“南京是六朝古都，老百姓的体会也许更深一些。”

李银桥：凭吊中山陵

1953 年 3 月 23 日下午 1 时半，毛泽东来到中山陵凭吊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

毛泽东时而沿着台阶拾级而上，时而在绿茵如画的草地上伫立，别有一番情趣。

登上墓顶的平台，台中便是祭堂。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在中山先生的坐像前举行了默哀仪式。而后自左向右认真地观看篆刻在四周墙壁上的《建国大纲》。

陈毅见毛泽东伫立已久，怕他受累，便上前说道：“主席，还有几个地方呢！”

“噢，噢。”毛泽东满口应允，却依然一块一块细读碑文，直到读完才走进祭堂后的墓室。

墓室光线幽暗，气氛肃穆。柯庆施站在毛泽东身旁，小声介绍说：“这穹窿状的墓室，直径约 16 米，室顶图案是国民党的党徽。”

毛泽东抬头细细地望了一阵，说：“那中山先生遗体安放何处？”

“这上面的白色卧像是大理石刻制的，安放孙中山先生遗体的紫铜棺就在卧像下面 5 米深处。”柯庆施指着孙中山卧像回答说。

毛泽东点头表示明白。他朝孙中山卧像久久凝视，半晌没有说话，仿佛在思考什么。然后，无限感慨地长吁一口气，又背着手，绕着墓穴转了一圈。

毛泽东走出祭堂，来到外面宽大的平台上。他双手叉腰，举目远眺，良田沃野，尽收眼底。山上山下松涛滚滚，宛如一片绿色的海洋。他不言不语，倘徉良久。蓦地，他好像想起了什么……

毛泽东瞻仰孙中山祭堂时，被正在祭堂前草坪上读书的南京航空学院的一个学生发现了："这不是毛主席吗？"他飞一般地朝学校猛跑，连书包都忘了拿。他要把自己见到毛主席的情景告诉同学们，让大家都来分享他的喜悦。

校园轰动了！全校师生们坚决要求去看毛主席。于是不一会儿，几辆学校的大卡车载着满满的师生员工，顺着陵园路朝中山陵疾驶而来。

毛泽东视察南京的消息不胫而走。当毛泽东等领导人的车队驶到中山陵 8 号原孙科公馆稍事休息时，忽然"呼啦啦"门口来了大片人群，气氛异常热烈、激动。他们是工人、学生和附近的居民。

"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群情激动。

怎么办？负责警卫的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洪沛霖同志急忙去向柯庆施等人报告。他们几人正在商量时，陈毅走过来听说后，沉吟片刻说："我来！"说着便大步朝外走去。

来到门口，陈毅朝着人群大声说："你们都是毛主席的好学生，主席今天已经很疲劳了，要爱护主席的健康。"

激动的人群还是不肯散去。

罗瑞卿同南京公安局局长黄赤波、副局长洪沛霖简单商量一下，当机立断来到人群面前，大声说道："为了主席的安全和大家能清楚地见到主席，我们应该有秩序地站成行……"

在警卫人员的安排下，人群很快排成长长的两列，坐在草坪上。

这时，毛泽东从里面走了出来，在陈毅、罗瑞卿、谭震林、柯

庆施等陪同下来到群众中，毛泽东精神抖擞，满面笑容地向群众频频点头。

“毛主席万岁！”群众欢呼着。

毛泽东披着军呢大衣，摘下草绿色的呢军帽，高高举过头顶，在空中不停地挥着向群众致意，并用那口湖南腔洪亮有力地呼着：

“人民万岁！祖国万岁！”

而后，他健步走入欢呼的人群中，热情地握着向他伸来的千百只手。

一时间，口号声、欢呼声、鼓掌声响成一片。

人们含着激动的泪花，目不转睛地望着毛泽东和蔼可亲的面容，沉浸在幸福的暖流中。

毛泽东也很激动，一直到回来后，他还在喃喃自语：“这就是人民啊，他们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

李银桥：参观紫金山天文台

毛泽东一行车队沿着蜿蜒起伏的东郊公路，来到紫金山脚下。因山势太陡，道路狭窄，大家纷纷下车，换上了越野性能较强的苏制“嘎斯 69”吉普车向山顶前进。

正要开动时，陈毅忽然从自己的座车上走下，来到毛泽东车前，笑嘻嘻地说：“主席啊，咱们乘一辆车吧！”

“你的车呢？”毛泽东不解地问道。

“在后头呢，不管它。你看紫金山风景这么好，也好谈谈诗么。”

“也好，也好。”毛泽东微微颔首，说着便往里挪了挪，但因毛泽东身体高大，也没腾出多少地方。陈毅便挤在毛泽东身旁。

其实，陈老总考虑的是万一发生不测，他可用自己的身体挡住毛泽东，以保证毛泽东的安全。在场的领导和警卫人员，无不为陈老总的精神所感动。

抵达山顶，紫金山天文台副台长孙克定满面喜悦地迎上来，欢迎毛泽东的到来。

孙克定陪着毛泽东等领导人首先来到大观测台。毛泽东在大观测台的平顶上来回踱步，举目远望，不觉有些激动，他自言自语地念道："是虎踞龙盘今胜昔啊！"大家顿时活跃起来，一齐鼓掌，无不为毛泽东诗人般的热情所感染。

大观测台在南京沦陷时，曾遭到日本侵略者的严重破坏，当时仪器还没有修复，所以孙克定只简单地向毛泽东介绍了天文望远镜的性能和作用。

不料，毛泽东不能满足，问道："世界上最大的望远镜有多大？"

"美国芝加哥大学所属耶基斯天文台的望远镜是迄今世界上最大的折射天文望远镜，长达 18.9 米。"孙克定回答说，"苏联设计了一架使用反射镜的望远镜，直径为 6 米，它的一块镜片重达 70 吨。如能顺利制造出来，那将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操作的望远镜。"

毛泽东听了点点头，表示赞同。

接着，毛泽东又观看了几件古代天文仪器。他拍拍东汉的浑天仪，对孙克定说："这些仪器过去是为帝王服务的。现在回到人民手中了，你们要为人民服务。"孙克定连连点头。

毛泽东一行从大观测台下来，穿过一片树林，来到最东面的小观测台。那天下午云层比较厚，为了看太阳黑子，等了一段时间。毛泽东抬头看看天，转过身子，风趣地说："我们要看太阳黑子，它害

羞了，不让我们看。天公不作美，帮了它的忙。”

在天文台陈列室里，孙克定叫工作人员取来一块褐色的石头，介绍说：“这是 1952 年在如皋发现的陨石。”

“哦，地球外面来的客人嘛。”毛泽东不无幽默。他拿起陨石，仔细端详，反复看了好长时间，然后慢慢地放回托盘里，沉思着说：“世界、宇宙是物质的。”接着，他说起了天体的起源和演变。

那天在紫金山，毛泽东还观看了当年太平天国革命军与清军浴血奋战的地方——天堡城的遗迹。看罢，毛泽东感慨万千地望着大家，意味深长地说：“在西柏坡时，我就提出来，要大家看《闯王进京》，看来这出戏今后还要看。太平天国革命历史也要建个博物馆，这是极有意义的。”后来，1956 年 10 月 1 日，太平天国纪念馆果然在南京落成。

毛泽东看完天堡城遗迹，信步走到一处山峰，坐在一块石头上，俯瞰南京全景，深刻而风趣地说：“南京这个地方，我看是个好地方。但有一位先生，他叫章太炎，他说龙盘虎踞‘古人之虚言’，是古人讲的假话。看起来，这在国民党是一个虚言，国民党在这里搞了几十年，结果被人民赶走了。如今，它在人民手里，我看完全是实言，是现实，南京还是个好地方！”

2 月 23 日晚 7 时许，毛泽东、陈毅、罗瑞卿等离开南京，登上了洛阳号。谭震林、柯庆施、唐亮等人也上船送毛泽东到浦口，铁道部部长滕代远已在那里等候。毛泽东在那里乘专列北上，途经徐州凭吊了淮海战役战场，在济南游览了趵突泉等名胜古迹，愉快地回到了北京。

十九 爱心

李银桥：第六位老师

我小时候在家乡上过二年级小学。1938 年 11 岁参加八路军后，从 1943 年到 1945 年抗战胜利前夕，在 358 旅教导营又学习了两年文化。在首长身边工作，特别是当了毛泽东的卫士后，我深感自己文化水平低，渴望去学校学习。

1950 年 5 月，我从报上看到中直机关干部文化补习学校招生启示，便向毛泽东提出来："主席，我想上学去。"

"嗯，"毛泽东顿了一下，问道："到哪里去上学呀？"

"中直机关干部文化补习学校。"

"上学是件好事。不过，你非要现在去吗？"

听得出来，毛泽东有点不愿意。但我还是坚持说："我今年都 23 岁了，再不上就没有机会了。"

"噢——23，是不小了。"毛泽东终于答应了："那好，你去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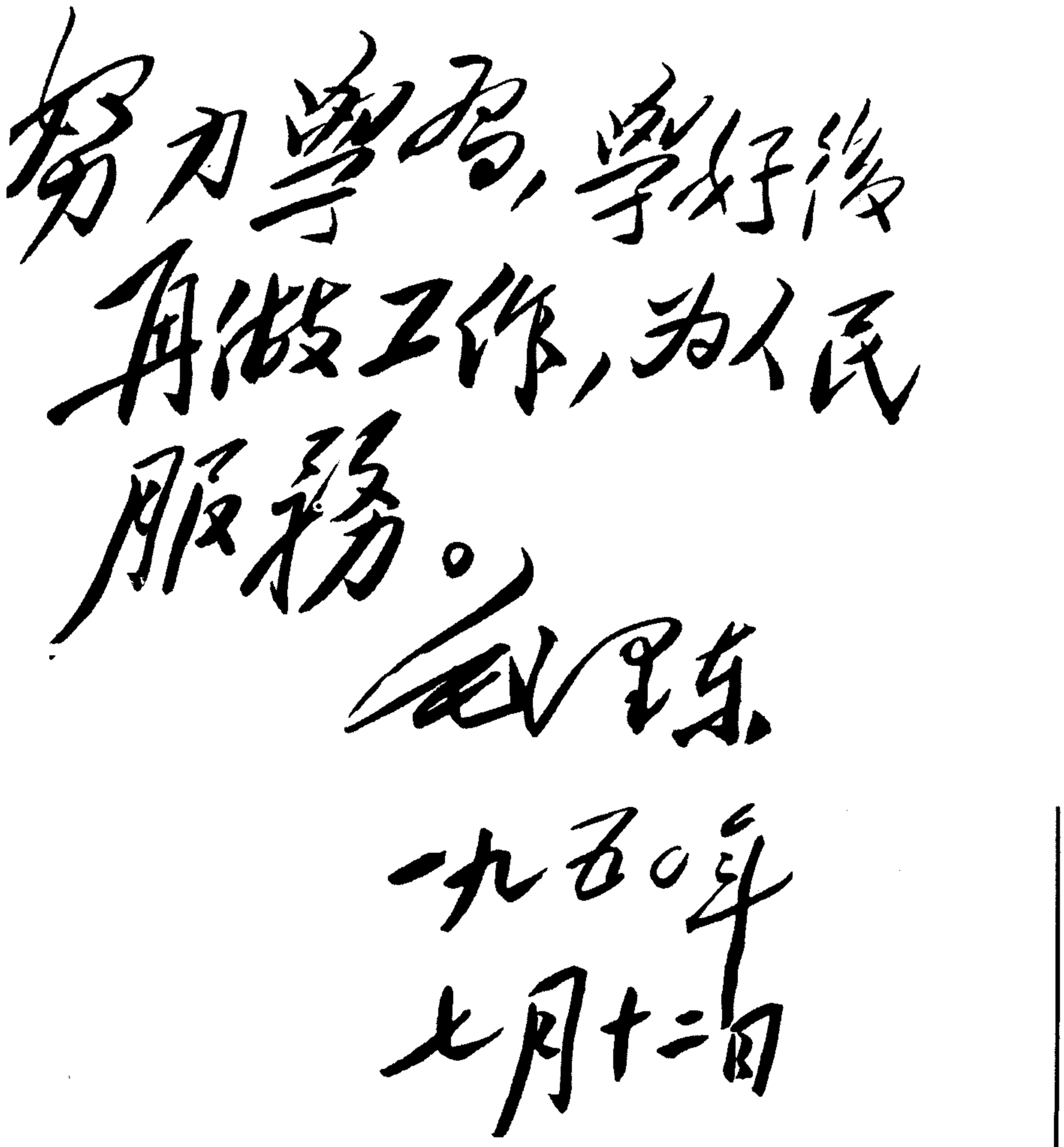
毛泽东一旦答应了，我自己反而犹豫起来。我与毛泽东朝夕相处，真的要离开时心里又有说不出来的滋味儿。我说："主席，我去学习，学完了再回来。"

“好啊，随时欢迎你回来。”毛泽东变得高兴起来。

我拿出黑漆皮面的练习本，请毛泽东题词留个纪念。他抓起笔，想了想，便在第一页上写道：

努力学习，学好后再做工作，为人民服务。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七月十二日



其他几位中央首长听说我要去上学，也欣然给我题了词，勉励我学好文化。

提高文化是学习一切的先决条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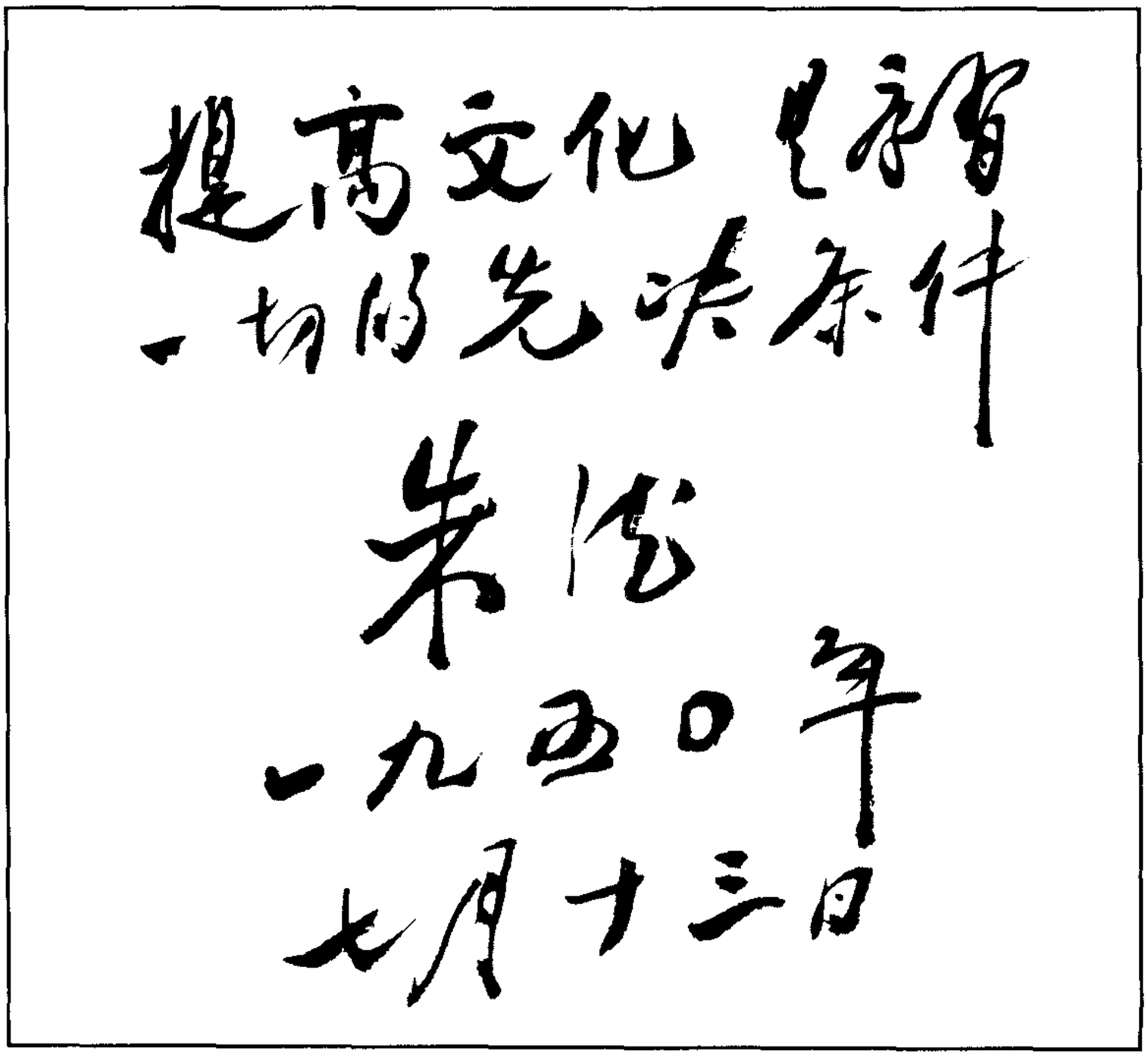
朱 德　一九五O年七月十三日

学好本事，作好工作，不务虚名，自有你的好处。

刘少奇　七月二十五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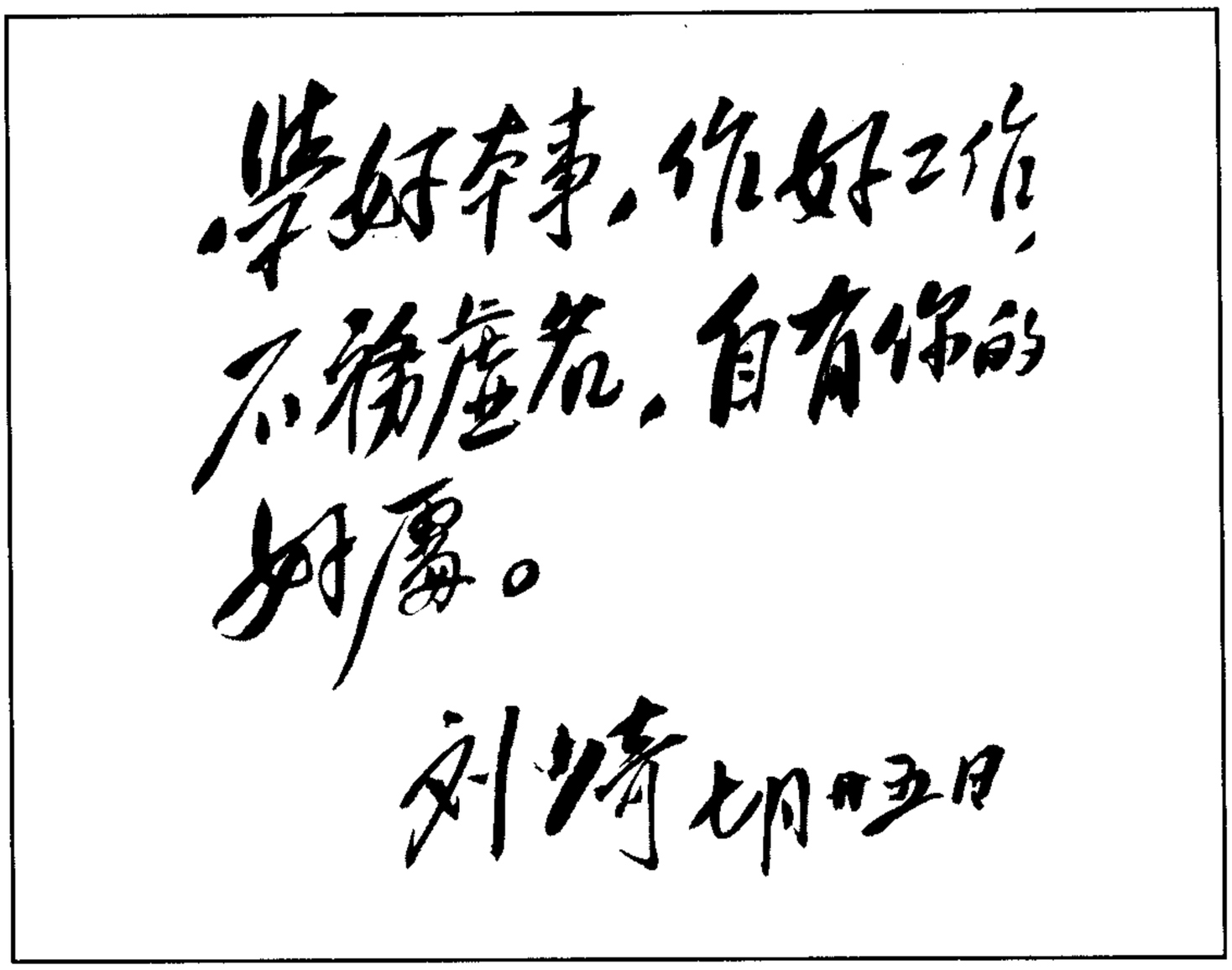
加紧学习，提高文化，不骄不躁，好好地学做一个人民的勤务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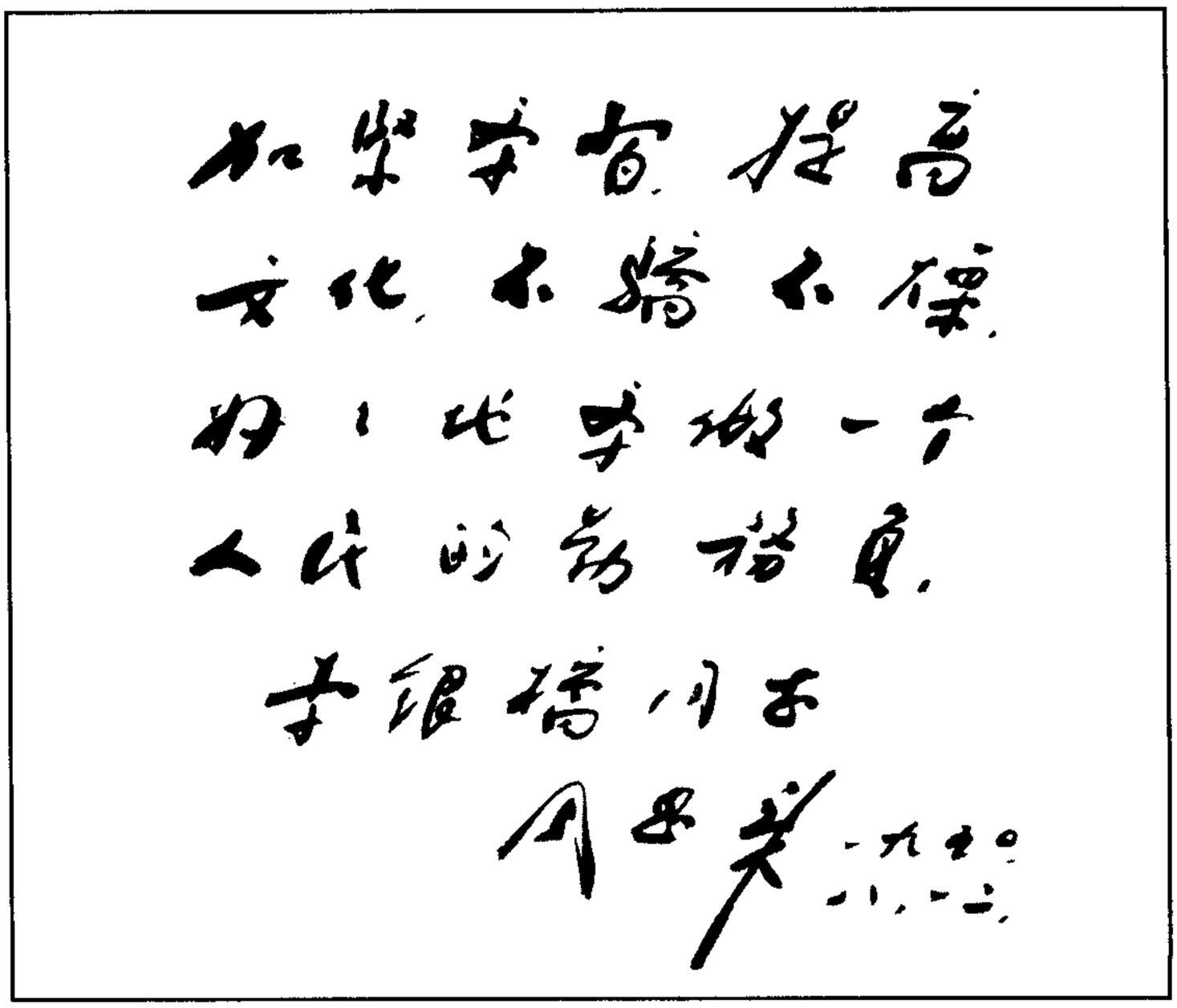
周恩来一九五O，八，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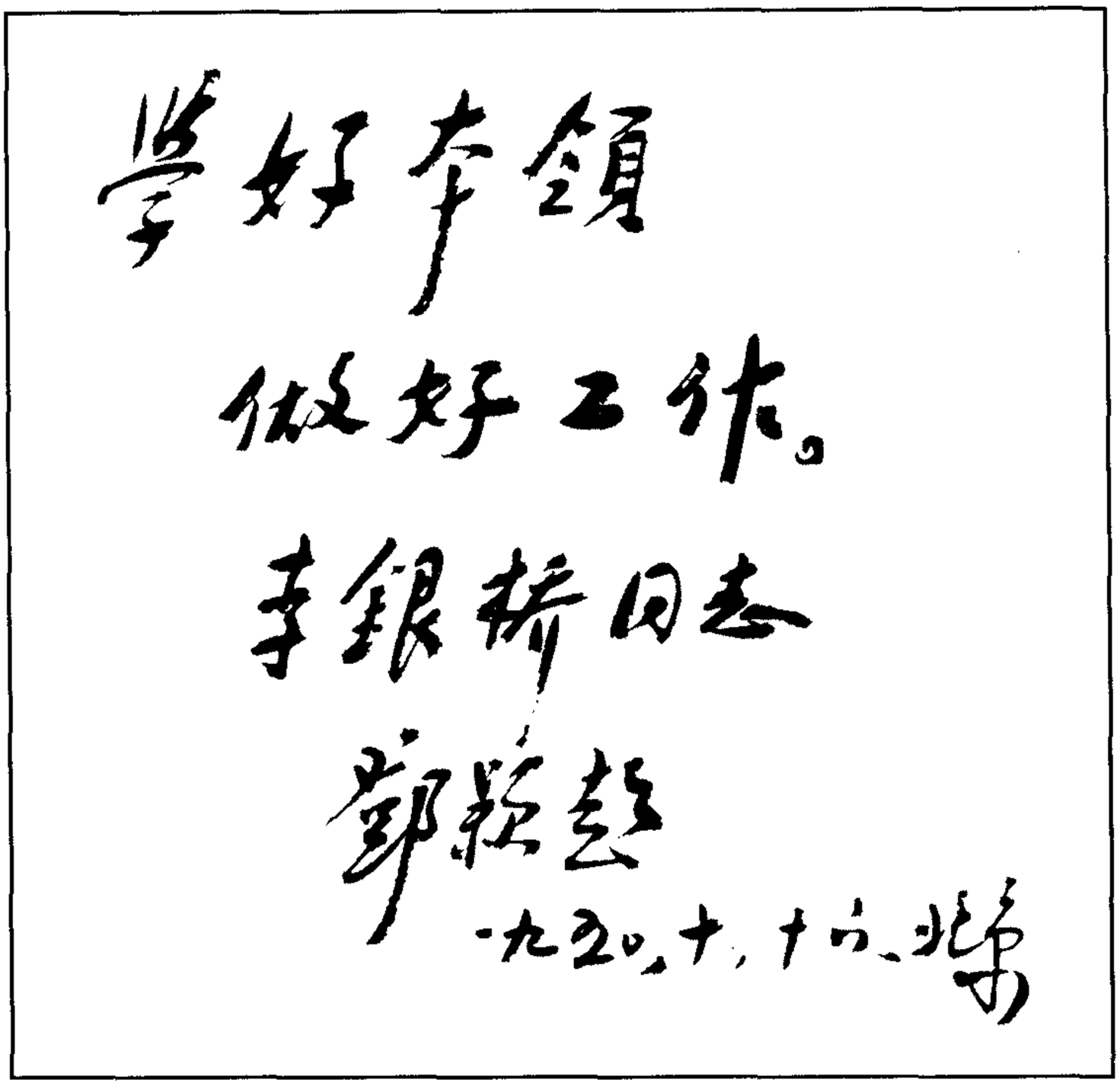


学好本领，做好工作。

邓颖超　一九五〇，十，十六北京







带着首长们的叮嘱，我满心欢喜去补习学校上学。可来到那里一看，这哪里是学校啊，只是一个大院，没有课堂，乱哄哄的。我大失所望，在那里呆了一个多星期，就又回到了中南海。

那天，毛泽东见我回来了，高兴地说："回来好啊！回来继续工作。"

从那以后直到 1962 年，我再也没有离开过毛泽东。

大概因为我外出学习没有学成这事触动了毛泽东。1954 年的一天，毛泽东把叶子龙和我叫去，提议为警卫战士和身边工作人员办一个业余学校。

他说："没有文化没有知识，建设不好社会主义。我身边的人文化程度都太低，不学习不行。教育不普及，文化不提高，国家就富

强不起来。”

他让我从他工资中拿钱，由张国兴管理员买来课本和笔墨、字典、地图、作业本等，70 多个人每人发一套。并以他的名义请来了王近山、朱进礼、周启才等 5 位老师，分别教授语文、数学、地理、政治、自然等课程。业务学校的课堂设在一排小平房里，每天除值班人员外，大家都去上课，一般上下午各上一堂课，每堂上一小时。

业余学校从 1954 年开办到 1957 年结束。老师教得认真，大家学得努力，70 多名警卫战士和身边工作人员，几乎都达到初中毕业的文化程度。

毛泽东经常检查我们的作业本。有一天，封耀松从业余学校上课回到毛泽东身边，忙将本子递过去。毛泽东先看了分数，喜形于色：“嗯，好，又进步了。”

小封也很高兴。可不，作业本上，老师用红笔给他打了一个大大的“5”。

可是，毛泽东还在看他的作业，看得很仔细。笑容渐渐消失，“嘿”了一声说：“你们那个老师也是马大哈呀。”

小封紧张了，把脸凑过去看。那是他默写的白居易的诗《卖炭翁》，毛泽东用手指甲在其中一行的下边划道：“这句怎么念？”

“心忧炭贱愿天寒。”

“你写的是忧吗？哪里伸出来一只手？你写的是扰，扰乱的扰。怪不得炭贱卖不出价钱，有你扰乱么。”

小封脸红了，抓挠头皮窘笑。

“这句怎么念？”

“晓驾炭车辗冰辙。”

“这是辙吗？到处插手，炭还没卖就大撤退，逃跑主义。这是撤退的撤。”毛泽东抓起笔给小封改作业，“虚有 5 分，名不副实。”

于是，小封的 5 分变成了 3 分。

机关业余学校有 5 位老师，其实大家还有第 6 位老师，就是毛泽东。那 5 位老师每人只教我们一门功课。毛泽东哪门功课都教我们。从查字典、四则运算，到地理、历史、时事，他老人家都为我们花了很大心血。即便平日里写家信，也常要帮助改正错别字。那个“的、地、得”的用法，毛泽东就不知给大家讲过多少遍。

李银桥：教卫士学游泳

毛泽东不仅关心我们的学习，也关心我们的身体健康。

他说：“你们一天到晚除了工作就是睡觉不行，要锻炼。没有好的身体怎么行啊？你们跟着我转，时间长了，把身子拖垮了不行，要锻炼。有了好的身体，将来可以做很多工作。”

开始，他教我们学游泳。我和封耀松、田云玉、李连成、张仙朋当卫士之前，都会游泳，但技术都不精。毛泽东利用他游泳的机会，就教我们如何侧泳，如何仰泳。慢慢地，我们几个人都成了游泳能手，跟着毛泽东去追赶大海的浪潮，去畅游湘江、长江、邕江。

后来，毛泽东又拿出钱来，让我们去买来单杠、双杠、哑铃、拉力器、乒乓球台等体育器械，供我们锻炼身体用。

从此，我们每天都坚持锻炼。毛泽东散步时，常来看大家锻炼。毛泽东看到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一个个都生龙活虎，高兴地笑了。

有时，他还和我们一起打乒乓球。乒乓球台就放在菊香书屋西

房江青原来的会客室里。

毛泽东打乒乓球是横握拍。同他指挥游击战、运动战一样，常常冒着出界和落网的危险，竭力将球打出变化，那球落得忽近忽远，忽左忽右。对手奔跑不迭，不一会儿就汗流浃背，而他若无其事。

有时，毛泽东瞪大眼睛，虚张声势地望着对手的左案角。当对手做好迎球准备时，他的球拍挥动一半，忽然抽回胸前，轻轻一推，把球推到右案角，对手应接不暇，差点滑一跤，他便哈哈大笑，吮一吮下唇说："声东击西，杀你个顾头不顾尾。"

于是，大家都开心地笑了。

韩桂馨：卫士小马

进城后，主席身边又陆续增加了几名卫士，这些新调来的卫士年龄也比较小，有的才十六七岁，还透着孩子气呢。

由于事情多，千头万绪的，毛主席又处在党和国家的中心这种特殊的位置，因此主席的工作仍很繁重，生活也无规律。有时几天几夜睡不好，有的时候白天有重要会议，也有晚上睡的时候，但大多数时间主席仍是喜欢夜晚办公。有一次，毛主席的保健医生决心摸透主席的生活规律，以便在保健、营养等方面为主席做好安排。他随主席在办公室的沙发上坐着，他想主席办公他就看书，主席休息他再休息。这样没过几天，他自己熬不住，竟在主席的沙发上睡着了，主席多次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这样做是主动的，你们陪我做是被动的，当然你们比我疲劳了。"大家都被主席的工作精神所感动，无人不佩服主席超人的毅力和充沛的精力。

为了做好主席的生活服务，李银桥将卫士的工作安排成三班倒，大家轮流值班轮流休息，工作有记录，也有检查。

有天早上，卫士马武义说他夜里值班睡着了，毛主席还劝他盖点东西，不要着凉。看他那样子，好像不在乎，大家就都对他提了意见，银桥也对他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指出工作时间睡觉，就是工作的失职。马武义见大家这样，不服气地说："主席还没有像你们这样批评我，我改了就行了。"

我相信小马的话。他这个人孩子气重了点，在工作人员中是最活泼最爱玩的一个。在主席身边久了，他完全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把主席当做是慈祥的长辈。有一次几个卫士逗着玩，他竟钻到了主席的床底下，害得大家找了他好一阵子。

论起工作来，小马手脚麻利，有眼力，主席也很喜欢他。他工作并不是不负责任，就是那个贪玩的毛病老改不了，到底还是孩子嘛。那天轮到他值夜班了，白天也没好好睡觉，到晚上接班时小伙子也蛮精神，白天玩得高兴了么。

这个小马也有点鬼心眼，他知道主席工作起来最怕别人打扰。沏好茶、放好烟，小马悄悄退出来。他怕自己在值班室困劲上来影响工作，就在院子里站一会儿，走一会儿，反正院里冷，人在冷空气里就容易清醒，不犯困。

到了后半夜，周围静极了，小马大概也走累了，他见院里有个躺椅，就坐了上去。这是主席的椅子，小马坐在上面，很舒服。他伸伸有点酸痛的腰，揉揉走累了的腿，周围万籁俱寂，只有星星在夜空中眨着眼睛。他看星空，数星星，不知不觉睡着了。

毛主席办公累了出来散步，这是他多年的习惯。主席走到马武

义面前，想和他聊聊天，走一走。小马虽然迷糊过去了，但还很警觉，他听到脚步声，腾地站起身，见是主席站在自己面前，一时竟不知所措。

主席没有怪他，随便问了两句，还劝他到屋里去睡，说院里冷，小心不要着了凉。小马更不好意思了。

毛主席又回办公室了。从主席的窗子里透出的亮光，使人有一种温暖的感觉。小马揉揉太阳穴，揪揪自己的眼皮，和瞌睡虫作着斗争。但他不敢弄出响声，怕惊动主席。

谁知不一会儿，主席又出来了。他径直走到小马面前，对他说："天气凉了，身上要盖一点东西，不要着凉。"

马武义感到一股热流在胸中涌动，今晚仿佛不是他在为主席值班，倒像顽皮的孩子在处处受到慈父的关照。

韩桂馨：有字的苹果

在北方，秋冬季节大家都喜欢买一些国光苹果，这种苹果甜酸适口，松脆多汁，而且很好保存。每年我家里都买上一些。

有一次，主席当年的几位卫士到我家小聚。饭后我又端上一盘苹果，在他们聊天时，我在一旁为大家削果皮。

"这是国光苹果吧？"一位朋友问。

"是啊，烟台产的，又脆又甜。"银桥随口答道。

"你记不记得那年主席过生日，我们吃的金日成主席送来的苹果？"说话的人意味深长。是啊，每当主席生日纪念日，大家聚在一起时，总是在一起回忆过去的岁月。主席过生日发生的事又总是

一一被大家提起。他说的吃苹果的事我们又怎能忘呢?

那是1954年，我已离开了主席那里，考取了人民大学附属工农速成中学。每星期回家，我除了料理一下家务之外，仍抓紧时间复习功课。年底将近期末考试，自然比平时还要紧张。

在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工农速成中学读书时的韩桂馨

“小韩，你学习用功，给你一点奖励。”银桥一进门，就对我嚷嚷着说。看他那神情，半真半假的，我不知他是不是拿我打趣。因为我虽是很用功的，但学习仍很吃力，成绩也一般，谈不上应受什么奖励。我对他的话半信半疑。他见我的疑惑劲，就认真地从他的外衣口袋里掏出两个苹果，递到我手里。

我一看这两个苹果，都有茶碗那么大，长得很匀称，红红的，保存得很好，外面还有一点点白霜呢，其余部分可能是在银桥口袋里擦掉了。我凑在鼻子下闻了闻，啊，真香！但奇怪的事也出现了，原来苹果上有“毛主席万岁”这几个字，我又看了看另一只，也一样。这是怎么回事?

银桥说：“这是金日成主席在毛主席生日时送的，上面的字是写好后晒出来的，一共有24箱呢。毛主席让我把这些苹果送给警卫部队了。开始时大家发现了苹果上面的字，就不知怎么办才好。有人说这些苹果干脆别吃，保存起来，天天闻香味吧。”

“那当然好，但是苹果蔫了怎么办呢？”我没等银桥说完，又提出了一个问题。

他见我的样子，很不以为然地接着他自己的话说下去：

“我把这个情况向主席作了汇报，主席听了，皱着眉摇头，他说：‘我就不喜欢这个口号。哪有人能活一万岁的？活不到，那就吃掉。’”

噢，原来这是银桥把自己的苹果转送给我了，但是这里面又有一种很深刻的内容。那时候，我是首次听说毛主席本人不喜欢这个口号。“文化大革命”时，主席又亲口对美国友人斯诺说，这句口号“很讨嫌”，我觉得这很符合主席的性格。

那两个苹果在桌上摆了整整一天。现在吃苹果，还常常想起当年的那些往事。

李银桥：他不喜欢“万岁”这个口号

朝鲜停战后，大概是第二年（1954 年），金日成主席赠送毛泽东主席 24 箱苹果。

一般国内外送给毛泽东的礼品，毛泽东看到的只是白纸黑字一份礼品单，并不见实物。实物直接由负责礼品的部门交公。这一次因为是金日成所赠，又是不宜保存的果品，所以毛泽东吩咐我把苹果转赠给警卫部队。

我将苹果送到警卫一中队，恰好是春节前夕，大家非常高兴，七手八脚打开纸箱，忽然都傻眼了。那是国光苹果，拳头大小，整齐匀称。每个苹果上都有一行字：毛主席万岁！

那字擦不掉。原来，那是早早写在苹果上，被阳光晒出来的。

“毛主席万岁”怎么能吃掉呢？大家束手无策。有人建议说：“这样也好，干脆别吃，保存下来，天天可以闻到苹果的香味。”

我把这个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大不以为然，皱着眉摇头："我就不喜欢这个口号。哪有人能活一万岁的？活不到，那就吃掉。"

于是，24 箱晒有"毛主席万岁"的国光苹果便全被我们吃掉了。

邓小平同志说过："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主席，我们党可能还在黑暗中苦斗。"

这是千真万确的。正因为如此，全国人民高呼"毛主席万岁！"那是他们发自内心的对领袖的崇敬和爱戴，是很自然的事情。而毛泽东开始是警惕这种个人崇拜的发生和发展的，不许在天安门广场为他竖铜像，称竖铜像的工作为"只有讽刺意味"。

但是，再伟大的人物，生活在这个山呼万岁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国，天天面对万岁的呼声，不习惯也会习惯起来，终于变得习以为常，理所当然。万岁喊多了，必然神化；神化了，就脱离群众了；越脱离群众，就越容易被神化；加上林彪、"四人帮"等一小撮阴谋分子别有用心的"造神运动"，悲剧也就会产生。这是很值得重视的一条教训。

韩桂馨："你这个女儿啊，比男孩还淘气。"

主席喜欢孩子，和孩子在一起时，他显得松弛，表情特别慈爱，而且还喜欢和孩子们开玩笑，就像寻常百姓家的爷爷。

我的大孩子 3 岁时，我们把他接到北京。我这个儿子，小时候长得很可爱。虽然人小，可到了新地方却不陌生，不几天，就对这个新环境很适应了。李敏、李讷很喜欢他，星期天回来，常领着我

的孩子玩。有天下午我好长时间没见儿子，房前房后都没有。我估计李讷可能领孩子去菊香书屋了，就到主席院里去找。

时正初春，天气还有些冷，我刚进主席的四合院，见银桥正在房门口站着，我悄悄来到门口，问他见到儿子没有。银桥往屋里一指，我马上看到了一幅生动的画面，阳光照进屋里，像一束光线织

李银桥、韩桂馨夫妇和他们的儿子

成了伞，罩住了屋里的四个人：后面站着的是李敏、李讷，前面的一老一小正津津有味地聊着，主席坐着，我儿子站着还要仰头望着这位爷爷。孩子天真幼稚，主席和蔼慈祥，难怪银桥不忍心去打断他们呢。

在这里，我要顺便谈谈我们家住的位置。

我们家离主席住的地方很近，菊香书屋的北房外面，有条南北走向的夹道，夹道北头有个便门，走出去就是中南海岸的马路，主

席到怀仁堂开会就从这个便门出入。夹道西侧有排平房，靠南边的是卫士值班室，北边是厨房。我们住的房子就在夹道东侧。周围有些小平房拆除了，形成了一小块空地，水泥地面成了走路和散步的地方，还有一小片草地，烧锅炉的老关和老李拾掇出来一小块菜地，里面种了各种蔬菜，周围种了一圈向日葵。菜地的东边是养猴的笼子，笼子是用旧木板钉的，共有两个，中间用一块板隔开，提出板，猴子可从一个笼子到另一个笼子。我们养的两只猴子是广州送来的，个子不大，很逗人喜爱。

我们种菜、养猴主要是为了让主席消遣、休息。当然新鲜的菜也送到主席的厨房中去，让主席尝尝鲜。工作人员也吃，但不是主要的蔬菜来源。

儿子卓韦渐渐长大了，1954 年出生的小女儿也两岁了。

记得有一次，猴子没栓牢，从笼子里跑出来，吓得六岁的儿子急慌慌地跑到厕所里，把自己关在里面哭起来。小猴子不怕人，主席有时还让小猴子爬到肩膀上。当他听说我儿子让猴子吓成那种狼狈样，竟哈哈地笑起来。

天变暖了以后，卫士值班室又多了一对小白兔，因院里有草，菜地有菜，小兔子饿了肯定吃现成的。小兔子毛茸茸的，白雪般的身子，红红的眼睛，非常

韩桂馨与女儿

可爱。有一天，主席从怀仁堂开会回来，从北面的便门进来。银桥刚好跟主席一起走，胳膊下夹着一包文件。走到值班室门口，主席忽然站住，哈哈大笑起来。银桥也笑了。值班室的卫士跑出来一看也笑了。原来两只小兔子被我女儿赶出来，她自己进了小白兔的窝——大柳条筐里，坐在里面洋洋自得地东张西望，大大咧咧的。两岁的孩子当然不懂得卫生不卫生，头发上还挂着草叶子呢。

主席哈哈地笑着，对银桥说："你这个女儿啊，比男孩还淘气。"

李银桥：了解农村的真实情况

1955 年 5 月 14 日，毛泽东游过泳之后，来到中南海丰泽园接见警卫部队。部队的同志们都换了崭新的军装，站成队列。毛泽东走在队列前和战士们打招呼，内卫班的一些战士他可以叫出名字，担负外卫任务的战士，他就叫不出名字了，便一一询问。院子里的气氛很快便活跃起来。

毛泽东讲话仍然保持着延安时代的作风，亲切、随便，喜欢启发式，习惯用最通俗的语言来阐述任何最复杂的道理。

"我们工作是为什么目的呢？"毛泽东的目光从前扫向后。队列里就有人回答："为共产主义！""为人民服务！"

毛泽东点点头，招呼大家坐下，自己也在藤椅上坐下来。他一般不爱讲空道理，特别是对工农兵，讲话只讲有具体内容的话。他像拉家常一样，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发展讲到现在的社会主义建设及未来的工业化前景。这时，他抬起左手，用右手扳着指头说：

"具体到我们警卫部队每个同志来说，我以为你们应该有三项任

务：一、要搞好保卫工作；二、要努力学习文化知识；三、要做群众工作，要学会搞调查研究……”

毛泽东对调查研究的态度、方法、意义作了详细阐述，并且热切地号召每一名警卫战士回家探亲时，都要写调查材料，要研究社会，回来向他报告家乡的真实情况。

事后毛泽东对我讲：“以后你也要这样做，搞社会调查，写书面报告，拿来给我看。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是提高你们文化知识水平，锻炼工作能力；二是使我了解全国的真实情况，并且使我从你们那里学到一些知识。”

为了更全面地了解情况，毛泽东要求负责他的安全警卫工作的一中队成员，须从全国每个专区选一名，不要重复。

那以后，每个休假回来的战士都要写调查报告。战士高碧岑的材料，毛泽东看后，说：“写得很好。你写的这位合作社干部，病得那么重还要带领群众搞生产，使我也受到鼓舞和教育。你代我写信问候他，问问他的病好了没有？下次回家你再去看看他。”说罢，毛泽东在高碧岑的材料上写下一句批语：“此份报告写得不错，有分析，有例证。”

现在这份材料就保存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

不久，战士曾文从广东探亲归来，将一份家乡人民依靠合作社的集体力量战胜百年未遇的大旱灾的调查报告交给毛泽东。毛泽东阅后很激动，在调查报告上写了四个大字：“合作社好。”

1955 年春天，毛泽东叫我回家探亲，顺便了解合作化进行情况。

我带了任务回河北安平探亲，找农民聊，找村里的支部书记聊。支部书记李培学先讲了村里的合作社最初是怎么形成的，有什么优

越性，存在什么问题。讲到后来，他说："唉，开始还不错，现在有些简单化了。"

我问："怎么简单化了？"

他说："区里来了干部，命令全村人站到场院里，他就在人前宣布：跟蒋介石走的站那边，单干。跟毛主席走的站这边，搞合作化。你说，谁还肯站那边跟蒋介石走呀？情愿不情愿都得站这边搞合作化，这不符合政策么。"

我说："确实简单化了。你能不能写一下？"

支书高兴了，说："行，我写封信，你捎给毛主席他老人家。"

回到北京，我把信交给毛泽东，如实汇报了情况。

毛泽东一边看信一边摇头："那怎么行啊？胡闹，太简单化了！"

说罢，他想了想，抓笔作了指示，批给了河北省委书记林铁，要他注意这件事情。

林铁同志：

此事请你予以处理。这是我的卫士回他的家乡安平县从那里带回的一封信。这种情况恐怕不止安平县一个乡里有，很值得注意。

毛泽东　　三月五日

河北省委接到批示后，就派人下去了解情况，并把结果拍电报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阅后，批给我看：李银桥阅。

河北省委在纠正简单化过程中，又发现了南王庄以王玉坤为首的 3 户农民的合作社，便也写了一份材料送毛泽东。毛泽东见到这份材料后，很振奋，为此写了《五亿农民的方向》那篇文章。

李银桥：跟身边工作人员学英语

1955 年，汪东兴不再兼任卫士长，我由副卫士长升任卫士长。毛泽东是这样评价我的：“你不爱说话，不善言词。但是纪律观念强，时间观念强。工作钉是钉铆是铆，不搞小聪明。你学习稍差些，但人是好人，心眼好。这就行。”

卫士长是不参加值班的，但毛泽东改变了这一惯例，对我说：“升官了，可是老不见也不好吧？我和你惯了，你一礼拜值一两个班，这样我就可以见到你。”

我照毛泽东的话办了，每星期值一两个班，保持经常见面。

毛泽东虽已年过花甲，工作又是那么繁忙，但他还是身体力行，挤出时间来向英语水平较高的林克同志学习英语。

毛泽东那时熟悉的单词和短语还不很多，他就从阅读新闻、时事和政论文章入手，以后逐步学习《矛盾论》、《实践论》等英译本。

毛泽东说话湖南口音很重，有些英语单词发音不准。他就让林克领读，他跟着读。有时，他自己再练习几遍，请林克听他的发音是否标准。遇有生疏的单词或短语，他便用削得很尖的铅笔，在单词上注明音标，并在书页空白的地方，用密密麻麻的蝇头小楷注明每个单词和短语多种不同的意思。

为了学好英语，他身边经常放着两部字典：一部《英汉字典》，一部《汉英字典》，以备经常查阅。每次到外地视察工作时，也都带着字典。

毛泽东学英语，把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都利用了起来。他经常

在刚刚起床后，或在入睡之前，或饭前饭后，或爬山、散步中间休息时，以及游泳之后晒太阳时来学英语。在外出巡视工作期间，无论在火车上、轮船上、飞机上，随时都挤时间学习英语。1957 年 11 月，毛泽东去苏联参加莫斯科会议，也没有中断过英语学习。他当时住在克里姆林宫里，睡觉前总要让林克同他一起学习一会儿英语。

韩桂馨："努力学习，日进有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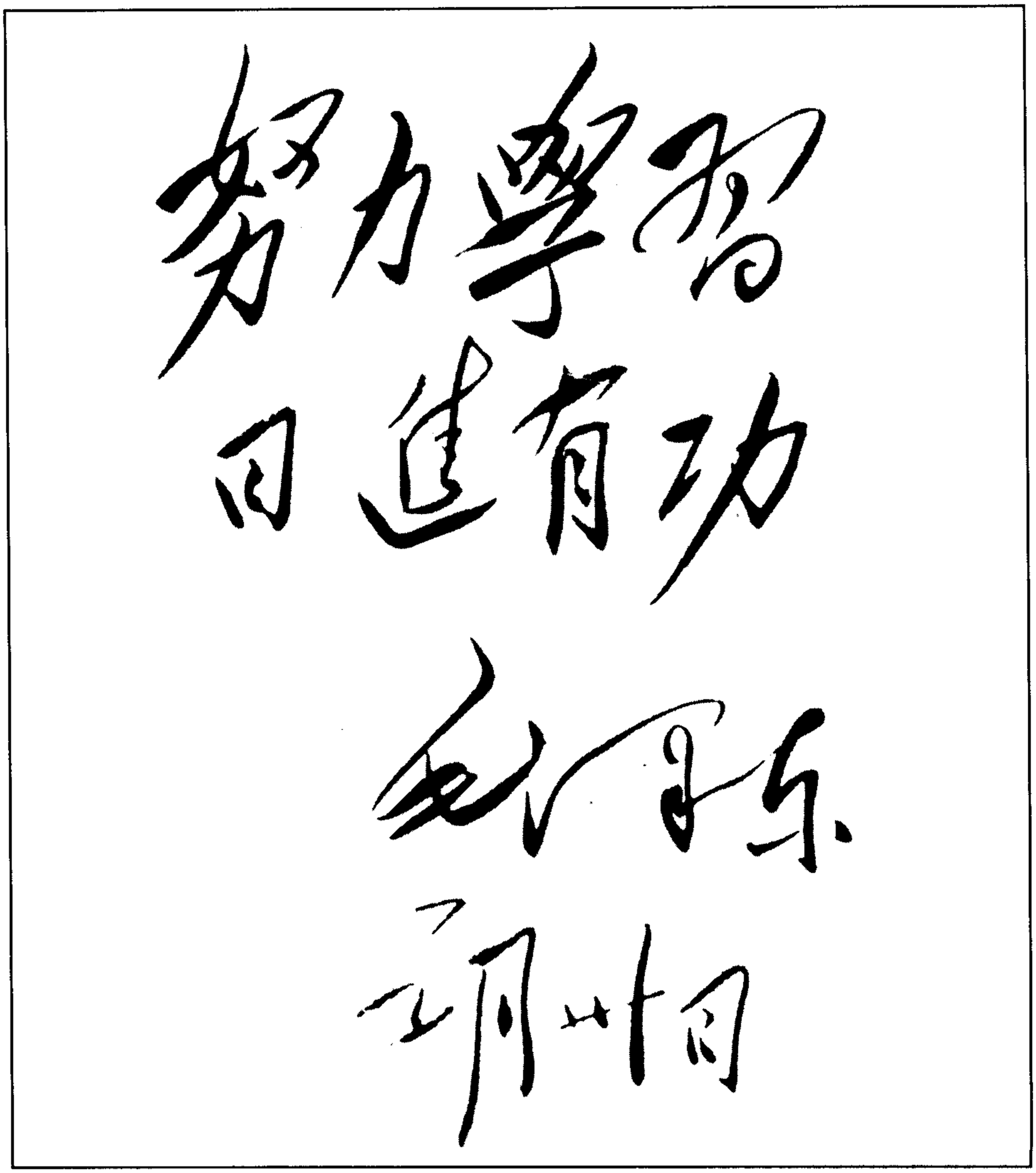
1950 年 6 月，王敬先找我谈话，他说："李敏、李讷已经进学校读书了，孩子们假期有李云露老太太照顾，这里事情不多了，组织上决定分配你到中央办公厅收发室工作。"

收发室当时隶属于警卫局领导。我虽到了收发室，仍经常被借调回来照顾李讷。记得有一次李讷在北京医院住院，我陪住了一段时间。我认为让我做陪护，主要考虑我与李讷较熟悉，好相处，另外找人还要进行政治审查等，紧急时也来不及找人。就这样，我断断续续地又在主席那里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来我考上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工农速成中学。我是 1954 年 8 月去学校报到的，这时我的第二个孩子刚刚 8 个月，为了保证自己能安心学习，我和银桥商量，将大儿子放在托儿所全托，这小女儿就请个阿姨照顾吧。我给孩子断了奶，就当了住校生。我吃住在学校，到周六才回到中南海的家里。

当时我已经 25 岁了，又是两个孩子的妈妈。虽然我在中南海的夜校学习了一段文化知识，但毕竟把课本放下的时间太长了。速成中学，就是要将 6 年学完的中学课程，缩短到 4 年完成。自己基础差，困难是很多的。临上学前，我去见毛主席，请他老人家为我题

个词。毛主席听说我去上学，高兴地拿起笔，饱蘸墨汁，挥笔写下了“努力学习，日进有功”8个大字。从此我在自己的学习生活中，始终将这8个字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对中学课程，我喜欢几何，做题时想尽各种方法，觉得很有意思。但对化学和物理课，学习困难就大一些，特别是俄语，发音挺



难掌握，卷舌音老发不好。遇到困难时，我就想到了毛主席的教导，主席说的日进有功，是要我不断进取，获得成绩。我就自己给自己鼓励：胖子也不是一口吃成的，我就一口一口吃呗。我列了一个学习计划，抓紧一切时间，充分利用早自习、晚自习的时间，连上厕所、走路、乘公共汽车时也用来背外语单词，靠着这种毅力，我终于胜利学完了中学的全部课程，并考上了人民大学。我上大学时，儿子已经上了小学。等我读完 4 年大学时，女儿也上小学了。

1985 年我离休后，又进了老年大学，学习书法和绘画，不断丰富和提高自己的知识和水平。我要永远以主席的教导鞭策自己："努力学习，日进有功。"

二十　大风大浪不可怕

李银桥：第一次畅游大海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毛泽东松了一口气。记得停战协议签订那天，毛泽东走出屋门，深深吸口气，然后唱了一嗓子京剧。这是他每次胜利后特有的抒发感情的一种方式。

此后，毛泽东将主要精力投入了国内建设，往全国各地跑的也多了。1953 年 12 月底至 1954 年 3 月中旬，毛泽东在杭州住了近 3 个月，主持写出了我国第一部宪法。

以后，毛泽东几乎每年都要去杭州住一段时间。每次去杭州，王芳同志都要亲自精心安排有关安全警卫和饮食起居。毛泽东对此非常满意。

谁知“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有人把正常的会议录音说成是对毛泽东搞窃听，1967 年王芳被捕押解北京，关进秦城监狱。

1974 年，王芳的夫人刘馨同志到天津找我，把王芳的身体状况写了个材料，托我转给毛主席，要求保外就医。

毛泽东看到材料后，说：“浙江省的造反派说王厅长反对我，想害死我，我不信，他反对我做什么呀？我每次去杭州，都是他负责

保卫我的，他要是想害死我，我不早死了，还能活到今天呀！他反对我，我自己怎么不知道呀？他是保卫我的，王厅长是个好人，没什么问题。就是爱喝点酒，告诉他，以后别喝了……”说到这里，毛泽东自己也笑了。

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关押 8 年之久的王芳同志才得以回到杭州家中。

1954 年 4 月，毛泽东去秦皇岛视察回北京途中，在北戴河停下来，住了一夜，只远远地看了看大海。

毛泽东在北戴河住在张家大楼。这是当年张学良将军为避暑而修建的别墅。4 月的北戴河，春寒料峭，而楼内没有取暖设备，我们就生了木炭火盆供毛泽东取暖。

这年夏天，中央统一安排去北戴河。我们随毛泽东来到北戴河，住在浴场一号平房。那房子掩映在一片小叶杨树林中，环境很幽静。中间是会客厅，毛泽东照例是住在东面屋里。江青住在西面屋里。

毛泽东在这里除了办公、开会、会客外，就是游泳。

有一天，毛泽东对我说：“银桥，你去看看，能不能游泳？我想游泳。”

我跑出去一看，正刮着风，海浪很大，回来对毛泽东说：“主席，不能游，浪太大。”

“我看看去。”说着，毛泽东就扔下手头的工作，往外走。

来到海滨室，毛泽东脱下衣服，换上泳装，便向大海冲去。我们也迅速跟着他向大海冲去。

俗话说：海上无风三尺浪。何况是个大风天。咆哮的海浪一下子把毛泽东掀到浪峰上，一下子又把他跌入波谷，我们十几个警卫

人员和卫士，还有河北省公安厅的几位同志都吓坏了，大家紧紧围着毛泽东。可毛泽东不慌不忙。他先是侧泳，轻松自如地划水。后来仰泳，两腿一蜷，两手不紧不慢地划着，逍遥自在。

毛泽东游了一个多小时，上岸，坐在藤椅里晒太阳。他兴奋地说："好吧，你们说浪大。我们下去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这是他第一次去北戴河避暑办公，第一次畅游大海。为纪念这次难忘的活动，他写下了《浪淘沙·北戴河》：

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
秦皇岛外打渔船。
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

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
东临碣石有遗篇。
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我们7月初去，8月20号回来。毛泽东越紧张，江青越闲得慌，每天就是由我们卫士和女护士陪着她打扑克消磨时间。每天午觉起来，她绕平房散一圈步，或者去游泳。她游泳水平一般，能游一段，就是姿式不行，只会"狗刨"，而且长进不大，比王光美差多了。王光美会蛙泳、侧泳、仰泳。也许就为这个原因，她游泳兴趣不太大，游一游回来还是打扑克。

见到这种情况，特别是看到毛泽东连续工作太疲劳，我们都劝他适当注意休息，换换脑筋可以更好地工作。可以和江青打打扑克么。

毛泽东早就说过，办公办累了看书也是休息，看书看累了下棋也是休息。只要“换脑子”就是一种休息。所以他还听。工作太疲劳时，偶尔过来同江青打扑克。

他们是打“都拉K”。

这时，江青是乐于输掉的。毕竟是两口子，毛泽东赢了她不争，毛泽东心情好，休息好，她还是满意的。

1955年，何香凝画了一只老虎，用玻璃框镶着，送给了毛泽东。这是一只立虎，毛泽东将画靠墙立住，反复欣赏，像是琢磨什么。良久，对我吩咐一声：“是了，这只虎应该放东屋。”

我照办了，却始终不明白为何要放东屋。

李银桥：第一次畅游泳长江

1956年初夏，毛泽东来到广州，住在广东省委附近的一个珠岛上。

天气燥热。毛泽东望着珠江念念有词，忽然转脸朝我吩咐：

“银桥，我们走吧，到长江边上去。我们去游长江。”

啊？游长江！我立即去报告罗瑞卿。罗瑞卿，还有汪东兴、王任重都坚决反对。海比江大，但是江比海险。无论流速还是水情的复杂性，长江都比北戴河的海水浴场来得危险。出点事，无法向党中央和全国人民交代。

罗瑞卿来劝毛泽东：“主席，我是不同意你游泳。我要负起责任。你去游长江我负不起责任。”

毛泽东不听，烦躁地大声说：“无非你们就是怕我死在那个地方么！你怎么知道我会淹死？”

罗瑞卿吓了一跳，显得很不安。他怎么敢想毛泽东被淹死？他赶紧解释："主席，不是那个意思。保护你的安全是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是不同意您冒风险，哪怕是一点风险也不许有。"

毛泽东还是不听，坚决说："先派人去试试水性。"

于是，警卫队一中队韩庆余队长被派去实地考察，看长江到底能不能游。

韩队长也是反对毛泽东游长江的。他去长江考察，沿江询问一些人，这些人都说不能游，漩涡太大太多。他喜欢听这种话，有了证明便匆匆赶回来向毛泽东汇报。

毛泽东听罢问道："你下水了没有？"

韩队长一怔，脸刷地红了，喃喃着："我没有下水。"

"没下水你怎么知道不能游？"毛泽东有点不高兴了。

罗瑞卿又派副卫士长孙勇去实地考察，他游泳游得好。毛泽东指着孙勇说："你再去，你亲自看看长江到底能不能游？"

孙勇自然一去便下了水。游一趟回来，向毛泽东报告："没问题，完全可以游。"

王任重匆匆赶回武汉准备，亲自组织游泳选手护泳，并且探水性，选地点。

于是，毛泽东乘飞机从广州到长沙，游过湘江，算是准备活动，又乘飞机到武汉。

毛泽东兴致勃勃地登上一艘客轮。工作人员将软梯放下水，韩庆余队长和孙勇照顾毛泽东下水。我跟在毛泽东后边下水。

毛泽东游泳就像散步一样轻松自如，一边和我们警卫人员及护泳的运动员谈笑，一边侧着身子悠哉悠哉地划水。高兴时，还扎个

1956年，毛泽东畅游湘江后上岸与孩子们在一起

猛子，然后露出水面，在水中点上烟抽。

那天游泳回到东湖宾馆，毛泽东召集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等领导同志在一楼会议室开会。会后，便赶回北京接见外宾。接见前，毛泽东兴奋地说："罗部长不叫我去游，我就去。还不是去了吗？一游就是16里！明年6月份我还要去，把他也要拉下水。"这种兴奋得意之态，一直延续到接见开始。当外宾出现在面前时，他才恢复了平常公开场所表现的那种庄严神态。

毛泽东首次畅游长江，诗兴大发，《水调歌头·游泳》就是这次写下的：

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
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余。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
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
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以后，毛泽东又曾多次去畅游长江。1957 年，毛泽东第 4 次横渡长江，他感慨地说：“长江，别人都说很大，其实，大并不可怕。美帝国主义不是很大吗？我们顶了他一下，也没有啥。所以，世界上有些东西，其实并不可怕。”

毛泽东游长江。左三是李银桥，正扶毛泽东起来

1957 年 3 月 12 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说："大风大浪也不可怕。人类社会就是在大风大浪中发展起来的。"

李银桥：使用国产收音机

1955 年印尼苏加诺总统来华访问，受到隆重欢迎。毛泽东曾对我说："过去我们搞解放区，搞根据地，国民党封锁我们。封锁来封锁去，我们没有饿死，夺取了全国政权。现在我们搞建设，国际帝国主义又来封锁我们，我看他们也不会得逞。我们会争取到越来越多的朋友。"

与外宾合影时，摄影师侯波一边对镜头一边朝后退，不小心绊了个跟头。毛泽东飞步上前搀扶起她，关心地问："怎么样？没摔伤吧？"

侯波红着脸说："没事，没事。"

我跟毛泽东去机场为苏加诺送行。回来的路上，毛泽东提议："咱们找个饭馆吃饭去。"

我知道毛泽东非常留恋普通人的生活。当时朝鲜战争结束，国内形势安定，一片太平景象，安全方面问题不大。我便同意说："行，咱们吃西安羊肉泡馍去。我在那儿吃过。"

正是早八点多钟，饭馆里还没有顾客。我请师傅现做了泡馍。毛泽东不大爱吃羊肉，但他兴致很高，在这种小饭馆里一坐对他来说就是一种享受。

吃过羊肉泡馍，毛泽东又吩咐去看日本的工业展览。展览是在苏联展览馆（今北京展览馆）里举办的。毛泽东认真看完全部展览。主办的日本人送给毛泽东一个半导体收音机，那时我国还不能生产

这种东西。

在接待苏加诺时，我们布置颐年堂，毛泽东曾经亲自去检查。他看到屋里摆的收音机，问："为什么要摆外国的？摆一台'东方红'不是更好吗？"于是，我们马上换成了国产收音机。

现在看到日本生产的半导体收音机，毛泽东诚恳地对日本人说："你们的展览办得很好，希望以后能加强经济友好往来。政府间不好往来，还有别的渠道，还可以加强民间往来么。中华民族是个伟大的民族，日本民族也是个伟大的民族，我们两国人民应该团结互助。我们欢迎你们多来，多交往。"

毛泽东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为了民族的兴旺发达，他也是强烈希望与世界各民族发展经济、文化的往来交流。只是限于当时的国际环境，不能一下子从根本上打开局面。

李银桥：他和江青"吃不到一起"

毛泽东喜欢吃红烧猪肉，喜欢吃五花肥肉。我在他身边 15 年，他进口的东西必经我们卫士之手。这 15 年中，他没吃过任何滋补品，如果说吃过，那就是红烧肉。

保健医生多次劝毛泽东注意营养，改变饮食习惯，多吃点有营养的东西。毛泽东每次都摇头。他的固执是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的。他的道理又是轻易不好反驳的。他有几句话给我印象很深。

一次，他用毛竹筷子敲敲碗里的二米饭（小米加大米），望着保健医生说："全国农民要是都吃上我这样的饭，那就很不错了，你就可以跟我提你那些建议了。"

另一次，他皱着眉头朝喋喋不休的保健医生挥手："你不要说了。我是农民的儿子，自小过的就是农民的生活。我习惯了，你不要勉强我改变，不要勉强么！"

毛泽东有时简直是个谜，就是我们这些贴身相处的卫士也往往感到他确实"神"。他的工作量惊人，睡眠、饮食、活动都没个规律性。可他的身体就没事，极少闹病，身体极健康！怪不得任弼时多次向周恩来感慨："中华民族有幸，出了个毛泽东！"

记得1956年的一天晚上，毛泽东又是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值班卫士田云玉一再提醒："主席，你该吃饭了。"

"是吗？"毛泽东喝着茶说，"嗯，有些饿了呢。好吧，我吃一顿饭吧。"

按规定，毛泽东一周要吃两次红烧肉，这天又轮到要吃红烧肉了。可是，江青知道后，却不让搞。

说实话，江青对毛泽东的生活还是比较关心的。她对营养学有一些研究，特别是进城后长了不少知识，反对毛泽东吃肥肉，多次劝毛泽东："年纪大了，肥肉吃多了不好，胆固醇高，容易造成血管硬化，出现血栓。"我们卫士组归她管，她的话又不能不听。何况，我们也希望毛泽东多吃点好东西呢。田云玉就照江青的话办了。

'开饭了。

毛泽东一看桌上没有红烧肉，便问道："红烧肉呢？"说着让田云玉把我叫去。

毛泽东问我："为什么没有红烧肉？"我没有回答，我等着江青帮助说一句解释的话。可是，江青坐在一旁，一声不吭。

"为什么交待了的事情不办？"毛泽东生气了。他历来坚持"交

待了就要办”的原则。

我垂下头，无言以对。我仍然不能去看江青，看一眼就等于转移矛盾。但我还不肯放弃那一线希望，还在期待……

江青仍然不说话。

我忍不住流下了泪。

毛泽东一见我哭了，说：“你下去。”

毛泽东草草吃几口饭便放了筷子。

第二天早晨，毛泽东睡觉前，让田云玉把我叫去。我坐在床边的一个凳子上。毛泽东小声问我：“说说吧，这是怎么回事？”

我眼里又含了泪，不肯说。毛泽东皱起眉头，一再坚持要我说。

正在这时，江青从西屋穿着睡衣走进来了。我不安地站起来。毛泽东皱着眉头白一眼江青。

江青立刻喊起来：“你们谈，你们谈，我走！”

江青一脸愠色，转身就走。我忙跟上去送她，身后传来毛泽东的怒声：“别管她，谈我们的！”

我返回来，坐到毛泽东身边。欲言又止，真难哪！

“你说么，”毛泽东有些烦躁，“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人。”

于是，我把江青不让做肥肉的经过如实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听后吩咐道：“今后，我和她就分开吃，她吃的饭按她的口味搞，我吃的饭按我的口味搞。”

那以后，毛泽东和江青就分开吃了。即便在一个饭桌吃饭，也各吃各的菜。毛泽东从不动江青的菜，江青仍时时尝几片毛泽东的菜。因为毛泽东爱吃辣，他说能吃辣的人革命性强，所以江青总要夹几片毛泽东的菜辣辣嘴。

李银桥：开展整风运动

1957 年周恩来曾出访苏联。回来那天，工作一夜的毛泽东早晨服过安眠药，却一上午不曾入睡，先后几次睁眼问我："恩来回来没有？""恩来还没回来吗？"

下午，我报告毛泽东："主席，总理回来了。"

"噢。"毛泽东像是松了一口气。他并未去机场迎接，也没立刻约见周恩来，翻个身便安然睡去。

据说，周恩来这次出国，大约是与匈牙利事件有关。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秘密报告，内容传出后，在国际上引起轩然大波。东欧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发生了动荡。那段时间毛泽东一直神态严肃，经常独自深思，也常和中央首长们交谈。

我的感觉，苏联发生的事情对毛泽东震动很大。因为那时世界存在两大阵营，是对抗的年代。社会主义阵营内任何一国发生的事情，对阵营内的其他国家都会产生影响。何况苏联又是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

苏联共产党为了求得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增加了对华援助。这并不能使毛泽东轻松宽慰，他是原则性很强的领袖。从个人来讲，在中国长期的武装斗争中，斯大林并不曾信任毛泽东。毛泽东曾经称那些从苏联派来的共产国际代表和归国领导人为"洋房子"。"这些'洋房子'说我们山沟里面没有马列主义，我看倒是他们尽搞些教条主义。"这些情况我是了解的。但是，斯大林毕竟领导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长达几十年，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和反法西斯战争的

伟大胜利。毛泽东对斯大林的感情还是很深的。

毛泽东承认斯大林有错误，但是认为要三七开。

从我有限的接触中，我感觉毛泽东的思索最初是从如何避免重犯斯大林的错误为主。他在深思熟虑之后，写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并在1957年2月27日至3月1日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这个题目的重要讲话，全面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提出了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系列正确方针。

他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我国现在的社会制度比较旧时代的社会制度要优胜得多，如果不优胜，旧制度就不会被推翻，新制度就不可能建立。"

他说："当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之后，中国要向哪里去？向资本主义，还是向社会主义？有许多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是不清楚的。事实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

根据事物发展的规律，他正确地指出，现在我国的情况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便团结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和文化，建设我们的新国家。"

3月12日，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继续强调"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方针。他说：“不应该肯定我们的一切，只应该肯定正确的东西；同时，也不应该否定我们的一切，只应该否定错误的东西。”并准备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

1957 年 4 月 27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开展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

李银桥：毛泽东带头作自我批评

整风运动一开始，广大群众和爱国人士积极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向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提出了大量有益的批评和建议。开始，毛泽东对此是热烈欢迎的，他自己也真诚地向身边的工作人员征求意见，希望我们的党和党员干部永远保持革命热情，保持清正廉洁。他要求别人做到的，首先要求自己做到。这段时间，他曾多次征求我们对他的意见，作自我批评，使我们深受感动。

有一天我帮毛泽东做睡前按摩。他抓住我的手背亲切地问：“银桥，你怕我吗？”

我说：“不怕。”

“别人呢？别的卫士怕吗？”

“一般说，都不怕。也许个别……就怕主席睡不好觉发脾气。”

“这是我的不对。人睡不好觉容易烦躁，烦躁了就容易发脾气。我也是人，也有点脾气。可是我又是主席，发脾气就容易给同志们造成压力。”毛泽东吁口气，恳切地说：“告诉同志们，毛泽东不可怕。我没想到我会当共产党的主席。我本是想当一名教书先生，就

是当名教书先生也是不容易的呢。”

接着，他给我讲述了他的青少年时期，讲述自己父母的为人，讲述自己的喜怒哀乐。

类似的话，毛泽东曾经和许多卫士及秘书、医护人员讲过。毛泽东对于他睡不好觉而发过脾气的卫士都曾作过诚恳的自我批评。

毛泽东多次讲过：“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共产党是执政党，必须经常地整顿作风，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防止脱离群众，防止腐败变质。”

但是，整风运动发展到后来，确实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从根本上否定党的领导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甚至想取代共产党的领导。许多党的领导人和普通工农群众也确实对此不满，甚至义愤填膺。反映情况的简报材料纷纷送到毛泽东及其他中央首长那里。

毛泽东多次讲过写过：“我觉得吾人唯有主义之争，而无私人之争。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不争，所争者主义，非私人也。私人之争，世亦多有，则大概是可以相让的。”

一旦发觉有人要从根本上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毛泽东不答应。党的主要领导同志都不能答应，这是一个原则。毛泽东认为这些人不是帮助共产党，而是反对共产党。他常把同高级领导人及专家们研究过的同一问题拿来问问身边的工农兵出身的工作人员，我们都表示决不答应。

于是，党中央和毛泽东部署了对右派的反击。从 6 月份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反右斗争。这一斗争在当时的国内国际形势下，对于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都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

但是，由于当时对敌情估计过于严重，而且下边许多基层党的领导人已经不是“主义之争”，有不少成了“个人之争”，反右斗争被严重扩大化了。据我所知，毛泽东亲自出面保护过一些知识分子和爱国民主人士，但对于全局来讲，这是严重扩大化了，直到1978年才由党中央发指示，对被错划右派分子的人作了实事求是的改正。这是后话。

这场斗争开始之后，毛泽东由过去思考如何避免重犯斯大林“左”的错误，转向思考如何防止右的颠覆和出现修正主义。在1957年9月20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作了题为《做革命的促进派》的讲话。讲话中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一论断，显然违反了1956年党的“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这一分析。

李银桥：莫斯科之行

1957年11月2日，毛泽东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去苏联参加莫斯科会议。

开始，毛泽东本不想去参加这次会议。那天在汽车上，周恩来对毛泽东说：“赫鲁晓夫来电报了，请主席去莫斯科。”

毛泽东听了，没有作声。

周恩来劝道：“你是党魁么，还得去。”接着，周恩来又告诉毛泽东：“铁托也要到莫斯科参加会议。”

“嗯，那就去吧。”毛泽东说。

“那就定下吧？”

“好。”

行前，毛泽东对我说：“你去一个，张仙朋去一个，你们准备一下。我的衣服就不做什么了，你们的衣服可以做两套去。”

我和张仙朋按规定每人做了 500 元钱的制服和大衣，毛泽东就是多少年来一直穿着的那套衣服，就这样到了莫斯科。

在机场，举行过简单的欢迎仪式后，赫鲁晓夫陪毛泽东乘车进莫斯科市区。路上，赫鲁晓夫告诉毛泽东：“铁托不来了。他说腰疼。”

毛泽东停顿一下，说：“他是‘政治腰疼’。”

毛泽东住在克里姆林宫里过去沙皇住过的房间。但是，毛泽东郑重对我们讲过：“我不是皇帝，我是国家主席，是人民的公仆。”

毛泽东住下后，去拜访了越南共产党主席胡志明。两位领袖一见如故，非常亲密，用中国话互相问候交谈。

胡志明非常热情，平易近人。他认识我，热情打招呼。前不久他曾秘密到中国来，那时我曾见过他。

那是一天上午，周恩来忽然把电话打到卫士值班室，我接的电话。周恩来问：“主席起没起床？”我说：“没有。”周恩来问：“什么时候睡的？”我说：“早 8 点。”周恩来犹豫一下，说：“要叫起主席。胡志明来了，有紧急事。”我放下电话，来到毛泽东卧室。他睡觉很轻，一叫就醒。起床先在床上擦把脸，不再抽烟喝茶看报，动作快多了。起来后便直奔颐年堂。工夫不大，周恩来便陪同胡志明走来。我见他们进了院子，便对毛泽东说：“到了。”毛泽东闻声迎向门口，与胡志明握手问候……

我们随毛泽东到达莫斯科后，先参加了纪念苏联十月革命胜利

1957 年 11 月，毛泽东访问苏联，参加莫斯科共产党会议。这是前往红场向列宁墓献花圈，左一为李银桥

40 周年的庆祝活动，然后参加 12 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会议和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

会议开始后，赫鲁晓夫、伏罗希洛夫和布尔加宁来拜访过毛泽东。那时双方都很热情。

赫鲁晓夫等苏联领导人拜访毛泽东之后，邓小平同志来向毛泽东汇报，中苏两党关于《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宣言》的起草班子争

毛泽东参加莫斯科共产党会议期间与刘晓大使（右二）、李越然翻译（左一）、李银桥（右一）在克里姆林宫合影

吵起来，吵得很凶。

毛泽东听过汇报后，在杨尚昆同志陪同下去莫斯科郊外赫鲁晓夫等人的别墅回拜苏联领导人，单独与赫鲁晓夫、伏罗希洛夫、布尔加宁进行了谈话。我们的翻译是阎明复和李越然同志。到了那里后警卫工作就全由苏联人员负责了。

莫斯科共产党会议期间，在毛泽东身边负责警卫工作的苏联特工人员与李银桥合影

毛泽东事后对我讲："原则问题我们是一定要认真对待的。"

这次谈话后，毛泽东睡觉后起床，依床栏而坐，我给他做按摩。他望着我，忽然说："你这个人哪，就是办事认真。"

又一天，毛泽东去莫斯科大学看望中国留学生。讲话时讲了那句著名的话："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

1957 年 11 月，参加莫斯科共产党会议的宋庆龄（前排左三）与中苏工作人员合影，前排左二为李银桥

二十一　举起“三面红旗”

李银桥：一个窝头引起的思考

大约是 1957 年 12 月，警卫队一位战士探家回来，不但写了调查报告，还带回一个窝头，又黑又硬，交给毛泽东说：“我们家乡的农民生活还很苦，他们就是吃这种窝头，我讲的是实话。”

毛泽东接过窝头时，我看到他的手有些抖，眼圈一下子就红了。他是非常容易动感情的。在陕北时，毛泽东就讲过：“我这个人平时不爱落泪，只有三种情况下流过眼泪。一是听不得穷苦老百姓的哭声，看到他们受苦，我忍不住要掉泪。二是跟过我的通讯员，我舍不得他们离开。有的通讯员牺牲了，我难过得落泪。三是看动感情的戏也会落泪。我这个人就是这样，用过的东西旧了，都舍不得换掉……”

毛泽东一边掰一块窝头放嘴里，一边分给我们这些身边的工作人员：“吃，你们都吃一块。这就是我们农民的口粮，这就是种粮的人吃的粮食呵！……”

我也分到一块，放到嘴里，确实难吃，嚼了很久才咽下去。

那天，毛泽东失眠了，嘴里不断喃喃着：“为什么是这样呢？为

什么？……人民当家做主了，不再是为地主种田，是为人民群众自身搞生产，生产力应该获得解放么……”

以后很长时间，毛泽东时时带着严肃深沉的思考，无论散步、吃饭还是睡觉，都在思考着这个问题。多次自言自语：

“我们是社会主义么，不该是这样。要想个办法……”

1957年8月7日，毛泽东在河南省襄城县后梁庄麦场上，右一为李银桥

毛泽东日思夜想如何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使人民尽快过上富裕日子。他生活极为俭朴，说什么时候农民都吃到他这样的伙食，他就满意了。他也要求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开动脑筋，集思广益，想出加快建设步伐的好办法。他始终有一种“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想法。

李银桥：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

1958 年 1 月 28 日，毛泽东在临时召集的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讲："我们这个民族，是个大有希望的民族。"并且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十五年内赶上英国"的号召。

那段时间，毛泽东多次召集政治局同志开会，研究"想个办法"，尽快使国家富强人民富裕起来。

1958 年 3 月，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基本方针。

1958 年 5 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全党形成了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干的一种热潮。不少中央领导同志也热切希望尽快建成社会主义，纷纷开动脑筋想办法。

记得有一次毛泽东在颐年堂接待客人，谈话结束后，客人都走了。毛泽东从颐年堂出来，回菊香书屋。一位中央负责同志同毛泽东一道走着。这位中央负责同志与毛泽东边走边议论着形势和工作。大家都憧憬着社会主义美好的未来。这位负责同志说："主席，现在谭震林他们提出个大跃进口号，我看这个提法很好。"

"噢，大、跃、进？"毛泽东啄磨着。

"《人民日报》上登了。"

"嗯，这个题目很好，拿来给我看看。"

这位负责同志把报纸找来，请毛泽东看。毛泽东认真看了一遍，点点头说："嗯，这个提法很好。"他拿起笔，在上面批了话。记得大意是：提法很好。

很快，"大跃进"这个口号便在全国喊响了。

那段时间，毛泽东频繁外出视察，深入群众。他也要求全党集中更大的领导力量放在社会主义建设上，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和现代化科学文化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总路线和"大跃进"也确实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但是，毛泽东在号召人民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说、敢做的创造精神时，也确实过分强调了主观能动性，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因而造成了"大跃进"中的失误。

1958 年夏天，毛泽东视察河南农村，左二为李银桥

人民公社也是在这种敢想、敢说、敢做的情况下产生出来的。我个人认为，它既是全国人民精神振奋，掀起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产物，也是党内"左"倾错误思想进一步发展的产物。是一次悲壮的

探索，为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沉重的经验教训。

党的八届五中全会之后，我跟随毛泽东外出视察工作。在河北徐水，毛泽东在抗洪现场听取了县委书记张国忠的汇报。汇报中，张国忠谈到民兵以连队出现在抗洪抢险的第一线，这种军事化的形式很解决问题。

毛泽东听后频频点头，说："还是军事化好。"

以后，这成了一条经验。遇有特殊情况，特别是在抢险救灾等战斗中，民兵连总是出现在第一线。

离开河北徐水以后，到了河南省七里营。地方负责同志向毛泽东汇报了人民公社，说这是一件新生事物。毛泽东很感兴趣，频频点头说："好么，那好么。人民公社好。"

当时，有位记者在场，一直是跟在我们身边。他听到这句话，记下来了。谁也没料到，第二天就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上用大字标题登出了"人民公社好"。

毛泽东外出视察一般就住在专列上。他起床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喝茶看报。那天他刚拿起报纸看，忽然失口喊道："哎呀，糟糕。捅出去了！事先没讨论呢，政治局还没有讨论呢……"

果然，"人民公社好"公开发表之后，有人提出这个问题，有反应。毛泽东在小范围内作了解释："这个话我是讲了，是我不慎重，也不能全怪记者。但是已经捅出去了，怎么办呢？"

那时，全国人民渴望尽快摆脱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现状，党和国家的领导者也一心一意要尽快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毛泽东也是将全部心思和精力投入到这场斗争中，想探索出一条富国强民，早日实现社会主义的新路子。出发点都是好的，但是头脑有些发热，

违背了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

到了 1958 年底，中央在人民大会堂开会，中宣部负责同志拿来了文章清样，正式提出“三面红旗”、“三个万岁”的口号。记得文章像大字报一样写出来，三份，摆在主席台旁 118 厅的地毯上。在京政治局委员都去看，中宣部负责同志亲自在那里讲解。我听到说这是针对苏联修正主义提出来的。赫鲁晓夫反对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我们针锋相对，喊出“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万岁”的口号。

李银桥：毛泽东喜欢看《白蛇传》

1958 年，毛泽东来到上海。市委负责同志为毛泽东准备文娱活动，征求他的意见。毛泽东想了想，说：“还是看《白蛇传》吧。”

于是，市委决定由李玉如领衔主演《白蛇传》。

晚上，我随毛泽东驱车来到上海干部俱乐部礼堂。观众都已坐好，一见毛泽东走入，都起立鼓掌。毛泽东一边招手，一边由工作人员引导走向前排。在前排就座的还有市委和市政府的领导同志。毛泽东对党内领导同志从来不讲客套，径直走到自己的座位，再向后面的观众招一下手，便坐下了。

毛泽东就座的前排摆放的是单人沙发，套有灰布套。我照例是坐在他身边。毛泽东肚子大，坐下后皮带便勒紧了腰，所以他一坐，我便依惯例帮他松开了皮带。

演员早已做好准备，毛泽东一坐下，锣鼓便敲响了。毛泽东稳稳坐在沙发里，我帮他点燃一支香烟。毛泽东是很容易入戏的，一

支烟没吸完，便拧熄了，目不转睛地盯着台上的表演。他烟瘾那么大，却再也不曾要烟抽。他在听唱片时，会用手打拍子，有时还跟着哼几嗓子。看戏则不然，手脚都不敲板眼，就那么睁大眼看，全身一动也不动，只有脸上的表情在不断变化。显然，他是进入了许仙和白娘子的角色，理解他们，赞赏他们，特别对热情、勇敢、聪明的小青怀着极大的敬意和赞誉。唱得好的地方，他就鼓掌。他鼓掌大家立刻跟着鼓掌。

然而，这毕竟是一出悲剧。当老和尚法海一出场，许仙和白娘子的爱情受阻，开始了曲折痛苦的生离死别，毛泽东的鼻翼也开始翕动，发出嘶嘶的声音。随着剧情的发展，这嘶嘶声似乎越来越大。显然，他被深深地感动了。

毛泽东聚精会神地听着每一句唱词，直到演出结束。在热烈的掌声中，毛泽东上台同演员一一握手，祝贺他们演出成功。

李银桥：人民群众的热情

在全国掀起大跃进的高潮后，毛泽东也有一定的警惕，注意了不要热昏头脑。就我所见，毛泽东在鼓励群众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干的同时，也适当地泼过一点冷水。但是，从总的指导思想上来看，他还是有些急于求成的。他的思想影响了党内许多同志，过度高涨的热情也反过来影响着他。

1958 年 8 月 13 日，毛泽东去天津新立村参观稻田。有关领导同志和公社领导汇报说，亩产 10 万斤。

毛泽东摇头撇嘴，表示不相信。他说：“不可能的事。”他指着

一位领导同志说："你没种过地。这不是放卫星，这是放大炮。"

新立村的同志说用电灯为水稻照明，用鼓风机朝水稻里吹风，就是亩产10万斤。毛泽东摇头，说："吹牛，靠不住！我是种过地的。亩产10万斤？堆也堆不起来么！"

有些同志为了证明亩产10万斤，让小孩子往水稻上站。毛泽东仍然摇头，说："娃娃，不要上去。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哩。"

1958年8月，毛泽东视察天津郊区农村菜园。左一为李银桥

可是，报纸上还是登出了亩产突破10万斤大关的消息。有些人是很敢说敢吹的。有人敢写亩产突破2万斤大关，马上就有人写出突破5万斤大关的消息，报纸上一宣传，下面的浮夸风就更加严重，接着就出现了突破10万斤大关的消息。现在听来像笑话，那时就愣有人热中此事。

从农村参观回来，驱车到天津南开大学看校办工厂，由刘子厚省长和李耕涛市长陪同。

毛泽东在校园里一露面，全校立刻轰动了，掌声、欢呼声震耳欲聋。校园里人头攒动，挤得像要把校园胀裂一般。一方面是大跃进极大地振奋着人们的精神，另一方面人民群众对毛泽东的热爱和信任已经开始朝着个人崇拜发展起来。记得5月25日毛泽东和全体中央委员到十三陵水库工地参加义务劳动，毛泽东刚一放下铲土的铁锹，立刻就有一名叫余秉森的解放军战士用自己的衣服把这张铁锹包起来，激动地说："看到这张锹，我们就想起了毛主席。这样，我们的干劲就会更大。"这件事是很有代表性的。

毛泽在天津南开大学参观校办工厂，左一为李银桥

南开大学里人群拥挤，欢声雷动，无法离开。我跟天津市警卫处处长李侃商量，调动随行的一辆华沙牌轿车，请毛泽东上车。华沙车小，毛泽东身材魁梧，平时坐不进去。这天我们急了，硬是帮忙把他挤进车去，从人群里开出来，开到天津大学，又参观了"天

大”的校办工厂。

参观结束后，已经是中午。毛泽东兴致很高，提出去吃饭馆。于是，我们驱车来到天津市和平区沈阳道的正阳春鸭子楼，吃烤鸭。

吃饭时，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的领导继续向毛泽东汇报工作。

毛泽东吃饭快，别人没吃完，他先吃完了，起身在楼上走两步。正阳春是栋两层楼的饭馆，我们是在楼上吃烤鸭。毛泽东起身走动，经过窗口时，随便朝窗外望了一眼。这一眼望出去不要紧，又引出一场大麻烦。

饭馆对面的楼上，有一位妇女正在晾衣服，距离很近，一下子就认出了毛泽东，立刻脱口叫喊出声：“毛主席！毛主席万岁！”

这声呼喊就像是一声惊雷，整个天津市都震动了。刹那间，人群像潮水一般从四面八方涌来，立刻包围了正阳春鸭子楼。人们拥挤，欢呼，跳跃，越聚越多，堵满了路口，塞满了几条街道，一眼望去全是人，交通完全陷于瘫痪，就连交通警察也想看一眼毛主席么。

群众欢呼“毛主席万岁”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毛泽东坐不住，前后 6 次打开窗子向群众招手致意，高呼：“人民万岁！”每次呼过口号之后，毛泽东还向群众招手喊话，想叫群众散开。可是根本不行，越喊人们拥挤得越厉害。从中午 12 点多，一直被围困到下午 5 点多，无法“突围”。兴奋的群众简直到了狂热的程度，欢呼声经久不息。没办法，只好采取在南开大学使用过的老办法。

警备区派出一个排的精壮小伙子，战士们奋力开路，硬将一辆华沙牌小汽车从人群中推进来，推到正阳春鸭子楼门口。

我们卫士和警卫人员前呼后拥保护着毛泽东，再次将他挤入华沙小轿车。警卫排前有人开路，后有人推车，左右有人卫护，一步

一步，硬是将车推出了人群。

毛泽东在车上只讲了一句话："又是一次下不了的黄鹤楼噢。"

据说，事后清扫现场，鞋帽和钢笔、手表收了七筐半。群众对毛主席的感情由此可见一斑。

傍晚，毛泽东乘火车回北京，在卢沟桥又下车去两个公社视察。

那时，毛泽东精力充沛，身体极健。他大步走在田间小路，走上田埂，显得意气风发。远远就向田里干活的农民们招呼："天不早了，该收工了吧。"

"毛主席！毛主席来了！"社员们争先恐后地跑过来，纷纷伸出劳动的大手抢着同毛泽东握手。

领袖和群众互相热烈地问候交谈着，从生产形势谈到人们的思想，从大好形势谈到对未来的憧憬。告别时，几位社员激动地说："毛主席不辞辛苦，这么晚了还来看望我们，我们要挑灯夜战，用优异成绩向毛主席献礼！"

回到中南海已经是夜里 11 点多。毛泽东毫无倦意，精神反而更旺盛，就像当年指挥沙家店战役，指挥三大战役一样。他两眼闪闪发亮，充满信心地说："看来，我们这个国家是有希望的！"

我用力点点头。我那时还不曾认识到搞建设不同于打仗，认为来几个大战役就可以解决问题。

我以为，当时许多领导同志也是这样想的，毕竟是大半生戎马生涯过来的，搞建设还没有经验。

李银桥：大家都是报喜不报忧

1958 年 8 月 17 日至 30 日在北戴河举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

于是，大办人民公社的决议便传下来了。会议还规定了一批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决定 1958 年要生产钢 1070 万吨，即比 1957 年钢产量翻了一番。1959 年的指标为 2700 万吨，又比上年翻了一番多。决定 1959 年的粮食产量指标为 8000 亿斤。

北戴河会议后，我又跟随毛泽东外出视察，专列驶入河南省。可以看出，北戴河会议虽然有了决议，毛泽东对形势并不是很放心。毕竟是在探索道路，他总有些担心。

专列停在郑州，毛泽东听取河南省委书记和中央办公厅下放干部工作团领导的汇报后，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怎么也放不下心，反复问："有什么问题没有？不要只说成绩，我想知道有什么问题没有？"

问过七八遍，没有反映问题，只是说好。毛泽东提出召开一个座谈会，要和基层的同志直接谈谈。于是，叶子龙去荥阳，把正在田野里弄土高炉大炼钢铁的十几名工作队员用火车接到郑州来。这些同志一身煤黑和矿灰，洗也没洗就上了专列。毛泽东、谭震林、廖鲁言等同志在专列会客室里同这些来自第一线的工作队员们开了座谈会。

大家仍然是一片声地说好，也是报喜不报忧。多数人当时为革命激情所促使，很少能在高潮中冷静下头脑想问题。

毛泽东扭头发现了中南海摄影组的胡秀云，便盯着她认真问：

“小胡，你说说，有什么问题没有？”

胡秀云说：“反正我看妇女挺高兴的。原来围着锅台转，现在吃大食堂，解放了。”

毛泽东笑着又问：“你是不是吹牛呢？大锅菜炒出来就是不如小锅菜炒出来香么。”

工作队员们都愣住了。当时全国的形势像一锅沸腾的开水，毛泽东说的这句话如果换成别的人说，无疑是泼凉水的行为，会挨批，会戴“右倾”帽子的。

胡秀云大概是受了什么鼓励，忽然冒出一句：“我就是纳闷，怎么晚上亩产还是400斤，到早晨就成1000斤了？有些干部一个比一个能吹。”

许多人脸色都变了。只有毛泽东仍是一脸微笑，扭头望望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又望望谭震林和廖鲁言：“你们到底是放卫星啊，还是在放大炮？”

没有谁正面回答这句提问，都有些尴尬。幸亏有人拿了大食堂做的面包请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同志们品尝，才消除了尴尬气氛。

面包是用白面玉米面混合起来烤制的，大家都说不错。拿面包来的同志说：“社员们就是吃这种面包。”

对于大食堂，毛泽东一方面认为是新生事物而加以支持，另一方面又始终不放心，走到哪里总要问问，想知道真实情况。我跟随毛泽东来到武汉后，有一位党的负责同志提出大办食堂的好处，汇报了一些优越性。毛泽东听后很感兴趣，叫他们把食堂问题写个材料拿来看看。据说这位负责同志马上叫湖北省委一位副秘书长执笔写了。材料送来，毛泽东阅后批了，发下去了。

李银桥：他与李达的争论

毛泽东的活动安排、接见什么人，一般是由叶子龙及高智和罗光禄两位机要秘书负责安排。李达曾求见主席，毛泽东接见他几次，做过几次较长时间的谈话。

毛泽东与人谈话，不喜欢听面面俱到没有特色的长篇汇报，不喜欢汇报者罗列材料。他要求汇报者要善于动脑筋想问题。

毛泽东喜欢个别交谈，以便交心谈心。在武汉，他喜欢和王任重同志谈心，认为他有朝气，能深入群众。也愿意和李达谈心，和李达主要是谈哲学。

李达是湖南人，号鹤鸣。他比毛泽东大 6 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当时任武汉大学校长。

李达对毛泽东很敬仰，每次见到毛泽东都显出激动，眼里闪着兴奋喜悦的波光，不像一个年近 70 的老人。毛泽东对李达这样的老同志也是很尊重，谈话时既严肃又亲切。

毛泽东一生手不释卷，博览群书。像朱德、陈毅的诗词，郭沫若、李达的文章，他都注意看，并谈出意见。他让王任重请李达到东湖宾馆见面，谈文章，谈哲学。

1958 年，毛泽东特别强调解放思想，鼓励人们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他与李达谈话是畅所欲言的，他从来不掩饰自己的观点和想法。同李达谈文章时，他曾坦率地说：“我们年纪都大了，你比我还要大 6 岁。人老了思想不能老。你现在写的东西就不如过去写的有生气了。你那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尽是抄

书本上老生常谈的东西，没什么创造性，缺少自己的新见解。”

李达感谢主席关心他的工作和文章，说保持革命热情确实很重要，特别是对于老人。

毛泽东又说了不满意自己过去写的文章。他特别赞赏“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他说他还要重新写一些文章，特别是为青年写一些文章。

在一次谈心中，毛泽东说到他在成都会议上提出的“头脑要热又要冷”的话，说对于群众的革命热情一定要爱护，要保护。但是领导干部一定“要热又要冷”，光热不冷会出乱子。由此谈下去便谈到了哲学上。

李达说武汉大学的学生搞党史调查时，看到一些口号，不符合唯物主义的观点。他举了一些例子。大意是：只有想不到的事，没有做不到的事。

实际生活中，毛泽东是不全同意这种说法的。比如在天津新立村，人家汇报亩产 10 万斤，他就摇头说靠不住。在湖北，王任重同志也向主席汇报过类似情况。毛泽东问王任重：“有什么新闻吗？”王任重说：“朋兴乡有一块试验田，亩产水稻上万斤。”毛泽东摇头说：“我不信。”王任重说：“王部长亲自来验收的。”他说的是省农村工作部长。毛泽东还是摇头：“靠不住，谁验收也靠不住。除非派军队站岗放哨，单收单打，看住人不往里掺假才能算数。”

但是，在讨论问题时，毛泽东是不愿意有人否定群众敢想、敢说、敢干的革命热情和积极性的。他不慌不忙地说：“这个口号同世间一切事物一样，也有两重性。一重性是讲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这是有道理的。另一重性，如果说想到的事就能做到，甚至马上就能

做到，那就不科学了。”

李达认为这个口号在现在不能谈两重性，谈两重性，在现在的形势下就等于肯定这个口号。

毛泽东与列宁一样，是喜欢争论问题的。他问：“肯定怎么样？否定又会怎么样？”

两位老人就肯定、否定争论起来。争论中，毛泽东举了红军长征的例子，说明精神力量的作用。讲了红军就是依靠这种精神力量克服了按常理无法克服的困难，终于夺取了胜利。也举了各种发明创造，就是因为有了“敢想”，想飞就终于发明了飞机，想日行千里就发明了汽车、火车。

李达坚持说，肯定这个口号就是认为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无限大，就是错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离不开一定的条件。一个人要拼命，“以一当十”可以，最后总有个限制，终有寡不敌众的时候。“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是要有地形作条件，人的主观能动性不是无限大的。

争论到后来，有些激烈，和普通人一样，是就问题论问题的争论激烈，并不是对着人来。

李达说：“现在人们不是胆子太小，而是太大了，头脑发烧。主席脑子发热一点，下面就会不得了，就会烧到 40 度、41 度、42 度！这样中国就会遭难。主席信不信？”

人在争论中是不好控制情绪的，毛泽东虽然激动，但是还是控制住自己了。停了停，缓和语气说：“还是我在成都会议说过的那句话，头脑要热又要冷。”

送走李达后，毛泽东在屋里踱步吸烟，又坐在沙发里喝茶默想。

后来，他讲了这样意思的话：“孔子说过，60 而耳顺。我今年 65 岁，但还不够耳顺。听了鹤鸣兄的话很逆耳。以后我要同他多谈谈。”

毛泽东多次与李达谈话，还请他吃过饭。

后来，毛泽东在湖北农村视察中，有人汇报“挑灯夜战”，说是劳民伤财，夜里干了白天就没劲了。

毛泽东也是冷静地说了要“有张有弛，劳逸适度”的话，要求领导干部既要爱护、保护群众的热情，又要积极引导讲科学，适当降降温。

1958 年 11 月 2 日，毛泽东在郑州召集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省市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谈了他视察河北、河南、山东、湖北等地所发现的问题，谈了农村工作中的一些错误和在人民公社问题上存在着许多混乱现象，明确指出，有些领导人急于想使人民公社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错误的。他带领与会同志读了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批驳了陈伯达等人提出的废除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的错误主张，指出这种主张实质上是剥夺农民。

会议期间，毛泽东给县以上各级党委委员写了一封《关于读书的建议》的信。建议他们认真阅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信中指出：“现在有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读这两本书就可能给予澄清。”

由这次会议开始，毛泽东从反右转为纠“左”。

二十二 回韶山

李银桥：深切的怀念

1959年6月，毛泽东在罗瑞卿、王任重和周小舟陪同下回韶山，住在韶山宾馆。

他看了看故居。在门口，他站住脚环顾周围，大概是回忆幼时的生活吧，深深吸了一口气，忽然指着门前的水塘对我说："我小时候就在这个塘子里游泳，那时候还没见过长江。"

我们跟随毛泽东去看望一些老人，有和毛泽东同辈的，也有比他辈数高的。有个长胡子老头，毛泽东一见面就说："30年没见你们了，我是来看望你们的。"他们坐下来聊了许多他小时候的事。

毛泽东访问了几户农民，

毛泽东同他少年时的私塾老师毛宇居携手同行

在街上转一圈，还去小水库里游了泳。岸上围了许多群众。

毛泽东一边在水里自在地游泳，一边向乡亲们招呼道："都下来游泳啊！"

乡亲们有的摇摇头，有的说："我们不会啊！"

"不会就学呀！"毛泽东看一看我们，冲岸上说："他们都喜欢蛙式、蝴蝶式。我给你们表演一个新名堂！"

于是，他一会儿仰游，像躺在床上睡觉歇息，舒坦轻松；一会儿"坐凳子"，真像坐在竹凳上，从容自如；又点燃了烟抽……岸上的乡亲们，又是赞叹，又是高兴，笑得合不上嘴。

毛泽东游完，上岸后稍微休息一下，就开座谈会，了解家乡的生产和乡亲们的生活情况。

毛泽东在韶山游泳，左一为李银桥

毛泽东的激动和不平静是显而易见的。夜里他睡不着，靠在床

栏上，用报纸垫底，上面放一张白纸，用铅笔在上面写了涂，涂了又写，嘴里念念有词。他作诗时才会这样。

哼来哼去，折腾有两个多小时，停住笔，抑扬顿挫地吟诵出那首七律《到韶山》：

别梦依稀咒逝川，
故园三十二年前。
红旗卷起农奴戟，
黑手高悬霸主鞭。
为有牺牲多壮志，
敢教日月换新天。
喜看稻菽千重浪，
遍地英雄下夕烟。

吟罢，又拿笔写了一行字：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五日到韶山。离别这个地方已有三十二周年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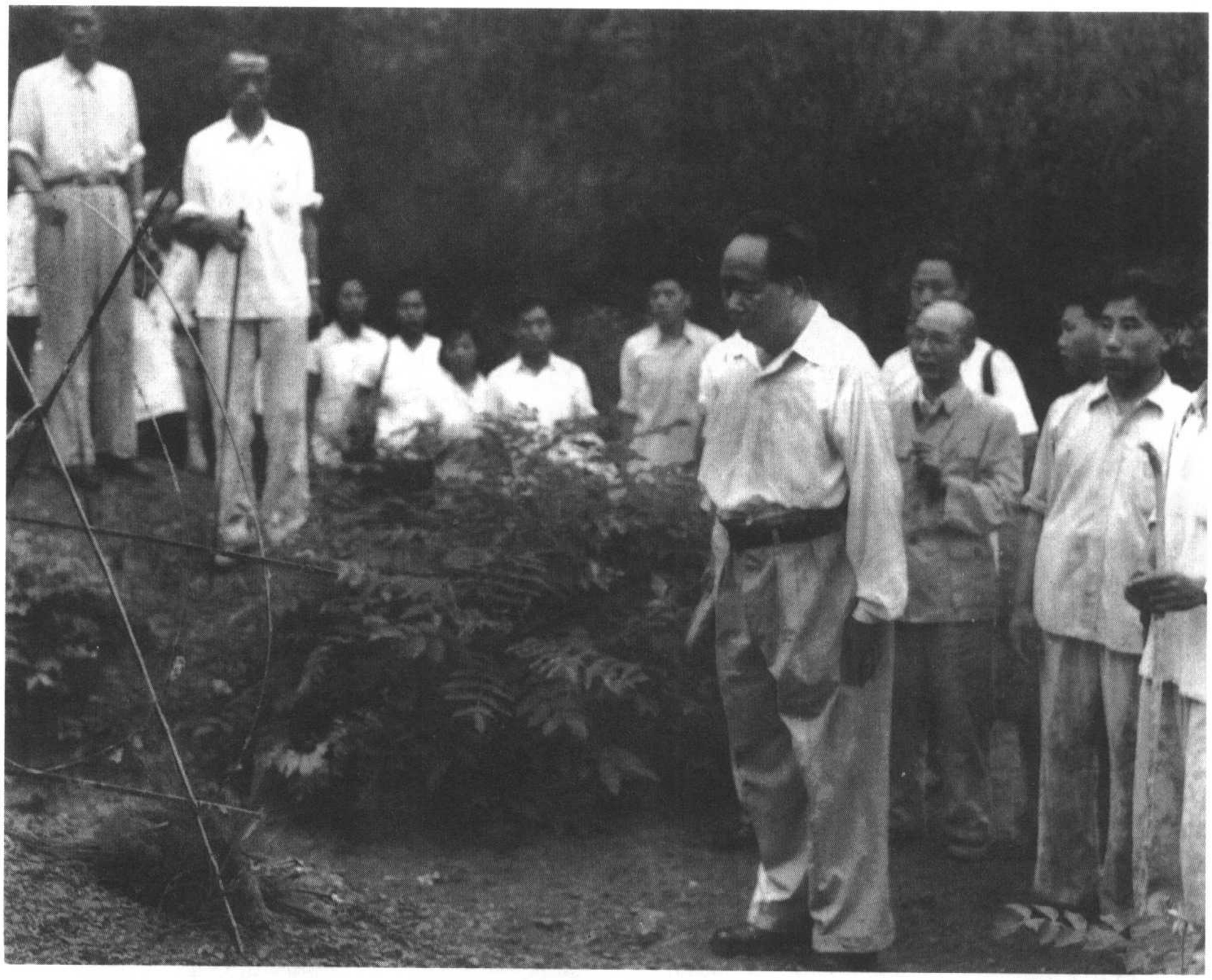
“小封啊，”毛泽东招呼值班卫士封耀松说，“你去把秘书叫来。”

封耀松叫来了秘书。毛泽东吩咐秘书说：“你把这个拿去誊一誊。”

第二天早晨，毛泽东7点钟起床，围绕村子转。我们以为是散步，跟在后面随行。毛泽东转着转着就转到对面一个山坡上。

山上有个孤零零的坟包。毛泽东走到坟前便低下头去默立。这时我才明白，那是毛泽东父母的合葬墓。

警卫局沈同副处长忙去旁边撅来一把青翠的松柏枝，递给我。这时，毛泽东对着坟墓深深地鞠下躬去，前后三鞠躬，眼圈有些红了。



毛泽东在父母墓前行礼致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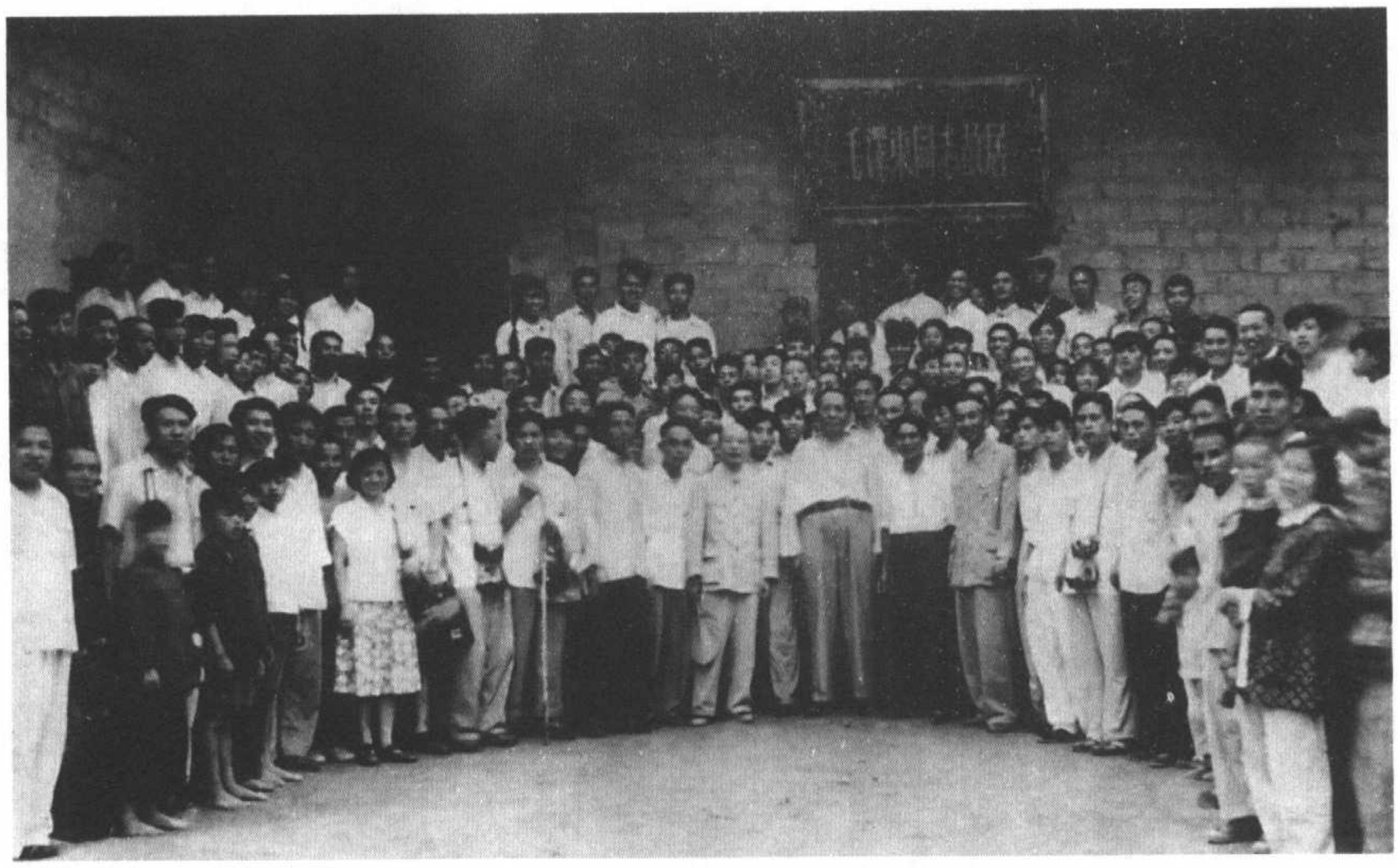
我等毛泽东鞠完躬，便将松枝递给他。他接过松枝，恭恭敬敬地放在坟头上。又默立片刻，然后才离开。

整个过程，大家都没有说话。

李银桥：毛泽东和乡亲拉家常

离开父母的坟后，毛泽东视察了韶山冲所有的稻田。他发现对面山腰樟树丛冒起一股青烟，一个短发妇女正用耙子把草丛中的枯枝败叶搂出来，放进火里焚烧，便走了过去。

短发妇女闻声猛回头，看见是毛泽东，便抱起孩子一面大声喊着“毛主席来了！”一面把我们带进一栋干净宽敞的堂屋里。



毛泽东与乡亲们合影

毛泽东与乡亲们拉家常

毛泽东像到了自己的家一样，坐在竹凳子上，抽着烟，亲切地同大家拉起家常来。他先问："这栋房子住几家？"又问他小时候的好朋友土地老倌和四道士有没有后代？

大队党支部书记指指短发妇女介绍说："她就是四道士的儿媳妇。"

毛泽东高兴地问她："我怎么没见过你？"

她回答："你老人家1927年就走了。我是1931年生的，所以没有见过呀！"

毛泽东又问："你是哪里人？姓什么？"

"我是如意亭的，姓汤。"

毛泽东摇摇头："如意亭没有姓汤的。"

"我小时候从宁乡逃难来的。"

毛泽东点点头。发现她穿着解放鞋，便问她爱人是不是解放军。当得知当过志愿军时，就说："你是军属啊！他在外面打美国鬼子，你在家里打美国鬼子，你们俩都打美国鬼子。"

那妇女说："我一定听您老人家的话，搞好生产，多打粮食，支援国家建设。"

毛泽东又问："今年每亩能收多少稻谷？"

这一回，在场的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时不知怎么回答好。因为当时到处都在"放卫星"，亩产千斤、双千斤，甚至上万斤的有的是。他们怎么说呢？

正在为难之时，有人爽爽快快地回答说："亩产800斤。"

毛泽东摇摇头："能产800斤？依我看，平均亩产500斤就谢天谢地了。要实事求是，要计划种田，要科学种田。"说着，看看大家，又风趣地说："我看见韶山的稻田绿化了。但山上树不多。韶山人多

山多地少，要腾出田来种庄稼。”

大伙点点头：“感谢毛主席……”话没说完，就被毛泽东打断了：“不要感谢我，要感谢人民。人民团结起来力量大。”

李银桥：他辞去国家主席职务

1958 年 11 月 10 日郑州会议结束。18 天后，中国共产党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举行。会议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冷热结合的精神，初步降低了北戴河会议确定的 1959 年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北戴河会议确定钢产量为 2700 万吨到 3000 万吨，武昌会议降到 1800 万吨。

会议通过了《同意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他不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建议的决定》。

1959 年 2 月 27 日，中共中央在郑州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主题是解决人民公社的所有制和纠正“共产风”的问题。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他指出，实现公社所有制必须有个发展过程。模糊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制之间的界限，急于过渡到公社所有制是错误的。他批评了“一平二调三收款”的共产风，指出这实际上是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是我们目前同农民关系中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他首先提出：公社在体制上应当实行权力下放，三级管理，三级核算，以队为基础。

会议完全同意毛泽东的讲话，下发了《郑州会议纪要》，并根据毛泽东讲话精神起草了《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这次会议制订的方针，不仅对纠正“一平二调”的共产风起了积极作用，而且表明我们党在纠正人民公社问题的“左”倾错误方面又

前进了一大步，受到广大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的欢迎。

1959 年 4 月 18 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大会选举刘少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宋庆龄、董必武为副主席，朱德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并决定周恩来继续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大会根据中共中央的建议通过了 1959 年度国民经济计划：钢产量 1800 万吨，煤 3.8 亿吨，粮食 10500 亿斤，棉花 1 亿担。这个指标仍然很高，后来实际上都不曾达到，甚至差距很大。

李银桥：他说黄炎培“不够朋友，够英雄”

毛泽东退居二线后，像是要陶冶性情，休息时候便练习书法。这段时间与民主人士的往来更多。

听说黄炎培先生有一本王羲之的“真迹”，毛泽东借来看，爱不释手。他看着字迹琢磨，有时又抓起笔来对照着练。他不是照着摹仿，而是取其所长，领会神韵，消化吸收，变成自己的东西。练到兴头上，吃饭也叫不应。

大约是它太珍贵，黄炎培很不放心，借出一星期便频频打电话询问。电话打到值班室，问主席看没看完，什么时候还。

卫士尹荆山借倒茶机会，向毛泽东报告：“主席，黄炎培那边又来电话了。”

“嗯？”毛泽东收拢起眉毛。

“他们……又催呢。”

“怎么也学会逼债了？不是讲好一个月吗？我给他数着呢！”

“主席，他们，他们不是催要，是问问，就是问问主席看不看。”

“我看！”毛泽东喝口茶，语气转缓和些，“到一个月不还，我失信。不到一个月催讨，他们失信。谁失信都不好。”

可是，黄炎培又来电话了，电话一直打到毛泽东那里。先谈些别的事，末了还是问那本“真迹”。毛泽东问：“任之先生，一个月的气你也沉不住吗？”

那边的回答不得而知。

小尹挖苦：“真有点小家子气。”

我说：“跟主席讨债似的，没深浅。”

毛泽东听了，却愠气全消，换上微笑，说黄炎培“不够朋友，够英雄”。

到了一个月，毛泽东将王羲之那本“真迹”用木板小心翼翼夹好，交卫士小尹：“送还吧，零点必须送到。”

尹荆山说：“黄老那边已经说过，主席只要还在看，尽管多看几天没关系。”

毛泽东摆摆手：“送去吧，讲好一个月就是一个月，朋友交往要重信义。”

李银桥：唯一一次对我发脾气

毛泽东有时发脾气，就像天真无邪的孩子赌气一样，是很有意思的。在他身边 15 年，他只对我发过一次脾气，就是充满了孩子赌气的味道。

那是 1959 年，我随毛泽东去上海，就住在专列上。一天中午，

我见他睡着了，按睡眠 4 小时算，也要到下午了。我便进城到干部俱乐部办事。下午赶回专列，才知道毛泽东提前起床，进城开会去了。是值班卫士来电话告诉我的。我赶到毛泽东那里，他已经开完会去吃饭。我知道饭后要去干部俱乐部看《小刀会》的演出，便在车旁等候。

1959 年，毛泽东视察上海徐家汇区农村(右二为李银桥)

毛泽东出来了，旁边有柯庆施等人陪同。我忙抓住车门等他过来上车。可是，他立在台阶上不走了，一手叉腰，一手指着我突然喊："李银桥，你是干什么的？"

他喊声很大，一脸愠气。我想，什么事啊？怎么突然发脾气了？我忙朝台阶上迎，他也朝台阶下走。我搀扶他坐到车里，他不时吮吮嘴唇，既不看我，也不说话，反正是不高兴，生闷气。

坐到礼堂看戏，他仍然不理我，直到戏开始了，他进入了剧情，

才忘记了生气的事。他是容易入戏的。

演出结束后，我在回来的路上小声问："主席，今天出什么事了？惹你生气了？"

毛泽东嘟着嘴，翻我一眼："还说呢，把我嘴都烫坏了……"

后来我才问明，毛泽东吃过饭后漱口，水太烫，把嘴烫伤了。是一名卫士没试水温就递了过去。我以往都要试过水温，不烫不凉才递上去，毛泽东已经习惯了，接过来就是一大口，这次他又是这样，结果立即喷出去了，可也烫得不轻。事后只朝我喊了那么一嗓子，气就全消了。

二十三　毛泽东的一九五九

李银桥：庐山“神仙会”

为了总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经验教训，解决实际工作的问题，1959 年 6 月 13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于 7 月初在河南郑州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后又决定会址改在江西庐山。

从韶山出来，毛泽东乘专列北上。当专列行驶在湖南空旷的山野中时，毛泽东突然吩咐停车。他外出视察常有这种一时兴起的临时停车。

毛泽东走下火车，深深吸吮山野清新的空气，呼吸之声可闻。头缓缓转动，凝神四望，目光停在一个石岗上。岗上有松，可以听到啁啾鸟鸣。他向小石岗走去。他喜爱松树，喜欢散步。

毛泽东与专列列车员、文工团员在一起

铁道路基下有条小路，向右蜿蜒着伸

向石岗。他没有走那条路，而是踏着野草碎石从左边向石岗走去。他不喜欢循规蹈矩。我们卫士和警卫人员紧随着毛泽东走，另有一些工作人员选择了那条小路。毛泽东走的是没有路的野地，出现了带刺的荆棘。有人怕扎破裤子，犹豫了。

“主席，那边有路，走那边吧。”摄影组的胡秀云建议。

“路是人走出来的。”毛泽东继续在荆棘里走着，说：“我这个人哪，从来不肯走回头路，办后悔事。”

胡秀云转身向那条小路走去。毛泽东望望她的身影，又转身问卫士们：“你们怎么办？”

“我们跟主席走。”

“那好，我们就试一试。”毛泽东把大手比划一下，概括了心里想的一切意思。我朦胧感觉，这一幕与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一切似乎有着某种关联，但它到底与什么事有关联呢？

毛泽东登上那座小山岗，对早已到达的人们说：“你们说说，咱们谁的收获大？”

专列开到武汉，毛泽东又一次畅游了长江。在武汉，毛泽东舍车乘船顺流而下，直驶九江。

隔了一天——7 月 1 日，我们跟随毛泽东坐车上了庐山，住进一幢二层小楼里。当年蒋介石曾经在这里住过。

毛泽东上山后，为庐山的风光陶醉，诗兴大发，上庐山的当天就挥毫写下了七律《登庐山》：

一山飞峙大江边，

跃上葱茏四百旋。

冷眼向洋看世界，

热风吹雨洒江天。
云横九派浮黄鹤，
浪下三吴起白烟。
陶令不知何处去，
桃花源里可耕田？

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和他的夫人水静来看望毛泽东。毛泽东请他们帮卫士封耀松介绍个对象。

毛主席说："水静啊，我身边几个小伙子都是不错的，总想选择个漂亮点的，帮帮忙吧？"

水静说："就怕你的小伙子看不上哪，都长的这么精神。"

毛泽东指指封耀松说："帮他找一个吧，你这儿老俵很多么。"

水静想了想说："你们楼里的小郑好不好？"

我跟着凑热闹："好啊，江西老俵好啊，谈谈看嘛。"

毛泽东也笑着提高了声音说："我看也很好，水静，你就当个红娘吧！"

事后，毛泽东还多次问过封耀松："见过面了吧？""谈得怎么样？"后来封耀松还真和小郑谈成了。

由此可见，7月2日开会后，毛泽东一直轻松愉快。尽管他在紧张考虑大跃进和公社化的后果及前途，在考虑同苏联赫鲁晓夫之间出现的矛盾，在考虑自己队伍中出现的不同观点和态度，但他始终信心十足，坚信前途是光明的。整个会议的气氛都是轻松愉快的，一到傍晚，首长们或参加舞会，或观看演出，或三三两两散步，欣赏庐山的真面目。毛泽东刚写作的《到韶山》和《登庐山》两首诗交

给周小舟、胡乔木订正，结果就传了出来，大家互相传抄吟诵，气氛十分融洽。

经过十多天的讨论，大家对形势的看法取得了比较一致的意见，认为：形势大好，问题不少，前途光明。

后来，毛泽东在谈到这一阶段会议时，称之为“神仙会”。

李银桥：彭总上书

7 月 13 日，早饭后，彭德怀来找毛泽东。不巧，毛泽东刚刚睡下，他折身回去了。

第二天——7 月 14 日，彭总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这就是后来人们传说的“万言书”。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彭总在这封信里讲了两个问题。

他首先从基本建设、农村公社化、就业和全民炼钢铁等方面，充分肯定了 1958 年大跃进的成绩是伟大的。但也有不少深刻的教训，认真地加以分析，是必要的有益的。

接着，彭总讲了如何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他说，过去一个时期工作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原因是多方面的。他在分析了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不熟悉等客观因素外，着重指出在我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的主要问题有两个：一是浮夸作风较普遍地滋长起来；二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他说：“1958 年大跃进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样，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把党长期

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

毛泽东看过这封信后，带着苦笑的表情说：“彭老总批给我看的尽是消极材料，尽给我送消极材料。”接着他说出几位中央首长的名字，说“他们送的材料积极”。

三天之后，大会秘书处把彭德怀的信印发给大家。于是在继续讨论《会议纪要》的同时，讨论《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

我们虽然不知道会议讨论的详情，但明显地感到，彭总的上书打破了“神仙会”的平静，开始时那种轻松气氛渐渐消失了。

7 月 23 日上午，召开总结会议。就在这次会上，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情。

毛泽东开始讲话时，看与会同志到齐没有。我见他张望，知道是找彭德怀。按规定，常委们是坐台上，政治局委员坐台下前排，中央委员和各省市负责同志坐政治局委员的后面。彭德怀坐到了最后一排，并且剃了很光的头。

毛泽东看到了彭德怀，我猜想他是不会高兴的，但是没有说什么，开始讲话。

毛泽东在讲话中批评了有“左”的错误的同志，点了几个人的名。点一个名，说一段批评的话：“你尽放大炮。在重大问题上要慎重一些，别老放卫星，没有那么多卫星。”再点一个名，再批几句：“计划平衡没搞好，严重失调……”

批过“左”，再着重批右。因为在大办食堂问题上，中央领导同志间争论激烈，毛泽东对此讲了几句。他望着台上的朱德说：“总司令啊，你说食堂不好。在食堂问题上我们略有分歧。食堂不可不散，不可多散。”

说罢，毛泽东又不指名地批评了彭德怀，加重语气道："军队不跟我走的话，我可以重新到乡下去组织游击队，重新建军……"

散会后，领导同志们有走的，有没走的。彭德怀坐最后一排，所以出去的最早。毛泽东到门口时，彭德怀已经走远。

礼堂是在山坡上，毛泽东下坡，身后跟了几位中央首长。就在这时，彭德怀又忽然回头朝坡上走来，大约是丢下什么东西了吧，正与毛泽东走了个对面。

毛泽东停住脚，挺和气地打招呼："彭总，我们谈谈吧？"

彭德怀脸孔一下子涨红了，一边走一边甩手，非常生气地说："有什么好谈的？没什么好谈的！"

毛泽东望着彭德怀，态度仍很客气："没关系么，我们有不同意见可以坐下来谈谈么……"

"没什么好谈的！"彭德怀甩手而去。当时有几位中央首长在场，都看到了这个场面，闹了个不欢而散。

庐山会议最后错误地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决议中决定把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分别调离国防部、外交部、省委第一书记等工作岗位，但仍然保留他们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

庐山会议前期努力纠正"左"倾错误是正确的，但是会议中途转向，由原来的反对"左"倾改变为反对右倾，在全国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破坏，在经济上中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工作。

庐山会议基本结束时，彭德怀来求见毛泽东，板着脸，表情严

肃。彭德怀确实是个性格刚强的元帅。卫士引他上了二楼毛泽东的卧室，谈了半个小时，板着脸自己出来了。

回到北京后，彭德怀又到中南海来见了一次毛泽东，这一次头发留得很长，没剃光，自己从菊香书屋后门找进来的。他提出要到下面去看看。毛泽东说不要去了，年岁大了，下去也不安全，可以多读几本书么。彭德怀又提出下乡。毛泽东说有时下去看看也可以。

当彭德怀告辞离开时，我望着他的身影，突然想起沙家店战役时那位彭大将军，心里很有些惆怅……

李银桥：中苏关系破裂

1959 年 9 月 30 日，毛泽东吃过两次安眠药，仍然不能入睡。他起来了，坐在沙发里，一杯接一杯喝茶，一支接一支吸烟。

我们明白，国家陷入困难，而且多事。毛泽东的桌子上堆满文件和电报，饥荒已经笼罩全国。安徽、山东、河南等地发来饿死人的绝密电报，这些内容只有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委员才能看到。中苏边境、东南沿海都不平静。最新送来的一份材料是美苏戴维营会谈的消息。

那时，北京普通市民是不知道这些情况的。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挂红旗，歌声、笑声、锣鼓之声处处可闻，准备迎接建国 10 周年大庆。

毛泽东按响电铃，吩咐卫士搞点麦片粥来。卫士用茶缸子在电炉上煮了麦片粥。毛泽东喝麦片粥是为了同赫鲁晓夫谈判。

晚上，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林彪、陈毅等中国领导人在颐年堂同来访的赫鲁晓夫等苏联领导人

开始了会谈。我们在值班室，隔着薄薄一层纱帘将会场看得一清二楚。开始双方还表现出必要的礼貌，偶尔能听到一声笑。谈入正题，气氛便越来越严肃，越来越紧张。

会谈终于发展成争吵。作为领袖的个人气质，赫鲁晓夫远不如毛泽东。毛泽东严肃、尖锐，但是泰然自若。赫鲁晓夫沉不住气，用一触即跳来形容是很恰当的。他挥舞着两只手大吵大叫，缺少领袖的风度。毛泽东不慌不忙，用大手在他和赫鲁晓夫之间划了一道，说了句什么。赫鲁晓夫立刻叫喊起来。于是，少奇、恩来、彭真、陈毅等中国领导人作了尖锐强硬的插话。苏联方面也不再是赫鲁晓夫一个人讲，双方吵得一塌糊涂。唯有苏斯洛夫坐在那里一声不吭。

快结束时，赫鲁晓夫挥动着双手，口气咄咄逼人，很有些“老子党”的架势，可以体会到他的话充满威胁和压力。毛泽东将手在沙发扶手上轻轻一拍，奋然起身，胸膛微挺，头高傲地扬起来，凛凛然一副神姿：谁也休想让我低头弯腰！

会谈不欢而散。

第二天国庆游行，赫鲁晓夫在天安门城楼上通知毛泽东，中止帮助中国搞原子弹的协定。毛泽东仍然谈笑风生，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又像是有人打了个喷嚏一样，不值得大惊小怪。

李银桥：他带头不吃肉

国庆节之后，毛泽东立刻南下视察。专列开入山东时，沿途土地龟裂，到处是白花花的盐碱地。进入安徽后，情况更糟糕，大田里看不到丰收的庄稼，却插着一堆一堆的红旗。毛泽东一路凝视默

想，一支烟接一支烟地抽。

他长长吁了一口气，喃喃道："天灾人祸啊！"他的眼圈红了。他说的人祸，有多少成分是指苏联赫鲁晓夫中断合作，对中国造成的损失；又有多少成分是对他及党内一些领导同志在工作中的失误的反省？不得而知。

车到合肥市已是晚上，整座城市黑沉沉一片，不见灯火，不闻笑语。地方党政负责人汇报，合肥地区是靠水力发电，由于长江水流枯竭，只剩主航道有点水，已经无法发电。

毛泽东凝望黑沉沉的城市，没完没了地吸烟。后来他望着我们，慢条斯理地讲了历史上几次有名的大灾荒，接着又讲了有人趁火打劫，想逼我们屈服。他说："没骨气的国家是不敢顶的。你们敢顶不敢顶？"

"敢顶！"我们知道毛泽东指的是苏联赫鲁晓夫。

"他越压我们越要顶！"毛泽东将手拍在桌子上，斜挺出右肩和胸膛，仿佛要挑起泰山一般。于是，我们有些惶惑浮动的心便立刻踏实坚定下来。

作为领袖人物，不遇挑战是难以充分表现英雄本色的。毛泽东一生有过不少失误。即使失误，由于他那与生俱来又在艰苦复杂的斗争中锻炼而就的坚强个性、气质、决心和意志力，在历史的紧要关头总会产生出一种巨大力量。他一生总是强者。

回到北京，毛泽东向我们郑重宣布两条：自力更生和艰苦奋斗。

他说："全国人民都在定量，我也应该定量。是不是肉不吃了？你们愿意不愿意和我一起带这个头啊？"

我们回答："愿意！"

毛泽东庄严宣布："那好。我们就实行三不：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定量！"

毛泽东历来是"交待了的事情就要照办"的。毛泽东不喜欢吃牛羊肉，只喜欢吃猪肉。但是，在国家最困难的日子里，他曾经7个月没吃过一口猪肉。有时工作一天只吃一盘马齿苋或炒菠菜。宋庆龄同志曾关切地由上海赶到北京，送毛泽东一兜螃蟹，叫毛泽东吃。周恩来多次劝说毛泽东吃口猪肉，毛泽东总是摇头，"你不是也不吃吗？大家都不吃。"

到了1960年冬，饥饿风一股一股在中国大地上流窜。寻找一切可以吞下肚的东西，用来维持一个民族的生存，以求"有朝一日……"

毛泽东躺在他那张过于简朴，但又很适合国情的木板床上，身上搭了一条灰毛毯和毛巾被，靠在床栏上看文件。

他明显老了，眼角发散出细密的鱼尾纹，头发不知不觉变白了许多。我还时常为他篦篦头，想起三大战役胜利后，他说的"白一根头发，胜了三大战役，值得"的话，那情景仿佛就是昨天发生的一样。而现在，他的白头发已经不能一根根去数清了。我的心有些酸。

二十四　挥泪惜别

李银桥：毛泽东的66岁生日

这一天是1960年12月26日，毛泽东虽然眼望文件，却是一副若有所思的神情，他其实是在想心事。后来，他将文件放在床上的书籍堆上，小声招呼值班卫士："小封啊，我起来吧。"

这一天是封耀松值正班。他照顾毛泽东穿衣起床。毛泽东没有出去散步，直接走到沙发那里坐下来，仍然是心事重重地在那里沉思默想，不时呼出一口沉闷的粗气。

"主席，给你煮一缸麦片粥吧？"封耀松小声请示。

毛泽东摇头，靠在沙发上，只用手朝办公桌上的烟盒指了指。封耀松帮他取来烟，划燃火柴。

毛泽东吸燃香烟，吸得很深，然后重新靠在沙发上。工夫不大，他便被一团弥漫的青烟笼罩了。

烟雾中，传出毛泽东一字一板的声音："小封，你去把子龙、银桥、高智、敬先、林克和东兴同志叫来，今天在我这里吃饭。"

下午，我们7个人同毛泽东围在一张饭桌上吃饭，没有酒，没有肉，只是油多放了一些。毛泽东的竹筷子伸向菜盘，没等夹起菜

忽然又放下了，用目光扫视我们 7 个人。于是，我们也放下了筷子。

“现在老百姓遭了灾，你们都去搞些调查研究，那里到底有什么问题啊？把情况反映上来。”毛泽东的声音沉重缓慢，停顿一下又说：“人民公社，大办食堂，到底好不好？群众有什么意见？告诉我。要讲实话。”

我们都无声地点头，神情肃然。

毛泽东用手指指叶子龙，又指指我：“子龙，银桥，你们下去，不去山东，改去河南广泛调查研究，把真实情况反映给我。”

我和叶子龙说：“是，主席。”

毛泽东转脸望着封耀松：“小封啊，你去不去？”

封耀松说：“去。”

毛泽东点头：“那好，那好。”

毛泽东重新环顾饭桌上的 7 个人，忽然目光变得锐利，声音变得严厉：“要讲实话，不许说假话，不许隐瞒欺骗！”

我和同志们用力点头：“主席，我们讲实话。”我在那一刻，想起了毛泽东有一次批评那些有意无意说了假话的同志：“你们是放卫星还是放空炮？你们那个 10 万斤，我当时就讲了不可能，你们还是在报纸上捅出去！……”

这一顿饭，毛泽东没吃几口便放下了筷子。他吃不下去，我们也吃不下去，纷纷放了筷子。

夜里，封耀松用电炉子替毛泽东煮了一茶缸麦片粥，劝说毛泽东喝下去，然后劝毛泽东睡一觉。

“睡不着啊！”毛泽东声音悲凉，“全国人民遭了灾，我哪里睡得着啊！”他又讲起历史上一些大灾荒，讲了当年红军吃树皮，啃

草根的斗争生活，讲了他的理想和追求。

毛泽东多次谈过他的理想。参加十三陵水库工地的义务劳动时，他就曾说过，不但要改造自然，更要改造人类自身。他说，人不应该自私自利，为自己干活就有劲，为人民服务就缺少热情和干劲。他希望能教育出大公无私的新人来，都能具有为人民服务的自觉性和积极性。他说："人类有几千年的私有制，要改变私有观念是很难很难的啊。越是难我们越要做，否则还要我们共产党人干什么？"

也许，毛泽东为实现他的理想有些急躁了？超越了物质条件允许的范围，超越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但是，我始终认为他的理想是伟大而高尚的。

毛泽东睡不着觉，下床走到办公桌前，坐下来给我们 7 个人写了一封信。是用铅笔写的，写了三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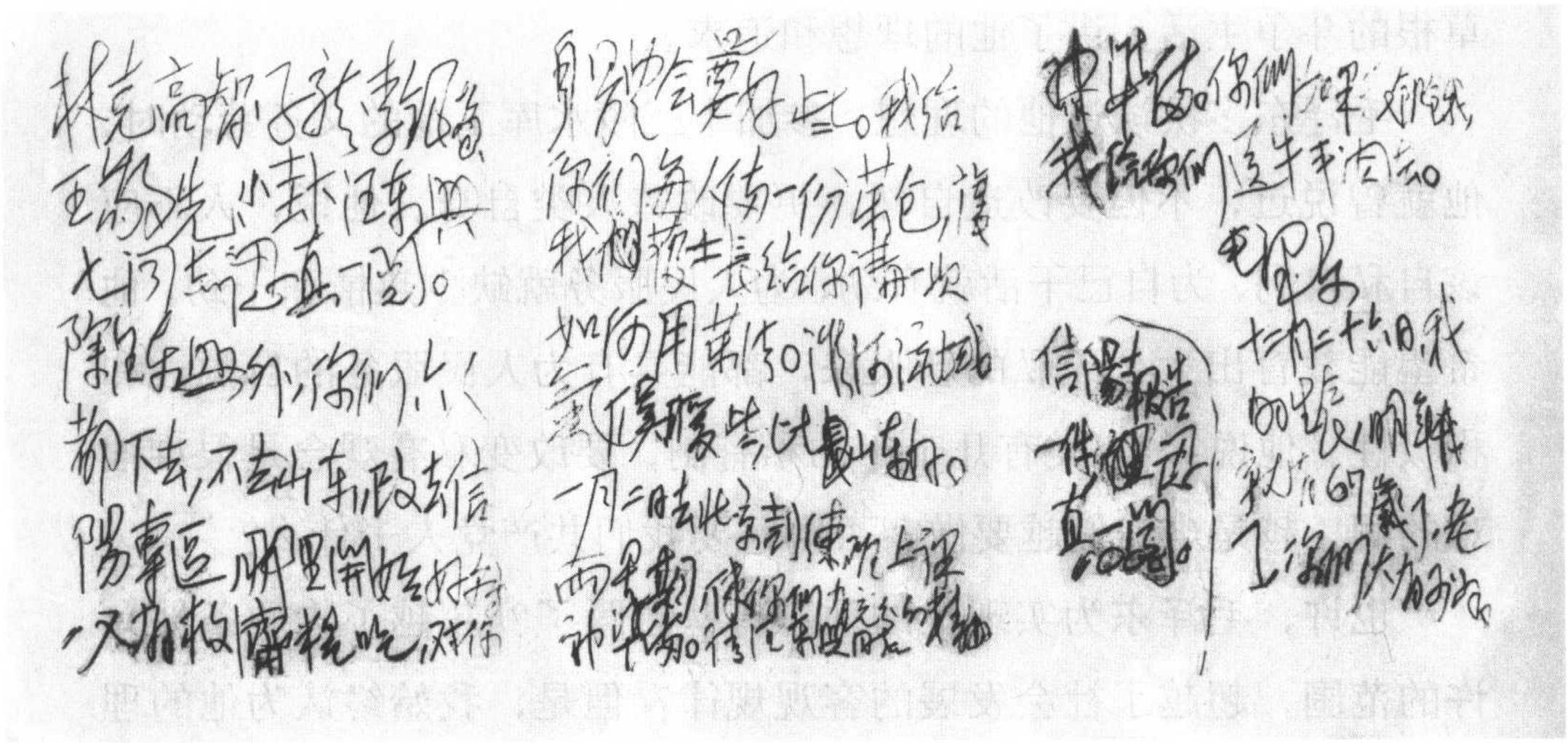
林克、高智、子龙、李银桥、王敬先、小封、汪东兴七同志认真一阅。

除汪东兴外，你们六人都下去，不去山东，改去信阳专区。那里开始好转，又有救济粮吃，对你们身体会要好些。我给你们每人备一份药包，让我的护士长给你们讲一次，如何用药法。淮河流域气候暖些，比山东好。一月二日去北京训练班上课两星期，使你们有充分的精神准备。请汪东兴同志作准备（原文如此）。你们如果很饥饿，我给你们送牛羊肉去。

信阳报告一件，认真一阅。

毛泽东

十二月二十六日，我的生辰，明年我就有 67 岁了，老了，你们大有可为。



我们一行 6 人去了河南。省委没有分配我们去信阳专区，安排我们去了许昌地区鄢陵县。走前，毛泽东同我们集体合影。半年后我们回来汇报了真实情况：大办食堂并不好。之后，我们又去江西贵溪县劳动半年。到江西时，中央已经发下指示：解散大食堂。

李银桥：毛泽东“还债”

还在 1956 年，毛泽东给章士钊先生写了封信，又叫我从中南海供应站取了两只鸡，送到章士钊家中。

章士钊正坐在门口的一张躺椅上，我把信和鸡交给了他。

他拆开信看后，笑了笑，问道：“主席身体怎样？他还那么忙吗？”说罢，进屋写了封信，让我捎给毛泽东。

1961 年，我国经济处于困难时期。有一次，毛泽东对章士钊说：“共产党不会忘记为她做过好事的爱国人士。当初你支援留法勤工俭

学的那笔款两万元，是我经手借的，一部分给了去欧洲的同志，一部分带回湖南开展革命活动。”毛泽东又诙谐地说：“现在有稿费可以还债了。”

打这以后，每年农历正月初二，毛泽东总要让秘书送两千元人民币到章士钊家中，直到 1971 年，整整 10 年。后来停了一年，毛泽东发现了，又对左右的同志说：“这个钱不能停，还要还利息呢。”于是 1973 年春节，秘书又送去了两千元。这时章士钊住在北京医院，接到这份礼物时，激动地对家人说：“主席想得真周到，他是要在经济上帮助我，怕我钱不够用。主席怕我好面子，不肯收，故意说是还钱，还利。其实这笔钱在当时是向社会名流募捐的，我不过是尽了一份力罢了。”

毛泽东所说的“借债”，是 1920 年春毛泽东在上海为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筹备旅费，向章士钊求援。章士钊即向上海工商界名流募捐了两万元相助，表示了对勤工俭学的支持。

李银桥：他说：“你们比我的孩子还亲啊”

1962 年 4 月的一天，值班卫士张景芳跑来说：“卫士长，主席叫你去呢。”

我理理衣冠，走进毛泽东卧室。他还是老习惯，躺在床上，背靠床栏看文件。听见我的声音，抬起头望着我说：“来，过来。”

我一步步走到他床边。我的脚步有些艰难，当时担任警卫局长的汪东兴已经和我谈过调离的事。那次，和我同时被调离毛泽东身边的还有叶子龙、封耀松、高智和王敬先。

毛泽东与李银桥

毛泽东用一只手握住我的手，另一只手在我背上轻抚，半晌才问道：

“听说你要走啊？”

我难过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听说你要求到石家庄去？”

“你听谁说的？”我问了一句。

毛泽东没有作声。

“我要离开你的话，我不到石家庄去，到天津去。”

“那好。”毛泽东提高声音说：“你去天津，我从那里经过时，可以找你谈谈……”

又是难忍的沉默。

“唉，”毛泽东轻轻叹息一声，说：“你跟我这么多年，人也长大了。你在我身边工作，帮了我的忙。你是个好同志，你在我这工作，一直兢兢业业，使我工作得很顺利，省了不少心。可是……可你老跟着我怎么行啊？我死了你怎么办？”

这时，在毛泽东身边生活工作 15 年，多少难忘的往事一下子浮上心来。我的泪水再也忍不住，扑簌簌地滚落下来。

毛泽东是感情很丰富的人，容易动感情。我一哭，他受不了，马上也流下泪来，声音哽咽地说：“我也舍不得你走啊。我和我的亲人，和我的孩子们一年也见不上几次面。你在我身边工作，我们每天在一起，朝夕相处，你们比我的孩子还亲啊……”

毛泽东说到这里，我呜地哭出了声。这是实情话。从我恋爱、结婚到生孩子，毛泽东事事处处关心，就像父亲一样。我逐渐把自己当成了毛泽东家庭中的一员。我们互相关心互相帮助，整整 15 年呵……

我想起转战陕北时，我陪着他老人家度过了多少个不眠的日日夜夜。他累了，我帮他按摩；我困了，他悄悄把衣服披在我身上。我有了心事就向他讲，他有了不愉快的事也跟我说，就连他跟江青吵嘴也要跟我说。战争年代生活苦，有时贺老总送一些鱼来，他吃一半还要给我留一半……

现在，毛泽东一边流泪，一边握着我的手说："我得为你的前途着想，我不能误你的前途。你在我这里，地位够高。可卫士长也只是团级干部，职务太低。老在我这里要影响你的前途。下去多锻炼锻炼，工业、农业、公安，几种事情都干干，取得经验，提高能力，也好胜任更重要的工作。下去以后要夹着尾巴做人，要搞好团结，多多接触工人群众，多多向周围同志们学习……"

，这时，毛泽东再也控制不住感情，用手一拉，把我一下子揽入怀中，拍打着我的后背，哭道："银桥，我死以后你要每年到坟头上去看一次啊……"

这时，我泪如泉涌。但是看到毛泽东伤心得厉害，马上想起自己的责任，不能让主席伤身子啊！我竭力克制住自己，流着泪说："主席，我听你老人家的话，下去要好好干，不辜负主席的期望。"

毛泽东擦着泪水点头："好，那好，那好。你在我这里工作 15 年，职务不高地位高，一举一动都要注意影响。不要脱离群众，干任何事，不干则已，干就要干出成绩；事不在大小，都要善始善终，我身边的人都要有这么一种精神，不搞半途而废，有一口气就要干到底！"

"主席，我记住了。"

"以后你每年都要来看我一次，我这里就是你的家。我活着你来

看我，我死了，你每年到我坟头上看我一次，看一次我就满意了……”

说到这里，我忍不住又哭出了声。

最后，毛泽东一边擦泪一边拉开抽屉，指着一个牛皮纸袋说：“你到天津工作，安家需要钱。拿上点钱。这是800元，帮你解决些问题。”

从1952年开始，毛泽东多次在经济上帮助我和其他卫士。我摇头，说：“我不要，我不缺钱。”

“拿着！”毛泽东说。

毛泽东见我拿了钱，点点头，声音放缓和，又叮嘱说：“下去后多依靠工人，特别是要多向老工人学习，凡事要多请教工农兵。小韩和孩子们什么时候回来？”

我说：“星期六。”

“那好，那就星期六一起来我这里见一见。”

李银桥：最后一次合影（一）

星期六下午，我爱人韩桂馨从学校回家。因为是星期六，两个孩子也比平时早些回到家里。

晚饭前，卫士张景芳来通知，说主席在游泳池等我们呢。

我们全家简单地吃点饭，就匆匆赶到游泳池。游泳池也是毛泽东办公休息的地方，在怀仁堂的东北面，里面有会客厅。

我和韩桂馨叫两个孩子等在外面，我们俩先走进会客厅。毛泽东正坐着等我们，一见我们进来，便立起身来迎住我们握手。刚谈了几句话，毛泽东便问：“孩子呢？孩子怎么没来？”

我说："孩子来了，在外面呢。"

毛泽东朝门外望："进来呀，快叫孩子进来。"毛泽东张望时，我们也一起朝门外张望。这一刻，闪光灯亮了一下，摄影师吕厚民同志为我们夫妻同毛泽东拍了第一张照片。

我接孩子进来，毛泽东鼓掌欢迎，并且同孩子们握手。同我的儿子李卓韦握手时，毛泽东夸奖孩子长得漂亮。吕厚民同志又及时按下照相机快门，拍下第二张照片。毛泽东又同我的女儿李媛媛握了手。

毛泽东望着我说："我们站着合影吧。"

我不同意，搬来一张椅子，请毛泽东坐下。我说："主席，您坐下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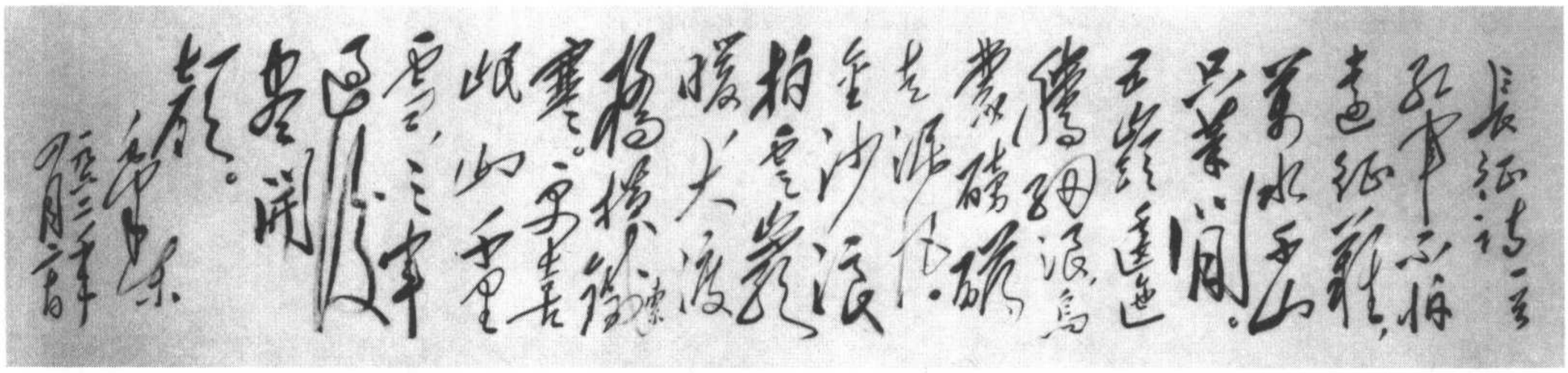
"不坐不坐。"毛泽东往起站。

"您坐下好。"我又按毛泽东坐下，而后我们全家分立毛泽东身后合了一张影。

毛泽东与李银桥、韩桂馨

我曾请毛泽

东为我写字，老人家已经事先写好，写在一个很长的折子里。老人家说：“近来没作新诗，抄了一首旧诗送给你吧。”



毛泽东亲笔书赠李银桥的《长征》诗

打开看时，是毛泽东1935年10月所作的七律诗《长征》。我很满意，收好折子坐回沙发上。这时，吕厚民同志给我们全家同毛泽东一道又合了一张影，照片中我手中拿的就是毛泽东赠我的折子。

后来，我请许多中央首长在折子上题了词，还有许多著名画家画的画。可惜，到天津后，被河北省委书记林铁和他的夫人弓彤轩借去看，说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丢了，再不曾要回来。

毛泽东夸李银桥之子李卓韦长得漂亮

上图右一为李银桥、右二为韩桂馨、左一为李媛媛、左二为李卓韦

毛泽东与李银桥一家

毛泽东与李银桥、韩桂馨夫妇

韩桂馨：最后一次合影（二）

北京的 4 月，已是春暖花开的季节。但是，自从听说银桥要离开主席的消息后，我的心里就阴沉沉的，甚至没有感到春天的来临。那是 1962 年，组织上决定调银桥去天津工作，主席已和银桥谈了话，并且给了银桥 800 元的安家费。这已是主席给我们的第二笔钱了，第一次是儿子刚接回时，主席给了我们 200 元，说是“补助孩子费用”。想想我们将要离开主席了，我真是舍不得呀。

记得是一个星期六，我和孩子都照例早早回到家，全家人团聚了。快要吃饭的时候，卫士张景芳同志到我家通知说：“毛主席在游泳池等你们呢。”我们全家人匆匆吃了点饭，就赶往游泳池。其实游泳池就是以前游泳休息的场所，1961 年以后，主席就一直在这里办公和休息。游泳池在丰泽园的北边，离怀仁堂较近，就在怀仁堂的东北面。

我们让孩子们等在外边，银桥推开门，把我领到主席的会客厅。一进门，我就看到了主席，他正坐着等我们。见我们来了，主席立起身，我们迎上前去握住老人家的双手。刚互相问候几句，主席看了看我们身后，问：“孩子呢？孩子怎么没来？”银桥说：“孩子在外面呢。”

毛主席朝门外望着，说：“进来呀，快叫孩子进来。”与此同时，我们也跟在主席身后，望着孩子们进来的方向。“啊，长这么高了！”主席习惯地拍拍手，欢迎孩子们到来，见到孩子，他高兴地笑了。

毛主席建议与我们全家一起照个相，他说：“我们站着合影吧。”

银桥不同意，他搬来一把椅子，请主席坐着："主席，您坐着好。"主席推辞道："不坐不坐。"我和银桥都请主席坐，然后我们全家围在主席身边拍了一张合影。

我们坐回沙发上之后，毛主席递给银桥一个很长的折子，上面是主席的手书七律《长征》。主席是应银桥的要求写的，主席说："近来没作新诗，抄了一首旧诗送给你吧。"银桥在桌旁展开一看，遒劲潇洒的字体，很有气势。他小心翼翼地折起来，向主席道谢。主席在百忙当中，还为即将离去的工作人员书写一篇自己的诗作，其情可叹。

1963 年河北发了洪水，主席曾到天津视察。1964 年初，我和银桥又一起到北京看望毛主席。那次大水灾，我们家乡的房屋损失惨重。主席已了解到我们家乡的灾情，在我们到他那之前，已经分两个信封，装了 1000 元钱，让我们帮助老家重建家园。我和银桥哪肯要他老人家的钱？但主席非要我们收下，他对银桥说：

"这是我的稿费，你家乡被水淹了，受了不少损失，多少帮助你解决些困难。以后你每年回家乡一次，了解下边的情况，给我写汇报材料。"

银桥根据这一指示，每年都回一次河北安平老家，把所见所闻写成调查材料，并拍成多幅照片，通过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同志转呈毛主席。"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这一调查工作被迫中断。

1976 年 9 月 9 日零时 10 分，毛主席因病逝世。从广播中听到这一噩耗后，我们全家人痛哭失声。当晚，银桥驱车进京，接着我带着孩子乘火车也到了北京。

我们全家人一起参加了悼念毛泽东主席的纪念活动。望着那熟

悉的面容，耳边仿佛还回响着他老人家的声音。我们的心都要碎了！

李银桥：永远的怀念

1963 年抗洪救灾，毛泽东来天津视察。省委书记汇报完工作后，回来对我说：“你到主席那里去一趟，他打听你呢。你看看他，再请主席写几个字。”

我问：“写什么字啊？”

省委书记交给我一张纸，上写：“一定要根治海河”。另外还有省委书记的信和防洪抗灾的汇报材料。

毛泽东已经回到北京。我赶到北京，先见到汪东兴，说明要见主席，请他老人家题字。汪东兴说主席还没起床，叫我等等。

等候期间，我向汪东兴汇报了天津的情况以及我下去以后的工作生活情况。

汇报完，电话铃响了，说主席已经起床，正在会客室等我。我忙告辞汪东兴，赶到毛泽东那里。

走进会客室，毛泽东起身迎住我热烈握手，边握手边询问我的情况。我简单汇报了一遍。大家都在沙发里坐下。

毛泽东又问：“小韩怎么样？”

我说：“挺好。”

毛泽东说：“你转告她，我问她好！”

“谢谢主席的关心。”我说着又问：“您现在身体怎样？”

毛泽东说：“身体挺好，就是眼有点花，看小字要用放大镜了。”

谈了一会儿话，毛泽东问：“你到北京干什么来了？”

“看看主席。林铁同志请主席题几个字，还有一封信和材料。”我说着，将“一定要根治海河”的字请毛泽东看。这几个字是河北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写的。毛泽东看过字后，说：“今天是 14 号。你等两天，我写好了再交给你。”

又谈了一会儿别后的情况，我告别毛泽东回到北京饭店等候。

17 日，毛泽东题写了“一定要根治海河”几个字。

19 日，卫士张景芳将毛泽东的题字带到北京饭店交给了我，同时还有毛泽东给林铁的信。信的内容是：

林铁同志：

遵嘱写了几个字，不知是否可用？浪淘沙一词，待后再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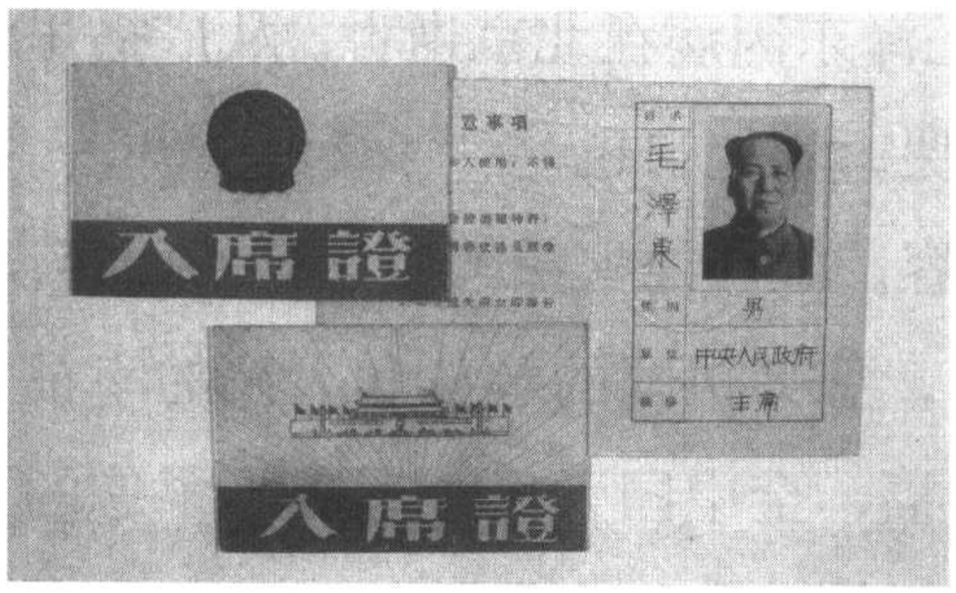
此祝

康吉！

毛泽东十一月十七日

1964 年初，我和韩桂馨又一道去看望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谈的话。当毛泽东得知我们的家乡被水淹了的情况后，又支援我 1000 元钱，早用纸包好了，分两袋，亲手递给了我，说：“这是我的稿费，你家乡被水淹了，受不少损失，多少帮助你解决些困难。以后你每年回家乡一次，了解下边的情况，给我

李银桥收藏的毛泽东参加国庆活动和参加苏联十月革命 40 周年纪念活动时用过的部分证卡、胸标



写汇报材料。”

根据这个指示，我在 1964 年和 1965 年都回家一趟，就所见所闻写成调查材料，并照了照片，通过机要渠道，送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同志转毛泽东。

1965 年 11 月，杨尚昆同志蒙冤停止了在中央办公厅的工作，我就再没有给毛泽东写材料送材料了。

1976 年 9 月，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在人民大会堂毛泽东灵前瞻仰遗容

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毛泽东因病在北京逝世。从广播里听到这个噩耗后，我们全家失声痛哭，不能自已。

我们全家一起瞻仰了主席的遗容。望着他那熟悉而慈祥的面容，我止不住泪如泉涌。主席啊，主席，您为祖国的解放和人民的幸福操劳了一生，可自己没有享过一天福，全中国人民永远忘不了您的恩情，我和我的全家也忘不了您的恩情。我们和我们的子孙一定继承您的遗志，把您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以后，每年9月9日毛泽东的祭辰和12月26日诞辰，我总要到毛主席纪念堂去看望他老人家。全心全意为人民谋福利的毛泽东，永远活在我心中，永远活在全国人民的心中！

二十五　后来的故事

韩桂馨：录访李讷

我在中南海住的时候，虽然不在主席身边工作了，但还能见到李讷。自从调到天津工作，我就没有机会见到她了。毛主席逝世，我和银桥到北京瞻仰主席遗容时，在守灵人员中没有见到李讷。那时我不能去中南海了，虽有想见李讷的念头，但也只得作罢。当时我想主席的去世对李讷肯定是个打击，我要去安慰安慰她。

1976 年 10 月，“四人帮”被粉碎了，我和全国人民一样，有一种重新获得解放的感觉。这时我又想到了李讷。不知为什么，我特别想看看她，因为李讷毕竟是自己带过的孩子。不管怎么说，江青总是她的母亲，这事肯定对她有刺激，她受得了吗？现在李讷怎么样了？这些问题一直困绕着我。李讷身居高位时，能不能看她倒没什么，如今她身边没有亲人了，又遇到了困难，我能不闻不问吗？那些天我眼前总浮动着李讷小时候的影子：她端着小瓷碗，和我一起到大食堂吃黑豆；行军时骑在马上打瞌睡；腰上扎着布带子一本正经地唱京剧；在窑洞里练字；和小朋友们扭秧歌……这些情景像电影画面一样在我脑子里过。

我和银桥到处打听，虽不知道李讷的确切地址，但知道了她的一些情况。她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曾到《解放军报》社工作，当时化名肖力。后来主席叫她下去到工人农民中间体验生活。这样，李讷又到了江西进贤县中办五七干校，并在那里认识了警卫局服务处的一位同志，两人有了感情。这个人符合主席给李讷定的“在下面选择，找个一般人”的条件，但江青不同意。李讷按照自己的意愿，与之成婚，一年后生了一个儿子。由于种种原因，两人婚后渐渐在感情上产生了隔阂，这次婚姻以失败告终。离婚后，李讷独立承担抚养孩子的义务。听说李讷目前正在生病住院，孩子就让警卫战士们看着，我心里就更着急了。1977 年我和银桥到北京，参加毛主席逝世周年的纪念活动，我就对银桥说：“我们得想办法看看李讷，她一定有难处。我们不去看就对不起毛主席。”银桥听罢，起身就去向领导请示。

不久，我们得到消息：可以去看李讷了。我们由中办警卫局的沈同同志陪着，到北京郊区昌平县的一所医院去看望李讷。我们进病房时，李讷正坐在板凳上看书。15 年不见了，李讷变化很大，白白胖胖的，完全是个少妇的样子了。看上去她的气色还比较好。我们一进门，她就认出了我和银桥，亲切地喊：“银桥叔叔！”“小韩阿姨！”显然对我们的到来很高兴。我们在医院的走廊里坐着谈话。我小心翼翼地问她身体怎么样，劝她好好休息，早日恢复健康。我们避免提“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帮”等字眼，并含蓄地劝她想开一些。

李讷听着，不断地点点头，但她说话很少。分手时，我们都有些恋恋不舍的。我和银桥答应以后一定要常常看望她。

李银桥夫妇与李讷

韩桂馨：为李讷做红娘

1979 年银桥调回北京工作。不久，我也回到了北京。李讷出院后，中办警卫局为她安排了住房，就在西城的太仆寺街，我们看望她就更方便了。

李讷的身体从小就弱，后来又得了肾盂肾炎、胆结石症，备受病痛的折磨。我们见她一个人带不了孩子，就给她物色阿姨，先后换了两个阿姨。她的孩子由于小的时候护理不当，也落下点毛病，我们又托人找医生，又找偏方，把孩子的病治好了。

那时，李讷过日子确实挺难的。我每次到她家，差不多都见她煮面条吃，饭菜老是凑合。还有就是买粮、买菜，虽说有个小车拉

回家，李讷一个人也扛不上楼，她就和幼小的儿子一起，把粮食抬到楼上。我看到她这样，心里很难过，就对银桥说："银桥，主席在世时对咱们那么关心，还帮助咱们结婚成家。现在主席不在了，咱们要像主席关心咱们那样关心李讷才对。"他很赞成，说："我也是这么想，李讷在家连个说话的对象都没有，咱们应该帮助她建立个新家庭。"

从那次谈话后，我就暗暗替李讷物色对象。但李讷有什么想法呢？我也要了解了解，才好有个选择的标准，否则，这种事很不容易成功。于是我再次去时，就有意把话题往这方面引。我跟她说："你这样一个人带着孩子有多难哪，还是组成个家庭好。我为你介绍个男朋友吧。"李讷听了我的话，沉默了一会儿，她看着我，叹了口气：

"我妈妈是'四人帮'，坐监狱呢……谁肯找我呀？"

我赶紧劝她："你不要这样想。你妈妈是'四人帮'，你爸爸还是人民领袖呢。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就是历史！这是谁也改变不了的事实！你还是找个人好，小尹还要帮你的忙呢。"

小尹名叫尹荆山，曾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现在是中国远东国际贸易总公司的总经理。但李讷对他的印象还停留在多年以前："啊？小尹那么小，还懂得这事？"

"不小了，都 40 多岁了。你看看大伙儿都在关心你哪。"

李讷不好意思地笑了。我心里有了底。

1983 年，老战友王景清来看我们，在交谈中，我认为机会来了。

王景清是陕北神木县人，1940 年参加革命。在西柏坡时，曾在刘少奇身边担任警卫，进城后在中央警卫团工作，后调到云南怒江军分区任参谋。老战友多年不见，见了面有说不完的话。后来我就

问起他的家庭情况。他说和他爱人已经离了婚，大孩子已经独立了，小的判给对方抚养。现在他自己已经离休了，也想建立个家庭。从谈话中我还了解到，他在陕北老家已经没有亲人，不想回去了。在云南又有那么一段不愉快的经历，在北京也没有什么亲戚，正在考虑把家安在哪里呢。

我觉得老王人不错，虽比李讷大十多岁，但身体好，人也长得挺精神，两个人也般配。于是就向老王提起李讷，并把李讷的近况向他作了介绍。老王当警卫时见过李讷，印象也很好，对李讷目前的处境很同情，同意见一见。

这时候，我的家搬到灵境胡同了，离李讷住的地方仅十来分钟的路。我很快就做好了安排，领着老王到了李讷家里。由于我已把老王的情况事先向李讷作了介绍，李讷也有了思想准备，所以客人一到，李讷就端出准备好的糖果、糕点。初次交谈双方都有好感，后来，他们逐渐自己联络，我的任务就完成了。看得出，王景清的到来，抹去了李讷脸上的愁云，孩子和老王相处得也很好，家里的欢笑声多了。经常来往，互相关照，感情逐步加深了，看到李讷和老王合得来，我和银桥真是打心眼儿里高兴啊！

不久，他们写了结婚申请。1984 年，李讷和王景清结婚了。

李讷的婚礼简单而朴素，只在家里摆了一桌酒席，饭菜全部由老王做。新郎官的手艺很不错。参加婚礼的有叶子龙和他女儿丽亚，还有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康一民和我们夫妇，大家祝贺王景清和李讷夫妇健康幸福、白头偕老。

杨尚昆同志得知消息，送来了礼物，还有一袋包装精致的高级巧克力，他知道李讷小时候喜欢吃这种食品。在贺信上，杨尚昆全

在李讷家坐客，左一为李讷丈夫王景清

家人都签上了名字。王光美同志知道我们为李讷介绍对象的事以后，说：“你们办了件大好事，看在主席面上，应该帮助。”我握着王光美同志的手，心里也很感动。要说“文化大革命”中的冤案，刘少奇的冤案是最大的一件，江青对王光美的迫害也尽人皆知了。但王光美对李讷还如此关心，这是多么宽广的胸怀啊！

王景清擅长书法、绘画，李讷喜欢历史，对书画作品有一定的鉴赏能力，字也写得好，两个人有共同语言。老王料理家务、烹调、缝纫都很有水平，生活上处处关照李讷和孩子，一家人生活过得很好。老王的孩子有时也来看望父亲和李讷。江青见过王景清，并看过他的隶书，还征得同意留下了一幅作为纪念。她对新女婿也很满意。

最近，中央办公厅又给李讷和老王在西郊安排了一套比较宽敞

李银桥夫妇看望李讷夫妇。右三为李讷、右四为王景清、左一为李银桥、左三为韩桂馨

的住宅，环境也比较安静。我们住得比较远了，但是我们还常常电话联系，逢节假日还经常来往。

李讷和老王像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一样，过着安静的日子。他们有时到各地去游览，去看看祝国的大好河山，看看改革开放后的新面貌，生活平静又充实。李讷的人生经历了大起大落，现在有了一个好的归宿，所有关心她的人都感到高兴。

李银桥、韩桂馨：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自从毛主席逝世以后，每年的9月9日毛主席祭辰和12月26日毛主席诞辰，我们都要到纪念堂看望他老人家，就是远在外地，我们也要在这两天赶回来。曾在毛主席身边工作过的其他同志也是这

种心情。这两个纪念日现在已经成为我们工作人员和毛主席的亲属们相聚的日子。我们在这里简单地介绍一下他们的情况。

毛主席的次子毛岸青，现在主要是在家休养。他好静，爱下国际象棋、听音乐和看电视。他的爱人邵华现仍在军队工作，除了照顾岸青外，还在编写回忆毛主席的著作。毛新宇是岸青的儿子，也是毛主席唯一的孙子。目前正在读研究生，酷爱历史，尤其对中国历史和世界现代史感兴趣。他每次来纪念堂看望爷爷，都增添一种使命感。他决心继承爷爷的遗志，把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李敏是毛主席的长女，目前工作关系在部队，副师级。李敏的丈夫孔令华在深圳工作。他们的儿子孔继宁已经大学毕业，现任我国驻外使馆武官；女儿孔东梅大学毕业后也有了合适的工作。李敏

李银桥夫妇看望李敏

李银桥夫妇在李敏家，左起李银桥、李敏、李敏之女孔东梅、韩桂馨

左一为王景清、左二为毛新宇、左四为李讷、左五为李讷之子王效之、右一为孔令华、右二为邵华、右三为毛岸青

李银桥、李敏、李讷三家人团聚

生活很简朴，她本人由于身体不大好，很少参加活动。

李讷现在精神状况很好，每年都来参加纪念毛主席的活动。她待人谦虚有礼，不愿意突出自己。这两年，她身体状况也有好转，有时还和老王一起到外地走走。她的儿子王效之在外事职高毕业后，在一家中外合资的宾馆里工作。李讷要求他从基层干起，扎扎实实做好本职工作。

主席的子女们都没有凭借自己的父亲谋求高位，也没有搞不正之风。从这一点来讲，他们是按主席的教导去做的。

每次我们来到纪念堂，都能看到来自各地的群众悼念这位伟人。人群里面有白发苍苍的老人，也有满脸稚气的儿童，还有一些是残疾人。我们跟着缓缓移动的队伍，踏上纪念堂的石阶时，心情都很

激动。是啊，毛主席永远活在亿万人民的心中！水晶棺中，主席的遗容是那样安详，仿佛他只是太累了，正在休息。但是我们却再也

李银桥、韩桂馨的幸福晚年

听不见他的声音了，我禁不住泪流满面。

我们常和孩子们讲起在毛主席身边的故事。我们相信，自己在毛主席身边所受的教诲，对自己的一生都有巨大的影响。毛主席的音容笑貌时时浮现在我们的眼前，鼓舞我们战胜困难，不断前进。我们为自己有这样一段不平凡的经历感到幸福和自豪。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　　（修订版）
作者＝李银桥　　韩桂馨著
页数＝３８７
ＳＳ号＝１１７７３２１０
出版日期＝２００６年０９月第２版
出版社＝河北人民出版社

目录
正文